



# 毛泽东在湖北

刘继增 毛 磊 袁继成 主编

● 湖北人民出版社 ●

上江之九河法中國沈一疏章  
南水烟雨身之念之急此疾  
大江為龍知何去乘舟  
乘把江封河之河也  
高調書美法管理  
一九二七

责任编辑 程世德  
封面设计 陈绪初

ISBN 7-216-012

D·290 定价



# 毛泽东在湖北

长江之九派流于湖流之一派首  
南山烟雨看舟舍之忽地顿  
大江若鹤知河去剩有帆  
系把浮对清之湖道过  
高 调寄菩萨蛮 毛泽东  
撰一九二七

刘继增 毛 磊 袁继成 主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01号

毛泽东在湖北

©刘继增 毛磊 袁继成 主编

出版者 湖北人民出版社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邮政编码 430022

发行科电话 537093

责任编辑 程世德

印刷者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发行者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印张 10

1993年10月第1版1993年10月第1次印刷

插页 10

印数 1—1000册

字数 250千字

ISBN 7-216-01252-6/D·290

定价：8.50元

本版图书如印制质量不合格，可由印刷厂调换



## 前 言

---

1918年初夏的一天，湖南长沙。一个伟岸魁梧的年青人正在捧读一封北京来信。他就是后来为整个世界所瞩目的人民领袖毛泽东，其时他刚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这封信是他过去的恩师杨昌济先生从执教之地——北京大学写来的，告知他北京正发起赴法勤工俭学活动，希望他能赴京寻求发展。得知这一信息，毛泽东和他的伙伴们兴奋起来，这年8月，毛泽东率领20名新民学会会员，辞别长沙城，先步行，后乘船，顺流东下，直达九省通衢的武汉，而后在汉口改乘火车继续北上……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离开他的家乡湖南进入更广阔的天地，也是毛泽东第一次来到湖北、武汉。尽管他在武汉逗留的时间十分短暂，但武汉这座当时仅次于上海、中国中部最大的商业城市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19年12月8日，将满26岁的毛泽东作为100人组成的驱张（敬尧）赴京请愿团团长，再度来到武汉，并小住了10天，进一步加深了对武汉的认识。自此毛泽东与湖北、武汉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他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湖北、武汉成为他始终格外

# 目 录

---

---

## 前 言

---

---

### 第一章 心潮逐浪高

- 一、驱张赴京途中…………… 3
- 二、由黄浦而至汉皋…………… 8
- 三、造就一批“农民王” …… 12
- 四、视察湖南农运给中央报告 …… 16
- 五、“糟得很”和“好得很” …… 20
- 六、“全国农民的总炮台” …… 24
- 七、发生在南洋大楼的一次较量 …… 28
- 八、阳新、麻城平暴 …… 31
- 九、在中央土地委员会上 …… 35
- 十、《菩萨蛮·黄鹤楼》…………… 39
- 十一、都府堤的日日夜夜 …… 43

---

---

### 第二章 而今迈步从头越

- 一、“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  
…………… 51



第一章



心潮逐浪高





## 一、驱张赴京途中

自从1840年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武力打开东方古老的中国大门之后，逐渐迫使它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从那时起，中华民族便走上了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自由的艰难历程。在这1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为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中华民族涌现出了千百万的民族精英，而毛泽东则是这无数民族精英中，当之无愧的、最杰出的代表人物。1918年4月，毛泽东集合一批志同道合的热血青年，在湘江对岸，岳麓山下，成立了一个探索真理、为实现救国救民而英勇献生的进步团体——新民学会。正是这个进步团体，日后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一大批最优秀的党员，同时也为毛泽东尔后领导湖南的革命运动起了十分重要的奠基作用。

继“五四”爱国运动之后，1919年9月，毛泽东在湖南领导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随着驱张运动的深入，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领导核心的学生界、教育界组织了100多人参加的“驱张代表团”，由毛泽东任总团长，分赴北京、上海、广州、衡阳、常州、柳州等地开展驱张活动。1919年12月6日，毛泽东亲自主持赴京代表团，由长沙赴北京沿途作驱张宣传，展开活动。

毛泽东率领代表团赴京前，事先已筹划先在武汉地区展开驱张斗争。因为武汉是中国中部和长江中游的一个重镇，水陆交通四通八达，称之为九省通衢，是南来北往的中心枢纽。当时的武汉不仅以商业、工业发达而驰名中外，也以革命名城著称于世。辛亥首义就是在此发生。但更重要的是，武汉地区以恽代英为首的

进步团体互助社与湖南毛泽东为首的进步团体新民学会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而武汉又是与湖南、北京、安徽等地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的联络站。正因如此，毛泽东决定赴京代表团先在武汉地区展开驱张运动，制造声势，广为宣传，争取各省的支持，将驱张运动尽早推向全国，以迫使北京政府撤换湖南的反动军阀张敬尧。

张敬尧，字勋臣，安徽霍丘人。这个被湖南全省各阶层人士称之为“张毒”的反动军阀，是由段琪瑞皖系军阀执政的北京政府一手扶植起来的。他在湖南统治时期，杀人如麻，抢劫财物，横征暴敛，摧残文化教育，钳制舆论，无所不为，无恶不作。当“五四”爱国运动的风暴席卷全国，激荡湖南时，毛泽东率领新民学会会员立即响应，组织起湖南学生联合会，创办《湘江评论》，在全省展开了抵制日货、焚烧日货，爱国储金运动。然而张敬尧，始则严密封锁、控制，继则诉诸武力，疯狂弹压。他不但下令查禁《湘江评论》，而且以武力强行解散了领导爱国运动的湖南学生联合会，致使湖南人民反帝爱国运动一度不得不转入地下活动。11月初，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湖南学生联合会再度组建，继续进行反帝爱国斗争，并公开了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走狗，北洋军阀政府在湖南的鹰犬张敬尧的斗争。12月2日，当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长沙各阶层人士在教育坪再次举行焚毁日货的示威大会时，遭到了张敬尧的武装驱逐、辱打。这一残暴的镇压，激起了学生们的愤怒，是日，长沙学生开始总罢课，抗议张敬尧的暴行。学生的这一行动得到了长沙各界人士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一城人民驱张运动掀起了新高潮。“张毒一日不出湘，学生一日不返校”。长沙学生誓与张敬尧作殊死的决斗。

毛泽东这是第二次赴京途经武汉。1918年初夏，毛泽东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后，接到过去的恩师杨怀中先生的北京来信，告知北京发起了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希望他能去北京。毛泽东将此



事与新民学会会员商量后，共同议定由蔡和森先赴北京。蔡和森到京后，在来信中向毛泽东谈了北京的情况，希望毛泽东也能尽早起程来京。同年8月，毛泽东在蔡和森来信的一再敦促下，带领一批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告别长沙城，击水湘江，抵岳州，出城陵矶，进入烟波浩渺的长江，顺流东下，直达九省通衢的武汉，而后在汉口改乘火车继续北上。虽然这次途经武汉停留短暂，但武汉这座中国中部最大的商业城市，当时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一次为驱张运动，毛泽东再次来到武汉。临出发前，毛泽东与各校代表相约先在汉口一家旅馆集中，待人到齐之后再开会，进一步商讨驱张的斗争方略。12月8日，各校代表齐集汉口一家旅馆开会，在会议上代表团正式定名为驱张代表团。毛泽东这次途经武汉停留了10天，他率领代表团成员先与明德学校（位于汉口大智路）等单位取得联系，通过他们进一步发动武汉地区的学生和各阶层人士支持驱张运动。为此，毛泽东通宵达旦，奋笔疾书，当夜便拟定了一个驱张文电，历数张敬尧的累累罪行及北洋军阀政府统治的黑暗，表达了湖南各界人士驱张的誓死决心。电文痛斥道：

……吾湘不幸，叠受兵凶，连亘数年，疮痍满目。上岁张敬尧入湘以后，纵饿狼之兵，奸焚劫杀，秉虎狼之政，铲刮诈捐。卖公地、卖湖田、卖矿厂，公家之财产已罄；加米捐，加盐税，加纸捐，加田税，人民之膏脂全干。泊乎今日，富者贫，贫者死，困苦流离之况，令人不忍卒闻。被张贼兄弟累资各数千百，尚不自厌，连此仅存之米盐公款，竟思攫入私囊以甘心。去年张贼曾嗾使湘痞李鸣九等电京查问此款，至去长沙设立米盐公款清查处；闻近复贿令郭人漳等以旅京湘事维持会名义

向熊秉三先生诘问该款，无理取闹；推其用意，无非欲攫尽湖南财产，吃尽湖南人民，以饱其欲壑。窃吾湘遭此巨创之际，哀哀子遗，非有巨资，何以善后，米盐公款为我三千万人民忍食淡所储蓄，乘必不易，利用尤殷，倘被鲸吞，此劫难复。被张贼之暴戾酷害，毒我湘人，已成惯技，独不能我同此食毛践土之败类，自杀父母之邦，甘与仇敌作狗。人之无良，至于此极！公民等对于郭人漳等此种恶劣行为，誓不承认。总之此款在张贼未去湘乱未宁以前，只可暂归湘绅保管，不得变动，俟湘事保定后，再由全省民意公决用途，此际倘来无耻之徒，希图破坏者，即视为公敌。凡我湘人，应知自卫，稍纵即逝，祈毋忽焉。湖南公民代表毛泽东等五十五人。

驱张文电描述了湖南人民在张敬尧的黑暗统治下所过的饥寒交迫的悲惨生活，彻底揭露了张氏兄弟祸湘虐民，收刮钱财，无恶不作的罪行，号召人民与张敬尧斗争到底。这个“快邮电”在汉口、北京、上海等地报纸上相继发表，形成了对张敬尧的强大舆论压力。不仅如此，驱张代表团还通过走访调查，在武汉市民的帮助下，一举查获存放在武昌鲇鱼套车站的、由反动军阀张宗昌私下为张敬尧偷运的鸦片种子，并将这一罄竹难书的罪恶勾当公诸于众，在国人面前彻底暴露了张敬尧的丑恶嘴脸。“张敬尧前此私运烟种入湘，不知凡几。长沙一县，发种至四万包之多。此种从奉天运来，共有七十余袋，除先已送到湘外，于十二月二十四日在鲇鱼套被站员游泳发觉者计四十五袋，每袋约二百余斤，外书‘交第二路总指挥司令查收’。第二路总指挥部为醴陵之张宗昌。盖张宗昌与张敬尧伙运也。事觉后，旅鄂湖南学生摄影烟种影片五张，呈鄂督王占元，电北政府，请将烟种扣留焚毁。一面派人

赴京呈报。”<sup>①</sup> 消息一经传出，引起国人哗然，纷纷上书报刊，谴责这一丑恶行径，使得张敬尧十分狼狈。

毛泽东除领导代表团展开驱张宣传，发动武汉地区学生和各界人士同情、支持驱张运动，以便推动和形成全国驱张的大气候外；还与恽代英创办的互助社加深了友谊，有时他就住在恽代英处。毛泽东与恽代英在此以前早有书信往来。1917年10月，恽代英在武昌创办了进步团体互助社。半年后，毛泽东也在长沙组建起新民学会。这两个进步团体都是新文化运动和民主爱国运动的直接产物。从此，他们开始有了书信往来，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的斗争中互相鼓励，互相学习。“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他们联系得更加紧密。当《湘江评论》创刊后，毛泽东将刊物寄给恽代英，请为代售。毛泽东的《创刊宣言》和《民众大联合》等文章，通过互助社举办的书报贩卖部，在武汉进步青年中广为流传，赢得了恽代英等武汉进步青年对他的钦佩。在湖北督军王占元血腥镇压武汉爱国学生运动，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六·一”、“六·三”惨案后，恽代英满腔怒火，奋笔挥毫写下了《武汉学生被官厅解散最后留言》，将惨案真相公诸于世，愤怒声讨王占元捕杀学生的滔天罪行。该文油印好后，恽代英寄给毛泽东，《湘江评论》立即临时增刊第一号（1919年7月21日）全文刊载。而这一次的驱张运动，更使这两位神交已久的战友得以相见，并一见如故，因而，俩人时常抵掌夜谈，共同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恽代英告知毛泽东，他和武昌进步青年正在酝酿筹建一个传播新思想，宗旨为“利群助人，服务群众”的利群书社。毛泽东对此十分赞赏，连声称好，并就利群书社如何发行进步书刊，广泛联系工人群众等问题与恽代英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恽代英对毛泽东领导的驱张运动十分关注，当毛泽东将驱张文电交予他后，恽代英连夜

<sup>①</sup> 《天问》，1920年2月8日第2号。

与互助社、仁社的成员印成传单，广为散发，同时还派人即刻过江将这个快邮代电去汉口发邮。

毛泽东这次率领驱张代表团赴京，虽然在武汉只短暂的逗留了10天，但将驱张运动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在全国引起了迅速的反响，为尔后毛泽东进京继续扩大驱张运动打下了基础。同时，毛泽东这次在武汉停留还与武汉的进步团体密切了关系，探讨了今后发展的趋势，为以后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起了促进作用。

## 二、由黄浦而至汉皋

随着反帝反封建的北伐战争兴起，全国工农运动如火如荼蓬勃发展，犹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地向四周扩延。为了加强全国农民运动的领导工作，中共中央于1926年11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农委会由毛泽东、阮啸仙、彭湃、易礼容、陆沉、肖人鹄和共青团代表等七人组成，毛泽东出任农委书记。在此之前，毛泽东在结束广州的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后，回湖南组织农民协会，向封建地主阶级势力展开进攻。中央农委会成立后，毛泽东即由湖南赴上海主持中央农委工作。在上海工作期间，毛泽东还调查了江苏、浙江等地的农村情况和那里的农民运动，并就此撰写了《江苏、浙江农民的悲惨生活与他们的反抗运动》一文，在党中央《向导》刊物上发表。文章中提出了农民运动应如何深入发展的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为了更正确，更及时地指导当前全国农运工作，使农民彻底摆脱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毛泽东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武汉将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建议农委“在汉口设农委办事处，就便指导湘、鄂、豫、赣、川农运工作”。农委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认真

研究后拟定出一个《目前农运计划》，指出：“在目前状况之下，农运发展应取集中原则。全国除粤省外，应集中在湘、鄂、赣、豫四省发展；次则陕西、四川、广西、福建、安徽、江苏、浙江七省亦应以相应的力量去做。”同时还要“促成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在武汉设立办事处。”并计划“在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sup>①</sup>1926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农委关于《目前农运计划》。

毛泽东为筹备农委汉口办事处和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以及考察长江流域的农民运动状况，于1926年11月下旬，以中共中央农委书记的身份由上海逆江而上，再次来临武汉。在此前，毛泽东曾六次途经武汉，虽然逗留的时间不长，但这座当时仅次于上海、中国中部最大的商埠却给毛泽东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特别是在驱张运动、反对赵恒惕的斗争以及筹建文化书社等活动中，毛泽东与武汉地区革命团体和一些著名的共产党人恽代英、陈潭秋、董必武、包惠僧等人结下了很深的友谊。那时，毛泽东来武汉，革命还处于萌芽阶段和低潮时期，而这次，却是大革命澎湃的洪流激荡着武汉三镇。

毛泽东风尘仆仆赶到武汉后，旋即投入到紧张的筹备农委办事处、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中。白天他忙着开会，布置筹备工作，夜间，他有时通宵达旦伏案写作，有时与各省来汉的农协代表交谈，详细地了解那里农民运动的状况，并从历史的角度和理论上——解答他们所提出的种种问题，公开阐述自己对农民运动的发生、发展以及历史作用的观点，用以提高他们对农民运动的认识，澄清他们对农民运动存在的一些模糊认识。毛泽东在与各地农协代表交谈的过程中，一旦发现问题即时提出批评，当即给予纠正，并指出错误的危害及根源，指导农民运动朝正确的方向

---

<sup>①</sup>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318页。

发展。同时，他对一些别有用意的人诬蔑农民运动的言论给予严厉的驳斥。

12月13日，毛泽东在汉口出席了中共中央召开的特别会议。党中央之所以在此时召开这次特别会议，是鉴于在目前大好的革命形势下，革命内部存在的危机也日益严重。当蒋介石随着北伐军事上的胜利，自己的力量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逐渐形成他的军事独裁体制，反动面目也进一步暴露。他不仅暗地指使、纵容各地国民党右派向革命进攻，屠杀工农事件不断发生，而且，他的总司令部还常以北伐为理由，发布各种文告，禁止和限制工农运动，开始与帝国主义暗中勾结，准备叛变革命。由于工农群众长期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压迫，一旦起来，难免会发生一些过火行动。反动分子便抓住这个支流，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甚至故意制造过火行为，以此作为他们反对工农运动的借口。而在中共党内，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也不一致，一些人却跟随国民党右派，公开指责工农运动过火，主张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1926年底，北伐革命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面对如此复杂、多变的形势，中共中央举行了这次特别会议，以期统一党内的认识，应付局势的变化。然而，由于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在党内占统治地位。会议根据陈独秀的政治报告精神所作出的各项决议，虽然在有些方面是正确的，但由于没有强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没有着重研究最重要的军事问题，就连如何解决当前农民的土地问题也未能进行很好地研究、讨论，因而使得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继续发展。与此同时，为保证统一战线不致于破裂，会议还十分错误地认为当前的主要危险来自民众运动勃起并日益向左，蒋介石因恐惧民众运动而日益向右；左右倾距离日远，将危及整个国民革命运动。这一错误的形势分析，导致会议错误地制定出党的今后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同时扶助汪精卫取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民众的领导地

位，并用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事实上，这些策略的实质就是不惜牺牲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去迁就蒋介石的反动要求，从而使党不能集中力量去对付蒋介石即将发动的突然袭击。

毛泽东在整个会议期间显得忧心忡忡，对会议的一些决议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认为“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不解决此问题，一切问题都不可能彻底解决。所以，当陈独秀在会上严厉指责湖南农民运动“过火”，要求中共湖南区委负责人回去纠正农民运动“过火”问题时，毛泽东在会上没有表态，以沉默的方式反对这种错误指责。在会下，毛泽东与瞿秋白多次就农运问题交换意见，阐述自己对农民运动的看法，并表示抽空回湖南乡下全面地考察农民运动，总结经验教训，向党中央写出书面报告。瞿秋白十分赞同毛泽东对农民运动的看法，支持他回湖南实地考察农民运动，收集有力的材料，彻底驳斥那些对工农运动的诬蔑和指责。

毛泽东在武汉的这段时间里，曾多次上门会见国民党著名左派人物邓演达，与他就农民运动的一些问题交换看法，希望在一些具体的事宜上得到他的支持和帮助。邓演达对毛泽东关于农民运动的一些看法也很赞同，并表示大力支持毛泽东的工作，而且，在一些具体的事情上，可代为办理或提供方便。毛泽东还经常受董必武之邀请，常去湖北省党部、省农协指导工作，介绍湖南农运的情况。毛泽东热情地鼓励农运干部应大胆地领导农民向乡村中封建地主阶级势力进攻，帮助农民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为完成国民革命而不断地努力。

毛泽东这次来临武汉，虽然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但在他卓有成效的努力下，各方面的工作已进入正轨，为尔后在汉开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成立全国农民协会奠定了基础。



### 三、造就一批“农民王”

为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坚定的农民运动骨干，中共中央农委于1926年11月拟定了《目前农运计划》，计划第六条规定“在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为落实此计划，毛泽东亲赴江西、湖北、湖南，与三省国民党党部商议此事，得到了三省党部中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积极支持。11月底，毛泽东到武汉后，便着手筹备农讲所的开办。湖北省党部在董必武等人的支持下，专门开会讨论此事，并推出陈荫林、李汉俊、张眉宣等人参与筹备工作。1927年1月16日，湘、鄂、赣三省党部联合推选出代表毛泽东、陈克文、周以栗、陈荫林、张眉宣、李汉俊、王礼锡、龚式农等人组成筹备处，着手工作，并将农讲所定名为“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随后根据全国农民运动发展形势的需要，毛泽东提议：仅仅为三省培养和造就农运骨干是远远不够的。要迎接全国农运高潮的到来，就必须培养更多的农运人才。他的提议得到了筹备处其他人的赞同。毛泽东便联合国民党著名左派邓演达，通过他进一步取得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批准，遂决定将三省农讲所扩大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该讲习所由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直接领导，面向全国招收学员。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根据国民党中央的决定，研究出具体实行办法，即中央农讲所不设所长，其领导机构为常务委员，由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担任常务委员。周以栗为教务主任，夏明翰为秘书。因邓演达在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中均兼任各种要职，加之不久又参加第二次北伐出征河南，更是无暇具体过问农讲所的工作，因而实际上农讲所是由毛泽东主持工作。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是“中国农民革命的大本营”。这诚如农

讲所开学宣言中所指出：“要训练一般领导农村革命的人才出来，对于农民问题有深切的认识，详细的研究，正确解决的方法，更锻炼着有农运的决心。几个月后，都跑到乡间，号召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实行农村革命，推翻封建势力。”正因如此，学员来自湘、鄂、赣、豫、皖、苏、川、贵、陕、晋、奉、直、闽、浙、鲁等18个省市，共计810名，分为4个班。1927年3月7日，农讲所正式上课，4月4日，在武昌北城角校内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邓演达主持大会，周以栗报告农讲所成立经过，谭平山、彭泽民、高语罕、彭湃等人，以及国际工人代表团的英、美、法、俄代表均在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鼓励学员认真学习，毕业后为中国的农民运动大发展作出贡献。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从酝酿到创建的全部过程中，毛泽东为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农讲所成立后，毛泽东不但参与制定教育方针和全部的教学计划，亲自选聘教员，而且还亲自讲授《农民问题》、《农村教育》等主要课程，并从当时中国革命实际出发，指导学员研究农民土地问题，农民政权问题，农民武装等中国革命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重大问题。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成后，毛泽东首先在农讲所向全体教职员员工讲授。讲课那天，附近的工农群众和武汉军校的一些学员也闻讯赶来，把大教室和走廊挤得满满的。毛泽东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而且还十分形象、风趣和幽默。当讲到“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的道理时，毛泽东手拿一根弯竹子做比喻说，要把这根竹子弄直，总要几次扳过头，甚至要先放在火上烤，而后才能将它弄直。这个形象的比喻有力地驳斥了那些高喊农民运动“过火”的谬论，阐述了“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说明了“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利”的深刻道理。

毛泽东在授课的过程中，还极力提倡学员们做农村调查，并

将自己写考察报告时一同产生的另一篇文章《佃农生活举例》，作为农讲所丛书之一出版，发给大家，使学员们的教材中既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那样的全面调查的范例，又有《佃农生活举例》这种典型调查作为初步入门的借鉴。《佃农生活举例》一文是一篇别具一格的调查材料。它不同于毛泽东以后的《寻乌调查》、《兴国调查》等调查材料，不是对某一个家庭、某一个乡村或某一个县份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查时所作出的如实记录，而是运用抽象力把中国广大佃农的生活情形以及影响其生活的各种复杂因素加以简单化，抓住事物主要的基本方面的东西，在一种典型的纯粹的形式上研究佃农生活。毛泽东在写这篇调查材料时不仅向佃农张初君逐一发问，而且还与他一起细细讨论，最后通过准确的计算而得出的令人信服的数据，展示出中国广大佃农痛苦非凡的生活图景，揭露了当时中国农村实行的一种极其普遍而残酷的剥削形式——重租制度的罪恶，揭示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封建剥削，乃是中国农村经济最本质的特征。这篇文章对学员们加深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本质起了很大的作用。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办的朝气蓬勃，革命气氛浓烈。为加强对学员的思想教育工作，农讲所的领导和教职员亲自做学员的思想工作，组织学习《共产党宣言》，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的历史经验，使学员树立起无产阶级世界观。同时，毛泽东还提出在学员中开展“怎样做一个农讲所的学生？”“怎样才能消除从旧社会带来的许多毛病，改造成为一个有效的革命工具？”等问题的讨论。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讨论，学员们自觉制订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规约》，指出：“我们现在虽然决心要做一个农民阶级的革命先锋，要为农民的利益牺牲一切，然而在我们身上，已经从旧社会带来了不少毒菌，这些毒菌，随时随地都有阻止我们前进的可能。”这些毒菌主要表现为个人主义、封建意识、自私自利、唯心主义等。为了清除这些旧思想，《规约》规定

学员必须“服从党的纪律命令”，“改正浪漫的个人活动”，“本所职员教员教官和学生，应表示互相尊重”，“要有练习耐劳吃苦的生活”<sup>①</sup>。通过这些活动，学员的政治思想觉悟有了明显的提高，决心做个坚定的革命者，为解除农民的痛苦而牺牲奋斗。

农讲所为了把学员培养成农民武装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特设置军事课程，以提高学员对武装斗争的认识并掌握军事知识。学员按军事编制，全校成立总队，下设4个大队和1个特别训练队。学员着灰色军装，打着绑腿，每人有一支汉阳造七九步枪。除有军事理论讲授外，每日操练两小时，每周一次野外军事演习，毛泽东对军事课程特别关注，时常观看学员军事操练。在一次军事操练后，毛泽东走过去从学员手中拿过一支步枪，风趣地说：“你们手中的家伙不是烧火棍，比孙猴子的金箍棒还要厉害，土豪劣绅最怕这家伙。在湖南乡下，一支梭镖就吓坏了他们，若见着这家伙，”毛泽东说着哈哈大笑起来：“那早就屁滚尿流啰！”毛泽东的风趣感染了学员们，同时也加深了他们对武装斗争的认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为准备应付事变，军事课的时间也随之增加。当大革命失败后，许多学员成为各地武装起义的骨干，有的成为英勇善战的红军指挥员。

农讲所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十分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为了尽快地提高学员的政治、军事素质，毛泽东一方面请农会干部和农协会会员来校作报告，另一方面把学生分为小组，到咸宁、石嘴、通山等地进行社会调查，参加当地的实际斗争。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毛泽东鼓励学员走上街头，散发传单，作宣传讲演，揭露蒋介石的罪行。当湖北麻城县地主武装发动暴乱时，毛泽东亲自调集300多名学员参加剿匪战斗，为平定暴乱作出了贡献。当夏斗寅叛变逼近武昌时，毛泽东又派出学员加入中央独立师，在

<sup>①</sup> 以上均见《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规约》。

叶挺、恽代英指挥下，击溃了叛军，保卫了武汉政府的安全。通过参加这一系列的实践活动，学员提高了政治军事素质，增强了处理事情和应变能力。经过几个月的严格训练与学习，农讲所学员达到了原订的培养目标，提前于6月18日结业。除几十名学员留在武汉政府农政部办的训练班继续学习外，多数学员被派往各地担任农民运动特派员或回乡从事农民运动，革命的火种撒向全国。在以后的斗争中，许多学员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由毛泽东主持的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占有极其光辉的一页。

## 四、视察湖南农运给中央报告

为了支持正在迅速高涨起来的农民运动，毛泽东于1926年12月17日由汉口到达长沙，以便对湖南农运作深入的实地考察。他在下乡考察农运之前，收到湖南省农协邀请出席指导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各项工作的专电，电文称：

湖北省农民协会转，毛润之先生鉴：敝会已于东日开幕，现正讨论各案。先生对于农运富有经验，盼即回湘，指导一切，无任感禱！敬祝旅祺！<sup>①</sup>

毛泽东回湘后，于12月20日在大会上作了重要的演讲，指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一切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将农民问题解决了，其余工人、商人、学生、教职员……的问题都解决了”<sup>②</sup>。他特别斥责了所谓在“帝国主义没有打倒以前，我们内

---

<sup>①②</sup> 《湖南全省第一次农工代表大会日刊》第87、340页。

部不要闹事”之类的论调，指出这种只准地主压榨农民，不准农民反压榨的人，就是破坏革命的人。他还提醒全体代表注意：现时湖南虽说是由武汉政府管辖，可是实际上赵恒惕的余孽、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势力还很大。使与会者深深认识到农村革命斗争的艰巨。12月30日大会闭幕后，毛泽东又“为中共湖南省委拟定将大会代表各同志开一短期训练班”，做了三次关于农民问题及调查方法的报告。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运情况。考察结束后，于是年2月12日由长沙返回武汉，住在武昌都府堤41号。2月16日，他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份极其重要的考察湖南农运的报告。

报告开宗明义地指出：“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在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全不同，始发现从前我们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现在是群众向左，我们党在许多地方都是表示不与群众的革命情绪相称，国民党更不消说，这是一件非常可注意的事。”尖锐地批评了由汉口特别会议开始形成的压制工农运动以谋求同右派妥协的投降主义方针。

毛泽东在湖南边作调查，边解决问题，边提出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党从前对农运的错误，已经有所改正”。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就其改正的要点举例说：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纠正政府国民党社会各界一致农运“糟得很”的议论；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纠正各界一致的“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议论；以从来并没有什么联合战线存在的事实，纠正农协破坏联合战线的议论，强调“今后问题，不在责备谁人破坏联合战线，而在共同负责建设一个联合战线”，等等。

当时的情况表明，革命的实际运动已经把农民运动问题最突出最迫切地提到党的议事日程上来了。这个时候，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处理决定全局的问题，是以什么态度来对待已经起来的伟大的农民革命：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

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尖锐地批驳党内外责难农民运动的种种谬论，论述了党应采取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态度。

基于在革命时期，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这一阶级斗争原理，报告强调说：农运分三时期，第一，组织时期，第二，革命时期，第三，建设联合战线时期。无论何地都必须经过第二时期，始能渡到第三时期，万万不可由第一时期跳到第三时期而不经过一个猛烈打击封建地主威风的第二时期。在第二时期即农村革命暴动时期内，农民一切向封建地主阶级的行动都是对的，“过分”一点也是对的，因为不“过分”，不用大力决不能推翻封建阶级几千年积累的权力，决不能迅速完成民主革命。“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因此，农协万万不可请求政府或团防去拘捕所谓“痞子”，只能提出“农协整顿纪律”的口号，自己去整顿那下级农协的“少数不良分子”，否则就必然会减损农民的志气而助长地主的威风。

“矫枉过正”是一句成语，原意是纠正错误而超过了应有的限度。人们在修正旧成规的范围内活动，叫做合乎“正”，如果破坏旧成规，就叫做“过正”，当时的改良派和革命队伍内的机会主义者正是用这个理论来反对农民运动的。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驳斥了这类改良派的理论。所谓“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正是他根据革命斗争的经验，总结出的一条重要的客观规律，就是说，要终结旧的封建秩序，必须用群众的革命方法，而不是用改良的方法。这是群众革命斗争的辩证法。

在国民政府辖区内，武汉民众需要米粮接济，政府也要统筹军粮，这同湖南禁运粮食出省的规定，存在着突出的矛盾。从湖南方面讲，粮食问题成了省政府、农民协会与各阶层农民之间的新焦点，对这一关系北伐大局的问题，应当如何认识和处置呢？毛泽东认为，阻谷问题是各界的怨府，其实是多数贫农要阻，只少



数富农要放。在这种情况下，农协只能处于劝告地位，劝告贫农让步，而不能代富农打击贫农。阻谷所以厉害，全因乡村无政府，不能保障民食，这是政府的责任，不全是农协的责任，要谷米流通只有从速建立新的乡村自治机关负责保障民食。报告将阻谷问题与建立农村革命政权联系起来思考，给这一难题的合理解决提出了正确的原则。

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革命的组织程度就显得太不相适应了。报告建议党中央大力的在农民尤其在贫农中普遍发展国民党组织，使这个政治影响巨大的各革命阶级联合的统一战线组织，出面去解决农村间的各种冲突，避免由我党直接出面。同时，报告强调：无论是为应付目前的环境，或是准备不久要来的革命，我们党都需要一个大大的发展。当时，湖南有6000名中共党员，与形势发展程度相差甚远。毛泽东报告说，这种情况应该改变，湖南党组织必须在六月内发展到两万人，在有农协会员两万以上的县均须成立党的地方组织，只有这样才有办法。

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斗争的中心问题，归根到底则是个土地问题。当毛泽东刚从武汉回长沙时，湖南的农民运动正处于革命时期，面临的严重斗争还是在政治上把地主的权力打下去，把农民权力长上来的问题，经济上还是减租减息问题，土地问题的解决暂时因条件不成熟而未被提出。待到从湖南调查农运返回武汉后，形势发生巨变，封建地主阶级威风经历了猛烈的冲击后，湖南农民运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的阶段。广大贫农迫切要求分配土地，有的地方已有自动丈量土地，开始分配土地的行动。同时乡村政权已实际归农民协会掌握。农民斗争发展得很快，但党的领导却远远跟不上形势，不敢不失时机地将土地问题提到紧迫的日程，反而犹豫动摇，不断地妥协退让，致使革命内部的危机日益加重。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主张立即着手解决贫农的土地问题。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

强调说：农民问题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的问题有两个，即资本问题与土地问题。这两个都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立即实行的问题。

毛泽东在武昌写给党中央的报告，提出的一系列切合时宜和切中要害的主张和意见，标志着大革命时期党内两条路线的公开分野。

## 五、“糟得很”和“好得很”

根据对湘省湘潭、湘乡等五县 32 天的实地考察，毛泽东在武昌给中央提出报告的同时，撰写并公开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报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特别是对中国农村社会结构进行了深刻的剖析，进一步考察了我国国情，从而提出了以农民武装、农村政权、土地问题为核心的中国革命发展总轨道的初步战略思想。

以湖南为中心的全国农民的大发动有着十分巨大的意义。毛泽东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极大的政治敏锐和饱满热情，赞扬农民运动“好得很”，驳斥了党内外怀疑和指责农民运动的种种论调，他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 40 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 40 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他强调说，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吃人的仇敌，完全是对的举动，他们的举动好得很！“好得很”是农民及其他革

命派的理论。

毛泽东在报告中总结了党从事农民运动的丰富经验，提出和阐述了许多独创性见解，使党对农民问题的认识，进一步地深化了。

首先，毛泽东剖析了中国的社会结构以及封建地主阶级在这一结构中的地位。他说：“宗法封建性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这是很深刻的分析，正是在这一分析的基础上，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得到了理论上的进一步阐发。问题很明显，既然农民革命斗争的锋芒是指向封建地主阶级、即反对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统治中国的墙脚，那么，农民群众起来打烂这个基础和墙脚，也就是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胜利铺平了道路。否则，不动摇这个国内统治阶级和国际帝国主义之“唯一坚实的基础”<sup>①</sup>，那就不可能动摇这一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在这里明确指出了以反帝反军阀为目标的国民革命的实质内容，应该是消灭农村的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正是从这点出发，毛泽东把对待农民运动的态度作为革命与反革命、真革命与口头革命派的试金石和分水岭。在当时，一般革命者虽然大都认识到“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并反复论述这种观点，但他们往往只是从中国经济落后，农民人口众多和生活痛苦的角度来认识这个问题的，毛泽东则主要是从中国的社会性质、社会结构来阐释农民问题严重性的。他的分析切中要害，入木三分，应该说是精辟透彻的，当时能作如是分析者是很罕见的。

其次，特别应该强调的是毛泽东在谈到城市与乡村、工人与农民的问题时所提出的重要思想。1926年秋，他在批判有人将买办阶级之猖獗于都市与地主阶级之猖獗于乡村相提并论的看法时

<sup>①</sup> 毛泽东：《农民问题丛刊》序，1926年9月1日。

提出：“说完全相同不对。买办阶级集中的区域，全国不过香港、广州、上海、汉口、天津、大连等沿江沿海数处，不若地主阶级之领域在整个的中国各省各县各乡。”<sup>①</sup>他强调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同时又认为“论功行赏，如果把完成民主革命的功绩作十分，则市民及军事的功绩只占三分，农民在乡村革命的功绩要占七分”<sup>②</sup>。毛泽东的这种思想与陈独秀、张国焘等人对农民问题的认识截然不同，表现了他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重大问题的创造精神。他通过对中国社会历史条件的分析，不仅在实践上作出了榜样，而且在理论上澄清轻视农民问题的种种论调和陈旧的观念，指导人们去高度重视农村的地位，重视农民的革命运动，重视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当然我们还不能说这时毛泽东已形成了以农村为主，城市为辅的认识，但是，可以毫无疑义地说，这一战略思想的重要内容在武汉时期已处于孕育过程中了。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对农村政权和农民武装是高度重视的。按照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形成的战略构想，要彻底摧毁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和改革地主土地所有制，必须要有步骤分阶段地进行。第一阶段，应将在封建势力压榨下的广大农民组织起来，使其在农会领导下开始行动。第二阶段，从政治上把地主阶级特别是土豪劣绅的威风打下去，实现农村权力从地主手中到农民手中的转移。第三阶段，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的经济斗争的深入开展，这个阶段任务的完成，如果没有前一阶段斗争的胜利，是决无可能的。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对外没有独立，对内没有民主，在农村更是赤裸裸的地主权力对农民极其残酷的野蛮的统治。为了维护超经济的封建剥削制度，地主豪绅与贪官污吏相

① 毛泽东：《农民问题丛刊》序，1926年9月7日。

② 《向导》第191期，第2063页。

勾结，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和封建军阀的庇护，把持基层权力，作威作福，横行乡里，随意对农民施行逮捕、监禁、审问和处罚，鱼肉乡民，造成农村一片白色恐怖。地主阶级以政权为基干，辅之以族权、神权、夫权，维护其对农村的权力统治。这四种权力相互配合形成系统的支配，而以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政权为一切权力的核心和基础，只有推翻地主政权，其他权力才会跟着动摇起来。毛泽东正是根据对中国社会政治和农村权力结构的剖析，说明了在中国要有农民的地位，就非推翻那大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不可，这是现时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特色。他强调：中国需要一个农村的大变动，这个大变动以新旧权力的变换为标志，其实质内容就是“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把地主权力打下去，把农民权力长上来，这是一个极其严重、极关紧要的阶级斗争，必须用极大的力量建立农会的绝对权力，否则，农村中一切政治、经济、文化的改革是不可能胜利进行的。建立革命的农民政权，“一切权力归农会”，这正是毛泽东在革命中心武汉所极力追求和热情歌颂的目标，这充分地反映了在激烈的阶级斗争环境中，他对中国革命认识的深化和飞跃，并为以后进一步的理论创造准备了思想条件。

夺取地主手中武装，建立农民的武装，这是建立和巩固农民革命政权的关键。北伐出师后，“农民的武装要求，处于日益紧迫的状态”，他们各自从溃兵和变兵中夺得枪枝，开始武装起来<sup>①</sup>。毛泽东总结了他们的经验，高度赞扬了他们的行动，号召“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主张在解除地主武装的同时，建立农民自己的武装——“挨户团常备队”，并建议将这种军事组织置于农民的权力机关的管理之下。另一方面，他又提出要大力发展梭标队，使之作为非常备的军事组织。这种建立农民常备的军事组织，

<sup>①</sup> 《向导》第181期，第1804页。

并将其从属于农民政权的主张，具有重大的意义，说明在武汉时期这一革命的危急关头，毛泽东认为武装农民的工作已经突破原来仅是自卫的原则，而与夺取政权、建立政权的农村权力变换联系起来。

毛泽东在武昌写的这个报告表明他对中国农民问题严重性的认识以及关于实行土地制度改革的主张，他对中国农村权力结构的深刻剖析和根据这种剖析提出的关于建立农民政权、农民武装的见解，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进行深入研究的结果，意义极其深远。它为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报告先在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战士》上发表，对于正在兴起的农民运动是一个有力的支持和鼓舞。但只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上刊登了一部分，就被陈独秀、彭述之所腰斩。瞿秋白很重视此文，4月中旬，他把这篇报告交由共产党员办的武汉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为名出版单行本，并为之作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序言。他说：“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革命者个个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 六、“全国农民的总炮台”

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以铁一般的事实，生动朴实的语言，不可抗拒的逻辑力量，总结了湖南农民运动的成绩和经验，有力地驳斥了那些反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谬论和诬蔑，极大地振奋了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农民群众，坚定了他们向反动派发起猛烈进攻的斗争意志，从而将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迅

速地推向新的阶段。

随着革命形势的高涨，全国农协会会员的数量增加很快，省一级的农民协会或筹备处已有10个以上，但一直还没有全国性的农民组织作为领导的中心。为统一全国的农运和加强4亿农民的团结，使农运更加广泛深入健康的发展，迫切需要成立全国性的农民协会组织。毛泽东对此事十分重视，他以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身份，在筹备农讲所的同时，也积极筹建全国的农协组织，并借助湖南、湖北、江西农代会上通过的《成立全国农民协会决议案》，联合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邓演达、农委会常委陈克文等人，于1927年3月27日，在北伐军总政治部召开了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扩大会议，集中讨论了农民部计划，议定28日在武昌大朝街59号开会，讨论筹备组织全国农民协会问题。是日，到会者有：邓演达、陈克文、毛泽东、周以栗、易礼容、陆沉、方志敏、陆智西、陈子林、宋英、孔寅初等人。会议经过充分讨论，认为：“自革命军到达长江以后，各省农民运动异常发展，现全国有农民组织者计有粤、湘、鄂、赣、皖、川、闽、浙、苏、……等十七省区，已正式成立省农民协会者，且有粤、湘、鄂、赣四省，全国有组织之农民，已达八百万人，……故实际上全国农民未有中心领导机关，不足以收进行划一及势力团结之效。”讨论结果，一致决定：由湘、鄂、赣、豫四省农协发起组织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并订于5月1日召开全国农民代表大会，与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同时举行，代表总人数为510名，大会经费为5万元。3月30日，湘、鄂、赣、豫四省的农民组织的代表在武昌农协举行联席会议，讨论结果，全国农协临时执行委员会由11人增至13人，推定邓演达、谭延闿、陆沉、毛泽东、谭平山5人为常务委员，行使正式执行委员会职权。会议推定邓演达为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宣传部长，毛泽东为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组织部长，彭湃为该会秘书长。实际上，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

的工作由毛泽东主持。

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成立后不久，便发出就职通电，指出：“吾国农民之痛苦，皆为国际帝国主义侵略与国内封建阶级压迫，而农民之解放，即国民革命之成功，故国民革命势力之进展，农民亦随之组织起来。同人深信此为不易之道，誓立于革命的地位，领导全国农民努力奋斗，以完成国民革命，与一切帝国主义者及封建阶级作最后之斗争。”通电在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广大农民把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称为“全国农民的总炮台。”临时执委会肩负着领导全国农运的重任。

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展开一系列的重大活动。首先，积极进行第一次全国农民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为开好这次大会，在毛泽东亲自指导下，农协临时执委会起草发出了《全国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宣传纲要》，指出：中国农民不但担负着在国内铲除封建势力的重任，同时也是赶走帝国主义的主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担负了世界革命的使命。《宣传纲要》同时还敏锐地指出：帝国主义已在引诱蒋介石走向反革命，地主阶级也在猛力破坏农民运动，这就要求全国农民加紧向反动派斗争，决不能软弱后退，须知“对敌人的宽恕，就是对自己的残忍，事实告诉我们：努力铲除封建势力的地方，封建地主阶级无法破坏我们；对封建势力让步的地方，封建地主阶级对我们进攻更利害”。《宣传纲要》还规定了大会将要讨论的主要问题是：怎样铲除一切破坏压迫农民的特殊阶级；怎样建设农民政权；怎样解决土地问题；怎样废除重租、高利、苛捐及一切对农民之剥削；工农兵如何联合等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个《宣传纲要》既肯定了初期农运的成绩，又提出以后农运的方针，是当时指导农民运动的一个纲领性重要文献。其次，农协临时执委会在急剧的事变中，及时地给予各省农协以指导。当农协临时执委会成立后，武汉国民政府的各个方面都处于急剧的变化中，为适应瞬息万变的形势，就



需要不断地调整农民运动的策略，才能使运动向前发展。如当夏斗寅、许克祥叛乱之时，农协临时执委会就即时指示湘、鄂、赣三省农协迅速召开执委扩大会议，研究与决定在新形势下的农运问题。随后，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起草发出了《全国农协对于农运之新规划》，提出了五项措施：注意强固组织严肃纪律；注意革命同盟者的利益；注意改良乡村旧习惯之步骤；加强乡村的政治和经济的建设事业；加紧宣传工作。鉴于青年农民和儿童已站在斗争的前线，已经是或者即将成为农民运动的中心力量，全国农协特通告各级农会建立青年工作部，以加强青少年工作。为支援北伐军，全国农协电令各级农民协会慰劳革命军人，指示各级农会应即“组织慰劳救护革命军人委员会，每个农民至少须捐铜元二枚，募集大宗捐款，购买大宗食品衣物”，以慰劳前方将士。

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始终代表着全国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成为他们的代言人，每逢遇重大政治事件，全国农协不仅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同时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为配合各地农民运动广泛深入的发展，反击诬蔑农民运动的逆流，从4月24日至30日，由全国农协发起并联合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湖北省农协、学生联合会、报界联合会等单位，开展了“中央农民运动宣传周”，以各种形式的讲演队、文艺宣传队，深入大街小巷，驳斥“糟得很”的反革命谬论，大造“好的很”的革命舆论，公开支持各地农民革命斗争。当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后，全国农协随即发出《讨蒋通电》，严正指出，“此贼不除，革命民众无幸存之理，国民革命亦无成功之望”，号召“全国民众及一切革命势力团结一致，共赋同仇。消灭蒋逆，铲除蒋逆御用的南京政府”。为了抗议武汉国民政府对反动派向农民疯狂反攻，无数农民被杀被捕的行动而软弱无力的表现，全国农协及时发出训令，要各级农协一致向武汉国民政府提出四项要求：明令保护工农组织和工农武装，团结革命力量，讨伐蒋

介石；肃清湖北各县的反动分子，以巩固武汉；明令惩办许克祥、仇鳌、彭国钧、肖翼鲲，解散其救党委员会、清党委员会等反动机关；明令制止江西驱逐共产党及工农领袖之行动。为揭露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及日本帝国主义出兵山东的阴谋，全国农协还发出通电，号召全国农民立即举行大规模的反英、日帝国主义的游行示威运动，在反帝斗争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全国农协的这些政治要求及行动，反映了全国农协在领导全国农运斗争所发挥的重要领导作用，为以后的农民运动深入持久的开展，提供了极宝贵的经验。

## 七、发生在南洋大楼的一次较量

随着革命形势的日益高涨，蒋介石的叛变阴谋也日益明显。为了反对蒋介石的篡权活动，1927年3月10日至17日，国民党中央在汉口南洋大楼（现为中山大道700号）举行了二届三中全会。这次全会是武汉政府时期的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是共产党联合国民党左派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的斗争较量。会上，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严厉谴责了国民党右派破坏革命的活动，限制了蒋介石的权力，维护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改选了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通过了进一步推动革命发展的10多个重要的决议案，正式宣布成立武汉国民政府。在整个会议期间，由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密切配合，使会议按原定计划顺利进行。毛泽东以国民党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的身份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3月7日，毛泽东在二届三中全会预备会上，率先提名著名的共产党人恽代英为提案委员，从而保证了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提案委员会中占有绝对优势，为以后起草通过许多重要的决议

案打下基础。随后，毛泽东又针对蒋介石无理要求延期召开会议的阴谋进行了有力的驳斥，并提议，在“大会期间，政治会议停止开会，如有重大事故发生，应付与主席团全权办理”。这一提议得到与会人员多数通过，形成决议。毛泽东的这个提议的实质是限制蒋介石的权力，因为蒋介石正是利用其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职权胡作非为的。而“政治会议暂不开会”的提案，实际上就是停止了以蒋介石为主席的政治会议在大会期间的职能作用，从而为国民党中央二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在整个会议的过程中，始终以高昂的斗志，清醒的头脑，深刻的理论，严密的逻辑思维参与讨论诸多重大问题，因而，他在会上的一些提议为解决这些问题起了重要的作用。在3月15日的第五次会议上，共产党人董必武鉴于阳新县前不久发生土豪劣绅用煤油烧死9个工农运动干部的惨案，代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提请大会批准公布《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条例》，为农民打击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斗争取得法律保障。毛泽东在会上当即发言表示支持，他指出：“土豪劣绅，必须以革命手段处之，必须有适应革命环境之法庭，最好，由农民直接行动。和平办法，是不能推倒土豪劣绅的，故亟应颁布此条例，以便推行各省。”但孙科却主张先提交政治委员会讨论，然后交国民政府公布，企图拖延公布此条例。国民党左派詹大悲极力反对孙科的意见，他说，湖北目前革命迫切需要，主张一面批准湖北单行，一面由国民政府公布之。毛泽东赞同他的主张，也力主先批准湖北单行，便于即时打击土豪劣绅的疯狂反扑。最后因与会人员多数通过，大会批准公布了《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条例》。与此同时，会议还决定由邓演达、毛泽东、吴玉章组成的“国民党中央处理阳新惨案委员会”，会同董必武主持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省农协全权调查处理阳新发生土豪劣绅残杀农运干部等9人的惨案。在3月17日的第七次会议上，毛泽东针对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中国国民党右派以

“黄埔同学会”名义大肆进行破坏分裂革命的活动，提议取消军校中的同志会、同学会等组织。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黄埔同学会皆党员，似不必有同学会之设立，凡同学会同志会皆封建思想之根蒂，已不适宜于今日，故应规定军事政治学校及各学校，不应有同学会同志会设立之一条文。”毛泽东的这一提议其目的是打击在军校中的国民党右派的猖狂活动，斩断蒋介石企图控制军校的黑手。在吴玉章、恽代英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全力支持下，提议得以通过。这样，国民党右派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中，利用“黄埔同学会”为蒋介石张目的反动组织便被视为非法，明文禁止了。<sup>①</sup>

毛泽东一向十分注重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多次亲自修正和审查了一些决议案，并联合邓演达、陈克文，以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常委身份，联名向三中全会提出了《对农民宣言》。这个《宣言》是全会通过的一份重要的文献，它基本上反映了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思想。《宣言》开宗明义地强调：国民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如得不到解决，国民革命断不能彻底完成。《宣言》认为，封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和一切反革命派的真实基础，不从政治上推翻它，就不能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宣言》热情地赞扬了农村革命风暴，要求每一个农村，都必须有一个大的变革，使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及一切反革命的活动，在农民的威力下完全消灭。《宣言》还提出了在乡村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问题，认为解除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推翻地主政权建立农民政权，是民主势力推翻封建势力，完成民主革命的确切保障。同时，政治斗争胜利之后，必须开展经济斗争，特别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不使农民得到土地，农民将不能拥

<sup>①</sup>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会议纪录》，1927年3月。

护革命，至于最后之成功。因此本党决计拥护农民获得土地之争斗，至于使土地问题完全解决而后止”。《宣言》中这些关于农民问题，特别是对农民土地问题的认识和主张，是孙中山先生“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思想的继续和发展，是在共产党人直接影响和帮助下，国民党才有可能达到的最为进步的认识、最为革命的主张。这一切与毛泽东多次亲自修正密切相关。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对《农民问题案》进行了数次审查，提出许多建设性的意见。鉴于这两份重要的文献对促进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将会产生很大的作用，因而得到与会者的一致通过，并以三中全会的名义发布。

毛泽东在会议期间，还十分注意加强与国民党左派人物之间的联系，倾听他们合理的、有见地的主张。即使双方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产生分歧时，毛泽东也总是耐心的、以商榷的态度提出自己的观点，阐述对问题的看法。当对方还不能完全接受他的观点、看法时，他从不强求，准许对方保留意见。而一旦这些人提出好的主张时，他马上会给予强有力的支持。毛泽东以广博深厚的学问；哲理、生动、漂亮的文章；风趣、幽默、雄辩的口才，早就赢得了国民党左派人物的赞赏，加之他这次在会议期间所表现出的谦虚、谨慎，平易待人的风度，更加博得大家的敬佩。在国民党中央二届三中全会上，正是由于毛泽东、吴玉章、恽代英、董必武等共产党人进行了艰苦的工作和不懈的努力，并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方针，团结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同右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因而取得了会议的成功。

## 八、阳新、麻城平暴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给“革命”下了这样

一个定义，“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当旧的统治阶级被推翻以后，并不甘心就此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将会作出拚死的反扑。而随着革命的不断深入发展，革命内部也将会出现不断分化，重新组合的局面。对此问题，毛泽东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并以十分严肃的态度高度重视它。1927年春，在江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即将召开的时候，国民党右派利用他们把持的江西省党部农民部，企图采取圈定省农协委员的办法来进行破坏。我党在江西负责农运工作的方志敏请示中共中央农委，“农委书记毛泽东指示：须坚决反对，宁可使农协大会开不成功，不可屈服于圈定办法”<sup>①</sup>。方志敏等人根据毛泽东这个指示，同国民党右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挫败了他们的阴谋。

1927年2月27日，当湖北阳新县发生土豪劣绅反攻倒算，用煤油烧死9个工农运动干部的惨案时，毛泽东以无比愤慨的心情，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实质，“在革命势力的范围内，竟不断地演出惨杀农工的事实，由此可证明封建的残余势力，正准备秣马厉兵，向我们作最后的挣扎！”为此，他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极力要求大会早日批准公布《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条例》，并大声疾呼，对“土豪劣绅，必须以革命手段处置之”。随后，他受大会的委托，与邓演达、吴玉章3人组成了“处理阳新惨案委员会”，全权处理阳新惨案。在处理惨案的过程中，毛泽东主张用严厉的手段处置反革命，并建议派出蔡以忱（中共党员）等专人和叶挺所辖两个连的兵力前往处理。在阳新县革命群众召开了声势浩大的追悼死难烈士大会，并为九位烈士立了纪念碑，枪决了首恶原县商会会长朱仲忻，对其他凶手也分别判处了死刑和有期徒刑。强有力的镇压了反革命，打击了反动派嚣张的气焰，使阳新县的革命运动更加猛烈地发展。3月26日，毛泽东在中央农民运动讲习

<sup>①</sup> 方志敏在狱中写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略述》（1935年）。

所召开的追悼阳新、赣洲死难烈士大会上作了重要的讲话，他指出：“从今日起，我们要下一决心，向那些反动分子势力进攻，务期达到真正目的，这是在今日追悼大会中，我们应该接受的责任。”<sup>①</sup>

对蒋介石叛变革命的阴谋，毛泽东早就有所警惕。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努力下，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发出命令，痛斥蒋介石屠杀人民的罪行，开除了蒋介石的国民党党籍，撤销他的一切职务，并下令通缉。毛泽东积极参与这一斗争，并在4月23日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联名讨蒋通电上签名。随后，毛泽东又为全国农协起草了《讨蒋通电》，号召消灭蒋逆，铲除蒋逆御用的南京政府。<sup>②</sup>

1927年5月间，湖北麻城县潜逃在外的土豪劣绅，认为反革命政变的时机已到，为配合上海的“四·一二”政变，麻城县反动头子外号王九聋子为首的一群土豪劣绅，以河南光山县新集为中心，勾结当地的反动民团和红枪会万余人，向麻城乘马岗、顺河集等地一路杀来，进而包围了麻城县城。中共麻城县党组织和农协会临危不惧，一面组织农民自卫军、县警备队进行殊死抵抗，同时派王树声到武汉请求增援。湖北省党部得知情况后，即刻召开省政府、省农协联席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力主坚决镇压，“对反动的土豪劣绅决不能心慈手软，统统消灭掉”。会后，他又亲自选调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300名全副武装的学员，并将他们送至江边，一再勉励“勇敢战斗，坚决消灭反动的土豪劣绅”。

农讲所武装学员、省警备队星夜驰援麻城，与当地农民武装协同作战，对反动民团、红枪会匪徒的暴乱给予了坚决的镇压。在广大农民群众的支持、配合下，革命的武装一路穷追猛打，一直

①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30日。

②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7月7日。

打到新集附近，并沿途收拾了方家湾、丁家岗、熊家冲等反革命堡垒，给了当地土豪劣绅以严重的打击，取得了保卫麻城反击战的胜利。

同月，由武汉国民政府所管辖的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武装叛乱，企图乘北伐军主力远在河南之机，偷袭武汉。当夏师已进逼距武昌城只有三四十里的纸坊时，毛泽东又亲自调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改编为中央独立师第二团第三营，开赴前方迎击叛军，在叶挺的统一指挥下，击溃叛军，保卫了武汉政府的安全。

毛泽东向反动势力进攻时，从不心慈手软，他深知旧的统治阶级决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对付武装的反革命必须用武装的革命来对付。当许克祥在长沙制造“马日事变”后，湖南一片白色恐怖，毛泽东向党中央要求回湖南担任省委书记。他的要求得到党中央批准后，即刻赴湖南领导布署向反动势力进攻。但只过了十天，陈独秀便大肆指责他在湖南组织反对唐生智的暴动，认为这是妨害国共合作的举动，又把他调回武汉，致使向反动势力进攻的计划落空。

向反动势力进攻靠什么？靠革命的武装力量。随着农民运动的兴起，毛泽东便着手研究并提出了解决农民武装等重大问题。他十分重视武装农民，要求各地农村“每个青年壮年农民都有一柄梭镖”。认为农会的梭镖队是使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一种新兴起来的武装力量。在他主持中共中央农委时，作出了《对于农民武装之决议案》，提出“各级农民协会，应一律设置健全的农民自卫军部”，对于旧有的地主武装，“只要为政治环境所许，能以农民力量强夺其武装的即行强夺”，同时，又可通过统一战线工作，使农民能合法地得到枪支<sup>①</sup>。湖南省农协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正式

<sup>①</sup> 《中央通告农字第8号》（1927年6月14日）。



通令各县成立农民自卫军，在“解散全省团防武装”，“普遍建立农民自卫军”的口号下，各地农协纷纷组织农民向地主武装团防局夺取枪支武装自己，建立农民自卫军。为了培养军事指挥人才，省总工会、省农协在长沙还开办了工农自卫军干部训练班，并酝酿在长沙、常德、衡阳等地各成立一个武装的工农师。与此同时，湖北省农协也在武昌开设了农民自卫军养成所，学员训练三个月后，即派至各县筹建农民自卫军。省农协要求各县的农民自卫军有400支枪，主张散于各分区的枪械集中起来使用。到6月份时，各县农民之快枪，多者达二三百支，少者亦有二三十支，全省武装的县份，共有枪2000多支，形成了一股强有力的革命武装。“马日事变”后，湖南许多从事工农运动的干部来到武汉，毛泽东召集他们开会，指出今后斗争的方向，要求大家回到原来的岗位，坚持工作，拿起武器。由此，毛泽东的“武装斗争”思想也开始逐步形成。

## 九、在中央土地委员会上

当农民运动狂飙似的兴起，推翻了旧的统治阶级后，他们随即展开的经济斗争便是由减租减息发展到分配土地。对此，毛泽东在湖南考察农民运动时就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一点。1927年2月16日，毛泽东在《视察湖南农民运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农民问题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的问题有两个，即资本问题与土地问题。”随后，毛泽东又强调指出：“目前我们对农民应该领导他们极力做政治斗争，期于彻底推翻地主权力。而随即开始经济斗争，期于根本解决农民的土地及其他经济问题。”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武汉出席国民党中央二届三中全会时，联合国民党左派邓演达、陈克文在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农民问题的议案，其中特别

强调了土地问题的极端重要性，认为“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有（一）使农民得解放，废除地主及一切压迫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为本题的主要意义。（二）土地问题不解决，经济落后的国家不能增加生产力，不能解决农民的生活痛苦，不能改良土地。（三）保护革命，革命势力目前虽见发展，但亦即到了一个危机，此后非有一支生力军必归失败，要增加生力军保护革命，非解决土地问题不可。其作用在解决土地问题后即能够解决财政问题及兵士问题，兵士能否永远参加革命亦即在土地问题解决，因农民要保护他们的土地必须勇敢作战。这三点是解决土地问题的重大意义。”毛泽东对解决土地问题重要意义的精辟阐述引起了与会者的高度重视。中共代表夏曦、彭湃也就这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支持毛泽东的见解。随后，毛泽东又将其他代表对此问题的看法加以归纳，补充完善自己的观点：“现在关于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可再加三项（一）废除封建制；（二）发展中国工业；（三）提高文化。”这“六点”重要意义的提出，是正确引导农民运动向纵深发展的指南，对完成国民革命至关重要。

与会代表经过详细的讨论后，一致决定应该组建一个专门的土地委员会，负责和提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方案。毛泽东被大会推定为土地委员会的五个常委之一，并担任了《土地问题决议草案》和《中国土地的调查》的起草人。

从4月2日至5月6日，毛泽东出席了在汉口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的土地委员会的一系列重要会议，阐述了自己对解决土地问题的许多具体的主张。在4月22日的土地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根据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既反对采用苏联没收一切土地后再行分配的意见，同时又考虑到中国各地大地主很少，如果不没收小地主的土地，农民便分配不到土地。因而建议采取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并就此提出了政治没收与经济没收两个不同的概念。毛泽东在没收地主

土地问题上，还极力主张区分不同地区，实行不同的土地政策，他指出：“湖北不能与湖南比，河南不能与湖北比，其解决当然不同，故一步做到经济没收，往往又与客观情形不称。”因此，他主张在湖南等地区采取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的农民，在河南等正在进行北伐战争的地区，则先实行政治没收，即没收反革命分子的土地，分配给无地的农民，俟这个地区政治时机成熟，再实行类似湖南的土地政策。然而，毛泽东的这些正确主张在中央土地委员会上，却遭到谭延闿、何键等人的激烈反对。他们认为“现在实谈不到如何分配，如何没收的问题，即以湖南而论，对土地的要求，是否处处有同样的情形也还是疑问”。并提出：“土地没收后，归到政府或党部，必起纠纷；如归农协，则纠纷更大。”<sup>①</sup>他们以不置可否的方式提出疑问，然后又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否定没收地主土地的必要性。为此，毛泽东针锋相对地指出，所谓土地没收，就是不纳租，并无须别的办法。现在湘鄂农民运动已经到了一个高潮，他们已经自动的不纳租了，自动的夺取政权了。中国土地问题的解决，应先有事实，然后再用法律去承认它就得了。并就政治没收与经济没收的概念进一步解释说：“现在所决定为政治的没收，如土豪劣绅、军阀等等的土地，此为第一步。进一步再论凡自己不耕种而出租于他人的田地皆行没收，此为经济的。经济没收在湖南已不成问题……只就湖南的状况说，用政治没收的形式是不够的，但就一般论，只能用政治没收。”<sup>②</sup>由于会上形成了两派针锋相对的意见，又互不相让，最后，会议决定邀请中共中央最高决策人陈独秀参加讨论。

陈独秀对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一向采取右倾态度，1927年1月，他以中央名义发了一个指示，认为，“农民搞土地革命是贫农的幼稚的行动，会使小资产阶级离开我们”。因此，“在农村中应

<sup>①②</sup> 《土地委员会审查委员会记录》。

该做两个工作，一个是扩大对土地问题的宣传，另一个是建立乡村自治政权”。他说：“我们不抛弃武装农民没收土地的政策，但这个政策太危险了，如果我们独立地搞起来，那么 we 和国民党的关系就要破裂，这个革命就要失败。”因此，他的结论是，你们不要着重搞土地问题，而应当着重反对帝国主义。正因为陈独秀对此问题的右倾态度，在4月26日的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上，对国民党右派所提出的目前暂不没收中小地主和军人的土地要求作出了一一让步，甚至公开表态同意此种作法，只对大地主的土地进行政治没收。这样，土地会议到后来就只通过了一个不准备马上实行的，只没收大地主土地的原则性决议草案。而这个草案在5月2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讨论时，由于多数反对，也未能通过。

毛泽东对陈独秀的右倾态度极为不满，在出席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向大会提交了迅速加强农民土地斗争，建立农村革命政权，大力发展农民武装的书面意见，但中央委员会未将此意见书提交全会讨论便否决了它。然而，在这次会议上，陈独秀仍坚持“土地的政治没收”的主张，这就是说，只有对反革命分子、反动军官和重大民愤的土豪劣绅的土地才提出没收的口号，所以，在“五大”通过的《土地决议案》中规定：“属于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革命军人现时已有的土地可不没收”。陈独秀一再强调：现在只要扩大而暂时不能深入，所以没收土地还要再等一等。会后，关于土地问题提交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去讨论，讨论结果只在原则上规定要解决土地问题，但不要求立即着手解决。以后党中央宣传部又不断地发出通告，指责各地农协“放任农民无组织的自由行动来解决土地问题，已经引起了无数的过火行为，这种情形，必须纠正”。

毛泽东对他们压制广大农民没收地主土地的作法甚感忧虑，认为这是在断送革命前程的自杀行为。如果四万万农民在革命的

过程中不能解决土地问题，农村中的封建势力就不能从根本上打倒，广大农民也就不会真心实意、前赴后继地为革命事业去奋斗流血。毛泽东为挽救革命的失败，对中央关于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上的右倾作法进行抵制，并不断地在党内与一些领导人交换看法，向他们阐述及时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对此，蔡和森曾评价道：“泽东一向反对中央农民政策，1926年冬季以来，完全代表湖南土地革命的倾向，为一切敌人之所痛恨，而为一切农民之所欢迎。”李立三也指出：“毛泽东同志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是中国革命是土地革命问题。”虽然在当时，毛泽东关于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正确主张还未被全党所接受和重视，但他的这一思想为我党尔后领导土地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对中国土地革命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 十、《菩萨蛮·黄鹤楼》

1927年是一个多舛之年。

正当北伐战争胜利前进之时，隐藏在革命内部的敌人蒋介石公开撕去伪装革命的面纱，举起屠刀杀向人民。而另一个隐藏在革命内部的敌人汪精卫，此时还在扮演着国民党左派领袖角色，与中共假装保持亲密合作。对这个十分危险的敌人，中共党内的一些人却被他装扮的假像所迷惑，不知晓，达摩克斯之剑已高悬，中国革命呈现出极为严峻的形势。毛泽东1927年春在武昌所作《菩萨蛮·黄鹤楼》这首词，就是在此种背景下写成的。

《菩萨蛮·黄鹤楼》这首词从整体格调看，它显得十分悲壮深沉，反映了诗人对革命事业前途的担忧，同时又强烈地表现出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极端不满，但“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心

情苍凉”的体现<sup>①</sup>。

茫茫九派流中国，  
沉沉一线穿南北。  
烟雨莽苍苍，  
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  
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  
心潮逐浪高！

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十分喜爱读诗做诗，并终生不辍。他的诗词具有浓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地道的中国传统诗歌，又是活生生的现代诗歌，是革命政治内容和完美艺术形式的统一。它在思想上、艺术上给予人们的启迪和影响是多方面的。虽然《菩萨蛮·黄鹤楼》这首词是诗人在心情忧闷的情况下写出来的，但仍旧是一首十分高雅、清新、品位极高的佳作。在词中不仅娓娓倾吐了诗人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而且用形象的手法，将黄鹤楼这一历史名楼的来胧去脉，地理位置，古代传说揉和为一体，栩栩如生地展示在读者的眼前。

在中国传统诗歌的创作中，将前人的诗文点化入诗的艺术手法是最常见的。而恰当的点化又具有很强的修辞作用和美学价值，是一种高级的艺术创作。毛泽东在他创作的诗词中运用点化的手法，可说是推陈出新，达到了天衣无缝的境地，产生了强大的艺术魅力与感染力。

---

<sup>①</sup> 诗人自注。

在《菩萨蛮·黄鹤楼》这首词中毛泽东运用了一连串的点化艺术手法。如词的开首句“茫茫九派流中国”中的“九派”，《尚书·禹贡》：“九江孔殷”。孔安国注：“江于此州（荆州）界分为九道。”郭璞《江赋》：“流九派乎浔阳。”李善注引应劭《汉书》注：“江自庐江浔阳分为九。”这里指长江在武汉到九江一带所汇合的一些支流。“中国”即国中，指我国中部地区。而“茫茫”句又与李白的《金陵望汉江》中的“汉江回万里，派作九龙盘。横溃豁中国，崔嵬飞迅湍”的描写相似，但语言更为概括、简炼。

“黄鹤知何去？”是诗人活用了唐代诗人崔颢所写《黄鹤楼》诗。崔颢前两联：“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在这里，诗人从神话传说写到现实感受。鹤去楼空，白云悠悠，不仅反映了黄鹤楼的古今变化，更表现了诗人登楼时的寂寞之感。毛泽东在这里点化活用，同样也表现出了诗人对现实生活中的重大变故的关切。

“把酒酹滔滔”的“酹”字，即指把酒浇地作奠祭。《隋书·贺若弼传》曰：“将渡江，酹酒而咒曰……”。陆游《登灌口庙东大桥观岷江雪山》：“白发萧条吹北风，手持卮酒酹江中。”毛泽东在这里用“酹”字作点化，使“把酒酹滔滔”一句点化成代表万千言语，起到了以少胜多的绝妙笔法。

毛泽东在《菩萨蛮·黄鹤楼》这首词中，不仅采用了点化的艺术手法，而且还使用了许多形象的艺术概括手法，如“烟雨莽苍苍”就是登楼时所见，也是对当时风雨纵横的政治形势的艺术概括。再如“龟蛇锁大江”，仅用一个“锁”字，便十分形象地描绘出了龟蛇二山隔江对峙的险要地势。

毛泽东从青年时候起就十分喜爱游历祖国的名山大川，古寺庙宇，历史陈迹。黄鹤楼相传始建于三国黄武年间，传说仙人子安曾承黄鹤过此，又传云费文祗驾鹤在此登仙，因而得名黄鹤楼。而最早的黄鹤楼是作军事观察瞭望用的，到了唐代才演变为登临

游憩的胜地。唐代大诗人崔颢游赏黄鹤楼时，写下了一首脍炙人口的七律诗《黄鹤楼》，从而使此楼名声大震，成为江南四大名楼之一。

1927年2月间，当毛泽东再次来临武汉时，就住在武昌都府堤41号。而武昌都府堤离蛇山很近，对历史陈迹有着特别偏爱的毛泽东一得空闲之余，总喜欢漫游黄鹤楼，品茗观景，一抒情怀。然而，当毛泽东得知蒋介石在上海突然发动反革命“四·一二”血腥大屠杀，成百上千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之中的消息时，心情十分沉重。面对严酷的现实，如何才能挽救中国革命，使航船胜利到达彼岸，毛泽东一时也未考虑成熟。心情的烦恼，使他感到很压抑，有时一整天不说一句话，一个劲地吸烟，在住所踱步沉思。

在春末的一个黄昏时节，毛泽东冒着淫雨霏霏，再次登临黄鹤楼时，心情就不像以往那样悠然自得，而是忧心如焚，十分沉重。他看着渐渐散去的游客，回想起曾与几位国民党人士一同登临游赏的情景，仿佛历历在目。那是北伐军占领武昌后不久，毛泽东从上海来到武汉，在恽代英的相邀下，与几位国民党人士一同游赏黄鹤楼。当他们坐下来品茗闲谈之时，其中一位国民党人伪虚奉承道：“此次北伐革命在湘、鄂两省进展之神迅，多亏了两省工农的援助，你们共党也出力不少。大家都希望彼此真诚合作，完成先总理之遗愿。”毛泽东对此人的德性十分了解，深知他话中有话，便诙谐的、一语双关答道：“大家都希望如此。但千万别搞桌上叫兄弟，桌下动拳脚的事。”然而，这句话不幸而言中。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李济深紧跟其后在广州制造大屠杀。毛泽东想到此，双眉锁得更紧。

天空暮霭深沉，烟雨之中，大江浊浪翻滚，四周的景物也随之消失在阴暗、低沉的云霭之中。眼前的此景，使毛泽东联想起目前严峻的局势，不是如同一辙吗？他此时此刻心绪复杂、繁乱，



胸中涌动一股苍凉惆怅之感。“烟雨莽苍苍”，怎能不心潮逐浪高呢。就在这天晚上，毛泽东挥毫写下了《菩萨蛮·黄鹤楼》这首词，借以遣排心中的忧闷，为了革命的前途，他准备再一次在党内大声疾呼。他寄希望于将要召开的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为此会的召开精心准备了一个农民运动决议草案，期望大会能一举扭转目前的被动局面，为今后革命的发展指明方向。但是，在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寄予的期望落空了，不仅是他向中央委员会所提交的农民运动决议案未获全会讨论就被否决了；陈独秀再次当选为党的总书记，他所作的政治报告则空洞无物；而且，就连会议所通过的那些决议，也没有一项能落到实处。这一切，怎能不使毛泽东更加忧虑、焦急。为了挽救中国革命，毛泽东准备采取行动，他认为：我们决不能坐以待毙，等在这里被人宰杀。要准备上山！

而《菩萨蛮·黄鹤楼》这首词正是毛泽东临战前慷慨、悲壮心情的真实写照。

## 十一、都府堤的日日夜夜

大革命前，毛泽东曾数次途经武汉，但都来去匆匆，停留的时间短暂。而这一次，毛泽东在湖南考察了五个县的农民运动后，于1927年2月12日由长沙返回武汉，住在武昌都府堤41号，直到“八七”会议后才离开，一住就是5个多月，因而对武汉很有感情，以至解放后毛泽东仍一如情深，在处理繁忙的国事之中，不仅多次抽出时间来武汉小住，将党中央的一些重要会议放置这里举行，并在这里多次接见外宾，而且，在他一生中，就一个地方曾写过两首脍炙人口的诗词只有武汉了。

毛泽东这次由长沙返回武汉不久，杨开慧和她母亲杨老太太

带着毛岸英、毛岸青也随后来到了武汉，这是毛泽东与杨开慧结婚后相聚最长的一段时间。杨开慧不仅是毛泽东的夫人，而且也是毛泽东工作上的重要助手，毛泽东早期起草的许多重要文稿大都由她整理誊清。在这段时间，他们所住的武昌都府堤41号便成为党内的红色据点，中共许多领导人蔡和森、彭湃夫妇、夏明翰、李一纯等人都在此住过。毛泽民、毛泽覃也在此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当时党内的许多人经常在这里开会研究问题，吃饭的时候，十几个人围一圆桌，站的站，坐的坐，如同在家一般，杨开慧总是尽自己最大努力满足他们的要求。

毛泽东在这段时间里工作特别繁忙，当时他的党内职务是：中共中央农委书记（1926. 11. —1927. 5.）；中共中央候补执行委员（1927. 5. —8.）；中共湖南省委书记（1927. 6. —8.）；中共湘南特委书记（1927. 8.）；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1927. 8. —11.）。

党外职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6. 1. —1927. 7.）；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1926. 6. —1927. 7.）；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1927. 3. —7.）；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常务委员（1927. 3. —6.）；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常务委员（1927. 4. —5.）；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农民问题讨论会委员；红枪会调查训练委员会主席（1927. 2. —3.）等10多个职务。白天，他忙于指导工作，晚上很晚才回家，回来后还要写作至深夜。毛泽东这次考察了湖南五个县的农民运动后，收获颇大，认为有许多问题，应当急需向中央反映，以便及时纠正中央对农民运动工作中的一些错误看法和指导过程中的一些错误政策，引导农民运动健康地向纵深发展。2月16日，他向中央写了关于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情况的报告，随后不久，他又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毛泽东在这段时间里还接连不断地出席了许多重要会议：国

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武汉政府土地委员会的一系列会议，全国农民协会的一系列会议，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等。并承担了许多重要文件、决议案的起草和审查工作。在出席这些重要的会议上，毛泽东都作了十分精辟的发言，为与会代表所接受，对会议顺利进行起了推动作用。1927年5月31日，全国农协和湖北省农协在汉口举行宴会，欢迎国际工人代表团。毛泽东代表全国农协担任宴会主席，在致词中他强调指出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中国农民运动，是革命进程中主要之力量，尤须与全世界工人阶级携手前进。”

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为推动全国农运的迅速发展还相继筹建了全国农民协会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由于毛泽东是这两个组织的实际负责人，因而事务特别多。除此外，他还亲自给农讲所学员上课，讲授《农民问题》、《农村教育》、《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主要课程，同时，他还与农讲所教务主任周以栗主持所内的党、团活动，组织学员着重研究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设立“农民问题讨论会”，指导学员下乡进行社会调查活动。

毛泽东为革命事业的发展不分昼夜的工作，以至于杨开慧生第三个孩子毛岸龙的第四天，毛泽东才忙中偷闲到医院去看望她们母子。一见面，毛泽东十分歉意地说：“开慧，这么多天了，我都没有来看望你，真对不起。”杨开慧看着毛泽东那清瘦的面孔，两只眼睛因熬夜布满血丝，一阵心疼，忙安慰道：“润之，你也要多注意身体。我这里不要紧，你在工作，我生小孩；你在这里我要生，你不在这里我也要生，你工作要紧。这里有孙嫂照顾我，你放心好了。”虽然杨开慧这么说，但毛泽东心里仍是过意不去，陪着杨开慧说了一个多小时的话。

当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的消息传到武汉后，毛泽东心里非常焦急，他准备在中共“五大”上提出一个农民运动决议草案，以

便加快农民运动步伐，以防不测。然而却遭到中央的否决，未能提交大会讨论。

“马日事变”后，湖南的工农群众组织请愿代表团来武汉政府请愿，要求武汉政府严惩屠杀工农的刽子手许克祥。毛泽东在汉口会见了这些代表，并将他们接到家中开会，商量对策，号召农民自卫军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武装保卫革命。

随着形势的日益恶化，武汉国民政府的反共倾向也逐步升级。中共中央机关为避免意外，由汉口迁移武昌办公。然而，就在这极严峻的时刻，中共决策人之间，中共决策人与共产国际以及他的代表之间都在如何应付目前局势的看法上产生了很大的意见分歧。蔡和森也因旧病复发，于6月28日向中央告假来毛泽东住处养病。

由于湖南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革命力量遭受了很大的摧残。离湘来汉的同志常常聚集在毛泽东的住处商讨应付局面的策略，蔡和森也时常加入其中。蔡和森一向十分尊重毛泽东，认为毛泽东“1926年冬季以来，完全代表湖南土地革命的倾向，为一切敌人之所痛恨，而为一切农民之所欢迎。”<sup>①</sup>为了挽救中国革命，毛泽东与蔡和森时常彻夜商量对策，最后由蔡和森执笔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十分坦诚地提出了他们经过长时间酝酿、研究后的真知灼见，毛泽东亲自将它送交瞿秋白。

7月15日，汪精卫终于扔掉了伪装革命的面纱，举起屠刀杀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武汉顿呈一片白色恐怖。街头巷尾，反动军警林立，四处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一天下午，毛泽东回到家后就对杨开慧他们说：“今天好险哟！差点被他们抓去了。我在汉口街上走，碰着一队搜捕的军队，他们对照片抓人。有两个人问我看见毛泽东没有？我指着旁边的小巷子说：‘看见了，刚

<sup>①</sup> 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

从这里过去的。’他们就朝我指的方向去了。”面对敌人的血腥屠杀，毛泽东为了挽救党，挽救中国革命，不顾个人安危，仍多方奔走，工作比以前更紧张，更忙碌。当时农讲所的传达贺协南（也是通讯员）经常到外面联系，探听消息，回来向毛泽东报告说外面风声很紧，敌人在四处抓人。而这时距党中央召开“八七”紧急会议已经很近了，毛泽东酝酿的以武装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一拯救中国革命的战略决策已经形成，决定要离开武昌了。他和杨开慧给长沙东乡板仓的杨秀生写了一封信，不久，杨秀生就到武昌先接走了毛岸青、杨开民和他姐姐、孙嫂及 10 余件行李回板仓。“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被派到湖南，准备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8 月 10 日，毛泽东与杨开慧、杨老太太、毛岸英、毛岸龙等离开武昌返回板仓。不久，毛泽东去平浏一带组织和发动了秋收起义。之后，又率领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革命道路。



第二章

而今迈步从头越





## 一、“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1927年7月初，毛泽东受中共中央之命，从湖南重返大革命中心地——武汉。

此时的武汉，风云变幻，恰似“山雨欲来风满楼”。把持武汉国民政府的汪精卫集团已决定公开走上叛变革命的道路，而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和苏联顾问依然实行退让政策，没有采取任何应变措施，反而在6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通过了一个向汪精卫集团妥协的国共两党关系决议案，共11条。其主要内容是：承认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共产党员是以国民党员资格参加政府工作，“并不含有联合政权的意义”，为图减少政局纠纷，参加政府工作的共产党员“可以请假”；“工农武装队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武汉现有之武装纠察队，为因避免政局之纠纷或误会，可以减少或编入军队。”<sup>①</sup>企图以此投降式的让步来拉拢汪精卫、唐生智，结果却更加助长了反动势力的气焰，武汉的反革命政变随时可能发生。

面临危险复杂的政局，毛泽东深感忧虑。如何挽救中国革命，成了其苦苦思索、探求的问题。他曾忧心忡忡地与老同学、老战友蔡和森探讨过武汉时局和唐生智的问题，两人一致感到武汉危急，不能坐此静候人家来处理，中共中央及军部应该迅速检查自己的势力，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与此同时，毛泽东向中共

---

<sup>①</sup>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55、256页。

中央阐述了自己对挽救时局的见解，提出了“上山”的策略。

7月4日，毛泽东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34次会议。这是一次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常委扩大会议，着重讨论了湖南局势和农民武装的对策问题。出席这次会议的还有仲（仲甫，即陈独秀）、罗（罗迈，即李维汉）、中（邓中夏）、和（蔡和森）、柳（何人不详，疑是柳直荀）、周（周恩来）、述之（彭述之）、特立（张国焘）等人。会上，毛泽东作了多次发言。当得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将派人改组湖南农民协会时，他认为“派一左派同志为好”。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他第一次向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工农武装应准备“上山”，以便在汪精卫集团一旦发动“事变”时，好有“办法”对付之。

与会者围绕工农武装的出路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陈独秀提出应“特别注意”和“用大力来作”各军招兵工作，“我们可以不客气的多将群众送给他们”，“枪藏不了的可以上山”<sup>①</sup>；张国焘主张农民武装“可以上山，但不必与C. P. 发生关系，可以打富济贫”<sup>②</sup>；毛泽东则明确指出：“改成安抚军合法保存，此条实难办到。”“此外尚有两条路线：a. 上山；b. 投入军队中去。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sup>③</sup>很显然，他不同意陈独秀、张国焘的意见。尽管毛泽东没有正面批驳他们，但却将“上山”放在了两条可行战略路线的首位，再三强调“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sup>④</sup>为此，毛泽东还主张办军事“训练班”。

比较上述三种观点，毛泽东的“上山”策略与陈、张的“上山”主张在内涵上明显不同。第一，他已洞察到汪精卫集团会搞阴谋政变，所以认为农民武装不能交给国民党军队、或藏枪解散、或“上山”消极避战，而应武装“上山”，保存自己实力；第二，

---

①②③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办：《党的文献》1988年第1期，第78页。

农民武装不能脱离共产党的领导，“上山”去当“打富济贫”的“山大王”，上山的农民必须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展斗争，积蓄革命力量，“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迎接将来更大的革命风暴。可见，毛泽东“上山”的思想，实质上是对陈、张的批评，同时也是对当时中共中央的提醒。

毛泽东提出“上山”的策略并非偶然，乃是在革命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而得出的。自1925年以来，他就一贯主张开展农民革命，发展工农武装斗争。1927年5月长沙“马日事变”后，鉴于形势变化，他更侧重于工农武装要走“上山”之路了。当时，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的毛泽东详细地听取了从湖南避往武汉的同志的意见和建议，知道了“马日事变”发生时，柳直荀曾组织湘潭起义，发动“十万农军”进攻长沙，受挫后纷纷退向山区，衡山工农武装在石湾暴动后，亦把部队拉上了南岳等情况，以及湖南广大党员坚决要求以革命的武装反击反革命武装的强烈愿望。也了解到机会主义错误的严重危害，正是由于不让大力发展工农武装，才导致许克祥叛变时湖南省委无力组织强有力反击的恶果。与湖南同志交换了看法后，毛泽东立即表示，完全赞成他们武装工农的见解。在和他们谈到工农武装现时的出路时，提出了“靠山的上山，滨湖的上船”的口号。6月下旬，应湖南基层党员的要求，征得中共中央批准，毛泽东回湘任临时省委书记，领导湖南革命斗争。在实地考察了解了工农情绪、工农武装和湖南政局后，毅然举起反对唐生智政权的旗帜，主持制定了《中共湖南省委目前工作计划》。针对当时武汉政府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械、解散工农武装的情况，《计划》对湖南工农武装作出了三种安排：“第一，编成合法的挨户团，次之则上山，再次之则将枪枝分散埋入土中。”<sup>①</sup>据此，湖南省委作了相应部署，从而保存了大量工农武装（约有

<sup>①</sup> 参见《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年甲第5集，第104—112页。

2 000 枪枝)，他们成为大革命失败后湖南秋收起义和湘南起义的重要力量。但毛泽东在湘的活动却遭到陈独秀的指责，仅仅 10 天，便命令他立刻返回武汉，致使毛泽东被迫放弃在湖南“组织暴动反对当时在武汉当权的唐生智”<sup>①</sup>的行动。返汉后，毛泽东已敏锐地觉察到武汉政府危机日深，遂在 7 月 4 日会议上首次将“上山”主张向中共中央正式提出，并把它作为保存工农武装、应付反革命屠杀的最好战略路线加以强调。

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召开后的第 11 天（即 7 月 15 日），汪精卫集团悍然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惨遭失败。在此前后，中国共产党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对中共中央进行了改组，成立了由张国焘、周恩来、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停止了陈独秀等在中央的领导工作。受命于危难之际的五人常委会为挽救革命做了许多工作，对毛泽东的“上山”思想给予了重视。7 月 20 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农字第九号——目前农民运动的总策略》，明确宣告，“近年农民运动的进展，已表明中国革命进到一个新阶段——土地革命阶段”，“我们的党只有坚决的站在这个土地革命的立场，才能领导这一革命潮流前进”；实行土地革命必须夺取政权，“推翻封建地主的乡村统治”，“建设农民的革命民权”，即“农会政权”；“农会政权的斗争和土地革命必须革命的武装才能保障其胜利”，因此农民要用种种方法夺取地主武装和一切反革命武装，各地党组织应当用种种方法，使农民接受军事训练，领导农民武装斗争。进而指出：农民武装现时已没有以“农民自卫军”、“农军”这类名义公开存在的可能，只有在三种形式之下才能存在，即：“A. 以合法的名义存在如‘挨户团’、

---

<sup>①</sup> 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9 出版，第 138 页。

‘保卫团’、‘联庄会’之类；B. 平时分散，秘密训练，一遇战事则随时集中；C. 两种形式都不可能时则可以‘上山’。”<sup>①</sup>在这里，中共中央显然是接受了毛泽东的提议，同意武装“上山”。

大革命失败后，“武汉的党完全是崩坏的状态，一般同志都在各自逃生状况。注意到以为如何做，注意到失败是什么原因，是非常之少”，毛泽东就是这“非常之少”中的一员。<sup>②</sup>他一方面参与制定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一方面率先响应《中央通告农字第九号》的精神，7月下旬在武汉着手起草《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多次写信给在长沙的湖南省委成员，催促他们提供详细的军事报告，供起草大纲时参考。月底，《大纲》拟就。8月1日经中共中央常委会批准寄发湖南省委。8月3日，临时五人常委会批准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湘南特委。

在《大纲》中，毛泽东对湖南工农武装斗争作了规划：“湘南特别运动以汝城县为中心，由此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州等四、五县，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与长沙之唐政府对抗，与湘西之反唐部队取联络；此湘南政府之作用有：（1）使唐在湖南本来未稳定的统治更趋于不稳定，激起唐部下之迅速分化；（2）为全省农民暴动先锋队，造成革命力量之中心，以达推翻唐政府之目的。”<sup>③</sup>在军事方面：1. 请中央命令彭湃同志勿将现在汝城之粤军他调；2. 浏阳平江农军千人立即由郭亮率领赴汝城；3. 江西革命军调一团人赴汝城，举行湘南起义。这个大纲不仅体现了中共中央通告关于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的精神，而且还有所发展，已经蕴育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观点的萌芽，它实际上初步提出了毛

①② 《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84—88，175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办：《党的文献》1988年第1期，第78页。

泽东关于组建革命军队和用枪杆子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战略构想。

## 二、“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于1927年8月7日在武汉汉口三教街41号（今鄱阳街139号）召开的一次中央紧急会议。它是大革命失败后五人临时中央常委会为挽救危局所做的三件大事之一（另外两件大事为，决定在湘鄂赣粤四省举行秋收暴动和在南昌发动起义）。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共青团代表、军委代表、湖南、湖北、上海代表，共计21人。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确定在新形势下的党的总方针。毛泽东作为中央候补委员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于5号（或6号）进入会场。据李维汉回忆，开会时他坐在第二排。

当时，国内政局随着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而陡然逆转，全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在反动派欲将革命者斩尽杀绝的屠杀政策下，共产党人剩下的唯一选择只能是高举革命旗帜，以武装的革命反抗武装的反革命。据此，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彻底清算和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任务。

会上，代表们就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报告、瞿秋白的工作报告以及选举新的中央领导机构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不点名的批判。毛泽东作重要的发言，其发言次数屡计达7次之多，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第一，毛泽东揭露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者，在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中自动放弃领导权，使大革命遭到失败的严

重错误。他说：国民党问题在我党是很长久的问题，直到现在还未解决。根本观念是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后来象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这是一大错误”。过去群众中有偶然不听中央命令的，抓住了国民党的下级党部，当了此房子的主人翁，但这是违反中央意思的。直到现在，才改变了策略。<sup>①</sup>

第二，批判了陈独秀领导下的党中央反对农民革命的错误，主张没收地主的土地以满足农民的要求。毛泽东指出：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党也要革命，但上层的党部则不同了。广大的党内党外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当我未到长沙之先，对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及到了长沙住了30多天后，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发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于是党的意见跟着许克祥走了。”<sup>②</sup>关于农民的土地问题，他说：1. 大、中地主标准一定要定，不定则不知何为大地主中地主。我意可以五十亩为限，50亩以上不管肥田瘦田通通没收。2. 小地主问题是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困难的是在不没收小地主土地，如此，则有許多没有大地主的地方，农协则要停止工作。所以要根本取消地主制，对小地主应有一定的方法。现在应解决小地主问题，如此方可以安民。3. 自耕农问题。富农中农的地权不同。农民要向富农进攻了，所以要确定方向。4. 土匪问题是非常大的问题。因此社会党土匪非常之多，我们应有策略。有些同志以为只可以利用他们，这是中山的方法，我们不应如此。只要我们实行土地革命，那一定是能领导他们的。我们应当他们是我们自己的弟兄，不应看

<sup>①②</sup> 《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57页。

作客人<sup>①</sup>。“在得着政权的地方，应当全般（盘）计划此问题。”<sup>②</sup>

第三，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不做军事工作，不抓枪杆子的错误，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毛泽东说：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sup>③</sup>他还作好了亲自“上山”的准备，所以当蔡和森、陆沉等人提议让他加入中央政治局时，他再三推辞：“我现在担任土匪工作不能加入。”“自己非外面去作工不可。”<sup>④</sup>足见其宏大的胆略、气魄与胸襟了。

第四，毛泽东批判了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强调要发扬党内民主，“以后上级机关应尽心听下级的报告”。<sup>⑤</sup>

毛泽东的发言，更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武装“上山”思想。大革命失败前夕，他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上山”的策略，仅仅是考虑如何将共产党手里掌握的一点点武力保存下来，那是在各种办法行不通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及至大革命失败后，他开始设想将军事斗争与夺取政权、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结合起来，这在其起草的《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中已露端倪。在此次会议上则明确提出了“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将军事斗争视为夺取政权的先决条件。如果将毛泽东发言的第二、三条内容联系起来分析，便不难看出他在会议上的发言已隐约含有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的设想。总之，毛泽东的发言，是在党领导革命的根本

①③⑤ 《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73、58页。

②④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四册，第11、12页。



性问题上，不但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而且提出了对尔后具有重大意义的指导方针。

最后，在选举新的中央机构时，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8月8日，中共中央写了《关于组织湘南革命政府及特别委员会问题》的信，正式决定组成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湘南特委，领导湘南地区广大农村的农民革命斗争。接到任命后，毛泽东打算立即动身去湖南，却突然被通知留下来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次日，他出席了由瞿秋白主持召开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此外，苏兆征、李维汉、罗亦农、王荷波、张太雷、蔡和森、彭公达、任弼时、顾顺章及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进一步讨论了湘鄂赣粤四省秋收起义问题和各地党的工作。当时，湖南省委和共产国际派往长沙的巡视员马也尔向中央写信来一信，信中提出：由湖南组织一师的军队，尾随南昌起义军队往广东，与南昌起义部队共同取粤。看轻湘省暴动。对此，毛泽东断然反对，批评道：这是错误的。“大家不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扩大，所缺的是武装，现已适值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前不久我起草经常委通过的一个计划<sup>①</sup>，要在湘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一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现在的省委是在事变后收拾残局，成立不到两月，他在恢复湖南组织上是建了一点功劳的。以后省委应增加工农同志的指导是很对的，以前党内群众对党的负责人是不满的。”<sup>①</sup>

毛泽东的意见受到以瞿秋白为首的党中央的赞同和支持。会议决定改组湖南省委，吸收与群众接近的人加入，加强湖南党的

<sup>①</sup> 即《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

<sup>①</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办：《党的文献》1988年第1期，第79页。

领导；由毛泽东、彭公达与湖南省委协商选出新省委名单报告中央；新省委由9人组成，其中至少应有工农分子3人，工农运动负责同志3人，彭公达任新省委书记。罗明纳兹提议：“现应派得力同志如东（即毛泽东——作者注）”回湘传达和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坚决的保护紧急会议的意见”<sup>①</sup>。

会议进行中，瞿秋白曾要毛泽东留在党中央工作，毛泽东毅然回答：“我要跟绿林交朋友，我定上山下湖，在山湖之中跟绿林交朋友。”<sup>②</sup>再次表明了他准备离开城市、奔向山头，亲自率领农民武装去从事开创党的伟大新事业的顽强决心。

毛泽东的才干和远见卓识，引起瞿秋白的重视，中共中央决定对其委以重任，改变派他赴湘南的决定，于8月12日任命他为中央特派员，同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一起去湖南，领导全省的秋收起义。当天，毛泽东由武昌乘货车连夜赶奔长沙。

1927年9月9日，霹雳一声暴动，毛泽东和湖南省委领导发动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起义部队在进攻长沙受挫后，由毛泽东率领向井冈山地区进军，创建了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泽东以自身的行动，首先实践了他自己提出的“上山”思想。

如果没有毛泽东武装“上山”的构想，就不会有后来“上山”的行动；如果没有“上山”的行动，也就不会有“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和实践，更不可能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正是从这个角度说，大革命失败前后，毛泽东在武汉的革命实践活动，无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还是对共产党人实现从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这一伟大历史性转折，都有着重大的意义和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sup>①</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办：《党的文献》1988年第1期，第79页。

<sup>②</sup> 据何长工同志的回忆。

### 三、挽救神州陆沉的“转旋之术”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一手制造了卢沟桥事变，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奋起抗战，从此，开始了长达8年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

在这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国共两党以民族利益为重，求同存异，再度携手，共赴国难，共同奏响了一曲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英雄曲。11月中旬，沪、宁相继沦陷，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重要机构和重要官员、在野的各党各派领袖人物、文化知识界的知名人士、原驻南京的各国驻华使馆人员纷纷撤往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中共中央代表团与长江局也设在了武汉，武汉随之成为全民族抗日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实际的战时首都。这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历史名城，又一次放射出熠熠光辉，为全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所瞩目。

战时首都武汉，再次将毛泽东——湖北、湖北——毛泽东，直接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抗战初期，毛泽东虽然远在黄土高原，但他那锐利的目光，却雄视着神州大地，关注着武汉抗战。在上海刚失守时，他已预见到“救亡运动中心将移至武汉”，乃于1937年11月12日致电给活动于长江流域的中共负责人秦邦宪等，指示他们应重新分配党与非党的干部，除一部分去战区，一部分环境较好的仍留下外，应以一部分去武汉。<sup>①</sup>在延河岸边，这位中共最高层领导人通过各种渠道打听武汉的消息，了解武汉抗战的局势。遇着从武汉来的同

<sup>①</sup> 《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870页。

志或友人，总忘不了首先问一问武汉方面的情形。1938年秋，作家臧云远到延安，第二天毛泽东在窑洞接见了。交谈一开始，毛泽东就问起汉口文艺界对其所著的《论持久战》一文的反映，然后又问起武汉文艺界的情况。听了臧云远的汇报，毛泽东十分高兴。

在武汉，毛泽东的名字频繁地出现在各种重大的政治、群众场合——

1938年1月23日，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在汉口成立，毛泽东当选为名誉主席；

5月8日，在徐州会战滕县守卫战中光荣牺牲的国民革命军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的灵柩运抵汉口，武汉各界举行了为期一周的隆重追悼活动。毛泽东与中共其他领导人吴玉章、秦邦宪、董必武等联名向烈士敬献了挽联，挽联上写道：“奋战守孤城死如归是革命军人本色，决心歼强敌以身殉国为中华民族争光”，对烈士为国捐躯的精神给予了高度赞扬；

7月初，毛泽东当选为国民参政会参议员。6日，首届国民参政会在汉口开幕，毛泽东“因齿病及琐务羁身”<sup>①</sup>，未能出席，但在开幕之日，向大会发去了贺电，并向全体参政员“致民族革命敬礼！”<sup>②</sup>根据《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规定，中共参政员由重要文化团体或经济团体遴选产生，对此，毛泽东不无幽默地说：中国共产党有军队，不能算是文化团体，只能说是武化团体；

7月7日，为纪念抗战1周年，“武汉各界抗战建国周年纪念筹备会”发起、开展了献金运动，支援前方抗

---

①② 《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870页。

战和救济后方难民。一连数日，武汉各界人士顶着骄阳，冒着暴雨，不畏敌机狂轰滥炸，如潮水一般拥向献金台，踊跃献金，至使原定献金时间由7至9日3天延长为5天，献金洪潮弥漫着整个武汉三镇。7月11日，毛泽东致电武汉，“嘱将其参政员七月份薪金全数捐出”<sup>①</sup>；

同月，《解放》杂志为纪念抗战1周年、中国共产党诞辰17周年出版了专刊，专刊首篇即是毛泽东写的《论持久战》一文。这本杂志在武汉广为发行。8月中旬，新华日报社又将《论持久战》印成单行本在汉发行。《新华日报》在为该书作的广告中，这样评价道：它是“第三期抗战后划时代的重要文献”，“实为坚持抗战争取抗战胜利的指南”，“凡属军政人员与救亡工作者，均宜精研细读，以求理论和实践之合一。”<sup>②</sup>这部著作发行后一下子销售了10 000多册。甚至冯玉祥组织的“三户印刷所”也大量印刷了《论持久战》。据统计，《论持久战》总发行量突破了抗战以来出版界的纪录。此外，毛泽东撰写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也在武汉出版发行。

.....

此时此刻，在延安宝塔山下，毛泽东也正在思考着如何保卫武汉与取得第三期抗战胜利这个最急迫的问题，思考着怎样才能赶走日本帝国主义、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在他看来，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的胜利是中国的。因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

① 《新华日报》1938年7月12日。

② 《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9页。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战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sup>①</sup>。但要取得抗战的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就要实行全民族的全面抗战，只有动员全国的老百姓，才能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sup>②</sup>。他还科学地预见到持久战争要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时期；第二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时期；第三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时期。从而在人们面前清晰而有说服力地描绘出中国抗日战争发展全过程的蓝图。

在著书立说的同时，毛泽东将自己的见解，一方面通过各种新闻舆论载体，广泛地传播到民众之中，另一方面则亲自写信、致电，向在汉的国民党决策者以及各民主党派领袖阐释，他的言论和著作，在武汉抗战中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国民党军队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就认为毛泽东提出的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方针，并将此方针的基本精神向蒋介石作了转述，蒋亦表示赞成。据担任过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秘书的程思远先生回忆：当时“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公（即周恩来——作者注）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sup>③</sup>为了倡导全军学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白崇禧还为其部队每人发一本《论持久战》。

1938年7月，武汉会战已经拉开帷幕，整个武汉及周围地区笼罩在一片战争的紧张气氛中，就在这时（7月5日），毛泽东给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发来贺电，陈述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及挽救危局的意见：“寇深祸亟，神州有陆沉之忧；民众发舒，大难有转旋之望。转旋之术多端，窃谓以三言为最切：一曰，坚持抗战；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1991年第2版，第447、480页。

③ 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9页。

二曰，坚持统一战线；三曰，坚持持久战。诚能循是猛进，勿馁勿辍，则胜利属我，决然无疑。”<sup>①</sup>言辞间充满着对祖国命运的深深忧虑，更指明了取胜的途径和必胜的前景。

次日，首届国民参政会在汉口正式召开，毛泽东虽未出席会议，但在大会开幕的前一天，与中共其他6名参政员王明、秦邦宪、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一起，在武汉《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一文，宣传了中共的抗战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首先，指出了战胜日本侵略者、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之策略，这就是：在军事上必须求得前线作战部队战斗力之加强，敌占区中人民游击战争之大规模发展及有现代化武装之坚强部队的创立；在政治上，必须改善政治机构，促进省、县、区民意机关之建立，普遍地发动和组织广大民众积极参战；在经济上，必须加紧创建国防工业，调整战时财政金融，提高工、农业生产，采取各种有效办法保障与改善人民生活；而一切军事、政治、经济的改进，均有赖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继续的巩固与扩大。接着，具体提出了保卫武汉、取得第三期抗战必须注意和应采取的紧急措施。他们认为，目前“最急迫的问题莫过于如何保卫武汉与取得第三期抗战的胜利”，为此必须采取必要措施，即：动员一切国力来保卫大武汉和有效地进行第三期抗战；改革目前的征兵制度，代之以政治动员的征募办法，以期军队有充足的民族意识坚定的战士源源补充；发动和组织民众，真正达到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之目的；保障人民民主权利；改善现有政治机构，认真地推行地方自治；等等。最后，他们表示，“我们将忠实地遵循人民的训示和人民的意志而努力工作，我们将

<sup>①</sup> 《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0页。

确定地为中国人民的意志、愿望和要求的实现而奋斗。”<sup>①</sup>

两个月后，武汉会战告急。9月29日田家镇要塞陷落，至此，长江中的最后一个要塞被日军占领，武汉的东大门为之洞开。为争取蒋介石坚持抗战，同一天，毛泽东亲笔给蒋写了一封信，再次陈述了中共和他自己对抗战前途的见解。同时指示正在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周恩来，不必等大会结束，星夜兼程赶奔武汉。10月1日，周恩来抵达武汉。4日，在汉口将毛泽东的亲笔信面交蒋介石。

在信中，毛泽东首先充分地肯定了15个月来中国抗战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虽顽寇尚未戢其凶锋，然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无穷”。其次，论述了中共对时局的主张。指出：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即进入到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阶段；此阶段的特点，将是一方面更加困难，另一方面必更加进步；“其任务在于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再次，特别强调了在我之准备反攻阶段坚持统一战线的极端重要性。因为，“在此过程中，敌人必利用欧洲事变与吾国弱点，策动各种不利于全国统一团结之破坏阴谋”，所以，“惟有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克尽最善之努力，在先生（指蒋介石——作者注）统一领导之下，严防与击破敌人之破坏阴谋，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并施行新阶段中必要的战时政策，方能达到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之目的”，而国共两党的合作，休戚与共，乃是支持长期战争和长期团结的关键。在信的末尾，毛泽东慷慨激昂地写道：“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之长期团结，必能支持长期战争，敌虽凶顽，终必失败；而我四万万五千万人之中华民族

---

<sup>①</sup> 《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0—263页。



必能于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克服困难，准备力量，实行反攻，驱逐顽寇，而使自己雄立于东亚。”<sup>①</sup>何等恢宏的气势！何等博大的胸襟！何等非凡的远见！果然，1938年10月下旬广州、武汉先后陷落后，中国抗战进入到一个新的、也是最艰苦的阶段，即敌我双方相持阶段。

总之，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是挽救神州陆沉的根本之所在。大量史实证明，毛泽东在抗战初期论证的这一观点是适时而科学的。正是国共两党始终把打击的目标集中于日本侵略者，才使两党的合作得以坚持；正是两党坚持了合作，才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巩固和发展；正是坚持了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使中国抗战得以支持8年之久，最终获得胜利。而抗日战争的胜利，又为一个独立、民主、自由、富强的新中国屹立于世界东方奠定了基础。

## 四、使敌“处于我战略包围之中”

武汉会战，是抗战初期国民党正面战场进行的著名战役之一，它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上有着重大的意义。会战期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虽一直与日寇周旋、战斗在华北敌后，并未亲临武汉保卫战的第一线，但他胸中自有全国抗战的整套方略，对武汉抗战的战略设想也自有独到见解，并将自己的见解屡次电告设在武汉的中共长江局和国民党最高当局。他还指示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牵制敌人，积极配合正面战场的武汉保卫战。事实上，每当人们缅怀武汉会战这段悲壮的历史时，必然会联想到

---

<sup>①</sup> 武汉市档案馆等编：《武汉抗战史料选编》，1985年版，第269—270页。

毛泽东——这位伟人的名字。

武汉，素为中原重镇，水陆交通发达，距平、沪、穗、渝均为1200公里左右，承东启西，南北交汇，有“九省通衢”之称。在文化名城北平、经济大都市上海、政治中心南京、战略要地徐州相继沦为日寇之手后，武汉的战略地位尤显重要，是故，占领武汉就成为了日寇攻克徐州以后的下一个战略目标。日本当局遂于1938年6月13日召开御前会议，正式作出决定：进攻武汉，彻底打击国民党政府，逼它逃往重庆或投降；占领中国沿海要地广州和粤闽等主要口岸，切断中国海上通道，以封锁国际对华援助。为此，日本在经济上增拨临时军费25亿日元，在军事上将全国兵力重新作了区分和调整，动用陆军14个师团，空军300多架飞机、海军舰艇120余艘进攻武汉。当时日本陆军总计有34个师团和6个混成旅团，而用于进攻武汉的陆军就占了陆军总兵力的1/3强，足见日本军部对进攻武汉的重视了。

迫于武汉在战略上的重要地位，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不得不展开对日军的会战。1938年6月5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了会议，决定调集兵力，进行武汉保卫战。随即调动军队130多个师，计100余万人与日军展开了武汉会战。

对于平、津、沪、宁沦陷后，战时首都武汉将成为日军的战略进攻重点之一，毛泽东早已预料。还在1937年12月30日，他就电告在武汉的长江局负责人王明、周恩来等，请他们将中共中央对敌情的判断转告蒋介石。据毛泽东判断：“敌占济南、徐州、蚌埠或再进占郑州、开封完成第一期作战任务后，其第二期作战目标，当在占领兰州、广州、武汉三点，并使相互联络起来。但为早日切断中国对外交通，用以围困中国起见，似将先占兰州、广

州，而置武汉之占领于稍后。”<sup>①</sup> 据此，毛泽东于同一天两次致电长江局，告之中共中央关于全国作战的部署，指示长江局向国民党当局建议：国共军队共同建立苏浙皖赣边和鄂豫皖两个主要军区，前者以皖南为中心，攻击或准备攻击南京、芜湖、杭州、浙赣路与湖口之敌；后者以舒城、桐城、黄梅、广济、商城、固始为中心，攻击或准备攻击占领三条铁道及沿江之敌。此外，再建立皖南、皖北、浙南、鄂赣、汉水、豫西 6 个辅助军区，“使敌攻武汉处于我之战略包围”之中<sup>②</sup>。上述关于长江南北作战的部署，既是一个包括正面战场和侧面战场的全面战略部署，也是一个在江淮河汉地区准备发动游击战争的战略方案，它是对中共洛川会议上制定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战略方针的具体化，为长江局今后的工作指明了方向。

中共长江局接到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指示后，于 1938 年 1 月 1 日立即开会讨论，提出要用一切力量和方法阻滞敌人对郑州、武汉的占领，争取 3 至 6 个月的时间以准备和组织新的抗战力量。并通过了关于鄂豫皖边、鄂豫边、湘鄂赣边三个游击区工作的决议，要求各区动员、组织和武装民众，积极参加保卫家乡的斗争。会议还决定由周恩来负责草拟一份书面建议送蒋介石，提出目前抗战的危机和支持抗战局面的办法。

此时，蒋介石集团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抗战军民的推动下，对抗战的动摇已有所克服。1937 年 12 月 16 日，蒋介石发表了告全国国民书，表明了“贯彻抗战到底”、“争取国家民族最后之胜利”的决心，同时，拒绝接受由德国出面调停、提出的中日谈判条件。对中共的态度也是友好的。正如长江局在 1937 年 12 月 31 日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电文中谈到国共合作问题时所言：“我们对解

<sup>①②</sup> 《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28、130 页。

决目前时局办法，各方均表示同情。”<sup>①</sup>而新四军则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和长江局会议精神，于1938年1月按江北、江南分别集中，3、4月间，各支队分别向皖南、皖中集中，军部和第一、二、三支队先后到达皖南之岩寺地区，第四支队到达皖中之舒城地区，在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

1938年2月，毛泽东根据敌情变化，进一步明确提出了保卫西安、武汉的战略计划，他亲笔草拟电文，就保卫西安、武汉的全盘战略部署及八路军将来之行动致电朱德、彭德怀等八路军将领和王明、周恩来等长江局负责人。电文首先分析了敌情，判断“敌为夺取陇海平汉两路直取西安武汉，决胜点必在潼关武胜关”。平汉同蒲两路之敌，似力求由东、北两方，分数路向晋南，占领临汾风陵渡，最后夺取潼关，保障进攻武胜关之右翼；而进攻武胜关之兵力，主要从津浦路转来。其次，提出了战略计划。战略计划的第一部是为保卫潼关和西安而战；第二部为保卫武胜关和武汉而战。再次，提出了坚持长期抗战的问题。指出必须告诉国民党，应注意外线作战，“在敌深入进攻条件下，必须部署足够力量于外线，方能配合内线主力作战，增加敌人困难，减少自己困难，造成有利于持久战之军事政治形势”<sup>②</sup>。若将此电文与他在1937年底给长江局的指示相比较，无疑更进了一步，它不仅仅局限于大江南北，而是从抗战全局出发，将西北、华北、华中各战场紧密联结成一个整体，既说明了要为保卫西安、武汉而战，但更强调了内线与外线的配合，即使武汉不守时，亦能“使敌处于我之包围中”<sup>③</sup>。

毛泽东那睿智的目光一刻也未曾离开武汉抗战。5月初徐州会战开始，因在4月时曾取得了台儿庄大捷，于是，“速胜论”者

---

<sup>①②③</sup> 《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2、170—172页。

更以为有了依据，而否认持久战，大肆鼓吹徐州会战是与日寇的准决战。这种论调对于中国持久抗战和武汉保卫战是极其有害而不利的。针对“速胜论”者的论调，毛泽东急电王明、周恩来等（可能是1938年5月13日），明确指出：提倡准决战的论调“是不妥的。徐州决战只应该是某种程度的战役决战，而不应该看作战略决战，必须准备在徐州决战失败后仍有充分力量为保卫武汉而战”<sup>①</sup>。5月19日，徐州失陷，毛泽东审时度势，及时提出了“保卫武汉，保卫广州，保卫西北，坚持华北游击战争”的口号<sup>②</sup>。

1938年6月13日，日军攻占安庆，揭开了武汉会战的序幕。尽管国民党正面战场广大官兵不畏牺牲，顽强抗敌，但终因敌强我弱、战略战术上指导失误等诸原因，致使日军步步进逼武汉。7月4日攻下湖口，26日占领九江，取得了进攻武汉的战略出发点。8月22日，日军大本营发出进攻武汉的作战命令，接着，日军沿长江南北向武汉进攻，会攻武汉，至10月上、中旬，已逐渐逼近武汉市外围，战争形势分外险峻。10月16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为着直接有力地配合、支持武汉及武汉失守后迟阻敌人继续前进，拟以八路军一部进至鄂豫皖区活动为有利。在朱总（即朱德——作者注）未到汉以前，请向陈诚、健生（即白崇禧——作者注）透意、活动，传入蒋（即蒋介石——作者注）耳为宜。”<sup>③</sup>主动提出与国民党配合作战，共同保卫武汉，共同抗敌的问题。

毛泽东不仅关注着武汉会战的进展，而且还时刻惦念着前线浴血奋战的广大官兵，正当敌我两军激战之时，他于9月18日给前线将士寄去了慰劳信：“前线英勇抗战的将士们：望你们继续发挥你们的英勇精神，奋战到底，达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最后胜利之目的。一切后方的同胞都是援助你们的。”<sup>④</sup>寥寥数语，寄托

<sup>①</sup>②③④ 《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4、904、293、804页。

了他对前线将士的无限关怀与殷切期望。

综上所述，毛泽东对保卫大武汉的战略部署是以持久抗战为出发点和立足点的。他把战略重心不是放在城市、死守武汉、与敌人去争一城一隅的得失上，而是将保卫武汉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结合起来，以敌后游击战配合国民党友军作战，以便在武汉守不住时，亦能陷日军于我军的战略包围之中，为中国抗战顺利地转入相持阶段奠定基础。所以，他在安庆失守后的第二天（6月15日）曾就日军进攻武汉形势下我军作战原则等问题复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我们应乘敌主攻武汉，对华北、西北无法多顾之机，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并部分地进行运动战；目前为配合友军作战，为缩小华北敌之占领地，为创造并巩固华北根据地，都有大举袭敌之必要；惟具体作战须全依敌我当前实际条件而定，不因人家议论而自乱步骤<sup>①</sup>。此后，又反复强调，保卫武汉，重在发动群众，军事则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取时间，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

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武汉会战时，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主动进行战略上的配合，在华北、华中的主要铁路干线上炸车毁路，破坏敌人交通，以阻止日寇向武汉方向的后勤运输。八路军一二九师、一一五师各一部出击平汉路南段，晋察冀根据地人民连续出击，破坏敌军设施，从而打乱了日军南下增援武汉的侵略计划。为配合武汉保卫战，八路军进行战斗近千次，歼敌3万余，将30万以上的日军牵制在自己的周围。新四军则活跃于大江南北，展开华中敌后游击战。在江南的新四军于6月17日取得了有名的卫岗战斗的胜利。这一仗威震沪宁守敌，迫使其不敢迅速地、大量地由此地调兵增援武汉的前线。6月以前，日军在

---

<sup>①</sup> 《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5页。

南京、芜湖、镇江一线的总兵力不过3个联队，由于受到新四军攻击，而被迫将其在江南后方的兵力增至3个师团，从而削弱了日寇进攻武汉的力量。江北的新四军于4月底至5月，在舒城、桐城、庐江、无为一带展开，在蒋家河口伏击日军，首战告捷。与江南的卫岗袭击战，两相辉映。随后，又在合肥至安旻公路、合肥至六安公路上抗击日军。10月，发动了庐江和无为战役，解放了淮南路两侧和津浦路两侧的广大地区。此外，中共河南省委领导的豫东游击队及新四军一部，活动于豫东一带，对进攻武汉的日军后方给予袭扰。

八路军、新四军的敌后抗战，牵制了侵华日军的大批有生力量，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武汉会战，形成了敌后战场的外线进攻与正面战场内线防御犬牙交错，国共两党两军携手并肩、共同保卫武汉的生动局面。

## 五、“生存第一，胜利第一”

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与中国政府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至此，中日战争以中国人民的胜利而告终。消息传来，举国欢腾。人民渴望和平安宁，医治战争创伤，重建家园。中共根据人民的意愿，及时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但国民党当局却冒天下之大不韪，一意孤行，坚持独裁、内战的既定方针，一方面玩弄和平阴谋，欺骗人民，另一方面积极准备内战，向中共领导的解放区发起军事进攻。经过8个多月的准备之后，于1946年6月26日悍然向中原解放区发起大举围攻，挑起全面内战。

对于国民党当局的阴谋，中共中央、毛泽东早已洞察，就在5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各中央局和分局的电报中

已经指出：“国民党反动派除在东北扩大内战外，现正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在此种情况下，我党必须有充分准备，能够于国民党发动内战时坚决消灭粉碎之。”<sup>①</sup>同一天，中共中央收到中原局要求向西突围的电报，立即复电说：你们须立即准备向西突围。电文在分析了国民党当局正加紧布置进攻五师和全国性内战的严峻形势后，向中原局作出向西突围的指示：“主力向西当然亦有许多困难与危险，但比向东地区广大（豫西、鄂西、陕南、川东），便于机动，且早麦将熟，如和平破裂，即准备在这一广大地区作长期游击战争，牵制敌人，配合华北、东北，将起重大战略作用。至那时，如万分困难坚持，亦可出敌不意，突然向华北或陕甘宁区转移。”<sup>②</sup>接着，就中原局向西突围的具体步骤作了阐述：可以一部先一、二日分路向东出动，吸引敌人向东调动；另以一部与地方有密切联系的部队分散在当地长期坚持武装斗争，以达到迟滞敌人，减轻敌人对我主力向西突围的威胁之目的。随后，毛泽东代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给中原局、中原军区发来一系列电报，这些指示对中原突围的胜利有着重大的意义。

在中原突围前夕，毛泽东反复重申了“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原则，从战略的高度对突围予以了指导。

中原解放区位于鄂豫皖边区的大别山一带，是抗日战争时期由新四军第五师和八路军南下支队创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至日本投降前夕，中原根据地已扩展到60余县，形成了对战略要地武汉三镇的包围态势，且有平汉铁路贯穿其中。1945年10月组成了以郑位三、李先念为首的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原军区<sup>\*\*</sup>，统一指挥

<sup>①②</sup>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393、394页。

<sup>\*\*</sup> 中原军区下辖第一纵队、第二纵队、江汉军区、鄂东军区、河南军区，共有60余万人。郑位三任军区政治委员，李先念任军区司令员。



这一地区的斗争。而武汉三镇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自大后方运兵华东、华北、东北的战略枢纽，因此，在日寇宣布投降的当天，国民党就调集了20多个师及9个游击纵队，从四面八方向中原解放区围逼过来，到1946年6月，便将中原解放军主力包围在罗山、光山、商城、经扶（今新县）、礼山之间以宣化店为中心方圆不足100公里的窄小范围内。至此，蒋介石自以为彻底消灭中原解放军的时机已经成熟，遂于6月下旬令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指挥8个整编师又2个旅，约22万人，向宣化店发起猛攻，还调集了西安、武汉的空军配合作战，企图将中原解放军压至桐柏、大洪山区，一举歼灭之。同时，国民党断定，中原解放军必定向东突围，与苏皖新四军汇合，乃将重兵摆在东线，准备堵击。

鉴于国民党大军压境，敌我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回旋余地甚小，毛泽东于6月19日为中央起草了致郑位三、李先念、王震的电报，指示在湖北宣化店的中原局须随时注意敌情，准备突围。并预测了突围后的前景，毛泽东估计有两个可能前途：第一种前途是能达到向北的目的，第二种是被敌阻隔不能达到向北的目的：“因此你们须作两个准备：第一个争取一切可能向北；第二个在向北不可能时准备在国民党区域创造根据地，以待时局之变化。”<sup>①</sup>

接到毛泽东的电报，中原局在6月22日立即将敌人围攻的情形和突围线路向中央作了详细汇报，认为“局势确已发展到必须迅速主动突围的地步”，向南突围有长江阻隔，向东突围有敌重兵把守，北渡黄河有很多不能徒涉的河川，因而这三条突围之路均难达到目的；比较安全的只有由豫西南向鄂中、向西突围两条路，但这两条路也因国民党军对信阳、随县地区的攻占，已失去其一；

<sup>①</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办：《党的文献》，1988年第4期，第12页。

若等国民党军全部部署完毕，向中原解放区正式发动全面进攻时再突围，则中原解放军在战略和战术上均将陷于被动，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中原局请求中共中央批准他们在6月底开始实施主力突围计划，即经鄂中分两个纵队分别向陕南与武当山突围，再转至陕甘宁边区<sup>①</sup>。次日，中原局、中原军区遵照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对突围作了具体部署，决定兵分三路：主力向西突围；一部向东突围，以迷惑牵制敌人，掩护向西突围的主力；一部留在原地坚持斗争。

为了赶在国民党军发动总攻之前给中原局以指示，在获悉中原局电报后的第二天（6月23日），毛泽东当即代中央起草了给中原局的回电，同意中原局的突围计划：“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今后行动，一切由你们自己决定，不要请示，免延误时机，并保机密”<sup>②</sup>。在电文中，他特别强调了“生存第一、胜利第一”<sup>③</sup>的原则。6月25日，他再电郑位三、李先念、王震，重申了对中原突围的意见，“如遇严重不利情况，则以旅为单位分散前进”<sup>④</sup>。

6月26日，中原解放军按计划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战略转移。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一旅伪装主力，向津浦路以东转移，鄂东军区部队就地坚持武装斗争，以迷惑、牵制敌人。主力分左右两路向西突围，其中，右路突围部队在李先念、郑位三率领下，曲宣化店向西北方向移动，于29日晚从偃阳至广水间越过了平汉路；左路突围部队在副司令员兼第一纵队司令员王树声率领下，由光山县的泼陂河向西移动，于7月1日从广水至花园间突过了平汉

①②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办：《党的文献》，1988年第4期，第12—13页。

④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8册，第217页。

路。此时，国民党如梦方醒，始发觉中原军区主力是向西突围，刘峙乃急调部队尾追堵截，在天河口、苍苔、唐河、北河一线多次对右路突围部队截击合围，企图将右路主力歼灭于此；对左路突围部队则在宜城东南流水沟等地加以堵截，妄图将其主力消灭在襄河之滨。

就在中原部队主力向“豫鄂西前进以求生存”<sup>①</sup>时，毛泽东又适时地指出中原军区的任务和具体工作注意事项，高度评价了中原突围的伟大战略意义，给处于极度困难的突围部队指明了前进方向，也给了他们巨大的精神力量。

7月13日，毛泽东代中央起草了给李先念、郑位三的指示电，及时指明了中原部队今后的任务，这就是以机动灵活的行动，活跃于鄂、豫、皖、川、陕广大地区，在外线牵制大量国民党军队，有力地配合我内线部队的作战。7月15日，在获悉李、郑等的电报后，又以中央军委的名义致电郑、李，高度肯定了中原突围胜利的重要战略地位，赞誉“整个突围战役是胜利的，敌人毫无所得。你们这一行动已调动程潜、刘峙、胡宗南三部力量，给反动派以极大震动与困难，故你们的行动关系全局甚大”<sup>②</sup>。

在对敌斗争中，毛泽东不仅强调军事，而且十分重视政治。他于7月5日指示中原局，必须注意部队纪律，必须注意群众工作，以孤立反动派，便于自己的行动<sup>③</sup>。

此外，毛泽东还多次致电刘伯承、陈毅、粟裕等，让他们在南线积极部署，援助中原突围，“使我中原军能在陕南、豫西、川东、鄂西、鄂中、鄂东、皖西等七八处地方站住脚跟，即是战略

<sup>①②</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办：《党的文献》，1988年第4期，第15、17页。

<sup>③</sup> 参见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438页。

上一大胜利”<sup>①</sup>。

在此前后，中原局一方面与中共中央保持联系，一方面与追堵之敌艰苦征战，昼夜兼程，急速向豫陕地区和鄂西地区前进。右路主力在7月上旬跨过天河口、苍苔，渡过唐河、白河，7月中旬飞渡丹江，同敌血战于鄂豫陕交界处的荆紫关和南化塘一带，主力终于在南化塘杀出一条血路，冲破敌人重重合围，于7月下旬进入陕南的商南县境，与当地的陕南游击队汇合，开辟了鄂豫陕根据地，8月3日成立鄂豫陕军区；另一部三五九旅在王震率领下，经过荆紫关激战，杀出重围，继续北进，于8月底进入陕甘宁解放区。左路突围部队于7月中旬在宜城东南大部抢渡过襄河，进入鄂西北地区，26日，进入武当山区，分散在竹溪、竹山、房县、保康、南漳等地活动，创建了以武当山为中心的鄂西游击根据地，8月27日成立鄂西北军区；未渡过襄河的3 000余人转道北上，进入伏牛山，8月初抵达陕南，与右路主力汇合。

在中原军区主力向西突围的同时，河南军区也向西北开进，进入鄂豫陕根据地。江汉军区由安陆向西突围，原拟入川，受阻后返回，于8月26日在房县西南地区同左路突围部队汇合。担任迷惑、牵制敌人任务的东路突围部队，历经艰险，突破敌人重重追堵，跨越津浦路，于7月20日进入苏皖解放区，与新四军主力会师。留在原地掩护主力突围的鄂东军区，于7月下旬以后，分散在大别山坚持斗争。

经过近两个月的征战，中原解放军终于粉碎了国民党3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胜利地完成战略转移任务。连国民党也不得不承认围歼计划失败，哀叹“窜回陕北”和“窜入苏北、豫、鄂、陕、川边区之匪，利用山地蔓延滋长，实皆本次战斗之失”<sup>②</sup>，“国军预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办：《党的文献》，1988年第4期，第20页。

② 参阅《戡乱简史》，台北版，第75页。

计在两礼拜内进攻陕北，现已被破坏”<sup>①</sup>。

中原突围初步告捷后，毛泽东再电中原局，鼓励中原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再接再厉，树立必胜之信念。

1946年9月11日，毛泽东致电中原局、鄂西北区党委、鄂皖边地委，较为全面地阐释了突围胜利后的中原解放军的任务。电文首先通报了各地战况，要求中原大军“咬紧牙关，克服困难，在当地立稳脚跟创立根据地”<sup>②</sup>，钳制在陕南、鄂西、鄂中、鄂东对付中原部队的胡宗南、程潜、刘峙14个旅之敌军，协助老解放区粉碎国民党进攻。毛泽东激励官兵说：“你们过去两个多月英勇斗争已起了极大的战略作用，中央希望并责成你们今后还要起同样的作用。”<sup>③</sup>其次，电文强调，务必要在指战员中建立起一种信心，即“国民党的进攻是能粉碎的。只要这一进攻被粉碎了，我中原军与八路军、新四军主力就必定能够汇合一起”<sup>④</sup>。

由此可见，中原突围的胜利是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取得的。诚如中共中央在1947年5月28日致中原部队的慰问电中所说：我中原各部“在极端困难条件之下，执行中央战略意图，坚持游击战争，曾经钳制了蒋介石正规军三十个旅以上，使我华北、华中主力渡过蒋介石进攻的最困难时期，起了极大的战略作用”。<sup>⑤</sup>而这一时期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给南线各大军区、各中央分局的指示电，大多是由毛泽东亲自草拟的。

---

①②③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办：《党的文献》，1988年第1期，第17、24页。

⑤ 转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9页。



第三章

极目楚天舒





## 一、“落后的东西都要逐步废除”

1953年2月16日至19日，毛泽东在建国后第一次来武汉视察工作，作了许多重要指示。

2月16日晚上11时3刻，毛泽东到达汉口大智门火车站，中南局李雪峰、湖北省委李先念、武汉市委王任重等前往迎接。

翌日，中南局、湖北省委、武汉市委主要负责人分别向毛泽东汇报工业、手工业和公私合营的情况，毛泽东听取汇报后，说：“现在有人说‘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还有人主张‘四大自由’，都是不对的。新民主主义只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在这个过渡阶段，要对私人工商业、手工业、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另一方面我们目前家底子很薄弱，钢极少，汽车不能造，飞机一架也造不出来，面粉、纱布的生产还是私营为主，因此过渡要有一套办法，像从汉口到武昌要坐船一样。要团结民主人士，搞好他们的生活，争取他们和我们一道搞建设，对于资本家、中小地主、富农，要给出路，只要不当反革命，就要给工作，给饭吃。”

2月18日，毛泽东听取武汉市分管工业的负责人和武昌区委书记张彬汇报手工业生产情况。汇报完毕，毛泽东又询问码头工人的情况，他说：“还记得大革命的时候，有一次我从武汉乘船到上海去，在汉口码头被搬运工敲了竹杠。”王任重汇报说：“我们准备在今年秋季对码头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取消把头，成立统一的搬运公司。现在正在作调查研究、制定方案等准备工作。那些

欺压工人作恶多端的封建把头，已经在民主改革和‘三反’、‘五反’运动中被打倒了。”

2月19日，毛泽东接见汉口交易街（今大智街）街长陈光中，询问了街道居民生活的情况、街道的组织建设和民主改革工作情况。

接着，毛泽东问王任重：“为什么不少手工业要停工？”

王任重答道：“要停工的主要是一些织毛巾、袜子的工厂，这是失业工人组织起来的合作工厂，技术不高，产品质量比较低，商业部门怕积压，既不加工订货，也不收购。实际上，我认为让这些失业工人没饭吃是不行的。秋季是商业旺季，这些产品运到农村去是会有销路的。”

毛泽东听完后点点头说：“要把经济核算的原则与政治任务结合起来。国营商业不能单纯追求利润，要关心工人就业问题，在不赔钱的原则下，应当加工订货、收购。”

这天上午近10时，毛泽东把中南局、湖北省委、武汉市委的主要领导同志找到他的住所谈话。

“我爱进步的中国，不爱落后的中国。”毛泽东一语惊四座。

“要提倡进步，反对保守，反对落后。”毛泽东接着说。“落后的东西都要逐步废除。木船是民族形式，要不要用轮船代替？为什么人们不喜欢旧毛厕，要用抽水马桶？飞机、汽车、坦克哪一样又是民族形式？还是大洋房子比小平房好嘛！”

“有些人对保护老古董的劲头可大了，连北京妨碍交通的牌楼也反对拆除。”毛泽东若有所指地又说。

“中国有三个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已经被打倒了，还有民族资本主义、个体农业、手工业和文盲等问题。对个体农业，要用合作社和国营农场去代替；手工业要用现代工业去代替；要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坚决扫除文盲；对民族资本主义，则可以采取赎买的办法。”

谈及工作作风问题，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告诫在座的领导同志们：“对人一定要和气，说话尤其要和气。你们有的人，为什么说话不和气呢？”“官僚主义作风主要在上头，你们这些地方的同志要敢顶、敢抗。对于上边来的错误的东西，要筑坝、要消毒。对于上级布置的工作，要分别轻重缓急来执行……”

谈话进行到11时半，毛泽东登上海军“长江”舰去南京，李先念、李雪峰、赵毅敏、王任重等送他上船。

后来，王任重回忆这段经历时说：“这几天我的精神很紧张，但又很愉快。主席的谈话和他平易近人的作风，使我受到了宝贵的教育。主席到达武汉的前几天，中南局的领导同志就告诉我要准备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我组织了几个人写了不少材料，都没用得上。因为主席是根据他想了解的情况，向你提问题，除了特殊情况之外，他是不要你按照本本向他汇报工作的。”<sup>①</sup>“他提倡人们和他谈话，要交心谈心，不要说假话、套话，也不要说他已经知道的事情。”<sup>②</sup>

这一年的8月12日，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讲话说：“最近我去武汉、南京走了一趟，知道了很多情况，很有益处。我在北京，差不多听不到什么，以后还要出去走走。中央领导机关是一个制造思想产品的工厂，如果不了解下情，没有原料，也没有半成品，怎么能够制造出产品？”再次强调了调查研究对决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性。

① 王任重：《毛泽东同志第一次视察武汉》。

② 王任重：《满篇谎言——评梅白的〈毛泽东的几次湖北之行〉》，载《春秋》杂志，1989年第1期。

## 二、“把长江航运事业搞好”<sup>①</sup>

毛泽东一直对长江航运工作十分关心。1953年2月16日晚上，他第一次来武汉视察，下车伊始，就要人找来刘惠农。刘惠农1950年4月即担任长江区航务局局长，该局统一领导长江航务工作。1952年9月，受党的委派，以公方代表的身份担任公私合营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

一见到刘惠农，毛泽东就提了一个要求，想到汉阳去看一看。武汉三镇中，武昌、汉口，毛泽东以前都去过，唯独汉阳未去，因此要求也格外迫切。

刘惠农却感到十分为难。因为他答应了公安部长罗瑞卿，要劝阻毛泽东的汉阳之行。

“主席最好不要去汉阳。”刘惠农说。

“为什么？”毛泽东颇为不解。

“第一，从汉口到汉阳既没有桥，也没有渡江的轮船，坐划子很不安全。第二，汉阳的码头还没有建设好，公路上也没有汽车。第三，社会秩序还不够稳定。”刘惠农解释道。

但毛泽东不听劝阻，决意要去。刘惠农只好答应去作准备。

2月17日上午10点钟，毛泽东上了长航局派来的一条船。

毛泽东兴致颇高，要船长把船一直开到舵落口才回航。在汉阳高公街附近，他上了岸。

当时的汉阳十分荒凉，百废待兴。毛泽东边看边问。

“汉阳兵工厂的旧址在哪里？”

---

<sup>①</sup> 此文参考刘惠农：《社会主义航程的灯塔——纪念毛泽东同志九十周年诞辰》等有关资料。

“就在那边。抗战初期，国民党将工厂设备迁到四川，厂房被日寇轰炸了好几回，破坏得十分厉害。1950年下半年，我们在这里建立了一个棉纺织厂。”刘惠农指着龟山北麓一带说。

毛泽东点点头，又问：“人民群众想过江，也只有坐划子吗？”

“是呀！”刘惠农说，“这个地方是汉水与长江的汇合处，风大浪急，坐划子很不安全。不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已决定在汉水上架设铁路桥和公路桥，连接汉口与汉阳，使长江以北的交通运输畅通。”

听到这些，毛泽东满意地笑了。

1953年12月21日，离刘惠农说这番话差不多10个月的时间，汉水铁路桥正式动工兴建。

这条铁路桥全长372公尺，9墩10孔，桥墩高达30公尺，最大跨度为55公尺，桥梁式样中间为下承花梁，两端为标准钢板梁和钢筋混凝土梁。

1954年12月17日汉水铁路桥胜利建成，并于1955年1月1日正式通车。

在汉水铁路桥即将全部竣工时，1954年11月5日正式开工兴建汉水公路桥（即今江汉一桥）。全桥共8墩7孔，长达322公尺。桥面当中是宽阔的车道，可并排行驶6辆大型汽车。两旁各有可容5人并行的人行道。

1955年12月25日，汉水公路桥已全部建成。武汉市人民政府将其命名为“江汉桥”。12月31日，江汉桥举行隆重的通车典礼。宋侃夫市长代表全市人民祝贺“江汉桥”的通车。大桥工程局彭敏局长在会上讲话，表示“保证在1957年火车通过长江”。宋侃夫市长在一片热烈掌声中剪彩。接着，悬挂着毛主席画像和载着江汉桥建设者的彩车，首次跨过汉水，开向汉阳，满载着物资的大卡车和数十辆小汽车也在群众夹道欢呼声中开往汉阳。

江汉桥是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建设总输送体系的先行步骤。

1956年1月，毛泽东应有关方面请求，欣然命笔写下了“江汉桥”三字，亲笔题词在《长江日报》1956年1月22日头版刊出。领袖的亲切关怀，像一股暖流顿时传遍武汉三镇，温暖着每个人的心，使这座雄伟的彩桥增色生辉。

让我们再把话题放回到1953年。

2月19日，毛泽东乘军舰从武汉启程到南京去。刘惠农随船继续向毛泽东汇报长江航运工作。

刘惠农认为，长江上木船很多，运输能力极低，又经常发生事故，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今后应大力发展轮船，用轮船取代木船。

毛泽东对此作了精辟独到的分析。他认为，搞经济建设要从实际出发，中国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在短时间里不可能造出或购买许多轮船以取代木船。因而，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必须发挥木船的运输效能，尤其是在长江的支流上。

当刘惠农汇报到民生轮船公司公私合营的情况时，毛泽东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详细地询问了该公司公私合营的情况。

民生轮船公司原名“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是旧中国最大的一家民族资本轮船公司，也是旧中国企业中经营上带有事业性质的三大企业之一，在我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950年春，长江上国营轮船的吨位数尚不及民生轮船公司拥有的吨位数，更可见民生轮船公司是长江上一支十分重要的运输力量。但由于该公司采取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方式，机构臃肿，经营不善，生产效率低，事故频发，解放后18个月就亏损1300多万元，因此负债累累，内外债高达800多万元（人民币），以致工资都无法支出。人民政府虽然不断贷款维持，但因公司本身没有从根本上改革，仍不能摆脱困境。1950年3月，民生轮船公司创建人之一、总经理卢作孚先生通过该公司驻京代表向周恩来请示，要求政府以派代表的方式，参加董事会，帮助该公司渡过难关。

1952年，公司董事会正式向政府提出公私合营的请求，这实际上涉及到党通过何种形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大国策。中共中央对此十分重视，经党中央、毛泽东决策，同意接受卢先生的请求，于同年9月1日将该公司正式改组为公私合营企业。刘惠农以公方代表的身份担任公私合营民生轮船公司的总经理，张文昂、肖鹏同志和童少生、张文智先生为副总经理，公司总部设在汉口，从此，民生轮船公司获得了新生。

毛泽东听完刘惠农的汇报，指示道：“对长江航运事业要定一个五年、十年规划，把长江航运事业搞好。”对于民生轮船公司的公私合营，他予以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

后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多次称赞了民生轮船公司公私合营的经验，誉其为“无痛分娩法”。1953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民生轮船公司的公私合营情况，同时发表了《公私合营企业的一个范例》的短评，高度评价了这个典型。

1955年1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有各省委和市委代表参加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刘惠农和当时担任武汉市委统战部副部长的余金堂同志作为武汉市委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并在会上作了题为《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是必要的可能的》的重点汇报。

毛泽东再一次听取了汇报，并指示说：“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是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这个问题马克思、列宁并没有解决，我们想解决好，便要把工作做细致，不要怕麻烦。”

民生轮船公司的公私合营工作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关怀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合营后的公司焕然一新，为长江航运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 三、“希望你们把工厂办大办好”

黄石市是建国后发展起来的一个现代化工业城市。她坐落在长江南岸，于江汉平原和鄂东南丘陵地区的交接处拔地而起。大冶钢厂是冶金工业部建在黄石的一个特殊钢厂。它上起石灰窑，下抵西塞山脚，倚山面江，厂房逶迤十余里，是黄石市内最大的一家工厂。它生产的钢材，畅销国内外，深受广大用户的欢迎。跨进厂门，一条宽阔平坦的林荫大道把钢流奔泻红雨翻飞的厂房、炉群紧紧地串连在一起，大道延伸到厂区的心脏，一幅巨型匾牌呈现在眼前，上面闪耀着四个金光灿灿的醒目大字：“办大办好。”

这是毛泽东在1953年2月19日视察大冶钢厂时所作的光辉指示。这是大冶钢厂全体职工的骄傲和光荣。40年来，大冶钢厂正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逐步办大办好的。

#### “速来中南局”

1953年2月18日，中共黄石市委书记杨殿奎接到中南局的电话：“速来中南局。”杨殿奎不知道是什么事，当晚即乘坐黄石的机动小轮船出发，直奔中南局所在地武汉。翌日晨，他才知道原来是毛主席来了。建国初期，我国经过了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等运动，取得了三年国民经济恢复的伟大胜利。1953年是我国开始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在这期间，毛主席离京，巡视大江南北，进行调查研究，听取各地汇报。当时，他已经在中南局住了两天。

杨殿奎一到中南局，中南局秘书长刘建勋即通知他：“这次你



要向毛主席汇报黄石开展民主改革的情况和通过民主改革带来的变化。”

当时的大冶钢厂，根据中南局《关于放手发动工人群众开展民主改革运动的指示》，开展了民主改革运动。大冶钢厂是中南局的重点单位，民主改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把头。在运动中，个别领导人热衷于只搞生产，反对群众性的民主改革运动，认为“民主改革把工厂搞乱了”，把生产中出现的许多问题都归咎于民主改革，对坚持民主改革的同志进行攻击。后来，当中南局发现这些问题后，及时撤回了反对民主改革的工作组，纠正了错误路线，使民主改革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给冶钢这个人民企业打下了改革与发展生产的坚实基础。

杨殿奎匆匆吃过早饭，带着十分激动而又有几分紧张的心情等候着毛主席的接见。

毛泽东笑容满面地走来了。他平易近人，谈话像拉家常一样，杨殿奎心里的几分紧张随即消除了。一起参加座谈的同志还有刘建勋和湖北省委的几位领导干部。话题主要围绕工商业改造、工业建设、长江改造、三峡开发等方面展开。毛泽东提问题，大家谈。

上午，江汉关大楼的钟声刚敲过十一下，毛泽东在群众的一片欢呼声中，健步登上了“长江”舰，从武汉启程，顺江东下去南京。杨殿奎也乘此舰回黄石。陪同主席的有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公安部长罗瑞卿、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等。毛泽东抽出时间在船舱里专门听取了杨殿奎关于大冶钢厂民主改革情况的详细汇报，指出：“民主改革是中央的指示，你们搞得好，搞得对。”还说：“不同意民主改革的看法是错误的。”当杨殿奎汇报到冶钢今后的发展规划时，毛泽东说，“我要去看看。”

## “我骑着驴驹也要看”

毛泽东原打算只了解一下大冶钢厂民主改革的情况，不在黄石停船的。听了杨殿奎的汇报后，他临时决定要在黄石下船亲自看一看。

杨尚昆、罗瑞卿考虑到毛泽东的安全问题，不同意他上岸，说：“黄石是个小城市，连马路也没有，交通不便。钢厂到处都是轧钢、木棒，万一有坏人，不安全。”毛泽东听后，风趣地说：“那里是将来的工业基地，我骑着驴驹也要看，他们搞了民改怕什么？”

毛泽东执意要在黄石下船，杨、罗二同志只得指示将船减速。船到黄石时，已是星明月亮的时候了。由于毛泽东原计划到南京，途中决定视察冶钢，所以主席来了市委都不知道。杨殿奎到码头给大冶钢厂党委书记高芸生打电话，高惊喜地说：“真的吗？太突然了。”

江南二月的夜晚，虽是早春万物待苏之际，但还有几分寒气。毛泽东从“长江”舰上走了下去。他身披一件草绿色呢子军装大衣，头戴一顶旧解放帽，迎着湿漉漉冷冰冰的江风，健步登上了黄石江岸。当年的黄石，刚刚走过三年社会经济恢复的里程，还遍布着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盘剥榨取所留下的枪伤刀痕，满目疮痍。沿江土堤，窄矮残破，无一完好者。码头上，各种钢材、木材交错罗列，新墙旧基，挤满江岸，连个休息的处所也找不到。毛泽东就像当年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一样，神情激昂、步履稳健地跨过凹凸不平的堤坡，来到横贯码头的铁路边，安然无忌地在轨道上坐下小憩，久久地环视着春江夜景和夜幕中闪烁着的市区灯火。

夜晚7时左右，杨殿奎、高芸生等人陪同毛泽东乘坐大冶钢厂“福特牌”（17—30110）小汽车，驶向冶钢招待所。一会儿功夫，车到招待所，毛泽东下车与在门口迎接的谢健、潘琪等人握

手后，来到一楼小会议厅。毛泽东坐在靠南面的长沙发上，分别问同志们的姓名、职务。还询问高芸生：“今年的伤亡事故有多少？”高芸生便让人事科的女科长朱辉向毛主席作了简要的汇报。

### “一个一个地从头看到尾”

在招待所休息了10分钟左右，毛泽东就要求下车间，去生产第一线视察。杨殿奎问他：“怎么看？”毛泽东挺有兴致地说：“我要从大冶钢厂的炼铁、炼钢、轧钢、锻钢到化验室，一个一个地从头看到尾。”毛泽东这次来大冶钢厂视察，是他老人家第一次接触钢铁企业。诚然，他想借此机会了解我国的钢铁生产情况，掌握第一手材料，从而制订发展我国钢铁工业的远景规划。

小车停在轧钢厂<sup>①</sup>西头水塔旁，毛泽东步行来到车间，在430m/m加热炉旁停住，杨殿奎和高芸生向毛泽东汇报了生产情况。毛泽东听后连连点头，表示满意。他靠近430m/m轧机，仔细地观看工人们的操作过程，然后问：“这是生产的什么钢？”

工人们答道：“这是给铁道部轧制的弹簧扁钢。”

高芸生补充说：“规格是100×250mm。”

听到工人们充满自豪感的回话，毛泽东高兴得笑了。接着，他又看了250m/m轧机的生产操作情况。由于事先干部、工人都不知道毛泽东来厂，突然发现是毛泽东来了，顿时都高兴得直鼓掌，但没有一人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

毛泽东在轧钢厂视察了一刻多钟后，步出了厂门。

小车驶进炼钢厂，车停在厂房东头。杨殿奎先下了车，毛泽东随即也下了车。在这里，毛泽东视察了A炉（即现二炼钢二号

<sup>①</sup> 此处所指轧钢厂及下述炼钢厂、锻钢厂、炼铁厂均系大冶钢厂的分厂。

电炉)，并看了出钢时的情形。他迈步走向浇铸底板前仔细地询问了生产情况，指着底板问：“这个设备是作什么用的？”

高芸生回答说：“这是浇钢的底板。”

毛泽东又问：“一盘浇多少钢锭？”

高芸生接着回答：“48个。”

毛泽东又问：“一个多重？”

高芸生答道：“130至150公斤。”

毛泽东听了连连点头，笑着向前走去。当他看到注管时，又问身边的高芸生：“钢水怎么从那里下去，从这边起来？”

高芸生回答说：“那是中注管，下边的汤道砖是空的，钢水从中注管下去，从汤道砖里流到模子里来。”

毛泽东听了高芸生的解释后，非常认真地看了这道工序。这时，他心情十分高兴，转身从东侧楼梯登上小平炉台，观看了生产情况和工人的操作过程。

毛泽东离开炼钢厂，徒步来到锻钢厂（即现一炼钢整模东侧），由杨殿奎、高芸生从北边一号门引进了厂房。约晚8点，毛泽东参观了二吨锤（22号锤），由于生产，这里噪音很大，他指着一上一下的气锤打着手势向工人们询问了生产工艺过程。在八号锤，主席站了片刻，同样用手比划着询问情况。

8点10分，毛泽东来到炼铁厂，登上了高炉台，全面视察了炼铁厂生产的全过程。然后，他热情地问一位青年工人：“家里几口人，拿多少工资，生活过得怎么样？”青年工人一一作了回答，说：“过得很好。”

毛泽东又进一步问道：“领导上关不关心你们的生活？”青工回答：“领导上很关心我们的生活。”毛泽东听后，十分高兴，连声说：“很好，很好。”

毛泽东走近六、五号风口。在五号风口，他从工人手里接过蓝色的镜子观看了炉壁和熔炼的情况。这时，突然传来一阵卷扬

机哗啦哗啦启动的响声，他回转身来，举目边看边问身边的高芸生：“这是什么？”

高芸生回答说：“这是上料的吊篮。”

毛泽东听后，打着手势，高兴地称赞说：“这很好，减省劳动力，自动化。”

一行人来到出铁口，毛泽东问：“什么时候出铁？”炼铁厂的保卫员宋友才回答说：“八点半钟。”毛泽东看了看手表，只听见身边的警卫员说：“来不及了。”

毛泽东非常惋惜地经北面台阶走下了炉台，顺着铁路观看了热风炉。他指着热风管问高芸生：“这起什么作用？”

高芸生回答说：“这是热风管，从风房送进来的冷风，经过热风炉加热，由热风管道送到高炉上去。”

毛泽东听后，点了点头，从铁路边步行到马路。高芸生问：“主席，您有什么指示？”

毛泽东环视了灯光闪烁的钢厂夜景，一字一句地说：“希望你们把工厂，办大办好。”话毕，就在杨殿奎、高芸生等人的陪同下，在工人们热情送别的欢呼声中，乘车到黄石码头，登上“长江”舰，继续向南京方向驶去。

## 四、“高峡出平湖”

1992年4月3日下午，北京。

庄严的人民大会堂里。出席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人民代表，以对中华民族高度负责的精神，表决通过了国务院提交大会审议的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

这个不寻常的时刻必将载入中华民族的史册。三峡，该寄寓了多少人的梦想啊！

最早设想在三峡造坝建库的，是中华民国的创始人孙中山，从那时算起，时间已过去了70多年；而新中国对三峡工程的论证，也已经进行了近40年，这其中，我们不应该忽略当年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雄才大略和远见卓识……

1953年2月19日中午，江城武汉。

毛泽东在武汉关附近的专轮码头上，健步登上“长江”舰。

“长江”舰从武汉启程，顺流东下。时任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的林一山手持地图，等候毛泽东的接见。

片刻之后，林一山走进二楼卧舱，向毛泽东汇报有关长江的情况。

林一山展开带来的地图，毛泽东手持一支红铅笔在地图上指点着。

“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借点水给北方呢？”毛泽东问道。

“比如说，从嘉陵江上游的白龙江和西汉水向北引水怎么样？”他又补充道。

“可能都不行。”林一山回答说，并作了详细的说明。

“引汉水行不行？”毛泽东把红铅笔指向汉中盆地。

“有可能性。”

“为什么？”

“因为汉江和渭河、黄河平行，与秦岭、伏牛山仅一山之隔。它自西向东，越到下游，地势越低，水量越大。这样只要找到合适的引水通道，兴建引水工程，就能把汉江水通过黄河引向华北。”

毛泽东抬起头来，凝望着窗外的滚滚水流，有些激动地问：“这个问题，你考虑过了没有？”

“考虑过。”

“嗯，有没有仔细研究过？”

“还没有。”

“你立即组织力量进行勘察，一有资料，就写信告诉我。”

2月21日上午，毛泽东又约见林一山。

毛泽东详细询问了长江水文资料的整理情况，语重心长地说：“要驯服这条大江，一定要认真研究啊！”

毛泽东还了解了长江流域的气象特点和暴雨区的分布等情况。

最后谈到防洪问题。他问：“怎样才能消除洪水的灾害呢？”

林一山摊开一幅《长江流域水利资源综合利用规划略图》，介绍说：“我们计划在长江干流及其主要支流上逐步兴修一系列梯级水库，拦洪蓄水，综合利用，从根本上消除洪水的威胁……”

毛泽东凝视着万里长江图，从世界屋脊的江源，直到金沙江、岷江、嘉陵江、乌江、湘江……烟波浩渺的入海口，纵横万里。他左手插在腰际，右手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大圆圈。

“太好了，太好了！”尔后又若有所思地问，“修这么多水库，全部加起来，能不能抵上一个三峡水库呢？”

“抵不上。”

毛泽东伸出手来，指着三峡口上说：

“费了那么大的力量修支流水库，还达不到彻底控制洪水的目的，为什么不在这个总口子上卡起来，毕其功于一役？就先修那个三峡水库，怎么样？”

林一山也兴奋起来：“我们很希望能先修三峡大坝，但现在还不敢圆这个梦。”<sup>①</sup>

毛泽东笑了。接着，他又详细地询问了有关三峡大坝的情况。

<sup>①</sup> 林一山：《毛主席指明了征服长江的方向》。

1954年12月，在京汉线上毛泽东的专列里，林一山又用整整一晚上的时间，向毛泽东和周恩来详尽地汇报了有关三峡工程的技术问题和坝址查勘情况，并特别汇报了三峡大坝、南津关坝区和美人沱坝区的地质基础情况。

毛泽东时而倾听，时而询问。他甚至想了解一些非常具体的细节问题。

“根据已有的资料，坝区的风化层有多厚？”

“大约30米左右，据国内外资料记载，世界上有风化层达到100米的。”

毛泽东有些耽心找不到合适的坝址，问：“如果这一带风化层也达到100米，怎么办呢？”

林一山答道：“请主席不用耽心。我们目前尚未全面勘探。我觉得，在25公里的火成岩河谷中，总会选到好坝址线。另外，在它的上游，还有一段片麻岩河段。”

毛泽东听到这里，脸上浮现出满意的笑容。“好，好！片麻岩是花岗岩的变质岩，抗风化性能要好得多，这下子好办了！”

此后，担负长江流域规划的广大勘测设计人员，迅速展开了对全流域的查勘工作，上自金沙江，下达入海口，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重点规划了三峡大坝和自流引水华北的线路，以及全长江的流域规划。

1956年5、6月间，林一山根据长江规划的初步成果，撰文论述了三峡工程在治理、开发长江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建议在流域规划阶段，应即“平行组织重点水利枢纽的设计研究工作”。

1956年5、6月间，毛泽东到达武汉，畅游了长江，写下石破天惊的诗句：“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这位6亿中国人的领袖，用诗的语言向全世界抒发了修建三峡大坝的愿望和情怀。它是在苏联专家来华以后，三峡工程已在技术等方面被证明有现实可能性时写下的，因此并非领袖一时诗兴大



发、罗曼蒂克。在三峡建大坝，确实成为毛泽东一个念念不忘的梦想，甚至可以说成为一个情结。他曾急切地对林一山说过这样的话：“你能不能找个人替我当国家主席，我来给你当助手，帮你修建三峡大坝好不好？”还有一次，毛泽东曾伤感地对人说：“将来我死了，三峡大坝建成后，不要忘了在祭文中提到我啊！”<sup>①</sup>

1958年1月，中共中央南宁会议期间，毛泽东听取了林一山的汇报和水电部副部长李锐关于三峡问题的不同意见，提出了“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方针。毛泽东委托周恩来亲自抓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他对周恩来说：“三峡工程的问题，你来管吧，一年抓4次！”<sup>②</sup>

1958年春，周恩来总理亲率中央、地方有关负责人及中外专家100多人对三峡进行了实地察勘。1958年3月下旬，中共中央在成都开会。会议听取了周恩来率队察勘三峡后的总结报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这是自1953年提出动议以来，中共中央对三峡工程所作出的第一个正式决议，所下发的第一个“红头文件”。《意见》认为：“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估计三峡工程的整个勘测、设计和施工的时间约需15到20年。现在应当采取积极准备和充分可靠的方针，进行各项有关的工作。”<sup>③</sup>

从此，三峡工程的兴建问题被提上了国家建设的重要议事日程。

① 陈可雄：《葛洲坝工程的决策内幕》，载《中国作家》1992年第6期。

②③ 樊云芳、丁炳昌、叶辉：《三峡工程论证始末（上）》，载《光明日报》1992年3月23日。

## 五、“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sup>①</sup>

1953年2月19日，瑞雪覆盖的武汉三镇，披着春日的朝阳，映射出银色的光辉。

上午，江汉关大楼的钟声刚敲过11下，几辆小轿车驶到江汉关码头，王任重首先走下车，接着李先念、李雪峰和赵毅敏也下了车。在群众的欢呼声中，毛泽东步下轿车，只见他头戴一顶旧解放帽，脚踏一双褪了色的黄皮鞋，身穿一件洗得有点泛白的黄哗叽制服，外面套着一件草绿色的大衣，旧得已经露出了线迹。一下车他就健步朝江边走去，登上了早已在那里停泊待命的海军东海舰队“长江”号军舰。他首先按照海军的礼节向舰尾上悬挂着的国旗敬了礼，然后朝战士们走来。

军舰徐徐驶离码头。毛泽东立在后甲板上，微笑着频频向岸上跳跃欢呼的群众挥手致意。

### “现在看清楚了吧”

军舰离江汉关愈来愈远。毛泽东离开后甲板，登上扶梯，来到高高的驾驶台上。

“同志们，愿意干海军吗？”毛泽东亲切地询问身边的战士。

“我们都愿意干海军。”航海长的回答脱口而出。

毛泽东点点头，说：“你们作为人民子弟兵，应该安心干海军，过去帝国主义侵略我们大都是从海上来的。现在太平洋还不太平。

---

<sup>①</sup> 此文参考新华社通讯员、《解放军报》记者、新华社记者采写的《伟大的航程》一文等有关资料。

我们应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

毛泽东走下扶梯，来到前甲板。战士们纷纷立正敬礼，排成一列横队。毛泽东摆摆手，说：“大家随便些。”

“你们都到过北京吗？”毛泽东问道。

“到北京参加过国庆检阅。”有几个同志回答说。

“嘿！我们是熟人了哟。”毛泽东笑了。

“天安门太高，没有看清主席。”一位水兵说。

“现在看清楚了吧！”毛泽东把身子往前倾了倾。

大家都笑了。

### “靠大家一起努力干”

时值深冬，天气十分寒冷，江风掠过甲板，战士们的衣服给吹得摆动不停。

毛泽东上前摸了摸战士的衣服，关切地问道：“冷不冷？”

战士们望着领袖慈祥的面容，热血沸腾，回答道：“不冷！”毛泽东拍了拍自己身上的大衣，笑着说：“你们是年青人，身体好，不怕冷。”

当毛泽东得知战士们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时，问大家：“你们团结不团结？”

听到战士们“很团结”的回答后，毛泽东脸上露出欣慰的微笑。

接着，毛泽东掰着手指头，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谈到共产主义的光辉未来；又从国际阶级斗争的风云，谈到海军发展的前景。

他语重心长地说：“过去我们没有空军，也没有海军，现在我们已经有了飞机，有了军舰。我国的海岸线这么长，一定要建设强大的海军，只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干，我们的前途是非常光明

的。”

“靠毛主席的领导！”战士们齐声说。

“靠大家一起努力干！”毛泽东谦逊地摇摇头。

### “应该好好地向战士们学习”

毛泽东从前甲板走到伙房。水兵们正在门口打菜。

他看了看饭菜，表示满意，并问：“天天都吃得一样吗？”

“一样！”

“干部战士吃的一样吗？”

“一样！”

军舰平稳前进，轮机的轰鸣声清晰地传来。毛泽东提出要到机舱去看望战士。

副机电长上前劝阻：“舱里又闷又热，还熏人，请主席不要去。”

毛泽东坚持要下舱，说：“都要看到嘛！我毛泽东怎能被这点困难吓倒？”

在机舱里，毛泽东向战士们一一问好。他向正在值勤的机电长伸过手去，机电长一看自己的手满是油污，不好意思和毛泽东握手，毛泽东笑着说：“没有关系的，这是革命战士的手，劳动人民的手，有力量，最光荣！”机电长双手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激动得睁大了湿润的双眼，久久地凝望着毛泽东慈祥的面容。

毛泽东回到舱面，向枪炮长详细地询问前主炮的构造和性能。枪炮长回答问话时，毛泽东稍倾着上身，听得是那样的认真，有时为了弄清一个细节，一连要问好几次。

毛泽东问身旁的舰政委学得怎样。他回答说：“刚学到一点舰艇知识，别的还不行。”

毛泽东亲切地对他说：“应该好好地向战士们学习。”

## “请把一个战士读的书都拿来”

20日中午，毛泽东从“长江”舰来到“洛阳”舰。

毛泽东首先视察了雷达室和驾驶台，然后走进会议室。他找来军舰副政委，询问干部战士们的政治思想情况和学习情况。

“请把一个战士读的书都拿来，让我看一看。”他对那位副政委说。

副政委答应了。刚走出会议室，就碰上一位报务员。副政委马上将这个报务员阅读的书籍拿来交给毛泽东。

这些书包括《毛泽东选集》、《实践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以及描写解放军和志愿军英雄事迹的读物，还有一些技术书籍。

毛泽东仔细地翻阅着一本描述头门山海战英雄事迹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说的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414艇指战员，在对比自己大数十倍的敌人的情况下，沉着冷静，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出色地完成了护航任务。

毛泽东说：“这本书内容很好，文字通俗，适合战士们阅读。”

又问副政委，“你看过这本书吗？”

“看过。”副政委回答。

毛泽东又对在座的干部强调要做好人的思想工作，重视从政治上建设海军，认为“要首先注意政治教育，提高同志们的政治热情”。

## “水道变了，世界也变了……”

战士们聚集在后甲板，拉起手风琴，跳起快乐的《水兵舞》。毛泽东微笑着走到战士们中间，称赞大家：“好，都很活泼。”

毛泽东问：“你们有什么乐器？”

“有胡琴!”“有手风琴!”“有笛子!”战士们像在队列里报数似的,一个个高兴地回答。

“还有锣鼓!”一位枪炮兵从人群背后挤到毛泽东跟前说。

“是啊,扭秧歌可少不了锣鼓。”毛泽东笑了。

毛泽东问:“你们中间工农同志有多少?青年学生有多少?大家团结不团结?”

当得到满意的回答后,毛泽东说:“应该好好团结。”并说:“今后就更好了,工农分子知识化,知识分子工农化,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的界限,慢慢地就消失了。”

战士们搬来一把椅子,请毛泽东坐下。毛泽东还是站着同战士们交谈。他关切地问大家:“同志们都习惯海上生活了吗?”

“都习惯了。”大家回答道。

毛泽东打着手势,对战士们说:“过去在陆地上,我们爱山、爱土;现在是海军,就应该爱舰、爱岛、爱海洋。”

毛泽东又来到伙房门口。几位炊事员正在里面忙碌着。其中一位正在炒菜,抬头一看,毛主席站在炊事班门口,他赶忙放下勺子,擦了擦手上的油,给主席敬礼。毛泽东问他:“你们伙房有几个人,有几口锅子?”又问:“我们在这里吃饭,你们便当不便当?”那个战士连忙回答:“很便当,很便当……”

毛泽东看了看烧好的菜,还舀起一勺汤晃了晃,问炊事员,伙食标准够不够,营养好不好。又仔细察看了伙房的卫生情况,说:“厨房卫生工作很重要,这有关全舰同志的身体健康。”

毛泽东来到前甲板,举起望远镜,久久地眺望着。军舰将要通过前方一个名叫小孤山的小岛。毛泽东说:“30年前,我路过这里,这个小岛那时在这边,现在到那边去了。过去这儿水道很窄,现在变宽了。水道变了,世界也变了……。”

## “多分几次，多照几张”

毛主席首次视察海军舰艇部队，战士们激动万分，彻夜难眠，“毛主席要能和我们在一起照个像，该多好啊！”

毛泽东似乎了解战士们的心思。21日上午9点多钟，毛泽东首先在“洛阳”舰上和大家一起合影留念。

天气很冷，战士们怕主席受凉，提议全舰合照一张。毛泽东说：“舰上人多，可以多分几次，多照几张。”

在照相的时候，毛泽东几次转过脸来，问大家排好了没有，还向前跨出几步，看看队伍，叫大家再靠拢一些，好都照上。

接着，毛泽东返回“长江”舰，同战士们合影。他不时地用手拉拉身边的战士靠近一点。还侧过身来指了指站在驾驶台上的战士，问摄影记者：“上面都能照上吗？”记者答道：“都能照上。”他这才放了心。就这样，毛泽东抽出宝贵的两个小时时间，分八批同两舰的指战员合影。

## “干海军就不要怕风浪”

22日凌晨1时，毛泽东抵达南京下关大兴码头。24日中午，毛泽东又迎风冒雨，亲临“南昌”舰、“广州”舰、“黄河”舰视察，并检阅101、104两艘鱼雷快艇的操演。

战舰迎着滚滚的江水，向燕子矶驶去。从驾驶台上向外望去，只见两艘矫健而威武的鱼雷快艇，飞快地赶了上来。鱼雷快艇从排气孔里猛力喷出的浓烟和激越飞腾的浪花交织在一起，像给快艇装上了两只银色的翅膀。

毛泽东站在甲板上，频频向鱼雷快艇挥手，脸上显出了愉快的笑容，兴奋地说：“这个东西很好，很快，要多造些。”

毛泽东在海军各级领导干部的陪同下，走进了军舰的会议室。有关负责同志向他汇报了工作。

毛泽东一个一个地询问在场的领导同志，都出过海没有。

当有两位领导同志回答说没有出过海时，毛泽东嘱咐大家，“你们是海军战士了，干海军就不要怕风浪，一定要到大海里去锻炼。”

那时候，我国海军正处于初建时期，舰船所需技术装备尚不能自给。毛泽东说：“海军建设一定要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点上。不能光靠人家，自己也要试着造。”强调“要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但我军好的传统，要发扬，不能丢。海军也要依靠群众，依靠渔民，要到群众中去扎根”。

下午4时，毛泽东离开军舰。

上岸后，毛泽东向前走了几步，转过身来，向战士们挥手；再向前走了几步，又转过身来向战士们挥手；继续向前走了几步，第三次转过身来，向战士们挥手。顿时，舰上战士和岸边群众的欢呼声融成一片，响彻长江上空。

正是在这次视察中，毛泽东接连5次为“长江”、“洛阳”、“南昌”、“广州”、“黄河”等五艘军舰写下了“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的光辉题词，为人民海军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 六、“为中国人民的利益”

屹立在沙市、公安和湘鄂交界的黄山头的荆江分洪工程纪念碑上，镌刻着毛泽东亲笔写下的“为中国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19个光芒四射的大字，这是毛泽东1952年5月19日在颁发给荆江分洪工程的军工、民工和全体员工锦旗上的题



词。

长江是我们祖国最伟大、富饶而又最美丽的河流，同黄河一样，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其长度仅次于密西西比河、尼罗河而居于世界第三位，流域面积相当于全国总面积的五分之一，从水量上说，仅次于南美亚马逊河、非洲刚果河及亚洲恒河而居世界第四位。

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是和长江的水分不开的，我们历史上无数的英勇、天才而又勤劳的人民都是喝长江水长大的。然而长江的洪流又不断地在吞噬着我们的城市和乡村，水灾的浩劫经常袭击着两岸的人民，肥沃的土地上，流浪着贫穷如洗的群众。据历史记载，从1849年到1949年的100年间，长江发生过7次大洪水，平均每14年一次。

荆江，指长江中游从湖北枝江到湖南城陵矶一段江流。河道弯狭，急流汹涌，素有“万里长江，险在荆江”之称。荆江南岸是辽阔的洞庭湖区域，北岸是富饶的江汉平原，均属我国的精华地带，是我国重要的粮棉基地。长江上游洪水来量大与中下游河道过洪能力小的矛盾体现最严重处即在荆江河段，因此历史上荆江大堤时呈险象，水位常常超过地面10多米，“一年丰收千担谷，洪水来了一担挑，前头挑着三岁孩，后头两个稻谷草，走遍天下无宿处，洪水何时才得消。”这就是荆江两岸人民千百年来惨痛生活的写照。1860年、1870年两次特大洪水，荆江大堤决口，30多个县被大水淹没，几百万人被洪水夺去了生命。1931年大洪水，江汉平原被淹9县、500万亩田地，死亡1.2万多人，灾民在300万人以上，武汉三镇也被淹没，京汉铁路被冲毁。1935年的洪水把洞庭湖区的垸子冲垮了90%，死亡1.4万多人。

1949年夏，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经过湖北、湖南时，迎接他们的却是长江大洪水。这是相当于1931年的大水。

仓促到任的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立即奔赴长江最危

险的荆江河段抗洪抢险。当时南岸已一片汪洋，方圆几十里不见人烟，北岸的荆江大堤已开始局部崩溃，岌岌可危，险情万状！

刚刚建立的长江水利委员会，首先把战略重点放在研究长江防洪上。1950年2月，长委会提出在荆江大堤南岸兴建荆江分洪工程的计划。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听取了汇报，看了设计书，并问到工程寿命多长。当听到至少可以用20年时，毛泽东说：“20年够了。”

1952年3月3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中南军政委员会发布了初步治理长江，消除荆江水患，修建荆江分洪工程以利两湖人民生活生产的决定。毛泽东也发出了“为中国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的伟大号召。

在毛泽东的伟大号召鼓舞下，30万劳动大军吹响了向大自然进军的号角。仅以75天的时间，完成了规模宏大、史无前例的荆江分洪工程。这项工程利用荆江以南、虎渡河以东、安乡河以北的低洼地带建立分洪区，用以蓄洪垦殖。分洪区可以分蓄长江洪水54亿立方米，使长江水位降低，基本上解除了荆江大堤溃决的危险。该工程包括：在荆江南岸，建造有54孔、长1054米的太平口进洪闸和有32孔、长336米的黄山头节制闸，修建208公里的新围堤，建一个分洪区和可安置17万分洪区移民的安全区；在荆江北岸，全面加固长江沿岸最为险要的堤段——荆江大堤。

当时，新中国还在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进行抗美援朝战争，能够在短短的两个半月时间里建成万里长江上、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闸，在当时世界上都被视为奇迹。人民满怀激情地歌唱着：

毛主席的眼睛观四方，  
人民的心事他知详，  
治淮未了，

又修荆江，  
毛主席的恩情像太阳，  
一担土就是千万担粮，  
修好荆江，  
就是修好谷米仓。

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是毛泽东“为中国人民的利益”治水思想的胜利。作为一项应急的过渡性治标工程，它初步缓解了历史上连绵不绝的水患给荆江两岸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1954年，长江发生了本世纪以来最大的洪水，荆江分洪工程三次开闸分洪，使荆江大堤得以安全度汛，保住了长江中游的最大城市武汉，使几十万生灵免为“鱼鳖”。

## 七、“庆贺武汉人民战胜了一九五四年的洪水”

在汉口滨江公园巍巍大堤旁，庄严矗立着武汉防汛纪念碑，那洁白的碑心石上精心镌刻着毛泽东的亲笔题词：“庆贺武汉人民战胜了一九五四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严重的洪水。”每当人们来到这儿，心中就会唤起对1954年武汉防汛抗洪斗争的难忘记忆，涌起对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深切怀念之情。

### 水患频繁的武汉历史

武汉地区是古云梦泽的一部分，位于长江、汉水的汇流之冲，地势低洼，三面环水。武汉三镇隔水对峙，武昌面临大江，汉阳

翼被江河，汉口四面环水。

历史上武汉三镇水患频仍，千百年来，劳动人民日夜盼望着有一道足以抵御洪水的坚固堤防。他们在明朝就曾修起了一些民垸、小围堤，到明末清初又连成部分堤防，但是历代反动统治者对堤防建设漠不关心，以致堤防残缺零乱，不成体系。据记载，解放前的百余年间，武汉就被长江的大洪水淹了三次，“洪水猛兽”这句成语，武汉人民是有着深切体会的。

老武汉人记忆犹新的 1931 年大水灾，武汉关水位达 26.94 米，洪水破堤直袭城区，房屋倒塌，人畜飘浮，被淹数月，市内陆地行船，京汉铁路被冲毁，景状十分凄惨。

## 特大洪水又来

1954 年，在这个革命胜利后的第五个年头，桀骜不驯的万里长江，又一次发生了罕见的特大洪水。

这年入夏以后，长江流域气候异常，暴雨连绵不绝，狂风不止，江河陡涨，水借风势，雨助水威，惊涛拍岸，浊浪滔天，洪水之大，为百年所未遇，其流量相当于黄河、淮河、海河三河流量的总和，最高洪峰达到 29.73 米，有些地区的水位竟平于两层楼房。如果依靠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残破不堪、百孔千疮的堤防，根本就抵御不了洪水的侵袭。

这一年，不仅长江发大水，淮河、黄河流域夏汛也来势凶猛。早在桃汛到来的 4 月份，中央防汛总指挥部和中央生产防旱办公室就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出了防汛防旱工作的联合指示，要求各汛区在保证水位下不溃堤。中共武汉市委、市政府贯彻这一指示，当即分别召开防汛紧急会议，采取紧急措施，集中力量与可能发生的水患作斗争。

## “立功去见毛主席”

6月中旬以后，位于武汉上游的洪水来量大，下游顶托，洪水流洩不畅，导致武汉关水位持续上升。

当长江武汉段水情已近历年平均最高水位时，中共中央于6月23日专门就武汉防汛工作下达了紧急指示，要求“竭尽全力来抢救危关”，并指定政务院副总理邓子恢负责领导武汉的防汛工作。

6月25日下午，武汉关水位突破26.30米的警戒线。随后连日递增，湖泊满溢，市内低洼地区普遍渍水，郊外部分农田受涝，武汉堤防遭受严重威胁。

6月27日，市政府发出紧急命令，紧急动员全市人民开展防汛。初期成立的防汛指挥部被扩大为总指挥部，在汉口胜利街市建设局内办公。总部由地方党、政、军和有关部门领导担任正副指挥，以王任重为总指挥，宋侃夫、李尔重、潘正道、宋烈、张海峰、张德、张雪涛、阎钧、唐适宇、方敬之等为副指挥（后又增加张平化、左叶、王克文），内设四室九处，各室处大都由副指挥兼管，总办公室主任为李晓明，总工程师办公室有老水利和市政专家陶述曾、涂允成、蔡炫等；室处干部则由机关、党、群团体抽调。分工明确，各执其事。

按照堤防分布情况，相继成立了第一、二、三、四、五和武昌、汉阳、水上8个分指挥部，划定堤段，分兵把守，全市调集机关、团体干部、工人、农民、居民、学生和部队战士近30万人组成防汛大军，全线出击，不间日夜，以人定胜天的英勇气概提出了“水涨堤高，人在堤在，坚决战胜洪水，确保武汉安全”的

战斗口号，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抗洪斗争。<sup>①</sup>

毛泽东和党中央密切地注视着长江的汛情，时刻关怀着武汉人民的安危。当洪水猛烈上涨，全线人力、物力越来越紧张的时候，中央及时向全国发出了“不惜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支援武汉防汛”的号召，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量防汛器材和生活物资，都以惊人的速度汇集到武汉防汛前线，有力地支援了武汉人民的斗争。

7月下旬，水势越来越猛，又遇上接连不断的暴风骤雨的袭击，堤防隐患四伏，险情接踵而至。正在这时，8月1日传来了政务院代表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向长江防汛抢险人员发出的慰问电，更加鼓舞了防汛大军的斗志。

8月3日，水位突破29米，18日又上升到29.73米，比1931年溃口水位高出近3米。面对奔腾咆哮的洪水，防汛大军发出了“保卫人民大武汉，立功去见毛主席”的豪迈誓言，同洪水展开生死大搏斗。直至10月3日，武汉关水位退至警戒线以下，前后共100天，武汉防汛“战役”胜利结束。

毛泽东与人民群众心连心。汛期后，毛泽东为庆贺武汉人民战胜百年罕见的特大洪水寄来亲笔题词。1969年，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在汉口滨江公园竖立起有毛泽东题词的纪念碑，供人瞻仰。一位老人说得好：“今天的水是百年不遇的大水，今天的政府是亘古未见的政府。”这话道出了当时武汉150万人民的心声。

## 汛期的前前后后

毛泽东的英明预见，为1954年防汛斗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

<sup>①</sup> 据陈绪文：《一九五四年武汉防汛追忆》，载《武汉文史资料》（季刊），1992年第三、四辑合刊。

早在1950年，毛泽东就对治理长江问题作了重要指示，并且亲自审议和批准了在武汉上游兴建荆江分洪工程，这座解放后在长江上兴建的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在1954年长江特大洪水期间，对确保荆江大堤和武汉市的安全渡汛发挥了重要作用。1953年2月，毛泽东亲临长江视察，对长江降雨量、洪水发生规律和堤防建设十分关注，一再叮嘱要加紧建设防洪工程，确保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武汉人民在解放后的头四年中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老堤进行了整修，为迎战特大洪水作了积极的准备。

防汛斗争取得胜利后，武汉人民并没有松劲，他们明白：长江的水害对武汉的威胁并没有完全解除，1954年防汛斗争的胜利，只是在征服长江的征途中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正在这时，传来了毛泽东的光辉题词，为武汉防汛工作指明了方向。

怎样为“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严重的洪水”作好一切准备工作呢？武汉人民把毛泽东题词转化成治江驯水的实际行动，立即开展了大规模的堤防基本建设。经过两个冬春的艰苦奋斗，初步改造了武汉老堤。接着，1957年冬到1958年春，又展开了声势浩大的东西湖围堤工程，在短短半年多的时间内，修成了一条长60公里、高10米、顶宽5米的大堤，为市区增加了一道抗洪防线。此后随着武汉市经济建设的飞跃发展，堤防建设也在大踏步地前进。现在，按照毛泽东光辉题词指引的目标，武汉市已经建成一个完整的防洪体系，堤线长度由136公里增加到300多公里，高度在6至8米以上，顶宽也达到6至8米，急流冲刷的坡岸铺砌了近200万平方米护坡，700多处险工隐患得到了治理；绿树成荫的防浪护堤林带，填补了解放前防浪设施上的空白；为解决排涝问题，陆续兴建了大大小小的泵站40多座，排渍能力大为增强。堤防抗洪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经受了30多年间多次高水位的考验。

今天，武汉人民缅怀这段历史，重睹毛泽东的亲笔题词，治江驯水的壮志豪情会再一次油然而生，毛泽东对武汉防汛抗洪斗

争的亲切关怀鼓舞着广大人民群众在与自然灾害的斗争中从胜利的基础走向新的胜利！

## 八、“长江里的水好甜啰”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这一首脍炙人口的《水调歌头·游泳》词是毛泽东 1956 年在武汉连续三次畅游长江后写下的。

毛泽东极为关怀建设长江的远景规划，多次视察长江，很早就有畅游长江的宏愿。1956 年 5 月下旬，毛泽东走遍大江南北，从长沙来到武汉，于 5 月 31 日第一次畅游长江。

这一天，骄阳似火，晴空一片湛蓝，进入夏季汛期的长江，水势上涨，江面格外开阔。正在施工中的长江大桥，耸然屹立，雄伟壮观。一些游泳好手很早就守候在江边，当他们获悉要跟随毛泽东游长江，激动的心情无法平静。

时近中午，几辆轿车驶进汉口军用码头，毛泽东从第一辆车中走了出来，满面红光，神采奕奕，向大家招手致意。12 时左右，毛泽东乘坐“武康”号江轮驶往江心，停在武昌岸边长江大桥八号桥墩附近。这儿水流湍急，漩涡一个接着一个。毛泽东偏偏选在这里下水。他健步走到船舷，沿着扶梯下水。当时江面有二、三级的东南风，流速为 1.20—2 米/秒。毛泽东视天堑如通途，履大江若平地，时而奋臂侧游，搏风击浪；时而踩水前进，信步于万顷波涛之上，浏览两岸景色；时而仰卧水面，双手放在脑后，头枕波峰，凝望万里长空；时而双手交叉置于胸前，安详地躺在水面休息。边游泳，边同周围的人谈笑风生。游到武汉关前的江心时，毛泽东问，离汉口还有多远？现在游到哪里？正说话间，一个浪头扑来，他从容地吐了一口水，风趣地说：“长江里的水好甜



啰！”

游了快一个小时，船上有的同志看水温仅有摄氏 20 度左右，跟随毛泽东游泳的一些同志已经有些体力不支了，便对毛泽东提议：“主席请上来吧，游的时间很长了。”毛泽东一边继续往前游，一边回答说，“还早着呢！”最后他一直游到汉口谌家矶江面，才起水上船，共游了 2 小时零 4 分钟，游程约 26 华里。上船后，他脸色红润，精神饱满，毫无倦意，很轻松地说：“如果给我个馒头吃，还可以再坚持两个小时。”大家看到伟大领袖身体这样健康，都感到无比高兴，浑身上下洋溢着浓郁的幸福感。

6 月 2 日，毛泽东为了实地视察长江大桥的建设，领略搏击江水的乐趣，要再次畅游长江。他提出，这次要从长江大桥上游下水，穿过桥墩，游过长江、汉水汇合处——龙王庙。这时，长江大桥的 8 个桥墩正在全面施工，好几个桥墩已耸立江中，开始架设钢架，桥墩附近停有不少吊船、驳船，许多锚链沉在水中。桥墩之间，水流特别湍急，流速达每秒 3 米以上；龙王庙一带水域，无风三尺浪，水急漩涡多。旧社会这里经常发生翻船事故，人们祈求“龙王保佑”，因而修了龙王庙。

下午两点多钟，毛泽东乘坐的轮船开到汉阳鹦鹉洲附近的江面上，他更衣下水。游到桥墩上游水域时，他立即改变游泳姿势，一边踩水，一边观看正在紧张施工的长江大桥。遇到大浪扑来，头就势一低，迅速潜入水中，十几秒种后又泰然自若地浮出水面。大桥工地，汽笛齐鸣，机器隆隆，人欢水笑。“毛主席来视察大桥啦！”“毛主席来检阅我们的工作啦！”“我们中国工人阶级一定要建设好长江大桥！”欢呼声传遍大桥工地，响彻长江两岸。在欢呼声中，毛泽东沉着镇静，迅速挥臂侧游，从二、三号桥墩之间一穿而过。这次，毛泽东一直游到武昌八大家江面才上船。历时 2 小时 40 分钟，游程近 28 华里。

6 月 3 日，毛泽东已从汉口搬到武昌东湖居住，他谢绝了让他

到东湖里游泳的安排，说：“长江是一个天然的最好的游泳池，在大江里游，随便它漂去。”这次他从武昌平湖门下水，穿过长江大桥七、八号桥墩之间，向下游游去。当天正下着毛毛雨，江面上刮着三、四级北风，天冷，浪大，毛泽东一直坚持游到武昌任家路一带，气也不喘，神情自若。游程 25 华里，历时 1 小时。

陪毛泽东在长江游泳的时候，王任重告诉他：“过去武汉市政府出过布告，禁止人们在长江游泳，因为怕淹死人。”毛泽东说：“这样好的游泳场所不利用多可惜！在游泳池那样狭小的池子里游水有什么意思，应当号召人们到长江、大河、大湖、大海里去游水，以锻炼人们的勇敢精神、宏伟气魄。”后来，邓小平、彭真、罗瑞卿等同志，都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学会了在大海里游水。

就在连续三次畅游长江后，毛泽东欣然命笔，写下了气壮山河的光辉诗篇《水调歌头·游泳》。如今，当我们肃立在武昌桥头镌刻着毛主席手迹的巨碑面前，低声吟诵着“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诗句时，毛泽东在大江中搏风击浪的威武英姿、和蔼慈祥的音容笑貌立即浮现在我们眼前。

当然，毛泽东毕竟已经是 63 岁的老人了，体力已经有所衰退，三次畅游长江以后回到北京，他曾对保健医生朱仲丽（王稼祥夫人）坦白道：“人不可逞能啊！我这次在长江游的时间太长了，已经感到全身疲乏，还要逞能，继续游，要不是叶子龙叫我上船，我只怕淹死了！”

朱仲丽不相信。毛泽东笑着说：“你不相信，观众也不会相信，这种心情我理解，所以，我就越游越起劲！”

朱仲丽说：“人们争着看您的勇敢和毅力哩。”

“唔！就这一下子坏事了。我被娇宠了，自己也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会游泳，几乎呜呼哀哉。看来世界上的事情，就是不能有一种唯我独能的思想。这次好险，幸亏有人下命令，也亏得我

服从了命令。”毛泽东若有所思。<sup>①</sup>

毛泽东畅游长江，不单纯是游泳，自有其不可低估的政治意义，既有其“与天斗争，其乐无穷”的大无畏精神，又有其应时之虑。游泳过程中，毛泽东也常机锋侧出、妙论泉涌。1957年夏季，他来到武汉，又两次畅游长江。9月5日下午，毛泽东乘坐轮渡15号在长江大桥五号桥墩处下水。这天，四级风紧催江浪，水温摄氏27度，有些人已经穿上了夹衣。毛泽东从容地走下梯子，先捧起一把江水抹了一下胸脯，就畅游起来。游到汉口四维路附近，他走上扶梯，迎面吹来一股江风，护游的运动员打了个哆嗦，信口说，“今天风太大，吹在身上有些凉。”毛泽东说：“水里是被窝，温暖得很。”接着意犹未尽地说：“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多么大，好多人都怕它，抗美援朝，我们顶了它一下，也没有啥。所以，世界上有许多貌似强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这番话在当年11月18日莫斯科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更被毛泽东提炼为一句名言：“一切所有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

## 九、“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

1956年6月1日，坐落在汉水、龟山之间新建的武汉市第一棉纺织厂，呈现出一派节日的景象。厂区干道上空，悬挂着一幅幅“全面、提前、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坚决贯彻执行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的巨大横标，宛若一道道彩虹，在阳光下显得分外鲜艳夺目。

上午9点多钟，毛泽东来到厂门口。他身穿半旧白府绸衬衣

<sup>①</sup> 朱仲丽：《灿灿红叶》。

配灰色裤子，脚着一双黑色圆口布鞋，神采奕奕、满面红光地朝人们走来。等候在门口的厂领导和劳动模范们激动不已，党委副书记忘记自己未戴帽子，跨前一步激动地向毛泽东行了一个举手礼。

“毛主席来啦！”这喜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工厂的每一个角落。在厂领导和劳动模范们陪同下，经清花、併粗车间，毛泽东首先来到细纱车间。

毛泽东边走边看，向欢呼雀跃的工人们挥着手。来到32号机车旁，他停住脚步，弯下腰，用手指轻轻地弹弹纱头，又拿起绒辊，抬起头来，指着集合器，问身旁的工人：“为什么要安这么个东西？”工人们回答说：“为了提高质量。”

毛泽东接着来到后纺车间，在第一台摇纱机旁，共产党员、值车工查焕珍动作灵巧、技术娴熟地为毛泽东表演了值车操作。在一排摇纱机台前，检修工徐心善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跨步向前，双手紧紧握住毛泽东的左手，激动万分地喊道：“毛主席好，毛主席好！”毛泽东急忙伸出右手，把他的双手握住，亲切地说：“工人们好，工人们好！”

毛泽东又来到成包车间。当时成包车间设备比较陈旧，打小包的工人用人工撒纱，比较吃力。毛泽东向厂领导们建议说：“这个车间的劳动强度比较大，为什么不改一改？要搞技术革新，看来还是机械化好！”

在变电车间，毛泽东得知变压器产自他的家乡湘潭时，满意地说：“好，好！”

在群众的欢呼声中，毛泽东来到厂会议室。整洁的会议室里，正中悬挂着毛泽东的像，对面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像。在毛泽东像下面有一张武汉市第三届劳动模范光荣榜。

毛泽东坐下后，厂党委副书记和厂长向他汇报了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如何和工人群众打成一片，依靠工人阶级办厂的体会。毛

泽东听完后，对大家说：“你们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这是一个新厂子，要努力把它办好！”

接着，他高兴地指着劳动模范光荣榜，问厂领导们：“这个上面，你们厂里有几个？”厂领导作了回答，并把在座的几位劳动模范一一向毛泽东作了介绍。

毛泽东问劳动模范们：“你们到过北京没有？”听到肯定的回答后，他风趣地说：“那么我们都不是头次见面了啊！”接着，他又关心地询问劳动模范陈爱娥：哪一年进厂的，多大年龄，家里几口人，念过书没有……亲切的话语似春雨点点滴滴洒在纺织工人的心田。

在欢庆的气氛中，毛泽东和劳模们一起合影留念。当他看到大家都站着时，他也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并招呼厂领导过来一起照。大家和毛泽东身挨着身，心贴着心，沉浸在无比幸福之中，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

## 十、“要在长江上修上二三十座桥”

1957年10月15日，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毛泽东描绘的“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宏伟蓝图终于实现，唐朝诗人李白的“江夏黄鹤楼，青山汉阳景；大语犹可闻，故人难相见”的哀叹和我国南北阻隔的状况成为历史。

武汉居中国之中，是汉水汇入长江的地方，因此城市鼎足而三。夹江有龟蛇两山对峙，虽是水陆交通的要会，实亦有长江天堑的险阻。长江水深流急，在长达5 800多公里的江面上，几千年来未造过一座永久性桥梁。它严重地影响了大江南北的交通运输，就像一把锐利的刀，切断了祖国南来北往的两大主要铁路干线——京汉、粤汉，不得不依赖运量很小的轮渡来维护交通运输。而

且每当洪水暴涨、恶风浓雾的时日，两岸的交通就有被隔绝的危险。

武汉长江大桥早经动议修建，远在1913年就开始了最初的勘测和设计工作。在1950年以前，先后有过多项尝试，但由于旧中国政府的腐败无能，以及种种原因，这些设想均成为泡影。这一艰巨的任务光荣地落在了人民中国的肩上。

1950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就决定了建造武汉长江大桥的议案。1952年，铁道部组建设计事务所，组织力量进行大桥工程的测量钻探工作。1953年3月，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局正式成立。1954年2月，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201次会议通过《关于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决议》。经过周密的勘探和设计，1955年9月，武汉——这座英雄的城市，在战胜特大洪水侵袭的第二年，又担当起这件巨大的富有历史意义的工程建设任务。

对于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毛泽东始终非常关注，他曾三次亲临建设工地视察。

1953年2月18日下午3时许，毛泽东在李先念、罗瑞卿、王任重等陪同下，从武昌东湖经珞珈山来到蛇山，登上黄鹤楼，视察了正在进行测量钻探、筹备施工的武汉长江大桥工地，询问了有关建设问题。“毛主席亲自来看桥址线了！”“长江上要架大桥了！”消息传开，人人奔走相告，个个欢欣鼓舞。

1956年5月31日清晨，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局党委第二书记、局长彭敏接到湖北省委通知，要他带上大桥工程建设情况汇报提纲，准备向毛泽东汇报。早晨七时，彭敏等人赶到汉口江汉关军用码头。不一会，毛泽东在省、市领导同志陪同下来到码头，和彭敏等人一一握手问候，接着一起上了“武康”号江轮。彭敏向毛泽东请示视察方式，问是否上岸。毛泽东说：“不用上岸了，就在船上看吧！”

毛泽东站在驾驶室窗内，深邃的目光望着施工中的长江大桥。船驶过汉水，接着沿汉阳江岸上行，从汉阳晴川阁向着正在紧张施工的江心桥墩徐徐驶来，从二号桥墩和三号桥墩之间通过，驶近鹦鹉洲时掉头回行，从三号桥墩和四号桥墩之间通过，继续下行……

实地视察后，毛泽东来到甲板上，听取彭敏的汇报。

当彭敏汇报道“新方法（指大桥施工中采用的管柱钻孔法）从社会意义上说是社会主义的劳动方法”时，毛泽东做了一个手势，打断了他的汇报，说：“这样提有些牵强，假如美国采用这种劳动方法，也是社会主义劳动方法？再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已经三十年了，却还未采用此方法。劳动方法只有科学与不科学、先进与不先进的区别，不好分哪些方法是资本主义的，哪些方法是社会主义的。我看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方法至少在目前比我们的进步许多，而从社会制度上来说，我们又是社会主义的。”

毛泽东十分认真地听取了彭敏等人的汇报，不时问上几个问题。

“彭敏，你知道不知道当年参加修建钱塘江大桥的老工程师还有哪几位健在？”当听到技术力量仍嫌薄弱的汇报时，毛泽东若有所思地询问。

“据我所知，还有罗英健在。”彭敏想了想，回答道。

“哦，他现在年龄多少了？在哪儿工作？”毛泽东接着问道。

彭敏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作了记录。

毛泽东还专门询问了大桥建设工人的生活情况，并且十分关切地问：“什么叫沉箱病？怎么治？”大桥局负责同志一一作了回答，并向毛泽东汇报桥工在建设实践中制造出了苏联还没有的震动打桩机。毛泽东高兴地说：“不能说苏联没有的我们就一定做不出来。”

最后，毛泽东又问了长江上还要修哪些大桥，得到回答后，他

豪迈地挥了挥手，“将来要在长江上修上二三十座桥，到处能走。”

毛泽东这次视察给全体大桥建设者以极大的鼓舞和激励，大家干劲倍增，你追我赶，“牵来彩虹凌空架，喝令钢龙跨江来”，终于提前建成大桥。

1957年9月6日下午6点半左右，毛泽东乘车来到长江大桥汉阳桥头堡附近，开始对长江大桥工地的第三次视察。这也是他第一次来到大桥公路桥面视察。

这一次，毛泽东决定从汉阳桥头徒步走到武昌桥头，进行实地视察。陪同的同志有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局副局长杨在田、政治部主任杜景云等。

毛泽东在桥上漫步走着，一面眺望武汉三镇，一面问大家修大桥用了多少钢材水泥，花了多少资金。听到回答后，他感慨地说：“在长江上修这么一座大桥，是要花费大量的财物啊！不过，这座桥连接武汉三镇，是会收到事半功倍之效的。”

毛泽东走到一排涂着各种颜色的栏杆面前，不解地问，“这是干什么的呀？”

“这是让大伙看看，挑拣出什么颜色好。”

“行呀，这是走的群众路线。”

毛泽东又问杨在田：“修桥工人最多时有多少？”

“有13 000多人。”

“哦，好多，简直是大兵团作战了啊！技术人员有多少？”

“300多人。”

“有苏联专家在这里可以修，现在如果没有苏联专家也可以修吗？”

“可以。”

“真可以修吗？”毛泽东重复问了一句。

“我们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提高了。”

是的，1956年开始兴建武汉长江大桥的时候，毛泽东曾指示



道：“要建成学会。”领袖的指示，大桥建设者们不折不扣地实现了。在大桥建设过程中，有2412名普通工人被培养成技术工人；有90名技术员、实习生晋升为工程师；有153名实习生被培养成技术员；有9名技术工人被培养成技师。这支建桥队伍已基本上能够独立运用世界上最新技术建设任何大型桥梁。

大家陪着毛泽东来到桥的中部。毛泽东面向长江上游，手指江中间：“鹦鹉洲不是在江中间的吗？”

“从前是在江中心，现在汉阳江边就叫鹦鹉洲了。”王任重回答道。

“啊！那可成了‘鹦鹉一去不复返’了。”忽然，毛泽东想起了黄鹤楼，1953年他来武汉时曾游览过。

“黄鹤楼因修建大桥已经拆除了，我们正计划重修。”王任重解释说。

“应当好好修，那可是天下名楼，历史留给湖北、武汉的财富呀！”毛泽东点着头。

这时，夜幕已经降临，大江两岸灯火辉映，璀璨夺目。陪同的同志劝毛泽东上车回去休息，毛泽东没有答应，他笑着说：“长江上的夜景可真是美不胜收，不领略一番，太可惜啰！”

毛泽东扶着栏杆朝桥下看，问身边的杨在田同志：“这时候桥面离江面有多高？”

“有四十公尺高。”

“游泳时可以当跳板。”有同志补充道。

“当跳板太高啦。”王任重不同意。

“从这儿跳下去会插到岩层上去的。”毛泽东比划着说。大家都笑了。

从汉阳走到武昌，毛泽东已经大汗淋漓，兴致仍然很高。他还想到铁路桥看看，因随行的同志纷纷劝阻，才作罢。

在武昌桥头堡，杨在田将一本《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建设画

册》送给毛泽东，并附上一封大桥工程局全体职工写给毛泽东的信。毛泽东欣然接受，并亲切地和大家握手告别。<sup>①</sup>

轿车载着伟人向远方驶去。

40天后，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实现了中国人民千百年来  
的“长虹卧波”的美好愿望。

## 十一、“每天跟群众打交道最有意思”

毛泽东是党的群众路线最忠实的执行者。作为农民出身的革命领袖，他和普通群众的感情是相当深厚的。他的行踪遍及祖国的山山水水，每到一地，他都要深入工厂、步入普通农民家中体察民情、调查研究。

1957年9月6日下午，毛泽东来到武汉国棉四厂视察，受到干部和工人群众的热烈欢迎。他深入到厂里的每个生产车间，看望坚守在生产岗位上的工人，和群众亲切交谈，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在大字报栏前，毛泽东仔细地看了仓库职工写的批评当时厂里一些领导干部作风不深入的一张大字报，他对这张大字报很赞赏，询问在场的厂领导，是不是那么回事？接着，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要密切联系群众，改进工作作风。一个领导干部，不能老呆在楼上，每天都要下去转一转，跑一跑，去深入实际，接触群众。”此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该厂党委实行认真的整风，作出了干部“下连当兵”的决定，党委书记带头搬进了工人集体宿舍，与工人一起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厂长亲自带领工厂行管干部深入车间，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参加劳动，真心实意为工人群众服务，改善了干群关系，推动了生产发展。

<sup>①</sup> 据《长江日报》，1957年9月25日。

早在1953年2月毛泽东第一次视察武汉时，他就对汉口交易街（今大智街）的陈光中街长说：“我非常羡慕你的工作，每天跟群众打交道最有意思。”这的确是他的心里话。

至今江城人民还铭记着毛泽东与人民心连心的一个生动事例：

1953年2月18日，正月初五。这天一早，毛泽东从住地中南局16号招待所（今惠济饭店）出发，过江去武昌视察。陪同的领导同志有公安部长罗瑞卿、中南局邓子恢、刘惠农、湖北省委李先念和武汉市委王任重、宋侃夫等。

毛泽东首先去东湖游览，约莫下午3时许，他经珞珈山来到蛇山，健步登临黄鹤楼，扶轩四顾，俯瞰滚滚东流的长江，回忆起大革命时期在武昌的日日夜夜……

为了免生事端，出于安全考虑，罗瑞卿请毛泽东戴了一只大口罩，没曾想还是给几位小学生发现了。孩子们一声呼喊：“毛主席来了！”顷刻间，在黄鹤楼做买卖的、游玩的、还有路过这儿的人们，呼啦啦一下子潮水般地涌过来，人们无比激动，欣喜若狂，振臂高呼：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霎时，这欢呼声像长了翅膀一样飞遍武昌大街小巷，一传十，十传百，蛇山脚下、武昌民主路、沿江大道，一股股人流在涌动，成千上万的工人、学生和市民从四面八方涌来……

大家多么想亲眼见到毛泽东一面呀！自从1927年8月离开武汉后，毛泽东未曾再来过武汉。人们万万没有料到，建国后毛泽东第一次来武汉视察工作，竟在黄鹤楼和武汉人民站在一起。

黄鹤楼上人越聚越多，黄鹤楼顿时被围得水泄不通。前面的群众看见了毛泽东舍不得离开，后面的拼命往人圈里挤，都想挤到毛泽东跟前，跟老人家握握手。毛泽东笑着向人们频频点头致意，不住地说：“同志们好！同志们好！”

看到这个热烈的场面，陪同的同志又喜又忧。喜的是领袖和武汉人民鱼水情深，亲密无间；忧的是武汉解放才几年，社会阶级情况极其复杂，他们耽心毛主席的安全。罗瑞卿挤到前面，对群众说：“同志们，主席工作很忙，时间很紧，请大家让出一条道来，让主席下山去。”说着便和其他同志、警卫人员一起手拉手，挽成一个圆圈，一步一步地保护主席朝山下走去。

群众非常自觉，自动围起几道保护的人墙。毛泽东从人墙当中，缓缓走向码头，准备乘停泊在武昌汉阳门码头的船过江，返回汉口。

这时，罗瑞卿得到报告，说汉口的群众已得到毛泽东来到武汉的消息，武汉关码头一带人山人海，在遥望武昌这边，等待毛泽东过江。

罗瑞卿为了毛泽东的安全，决定不让他从武汉关码头上岸，而是立刻调拨两艘小船，安排毛泽东乘船沿江而下，从江岸车辆厂附近的15码头上岸。

这时，武昌汉阳门、中华路码头直到大堤口沿江一带，人头攒动，群众欢呼着，跳跃着。正当毛泽东站在船上向群众挥手致意的时候，从人群中挤出来一位老太太，她眼里噙着泪花，喃喃自语：“真是他老人家呀！我可连碗水都没有敬给他老人家！”

原来，毛泽东从蛇山到黄鹤楼，走到半山腰，看到一所小茅草房门口挂着一块“光荣军属”的牌子，特意走进去探望访问。茅屋的主人是一位老太太，孙子参加了解放军，老太太只带着一个小女孩过日子。毛泽东问老太太：“生活困难不困难？”老太太回答说：“不困难，蛮好，政府非常关心我们。”毛泽东这才放心地告辞出去。老太太送走了毛泽东，又回到屋里来，觉得这位客人跟墙上挂的毛主席像一模一样，她猛然醒悟过来。于是不顾一切追到江边，自责道：“真是他老人家呀！我可连碗水都没有敬给他老人家！”

眼看着毛泽东乘坐的船慢慢驶入江心，罗瑞卿同志登上一艘电船向武汉关码头驶去。

云集在武汉关码头一带的群众，引颈翘望着急驶而来的电船，人们多么希望毛主席走上岸和他们见面啊！可是船上站着的却是罗瑞卿同志，人们纷纷询问毛主席的行踪。

罗瑞卿同志解释说：“主席很忙，他有要事要办，他托我作代表向同志们问好。”

此时，15 码头处。毛泽东已经下船上岸，坐进了小轿车……

大家回到中南局 16 号招待所，一个个都如释重负，怦怦跳动的心渐渐恢复平静。

刘惠农说：“主席，今天我们大家都急出了一身汗哩！”

毛泽东挥挥手说：“群众很好嘛，秩序也很好嘛！”

正说着，罗瑞卿走进房里来。

毛泽东风趣地说：“罗部长，今天好呀，你见了绳子都是蛇。”

罗瑞卿嘿嘿笑了，说：“主席，今天你愉快呀，人民都拥护你呀！”

毛泽东发出爽朗的笑声……<sup>①</sup>

---

<sup>①</sup> 参考张志善《黄鹤楼下春意浓》（载《武汉党史》1992 年第 1 期）一文及王任重、刘惠农等同志的回忆文章考证、综合而成。



第四章

坐地日行八万里





## 一、“大家尝尝湖北风味”

1958年，毛泽东先后于4月、9月和11、12月三次到湖北，视察了湖北的农村、工厂、学校，并主持了武昌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在湖北的许多地方，留下了光辉的足迹。

1958年4月3日，毛泽东到了老通城餐馆。

汉口花桥的老通城，是武汉一家老字号餐馆。这天晚上7点钟，餐馆里的顾客已经没有白天那么多了。这时，餐馆外面响起一阵汽车声，几辆小车在餐馆门前停下来，毛泽东、王任重一行人走下车来，步入餐堂。

毛主席！餐厅里的顾客一下子愣住了。这不是毛主席吗？毛主席怎么会到这里来呢？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在这里见到了自己的领袖，是紧张？是激动？他们只是不由自主地站起来，呆呆地望着毛泽东，可谁都忘记了和毛泽东打招呼。

还是孩子们最机伶。在这些顾客中，有几个小孩子在里面，一个叫滨滨的小朋友首先喊了起来：“毛主席！毛主席！”跑到毛泽东身边，另几个小朋友也不约而同地拥向毛泽东，其中一个用手牵着毛泽东的衣襟，仰着头问：

“毛主席，你是不是从北京来的呀？”

“是呀！”毛泽东弯下腰，用手抚摸着小孩的头，慈祥地回答。一边说话，一边和孩子们一一握了手，又环顾四周，向站在餐堂里的顾客们挥手致意。

餐馆的工作人员开始收拾桌椅，经理万书明也赶快来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在和顾客们打过招呼后，就看着餐厅墙上贴的标

语来，一边看，还一边念，然后问站在身边的万书明：

“这些是你们写的吗？”

“是的。”万书明回答。

“要大跃进，要除四害，很好。”毛泽东很满意，并接着说了三个“好”字。随即，用手摸了摸墙壁，又敲了敲，听到不是砖墙发出的声音，又问：

“这墙是什么东西做的？”

“用刨花板做的。”万书明回答，并简单地讲了一下做法。

“这么说很经济啰？”毛泽东说。

“是很经济。”

这时，为毛泽东一行准备的桌椅已经摆好，但毛泽东并没有去坐。看完餐厅后，又向厨房走去。一跨进厨房门，就满面笑容地挥手向大家招呼：“辛苦了！辛苦了！”

厨房里的师傅们，此前并不知道毛泽东已经到了他们餐馆，他们和顾客一样，何曾想到过毛泽东会到这里来！听到毛泽东的招呼声，他们怔住了。

毛泽东先走到做汤包的钟师傅面前。钟师傅此时刚把包子装上笼，准备去盖蒸笼盖子，见毛泽东走到自己面前，便赶紧停了手，但却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满面笑容地望着毛泽东。还是毛泽东先说话。

“这是什么包子？”毛泽东指着案板上已做好的包子问。

钟师傅还是呆呆地站着，巨大的幸福感似乎已使他停止了思维。直到毛泽东第二次问他：“这包子是谁做的？”钟师傅才如梦方醒，说：“这是汤包，是我做的。”

大家看到毛泽东如此平易近人，原有的一点拘束之感，很快烟消云散了，厨房里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毛泽东接着问旁边的曾师傅：“你是做什么的呀？”

“我是做豆皮的。”想了想，曾师傅又说：“我准备专门做点好

的豆皮，请您老人家吃。”

毛泽东来到炉灶前，用手摸了摸灶面，看看手上没有灰尘，满意地对大家说：“这个炉灶很干净呀！”

毛泽东又和其他一些师傅谈了话，边谈边走，走到宿舍门口的时候，又到宿舍里去看了一下。

参观完老通城，毛泽东对同来的同志们说：“今天就在这里吃饭吧。”

听说毛泽东要在这里吃饭，师傅们非常高兴，都希望把自己最拿手的東西献给毛泽东。但经过一天营业，有些原料已经用完，只能看材料办了。

毛泽东入座时，已经8点10分了。他举箸向同桌的外省同志介绍说：你们那里没有这，这是湖北的风味，来，尝尝湖北风味。大家都笑了起来。

毛泽东就餐时，许多人都把自己的座位移到最容易看见毛泽东的地方，以便能多看他一眼。许多孩子索性转过身子，眼也不眨地望着他。

毛泽东吃得很快，吃完后，即放下碗筷。一个小朋友看见他吃完，又跑上前去问好。毛泽东侧过身子和他握了手，并慈祥地抚摸他的头顶，小孩子高兴地走了。

等大家都吃完了，毛泽东才站起来，并看了看手表。大家知道他要离开了，也都站了起来。这时，顾客、工人师傅已挤满了餐厅。毛泽东又同身旁的工人师傅们一一握手，并问：

“你们是合作社，还是公私合营？”

“我们是国营。”工人们回答。

在厨房里工作的师傅们此时也都走了出来。已走到门口的毛泽东看到后面又走出来一些工人，又回过身去与他们一一握手后，才迈步离开。在离开的时候，他还风趣地对王任重说：“你们可不要告诉人说我到老通城吃豆皮，不然别的馆子会说我偏心，贴我

的大字报的。”上车后，毛泽东又从车内伸出手来，对跟出来的工人师傅们说：“谢谢你们！”

## 二、“多样化好处很多”

1958年9月10日，毛泽东再次来到湖北。当时，他对当年是否能够完成刚刚结束的北戴河会议提出的钢产量翻番的任务十分关心。因此，他顾不上旅途的劳累，立即翻开了当天湖北的各种报纸，对有关大办钢铁的报道特别有兴趣。

《长江日报》上一篇题为《怎样使小高炉正常出铁》的报道吸引住了他。这篇文章是武汉第一纱厂党委书记兼经理胡伯琴写的。文章中，胡伯琴介绍了一纱厂全体职工是如何克服困难，土法上马，苦战45天，建成小高炉，并在9月7日顺利投产的，总结了一纱厂建炉的经验，也谈到了纱厂办钢铁的困难和克服这些困难的办法：没有炼钢的技术员和工人，他们就派人出去学习，并把武昌钢校的师生请来作指导；没有耐火材料，就把厂里暂时不用的烟囱通道拆了，用来修高炉；没有鼓风机，就自己动手制造……最后终于投产成功。毛泽东很认真地看了这篇报道，决定第二天就到一纱厂小高炉工地参观。

9月11日，阳光灿烂，秋高气爽，是武汉不常有的好天气。武昌积玉桥南面凤凰山下一纱厂的炼铁工地上，一片繁忙景象。中午，一个喜讯在工地传开了：下午有中央首长来看小高炉。工人们纷纷猜测，是谁呢？他们多么盼望是毛主席呀！临近下午，几个性急的小伙子已经登上凤凰山顶，向积玉桥方向眺望。

下午3点45分，四辆黑色小汽车在离小高炉70多米远的一号门前停下来，毛泽东从第二辆车上走出来。陪同毛泽东前来的还有全国人大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中共湖北省委书

记王任重、武汉市委书记宋侃夫。

毛泽东下车后，和迎上前来的胡伯琴及其他同志握了手，便朝小高炉走去。一边走，一边听取了胡伯琴关于小高炉情况的介绍。

毛泽东走到小高炉的鼓风机旁，围着鼓风机走了几步，很仔细地看了鼓风机工作的情况。正在检查机器的机电工场主任程汉卿走了过来，胡伯琴把他向主席作了介绍，毛泽东热情地伸出了右手，程汉卿顾不上满手油腻，赶紧伸出双手，握住了毛主席的手。毛泽东又询问了机器设备的情况，程汉卿一一作了回答。

“这个小高炉是别人做的，还是你们自己做的？”站在毛泽东旁边的王任重问。

“是我们自己做的。”站在毛泽东另一边的胡伯琴回答。

“对，我昨天看到你在报上发表的文章了，知道你们修建小高炉克服了不少困难。”毛泽东在中间对胡伯琴说。

“不简单啊，纺纱厂也能炼铁。”站在胡伯琴另一边的张治中也称赞说。

毛泽东点点头，表示赞同张治中的话，接着说：“纱厂办钢铁，一个企业除了自己的专业外，还可以兼办别的工业和事业，要多样化，多样化好处很多。”

毛泽东提出要看看出铁的情况，胡伯琴于是将毛泽东一行带到小高炉左边炉口出铁的地方。这时，正是准备出铁的时候，毛泽东走到盛铁水的砂模前面站住了，并抬起手腕看了看表。

小高炉因是土法建成的，出铁时，必须用锤子将出铁口打开，打铁口，又是炉前难度最大的工作。前几天开铁口，最快也要一刻钟，有时甚至要一两个小时，并要锻工帮忙。毛泽东的到来，使炉前工心里不由得紧张。两个工人掌钎，另一个工人手挥大锤，一连打了上十下，铁口就开了，通红的铁水沿着铁水沟从毛泽东面前流过，毛泽东特别高兴，他又看了看表，满意地说：“开口很

快，只用了五分钟。”

铁水散发着高温，烤得人发热，毛泽东退了两步，又问身旁的胡伯琴：

“你们武汉有五个纱厂吧？”

“是五个。”胡伯琴暗暗佩服他对武汉情况的熟悉。

“都在办小高炉没有？”毛泽东又问。

“都办了小高炉，还要办一些土高炉，他们钢铁办得好，纱布生产也在大跃进。”这时，已站在毛泽东另一边的宋佩夫听到毛泽东问到武汉市的情况，便赶紧回答。

“好！”毛泽东看了一纱厂出铁的情况，又听到其它纱厂也都办了小高炉，感到很满意。

这时，铁水快要流完了，炉口流出一些铁渣，毛泽东指着铁渣问：“这是渣子吗？”

“是渣子。”胡伯琴回答。

“里面有没有铁？”毛泽东又问，

“没有。”胡伯琴脱口而出。

“有一点吧！”毛泽东风趣地说，把大家都逗笑了。

看完了出铁，毛泽东才离开高炉，向停车处走去。路上，毛泽东还询问了矿石原料的情况，还问了纺织厂在哪里。并说：“下次再来，看看你们厂。”

工人们簇拥着毛泽东，用热烈的掌声把毛泽东送到汽车旁。毛泽东和身旁的工人们一一握手告别，并不断挥手向群众致意，然后才上车离去。

### 三、“外行要变成内行”

东湖之滨，珞珈山北麓，是武汉大学化学系、物理系的工厂

区。1958年9月12日，毛泽东来到了这里。

这里，几个月前还是一片空地。在大跃进的高潮中，武汉大学化学系、物理系的师生在这里建起了30多个小型工厂。9月12日晚上7点20分，一列小轿车在工厂区停下，毛主席在王任重等同志陪同下，来视察大学生办的小工厂了。

“毛主席万岁！”早已知道消息并迎候在厂区的同学们无比激动，欢呼着向毛泽东拥去，围着他握手问好。化学系总支书记罗鸿运和毛泽东握手时，一旁的武汉大学副校长张勃川向毛泽东介绍说：“他叫罗鸿运，是化学系的总支书记，这里很多工厂，就是化学系办的。”毛泽东听了，笑着对罗鸿运说：“好啊，我是来看你的工厂了。你们有多少个工厂？”

“我们系共有30多个工厂，都是师生们自力更生办起来的，请主席看看。”罗鸿运回答。

毛泽东首先来到炼焦厂。当时炼焦炉正在烘炉，同学们都在炉前劳动。毛泽东走到炉前，副厂长盛蓉生同学代表炼焦厂的同学们上前向他问好。毛泽东握住他满是灰尘的手，问：

“你们厂有多少人？”

“有30几个人。”

“是分三班吗？”毛泽东又问。

“分二班。”

“那不是要停火吗？”毛泽东说。

“不停火。”

“不停火？那不是一班要干12小时吗？”

盛蓉生正不知怎么回答，毛泽东又问了一句：“是不是要干12小时呢？”

盛蓉生赶紧回答：“是的，我们是暂时的，等正式生产后，还要调整。”

毛泽东这才放心地点点头。他看了看围在身边的同学们，又

问道：

“你们都是学生吗？有没有技术工人？”

“有一位煤气工人，他是我们的厂长，其他人都是我们化学系的同学。”盛蓉生回答。

“技术工人是哪里请的呢？”毛泽东又问。

“就是我们系里的。”

毛泽东满意地笑了，从炼焦厂走出来。

接着，毛泽东走进了空气电池厂。同学们围上来，簇拥着自己的领袖，参观工厂和产品。徐茜莉，这个急性子的姑娘当了这个厂30多名同学的代表，给毛泽东作向导。她向毛泽东介绍说，这个厂是他们白手起家建成的，他们打破迷信，解放思想，不花一分钱，利用废物制造了压炭包机，许多部件是用木头代替钢铁，产品质量却完全合乎国内先进水平。毛泽东对这台土机器很感兴趣，在机器旁停了很久，看得很仔细，不住地点头称好。随即，拿起了他们的新产品观看。看到商标上写着汉口电池厂，毛泽东感到有些不解，问道：

“汉口电池厂就是你们的电池厂吗？”

“不，不，我们是为他们加工的。”徐茜莉红着脸，有些不好意思，又接着说：“不过，我们马上就要用自己的商标了。”

毛泽东来到硫酸厂。这个厂的室外部分是一个很大的块矿炉，炉前，几个同学正在汗流浹背地操作，看到毛泽东到来，他们欢跳着跑过去，厂长方佑龄跑在了最前面。毛泽东和他们一一握手，关切地问起了工厂的情况。方佑龄这才想起了汇报的事。毛泽东一边听，一边走近炉前。在炉前，毛泽东弯下腰，从洞孔里看炉内的火焰，脸上挂满了汗珠。看了一会，又直起身来，脱下银灰色上装，只穿一件白衬衣，继续听方佑龄介绍厂里的情况。最后，毛泽东看到方佑龄穿着一件很旧的背心和一条满是油垢的蓝布长裤，满脸是汗、浑身是土的样子，就伸出手，摸着他的头说：“象



一个工人的样子了。”

毛泽东又来到硅胶厂，先看了同学们洗硅胶，接着进了烘胶房。烘胶房里，厂长谢能咏，这个个子不高，年龄不大的湘潭姑娘用她的家乡话向毛泽东汇报了工厂的情况。当毛泽东知道她就是硅胶厂厂长时，就问：

“你是几年级的呀？”

“我是二年级。”谢能咏回答。

“你们厂有多少人呢？”

“26个人。”

“有26个人。”毛泽东笑了起来，又问：

“你怎么管得了。”

谢能咏回答说：“有事同大家商量，全凭大家一起干。”

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慢慢地说：“对啊，要依靠大家，边学习，边领导。”

在烘胶房，毛泽东仔细地观看了各种硅胶样品，并问了许多关于硅胶的问题，谢能咏都一一作了回答。最后谢能咏说：“我们现在正大搞技术革新，逐步实现机械化。”

“是用洋办法吗？”毛泽东很感兴趣。

“是土洋结合的。”谢能咏回答。

毛泽东很赞成，连声说：“对！对！土洋结合。”

硅胶厂门旁的一幅化学系工厂示意图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走过去，问站在图前的讲解员曾莉蓉：“你是讲解员吧？请你讲一讲。”这个长沙姑娘就用长沙话给毛泽东讲了起来。毛泽东一面听，一面用手指着图上一个一个工厂的名字念，“分析工厂、水玻璃厂……”当介绍到活性氧化铝厂时，他问：

“什么叫活性氧化铝？与普通氧化铝有没有区别？”

“都是氧化铝。”曾莉蓉回答。

“那为什么叫活性？”毛泽东又问。

讲解员窘住了，只是说：“活性就是活泼的意思。”

毛泽东又问在场的其他同学，大家也都未能回答上来。毛泽东就说：

“象活性氧化铝这样的问题都没有答出来，这说明你们还没有学好，以后要好好学习，钻研知识。”

看完工厂分布示意图，毛泽东又去参观卡普隆厂和矽钢片厂。在路上，毛泽东问跟在身后的罗鸿运说：

“你们办这么多工厂，你是内行还是外行？”

罗鸿运说：“我是外行。”

“外行要变成内行了！”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

“我一定要变成内行！”罗鸿运表示了自己的决心。

最后，毛泽东来到物理系办的炼铜厂。在反射炉前，他指着冒着熊熊烈火的炉子问：

“这是干什么的？”

厂长曾广培同学马上回答：“这是我们炼铜厂的一部分——水法炼铜小组，这个炉子是用来炼精铜的。”

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又问：“那么你们炼铜厂还有几个部分呢？”

“还有水法炼粗铜和电解炼纯铜两个小组。”曾广培说。

毛泽东马上问：“可以到那两个小组去看看吗？”

曾广培告诉毛泽东说：“水炼组在红安县，是与当地的工农一起建的工厂，电解组也不在这里。”

毛泽东有点惋惜地说：“哦，原来不在这里。”

毛泽东在反射炉前，仔细看了炼出来的铜块，问：“这就是精铜吗？用什么炼的？”

炼铜组长回答说：“这是精铜，我们用粗铜和废铜炼的。”

“那粗铜含铜量是多少？精铜含铜量又是多少？”毛泽东又问。

“粗铜含铜量一般是80%，我们精炼后可以达到97%——99%。”炼铜组长自豪地说。

毛泽东赞叹地说：“由80%炼到99%，那真不容易呀！”

曾广培说：“这是我们经过尖锐的思想斗争和好几次失败的考验，在党支部的领导和支持下苦干出来的。”

毛泽东听了，勉励地说：“好啊！青年人就要有志气，要经得起考验，要苦干，要巧干。”

7点57分，毛泽东视察了校办工厂之后，来到了武汉大学的大操场前，与等在这里的武汉大学、武汉测绘学院、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中南民族学院等4个高校的13000多名师生见面。在雷鸣般的欢呼声和掌声中，他从台的这一端走到那一端，向全体师生挥手致意。人们欢呼跳跃，整个珞珈山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在掌声和欢呼声中，毛泽东离开了武汉大学。离开时，毛泽东还对刘仰峤说：“在教学改革中，应注意发挥广大师生的积极性，多方面地集中群众的智慧。”

## 四、看武钢出第一炉铁

1958年9月13日，是武汉钢铁公司一号高炉提前投产出铁的日子，毛泽东来到武钢，亲自观看了武钢出第一炉铁。

9月3日，一号高炉比原计划提前10个月零28天竣工，进入最后一道工序——烘炉阶段，并准备在9月20日至国庆节期间点火投产。然而，9月10日，毛泽东到了武汉。为了让毛泽东看到他倾心关注的武钢出第一炉铁，武钢人决定：提前投产，让一号高炉在9月13日流出铁水。

9月13日过午，毛泽东在长江游泳后，乘船抵达武昌蒋家墩码头，弃舟登岸，毛泽东、张治中、王任重等一行在武钢总经理李一清、副总经理韩宁夫的陪同下，驱车直驶厂区。

汽车经过职工住宅区时，毛泽东问同车的李一清：“这是你们

的住宅区吗？”

“是的，这是住宅区，离厂远了些。”坐在毛泽东身旁的王任重说。

“那不方便啰。”毛泽东讲。

“我们已经搬到施工现场去了，这里是工人和家属的宿舍。”李一清接着说。

“你们对钢铁事业有没有信心？”毛泽东问。

“有，我们有信心！”李一清回答说：“群众的干劲也很大，创造很多，武钢的建设中就涌现了很多先进单位和先进人物。”接着，李一清向毛泽东介绍了一些先进单位和个人的事迹。毛泽东很有兴趣地听着。李一清最后说：“现在全国大办钢铁，耐火材料缺乏，我们的耐火材料厂也动工兴建了。”

“那好！”毛泽东显得很满意，又问：“你们有多少人？”

“现在有六万五千人，我们还要支援其他地方。”李一清回答。

“对！应该这样，力量发展了，就应当支援别人。”毛泽东很赞成。

汽车驶入厂前区，在简陋的经理办公室前停下来。毛泽东走进去，听取韩宁夫的汇报，刚坐下来，毛泽东首先就问：

“今天什么时间可以出铁？”

“三点半钟左右可以出铁。”韩宁夫回答。

“有没有把握呀？”毛泽东很关心。

“有把握！”停了一下，韩宁夫又说：“不过，也可能有预计不到的万一。”

“不要紧，今天出不了铁我明天再来，明天出不了后天再来，三顾茅庐也要看到出铁。”

韩宁夫拉开经理室墙上厂区总平面图的帷幕，开始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听得很认真，并不时提问。当听到矿石里还含有千分之五的铜时，他风趣地说：“铜也含得不少，你们可以叫钢铜公

司了。”当介绍到一号高炉时，他详细地询问了高炉的高度、容积、日产量等，韩宁夫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很满意，夸奖地说：“你都成了专家了。”

下午3点左右，毛泽东乘车来到一号高炉的出铁场。这时，出铁场旁，3000多名来自省市的群众和武钢的职工代表正翘首以待自己领袖的到来，一时间，彩旗飞舞，欢声雷动。毛泽东下车后，在李一清、王任重、张治中等人的陪同下，穿过欢乐的人群，登上高炉炉台，并凭着炉台前沿的铁栏杆频频向欢呼的群众招手。接着，他走到炉台中央，接见了武钢的14位先进模范。随后，在炉工休息室的小平台上坐下来，这里，是观看出铁的最佳地方。

毛泽东坐下后，韩宁夫向毛泽东介绍了高炉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如斜桥、秤量车等。毛泽东听了后问：“这些设备是不是国内制造的？”

“大部分是国内制造的。”韩宁夫回答。

李一清补充说：“一些主要设备如秤量车等是苏联供给的。”

这时，帮助武钢建设的前苏联专家们来了。毛泽东和他们一一握手，并请他们坐。专家组组长巴杜洛夫向毛泽东祝贺：“一号高炉提前建成出铁，这是你们的胜利！”

“谢谢你们。”毛泽东说：“这是我们共同的胜利！”

巴杜洛夫又说：“一号高炉是亚洲最大的高炉，这么大的高炉，苏联有3个，美国有2个，武钢就要建4个！”

“这是你们的帮助。”毛泽东笑着说。

3点12分，炉前工开始打出铁眼，韩宁夫对毛泽东说：“快出铁了。”

毛泽东忙站起来，走到平台前沿，准备看出铁。3点25分，通红的铁水奔流而出，顺着沙沟，流进铁水罐。

铁水很快就流完了。毛泽东很关心出铁的情况，说：“到前边去看看。”便下到出铁台，沿着铁水沟走到铁水罐上面的栏杆边，

看了看罐中的铁水，然后，沿着出铁台前边的栏杆，走下出铁台。在台下，他又问了一些出铁的情况，虽然对出铁不多感到意外，但毕竟看到了武钢出第一炉铁，还是非常满意。这时，王任重问他：“主席，是不是去看看炼焦炉？”炼焦炉也是预先安排的参观点。

“去看看吧。”毛泽东说。

3点40分，毛泽东乘汽车离开一号高炉，在焦化厂前下了车。炼焦厂厂长袁家柯将他们一行引到1号炼焦炉。

“焦炉有多少孔？”看见很多柱子，毛泽东又问：“是不是一柱一孔？”

“是一柱一孔，有65孔。”袁家柯回答。

这时，一个青年工人从2号炼焦炉那边跑了过来，来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和他握了手，并问了他的工作学习情况。

谈话的时候，13号孔的炉门开了，通红的焦炭穿过火架车，落在消火车上，消火车开进消火塔，立即，消火塔上空冒出巨大的蘑菇状白烟。毛泽东一边看出焦，一边询问了火架车的作用，怎样推焦、在消火塔内怎样消火等问题。一炉焦出完，他又问：“多少时间出一炉焦？”“九分钟出一次。”袁家柯回答说。

“再看一炉。”在太阳下，毛泽东又看了一次出焦，才满意地离开武钢。这时是下午4点钟。

毛泽东在离开武钢时，对武钢的发展提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武钢有六万五千人，象这样的大型企业，要利用自己的优势，化学工业、机械工业，都可以办一点，工农兵学商都要搞一点。”

## 五、第二次到“武重”

武汉重型机床厂，是毛泽东先后两次到过的地方。1956年6月3日，毛泽东冒雨乘车参观了正在建设中的武重工地，1958年

9月15日，毛泽东第二次到了这里。

9月15日上午8时，几辆小轿车徐徐开进工厂大门，毛泽东在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等的陪同下，来到武汉重型机床厂。下车后，毛泽东迈着稳健的步子，走进了第一车间。在他身边，有王任重同志，还有厂党委书记兼厂长史梓铭，副厂长孙毅，党委副书记储丹亭，劳动模范马学礼。毛泽东一边走，一边仔细地察看着机床。在门口不远的地方，就是一台巨大的龙门刨床，高耸的龙门架，似乎要触着房顶。4米宽、12米长的工作台，载着庞大的工件，往来不停。毛泽东饶有兴趣地驻足观看，史梓铭对毛泽东说：“这是7288的龙门刨，明年，我们要生产7289的，比这还大。”毛泽东微笑地点点头。

毛泽东走得很慢，一边看，一边询问着。孙毅副厂长向毛泽东汇报着边建厂边生产的情况。毛泽东看到工人們的干劲，看着欢快的机床，听着刀尖上的吼叫，不断地称赞工人們的革命干劲。

毛泽东来到厂房的中央干道上，看见一位干部满手油泥，正在忙碌，便热情地走过去，向这位干部伸出手来。这位干部怔了一下，赶紧在衣服上擦了几下手，一把抱住毛泽东的手掌。

毛泽东见这位干部在群众中劳动，便问旁边的孙毅副厂长：“全厂工人都认识你吗？”

孙毅回答说：“上次向您汇报，您给我们作了指示，反正不能一个长，反正不能独裁。现在，我和工人正在一起滚，和钢铁打几仗，就会和工人熟起来。”

毛泽东满意地点了点头。

迎面墙上，“鼓足干劲，大战苦战，一定完成二百台”的大红字标语，映入他的眼帘，他转向史梓铭厂长问道：

“今年的任务是200台吗？”

“是！”史梓铭厂长回答。接着，他就向毛泽东汇报了工厂生产跃进的情况。他说：

“我们今年原定任务是42台，后来跃进到65台，反右倾、反保守中跃进到130台，最近，又第四次跃进到200台。”

毛泽东关切地问：“能够完成吗？”

史梓铭厂长说：“这是工人提出的倡议，我们一定力争完成。”

毛泽东赞许地点了点头。

走到一台5米的螺旋铣床旁边，等候了很久的苏联专家迎了上来，史梓铭厂长把他们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和他们一一握手，一边说道：“谢谢你们！”苏联专家们向毛泽东介绍了这个厂设计、施工与生产的情况，毛泽东再次对苏联专家们说：“谢谢你们！”

来到中小件工部，毛泽东走近一位车工师傅的机床。他的机床上，今天早晨就贴出了一张大红纸。上边写着：

“车床高产试验田

月产700小时”

原来，厂里技术革新能手马学礼和同志们最近创造了一种新工艺，用外旋风铣代替车削，提高了工作效率十倍。昨天，马学礼听说毛泽东要来，就同机床上的师傅们商量，一定要在毛泽东到来以前，把一切准备好。经过一个上午的苦战，现在外旋风铣已经开始转动了。毛泽东看了工人在机床上的表演，瞄了瞄那张通红的喜报，不断点头微笑。这位工人师傅再也按不住内心的激动，高呼了一声：“毛主席万岁！”

一刹那间，整个车间响起了“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机器的轰鸣似乎变得哑了。

毛泽东继续往前走，不断地向欢呼的工人挥手回答。

离开第一车间，毛泽东到了铸造车间。在这个车间，他观看了化铁炉，观看了造型的情况。这个车间现在是全厂完成生产任务的关键。毛泽东的到来，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鼓舞与力量。这个车间中小件工部主任杨迈说：“我们要坚决苦战一百天，完成二



百台重型机床的铸造任务，来答谢毛主席对我们的关怀！”他的话，道出了铸造车间工人的心声。

8点半钟，毛泽东就要离开武重了。厂房之间的干道上，群众的欢呼声汇成一片。毛泽东站在小轿车门口，挥起手臂，向工人们不断地点头，招手……

## 六、喜讯传遍铁山

1958年9月15日，红日高照，晴空万里，毛泽东来到了大冶铁山。

这天上午10点30分，一列车队直向尖林山采矿区驶来。“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不知谁激动地喊了起来。早就迎候在山上的人们，一起向车队涌了过去。

车子在尖山180米水平的平台上停下了，毛泽东下了汽车，他身着白衬衣，灰布裤，穿着圆口布鞋，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书记张平化、黄石市委第一书记杨锐等同志的陪同下，会见了铁山党委书记张品、矿长陈明江和许多职工，并一一和他们握手。随后，就走向采矿场。毛泽东一边察看，一边详尽地询问有关矿山的情况，甚至问到四周山岭的名称。矿长陈明江一一作了回答，并介绍了铁山的开采情况和工人的生活情况。

毛泽东又问：“整个的大冶铁山矿石蕴藏量是多少？”

陈明江说：“是一亿吨！”

毛泽东微笑道：“多不多？少不少？”

张平化说：“这个一亿吨是近期勘探报告材料，是××公尺以上的情况，××公尺以下的情况并未查明！”

王任重递给毛泽东一块矿石，毛泽东翻来复去地看了这块矿

石，问道：“矿石的含铁量怎样？除铁之外，还含什么成分？你们是不是光要铁？”

陈明江回答：“这里矿石的含铁量是50%—60%，矿石中除铁之外，还含有铜等成分。”

“光要铁，其它不要了？”毛主席关切地问。

陈明江回答说：“现在正在动手建设选铜厂。”

毛泽东赞许地点了点头，并说：“这样，开一个矿山就等于搞几个矿山。”

边谈话，边走路，毛泽东的脸上已是汗水津津，衬衫上也落满了灰尘。张品和陈明江看在眼里，便请毛泽东到附近的工地办公室去休息。走了几步，看到一个避炮洞。当知道避炮洞的作用后，毛泽东立刻走了进去，并诙谐地说：“我也进去避避炮。”在洞内，他细心地察看着，不时用手推推洞顶的木板，十分关切地问道：“这个洞顶很薄，能顶得起矿石吗？”陈明江连忙回答说：“这里没有大石头飞来，小石头能顶得住。”毛泽东这才放了心。

在休息室里，毛泽东又问了一些矿山开采和基建投资的情况。他说：

“这里采矿是地下开采，还是露天开采？”

“这里是露天开采。”负责矿山生产的陈明江回答。

“是露天开采好，还是地下开采好？”

陈明江说：“露天开采剥离工程很大，基建费用比地下开采要多得多，比如，地下开采可以不修铁路，可以不搞电机车，不用电铲，但地下开采却没有露天开采量大。”

“那么，那花多少钱呢？”毛泽东又问。

“原来计划基建投资是一亿五千万，后来我们想办法、找窍门，结果只花了一亿二千万，省下了三千万。”陈明江回答。

“你们是不是搞的包干？”

“是包干。”

“好！包干好！这样可以大大地降低成本，节约资金。”毛泽东表示赞同，一边说，一边点上一支烟，吸了一口。

“早搞大包干，节约得还要多，有一亿就行了。”陈明江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兴奋地说。

张平化接过陈明江的话头，也说：“节约支出，关键是发动群众，窍门和潜力到处都有，发动了群众，什么都好办。”并举了电机车工人提高设计能力的例子。

这时，毛泽东来铁山视察的消息已传遍了整个矿山，越来越多未当班的工人从山下涌来。毛泽东走出休息室，热情地把手伸向来到身边的工人并不时向远处的工人们挥手致意。

毛泽东在陪同人员和工人們的簇拥下，继续参观，看了电铲、穿孔机、压风机、风钻的工作情况，并一一询问了这些机械的工作性能和每天的工作量。正在工作的职工不能离开岗位，见到毛泽东到来，一面高呼，一面挥手，不当班的工人们，则继续向毛泽东这里奔跑。

毛泽东视察完采矿区，时间已是十一点一刻，回到180米平台，毛泽东和矿长、党委书记及一些职工握手道别后，即驱车向黄石方向驶去。

## 七、“你们的变化很大”

1958年9月15日，毛泽东视察了大冶钢厂。

这天中午12点多钟，毛泽东在视察了武汉重型机床厂、大冶铁山之后，乘车来到了黄石市。

毛泽东十分关心钢铁，在见到黄石市委第一书记杨锐时，首先就问他：你看，今年1070万吨钢能不能完成，你们地方怎样？杨锐向毛泽东表示了自己的决心，并把当地钢铁生产情况向他作

了汇报。当杨锐向毛泽东汇报大冶钢厂职工的干劲很大，说明这个厂去年只能生产十几万吨钢，今年已能生产50万吨时，毛泽东说：“这很好，跃进的很快。”并说：“干什么事情都要有干劲。”杨锐又向毛泽东谈到大冶钢厂跃进的很快，主要是1953年毛泽东第一次来厂后，亲自作了“办大办好”的指示，给全体职工带来了鼓舞力量，毛泽东听后笑道：“你们还记得我说的话呀！”表示很高兴。

从武汉到黄石，毛泽东经过了100多公里的旅途颠簸，途中还到大冶铁山数百米高的尖山上进行了参观，大家想毛泽东一定很累了，要让毛泽东好好休息一下。但毛泽东吃过午饭，不顾疲劳，又要到大冶钢厂去参观。

大冶钢厂的工人们，特派本厂运输部司机昌春英到黄石市委给毛泽东作向导。当昌春英来到市委大院时，正碰上毛泽东和机关工作人员合影留念。他便自觉地跑到院门口站着等候。正在此时，毛泽东从楼内走了出来。等他坐好，摄影师对好了镜头，马上就要拍照了。可毛泽东又四周环视了一下，发现了站在院门口的昌春英，于是便问身边的人：“那位同志为什么没有来呀？”未等回答，就站起身，向昌春英走过去。昌春英一看毛泽东向自己走来，便赶快迎上前去，握住毛泽东伸出的手。

“这位同志，怎么不去照相啊？”毛泽东先发了话。

“我是大冶钢厂的，来给毛主席作向导。”昌春英回答。

听了昌春英的口音，毛泽东感兴趣地问：“你是哪里人啊？”

“湖南益阳人。”

“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呀？”毛泽东又问。

想到自己从小失去父母，到处流浪，解放后才在钢厂当了司机，昌春英激动地说：“是毛主席您老人家把我解放到这里来的呀！”

毛泽东笑了，随后请昌春英一起照了相。

下午1点多钟，毛泽东乘坐的小汽车开到大冶钢厂的煤气站旁停下来。欢迎的人群从四面八方涌来，钢厂炼钢部主任王金治、总支书记李振江也迎上前去，握住毛泽东伸过来的手，并作了自我介绍。

按照预定的路线，大家引着毛泽东向新建的平炉炼钢车间走去。在平炉车间，毛泽东顺着窄小的平炉铁梯，走上了五米多高的平炉操作台。在四号平炉旁，毛泽东停住了脚步，这时，记者们纷纷举起了照相机。正在炉前操作的工人们看到毛泽东到来，十分兴奋，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欢迎毛泽东的到来。

毛泽东在炉前走了几步，问道：“这是什么炉子？”

“这是平炉，又叫马丁炉。”一同来的杨锐回答说。

“有多大？”毛泽东又问。

“90吨。”一旁的厂长江敏回答。

毛泽东走到炉前，从一位工人手中接过蓝色的看火镜，走到炉口，观看炉火。通红的炉火，映着毛泽东的面庞，使他看起来更加健康。

参观了四号和三号平炉后，毛泽东接着来到二号平炉。这时，二号炉的工人们正操纵着自动加料机给平炉加料，毛泽东的到来，使他们的干劲更大了。看到这繁忙紧张的局面，毛泽东站住了，拿起看火镜又看了片刻，问身边的李振江说：“你们现在一炉可以出多少钢？”

“可以出到150吨以上。”李振江回答。

“那不是超过了设计能力？”毛泽东还记得设计能力是90吨。

见到毛泽东发问，李振江就讲了二号炉前不久“放卫星”，炉产量超过设计能力将近一倍的情况。毛泽东听了，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此时，毛泽东到来的消息已传遍全厂，人们纷纷来到平炉车间，想见一见自己的伟大领袖，并不断地欢呼“毛主席万岁！”听

到大家的欢呼声，毛泽东走到平台边，凭着栏杆，不断向人们招手致意，人们见到了自己的领袖，欢呼着，跳跃着，尽情地表达自己高兴的心情。毛泽东见到这种情景，就走下楼梯，走向欢迎的人群。

人们簇拥着毛泽东，又继续参观了电炉车间、转炉车间。一路上，毛泽东兴致勃勃，对每一道操作程序都十分认真地观看、询问。

参观完电炉、转炉车间，毛泽东又要到轧钢厂参观。当大家请他朝南走而不是朝东走时，他停住了脚步，不解地问：

“怎么从这里走啊？”

原来毛泽东1953年到厂视察轧钢车间时，是朝东走而不是朝南走的，现在虽过了5年多，但他依然记得很清楚。当大家告诉他，以前去的是旧轧钢车间，今天要去的是新建的轧钢厂时，毛泽东高兴地说：

“你们的变化很大！”

视察完轧钢厂后，毛泽东又详细地询问了钢厂整风的情况。下午2点多钟，毛泽东离开了大冶钢厂，驱车直到黄石沈家营码头，登上了“江峡”轮，冒雨畅游长江后，便离开湖北，驶往安徽。

## 八、亩产万斤“我不相信”

1958年11月14日下午，孝感车站，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省委副秘书长梅白、孝感地委书记王家吉、孝感县委书记王振明、长风人民公社党委书记朱朝启和全国劳动模范官木生、勤俭持家模范晏桃香等人先后登上了毛泽东乘坐的专列。

毛泽东要召开座谈会。13日上午，王任重接到叶子龙打来的电话，说毛泽东从郑州去武汉，路过孝感时想停留一下，找地方

同志谈一谈，因此有了这个座谈会。

王任重首先汇报了湖北人民在“大跃进”中干劲是如何大，并举例说，有一个司机三天三夜未上床睡觉，当汽车开得抵倒了电线杆才醒。王家吉汇报了孝感地区大办钢铁的情形，有的人为了放“卫星”，几天几夜连着干，结果倒在平炉上睡着了。毛泽东听了笑着说：“我也想睡下觉呢！”逗得大家直发笑。

梅白继续汇报全省“大跃进”的典型，他提到孝感县长风人民公社某复员军人创造的“万斤田”，亩产万斤稻谷。毛泽东听后，望着身边的王任重，摇了摇头说：“我不相信。”

“是农村工作部长王良来验收的。”王任重说。

毛泽东还是不信：“验收的也靠不住，除非派解放军站岗放哨，单打单收，才能算数。”

此时毛泽东的思想，与几个月前已大不相同。年初到北戴河会议期间，他所到之处，听到的都是粮食如何多的汇报，因而，他感到纳闷，怎么粮食一下子多得不得了了呢？北戴河会议之后短短两个月，牛皮露馅了。毛泽东开始感觉到浮夸风了。11月2日至10日的郑州会议，便开始着手纠正“大跃进”、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等问题。这次座谈恰恰是在郑州会议之后，毛泽东对亩产万斤之类的说法已有戒心。

原来，“万斤田”在长风大队殷罗湾一个偏僻不显眼的地方，是由那位复员军人带着两个人巧妙地用铁锹把几块田快黄的稻谷连根起成方泥块，掇到一块田里而成的。参加验收的，有孝感地委农业书记冉砚农、王振明、朱朝启，还有北京、上海和武汉的农业专家如白思九、郑建南等。验收时，只在禾场看谷堆，天也近黄昏，一过秤，亩产15000斤，就这样成了一个“万斤田”。验收后，冉砚农当场就指示王振明写了一篇文章《万斤田飞上天》，并要农业专家郑建南写了一篇评论《这是奇迹，这是事实》。不几天，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见了报，轰动了全国。座谈会上，当

毛泽东问起这件事时，王振明、朱朝启两人都暗暗有些自责。“大跃进”年代，在那种特定环境下，他们哪有勇气向毛泽东报告真实情况啊！只盼毛泽东不再追问，快快结束这个话题。

毛泽东果真没有再问这个话题。他拿起一支香烟，一面用手指慢慢掐着，一面问晏桃香对“挑灯夜战”的看法。晏桃香当时已是近40岁的农村妇女，丈夫死了，她勤扒苦做，把几个孩子抚养得很好。她的事迹见报后，陈毅元帅曾写诗赞扬她。这时，她对毛泽东说：妇女的干劲很大，妇女和男人一个样，但是夜里干了活，白天就没有劲。

毛泽东将掐好的那支烟卡成两半，放到烟嘴里，擦根火柴点着后，微笑着说：“妇女和男人还是不能一个样咯！要关心她们，要执行‘三期照顾’（月经期、怀孕期、哺乳期），今年三月我在成都会议上就讲了劳逸结合嘛！”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后，又问官木生。官木生说：“社员的干劲都起来了。比如我们长风大队官胡家湾有个12岁的小社员，破除迷信，平了自家祖坟，开荒扩大面积，日夜干。”王振明也接过话茬继续向毛泽东汇报这件事。毛泽东说：“群众积极性越大越要关心群众，不要搞夜战，人过分劳累要害病的……”

毛泽东历来关心群众疾苦。9月12日下午，他参观第一纺纱厂小高炉出铁，与王任重谈起农业大丰收和农民的苦干精神时，就讲了要保护群众的积极性。当时他问王任重：“你看要不要农业合作社开个庆祝丰收的大会，让人们吃点肉，喝点酒……”王任重说：“好，就在国庆节那一天，庆祝国庆，庆祝丰收。”毛泽东还讲：“在苦战三年当中，积累不可过多，必须使农民越干越有味道，越干越有劲。”

随后，毛泽东又询问到农业“八字宪法”的贯彻情况，大家将孝感县的“五改”即旱田改水田、山坡改梯田、单季作物改双季作物、籼稻改水稻、高岗改平地的情况你一言我一语地告诉给



他。他表示很满意，一时座谈会上气氛非常活跃。最后，毛泽东又谈到水稻产量有无潜力可挖时，大家都谈了自己的看法。朱朝启说：“要增产必须增肥，但肥施重了，水稻又要倒伏，没有办法。”

毛泽东打着手势说：“据专家们说，水稻根系很长，如果把土层耕深一点行不行？”

大家都认为毛主席说得有道理，于是地县领导当场表态，以后按主席指示去办，并认真地记到了本子上。

座谈会已开了一个多小时，大家都怕影响毛泽东休息，一时没有人发言。这时，梅白提议：“主席，是不是下去看一下？”

毛泽东点头说：“好吧！”

大家起身，毛泽东在王任重等同志陪同下先走出了专列，其余人员跟在后面陆续下了车。

夜色初现，站台上静悄悄的，毛泽东坐上已预备好的轿车，其余人员坐进吉普车。五、六辆车鱼贯式地开出孝感火车站。街道两旁欢迎的人群中，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汽车驶进了孝感驻军大院。本来准备让毛泽东在地区大礼堂接见地县两级干部的，现临时改在部队礼堂接见干部群众。为了有一段时间安排会场，就请毛泽东在驻军礼堂西面的小厅里休息。

晚上7点左右，毛泽东在驻军首长的陪同下，走进了礼堂，径直走到安排好的小桌前。此时，群情激动，爆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毛泽东体谅大家的心情，有意绕小桌子一圈，礼堂内所有的同志都幸福地见到了毛泽东。

毛泽东刚坐下，台上《打焦赞》的京剧就拉开了序幕。这出戏一结束，毛泽东和省、地、驻军的负责同志就退场了。

## 九、“纸老虎”与“真老虎”

1958年，一个多事之秋。国际上，美、英等国到处“插手”他国事务，干涉他国内政，在中国制造“一中一台”；在中东，美国于7月15日武装入侵黎巴嫩，英国军队于7月17日从约旦登陆，镇压中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台湾当局与英美行动遥相呼应，同美国在台军事官员和外交人员昼夜保持频繁接触，并派出飞机对福建、广东、浙江沿海侦察、照相和空投宣传品，同时加紧了对大陆的重要军事目标进行攻击的准备。为了牵制美国，减轻中东人民的压力，中共中央决定从8月23日开始大规模地炮轰金门、马祖，即“八·二三”炮战。在国内，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与高潮，在全国范围内普遍产生出轻视困难、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能动作用等“左”的思潮，认为对党和人民来说，似乎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到的，尤其是许多人轻视美、英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能量，以为它们是快要死亡的东西，不堪一击。为此，毛泽东在武昌主持召开八届六中全会期间，于12月1日专门撰写了《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该文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科学地分析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既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的两重性，进而论证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战略战术思想，使“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一著名论断在理论形态上更为完整。

早在12年前（即1946年8月6日），毛泽东曾就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有过一次重要谈话，就在这次谈话中，他第一次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点。当时，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自恃军事上的优势，在美国支持下，悍然发动全面内战，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人民军队被迫

奋起自卫，内战硝烟已弥漫中华大地。于是，有人担心中国的内战会引起美国出兵，或者在经济上援助国民党南京政府；也有人害怕美苏战争而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也有人对美国原子弹存在着一种恐惧心理。对此，毛泽东谈道：原子弹固然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因此，原子弹不过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而已，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这是毛泽东首次提及“纸老虎”一词。

最初，翻译陆定一将“纸老虎”译成“Scare-crow”，这种译法立即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他问斯特朗“Scare-crow”是什么东西，斯特朗答道：那是稻草人，农民把它竖在田里来吓唬乌鸦的。听罢，毛泽东马上表示这样译不确切，他说：纸老虎不是插在田里吓唬乌鸦的死东西，而是用来吓唬孩子的，它看起来像可怕的老虎，实际是硬纸板做成的，一遇潮就会发软，一阵大雨就会把它冲掉。接着，他就用英文直接讲“纸老虎”这几个字了。

毛泽东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sup>①</sup>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以前，沙皇的力量看似很强大很可怕，但二月革命的一阵风，就把沙皇吹走了；希特勒也曾被人们看作很有力量，但历史已证明他是一只纸老虎；墨索里尼也是如此；日本帝国主义也是如此；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中国的反动派企图拿美国的貌似强大来吓唬中国人民，但美国反动派也将要同一切历史上的反动派一样，被证明为并没有什么力量，总有一天要失败。“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4卷），1991年版，第1195页。

我们代表进步。”<sup>①</sup> 所以，当斯特朗问他：能否“报道说毛泽东称蒋是一只‘纸老虎’”时，他笑了笑，慢慢地说：“不仅仅是这几个字。你可以说如果蒋拥护人民的利益，他就是一只铁老虎。如果他抛弃人民并向他们发动战争——这，就是他现在正在做的事——他就是纸老虎，雨水会把他冲掉。”<sup>②</sup>

很显然，毛泽东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比喻为“纸老虎”，是从它们的本质上来说的，这是革命人民的一个根本战略思想。这个战略思想的提出，对于武装中国人民，战胜美蒋反动派，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起了伟大的作用。

12年后，毛泽东在武昌客观而全面地反思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进一步阐释了应如何科学地看待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问题，即从战略和战术上去辩证地认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问题。他说：“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sup>③</sup> 之所以说它是“纸老虎”，是因为它总是逐步向反面转化，而变为反动的、腐朽的、落后的阶级，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这是从战略上看，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之所以说它是“真老虎”，是因为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即使在它转化为反动派以后，它也有真老虎、铁老虎的一面，它还有力量去镇压和剥削人民，还要“吃人，成百万人成千万人地吃。人民斗争事业处在艰难困苦的时代，出现许多弯弯曲曲的道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1991年版，第1195页。

② 苏扬：《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中外名人的评说》，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340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1991年版，第1191—1192页。

路。中国人民为了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花了一百多年时间，死了大概几千万人之多，才取得一九四九年的胜利”。这是从策略上看，从战术上看。

如果我们将毛泽东在1946年和1958年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加以比较的话，便不难发现，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和发展。前者着重于从本质上、战略上，即“纸老虎”的方面去分析帝国主义，以坚定中国人民战胜美蒋反动派的信心；后者不仅重申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有“纸老虎”的一面，而且强调了它们还有“真老虎”的一面，即从战术上、策略上去分析帝国主义，以澄清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糊涂认识，从而丰富和完善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一理论观点，使之更趋科学。

毛泽东在1958年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论述，也是对中国革命的战略战术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早在1936年，毛泽东就曾在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经验的基础上，将红军的战略战术原则高度概括为：“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sup>①</sup>解放战争时期，又对上述法则作了更深入的发挥，指出：在战略上、全体上应藐视敌人，因为“全世界帝国主义和中国蒋介石反动集团的统治，已经腐烂，没有前途”，但在战术上、局部上却要重视敌人，因为只有“重视敌人，集中全力作战，方能取得胜利”<sup>②</sup>，否则，就会犯右的或“左”的错误。而在1958年底于武昌写成的《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则将对帝国主义两重性的认识与中国革命的战略战术思想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得出了一个科学的结论，这就是：“从本质上，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1991年版，第22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1991年版，第1267、1192页。

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sup>①</sup>从而将中国共产党人的战略策略思想表述得更加深刻，更加完备。

在文章中，毛泽东还将上述战略策略思想运用于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批评了建设中存在的过“热”与过“冷”的现象。他认为头脑要冷又要热，这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二者不可偏废。他特别提醒道：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些，他们不愿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做分析，只爱热，这种态度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是有可能跌跟头的；而另有一些人又爱冷不爱热，他们对一些事看不惯，跟不上。因此，毛泽东要求共产党人应该将藐视一切、乐观主义摆在首要地位，然后才是重视事物，重视每件工作，重视科学研究，分析矛盾的每一个问题的侧面，钻进去，逐步的认识自然界运动的法则和社会运动的法则，这样就有可能掌握和比较自由地运用这些法则，一个个地解决面临的问题，处理矛盾，完成任务，使困难向顺利转化，使真老虎向纸老虎转化，使革命的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化，使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化，使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转化，使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转化。

历史证明，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既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的科学论断，在战略上藐视困难、在战术上重视困难的战略策略思想，不仅在当时对于克服“大跃进”中的“左”倾错误、刹住急于过渡的势头起到过一定作用，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4卷），1991年版，第1267、1192页。

## 十、“不能陷入超越阶段的空想”

1958年11月20日，党中央在武昌召开了部分中央领导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为党的八届六中全会的召开作准备。

3个月前，党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了扩大会议，由于在“左”倾思想的指导下，因而作出了一系列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决定。在经济建设上，片面地追求高速度，高指标；在人民公社的问题上，强调“一大二公”，严重地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以“一平二调”为特征的“共产风”随之盛行。这样，就使得大跃进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更加严重地泛滥起来，对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同时形而上学的错误也在党内部分领导人身上严重地表现出来。对此，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其他领导人相继到农村调查研究，察觉到农村工作和经济工作中存在混淆两个过渡和平均主义等“左”的错误。

为了纠正这些错误，毛泽东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7月初，先后主持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提出了划清两个过渡的界限、反对剥夺农民和纠正平均主义错误的正确思想。11月20日党中央武昌政治局扩大会议就是为了进一步贯彻不久前的郑州会议精神而举行的。

在党中央武昌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作了重要的讲话，他认为，在大跃进运动中之所以出现一些严重的失误，关键在于形而上学猖獗，缺乏科学性。他强调指出：“不要把科学当作迷信破除了。凡是迷信一定要破除，凡是真理一定要保护，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下面作假，上面相信，这就危险。”与此同时，他还就北戴河会议上制订的一些脱离客观条件的高指

标进行了压缩，特别指出：“办不了的事，就要改。”

当月28日，党中央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又在武昌召开了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与会代表根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反省了前一段工作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开始用冷静的头脑思考和解决这些问题。

毛泽东在整个会议过程中，经常到各小组去倾听代表们的意见，有时他还单独地与中央一些部门和部分省、市、自治区的领导人交换意见，听取他们合理的建议，并对一些错误的提法给予及时纠正。对于“苦战三年基本改变全国面貌问题”的提法，毛泽东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口号合适吗？三年办得到办不到？”在围绕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提法上，毛泽东严厉地批评道：“立即进入共产主义，无疑是一个不可能成功的空想。”“我们不能陷入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跳入共产主义阶段的空想。”“太急了没有好处。”在对于一些全局性的责任问题上，毛泽东勇于承担，并表示认真考虑，加以改正。

毛泽东在广泛地征求代表们的意见后，集中归纳了几个主要问题，并在12月9日的全体会议上作了重要的讲话。关于重视研究经济理论问题，他指出：“为了我们的事业，联系实际来研究经济理论问题，对目前有很大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在所有制方面，他认为：“在社会主义阶段，有两种所有制同时存在。这是对立又是结合，是对立的统一。”并指出“斯大林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把三种所有制，即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绝对化，截然分开，是不对”。在制定生产计划方面，他提出了“又热又冷，要雄心很大，但又要有相当的科学分析。……避免产生某些不切合实际的想法”。

八届六中全会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与会代表经过认真讨论研究，对特别突出的人民公社问题，作出《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此决议从理论上和政策上明确地反对和纠正了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界限，急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倾向，强调指出：把农村中的集体所有制变成全民所有制，还需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而实现这两种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

此决议批评了有些人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的错误，指出：在今后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内，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以及国家和公社、公社和公社之间的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

此决议还澄清了要把个人现有的消费财产拿来重分的误解，明确规定：社员个人所有的生活资料（包括房屋、衣服、家具等）和在银行、信用社的存款，永远归社员所有。社员可以保留宅旁的小自留地，也可以继续经营一些家庭小副业。

在此全会上，还有一项重要议题。毛泽东再次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的问题，并明确表示了他不再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职务，想退居领导工作的第二线。全会经过审慎考虑，通过了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他不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

八届六中全会在毛泽东的主持下，还进一步讨论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问题，对一些不符合客观实际的高指标作出了相应的调整。这一切对进一步澄清混乱思想，纠正已察觉到的“左”倾错误，起了一定的作用。



第五章

大地微微暖气吹



## 一、“按照群众意见办事”

1959年早春，中原大地虽仍寒意袭人，但已有了春的气息。刚刚在郑州主持召开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的毛泽东，于3月10日乘专列沿京广线南下，来到江城武汉，住宿在风景怡人的东湖之滨。

毛泽东此行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在湖北农村进行社会调查，纠正已经发觉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倾错误，特别是人民公社存在的一些问题。

自1958年5月以来，中国便掀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热潮，它是中国共产党人为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所作的一种尝试。当时，我国刚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制度才建立不久，依然是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独特的国情迫使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去思考、研究和探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究竟应该怎样建设和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究竟应该如何走这个全新的课题。在此条件下，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包括党的最高决策层，都希望尽最大努力把建设搞得快一点，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是故，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制定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其中，“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快，这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sup>①</sup>，从而抛开了中共八大一次会议制定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

① 《人民日报》社论：《力争高速度》，《人民日报》，1958年6月21日。

的经济建设方针。“大跃进”的实践证明，这种努力是不成功的，“好省”制约不了“多快”，最终导致了以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为主要特征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至1958年秋冬之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了不少乱子，遂于同年11月初着手加以纠正和澄清。

毛泽东带头犯了错误，又带头纠正错误。在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他带头提出要纠正已经察觉到的急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搞产品无偿调拨、剥夺农民等“左”倾错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八届六中全会后，各地普遍开展了整顿人民公社的工作，刹住了急于过渡的势头。然而，人民公社内部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倾向仍然存在，加上为完成由高估产带来的高征购任务，各地农村普遍出现了基层干部在农民群众支持下，搞瞒产私分，问题被发现后又不适当地开展了反对生产队本位主义和瞒产私分的斗争，弄得党、政府与农民群众紧张关系难以缓解。毛泽东在1959年2月间对河北、山东、河南、天津等地农村作了深入考查后，及时觉察到上述问题，认为其实质是在所有制方面有毛病，“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农民的极大恐慌，乃于2月27日至3月5日主持召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进一步解决人民公社中存在的问题。他在会上作了多次重要讲话，对“共产”风进行了尖锐、辛辣的批评，提出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这就是：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会后，毛泽东来到武汉，继续思考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问题。在汉期间，他听取了湖北省委、湖南省委负责人王任重、周小舟等的汇报，询问了他们对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和分配单位的意见，仔细批阅、研究了湖北六级干部大会材料和广东省委的报告，接见了湖北省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全体代表，再结合对湖北农村

的实地调查了解，更进一步坚定了他第二次郑州会议前后关于人民公社的看法，于1959年3月15、17日，先后两次以《党内通信》的形式，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畅谈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强调了务必“要按照群众意见办事”的观点。

在3月15日的通信中，毛泽东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分别介绍了河南、湖南、湖北、广东等省人民公社的核算和分配方法：河南、湖南两省主张以生产大队（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湖北、广东则主张以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上述两种方法究竟哪一种比较好，各省究竟应采用哪一种方法，毛泽东认为“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关系到三千多万生产队长、小队长等基层干部和几亿农民的直接利益问题”<sup>①</sup>。他还较为客观、全面地分析了农村各层次对这个问题的不同态度，“大体上，县委、公社党委、大队（管理区）多主张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即原高级社）支书绝大多数或者全体主张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sup>②</sup>，所以，他特别指出：“采取河南、湖南的办法，一定要得到基层干部的真正同意，如果他们觉得勉强，则宁可采用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致使我们脱离群众，而在目前这个时期脱离群众，是很危险的，今年的生产将不能达到目的。”<sup>③</sup>基于上述认识，毛泽东在通信的末尾，再三强调：“总之，要按照群众意见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要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则终究是行不通的。”<sup>④</sup>

在3月17日的通信中，毛泽东要求深入贯彻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召开五级干部大会，即县委一级、公社党委一级、生产大队一级、生产队一级、生产小队（即生产组，又称作业组）一级都要有代表参加，县委第一书记要亲自讲话；会议应开得生动活

<sup>①②③④</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办：《文献与研究》，1990年第4期，第25页。

跃，言者无罪，大鸣大放，展开思想交锋，统一认识。他告诫县委、公社党委要从过去几个月中的“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脱离群众的深刻教训中，获得经验，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sup>①</sup> 信中还谈到应加强对公社及基层领导的问题，“县委和地委都要注意加强公社的领导”，“县和公社都要注意加强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一般是原来高级社）的领导骨干”。<sup>②</sup> 此外，毛泽东还专门提出了一个在当时较为敏感的问题，供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思考研究，这就是：除应当讨论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三级管理、三级核算之外，还应讨论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问题。尽管他在信中没有具体谈自己的看法，但却认为这个问题“值得讨论”<sup>③</sup>，为后来中共中央正式作出“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的规定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严以律己，他不仅要求广大的干部时刻关心群众疾苦，而且自己也是这么做的。他自始至终都十分重视一线的农业生产，在17日的通信中，他提出4月份忙一个月的生产，各生产队仅在工作之余开会讨论、解决一些具体问题，而“县开会时，公社各级都要留人领导生产，或交替到会，不误农时”<sup>④</sup>；还建议定期召开公社社员代表大会，选举成立公社管理委员会，倾听社员群众心声；等等。

很显然，毛泽东在武汉写的两篇《党内通信》，坚持且发展了他自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正确意见，对于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和政策贯彻落实到农村基层起了重大作用。而信中提出的按照群众意见办事、关心群众利益、党的政策要适合群众的觉悟水平和

---

<sup>①</sup> 《毛泽东传（1949—197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办，《文献与研究》，1990年第4期，第26页。



迫切要求等观点，对于我们今天党的工作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3月19日，毛泽东离鄂赴湘。尔后赴沪，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决定将第二次郑州会议关于公社化过程中平调财物的旧帐一般不算的规定，改为一般要算。据此，他于1959年4月3日专门在湖北省委汇报的“麻城经验”的材料上这样批示道：算帐才能团结；算帐才能帮助干部从贪污浪费的海洋中拔出来，一身干净；算帐才能教会干部学会经营管理方法，教会5亿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公社。从而将关心群众、“按照群众意见办事”落到实处。

同年6月29日，毛泽东途经武汉时，又同各协作区主任作了一次谈话，依然还是纠正、解决“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他号召广大县、社干部要读政治经济学的书，要去了解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同时，对那些在“大跃进”中敢于坚持真理的同志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应当搜集在去年大跃进中，敢于坚持真理，不随风倒，工作做得好，不谎报，不浮夸，实事求是的例子，将其编为一本“好人好事”的书，而把那些专门说假话，违法乱纪，或者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的例子，搜集起来编成一本“坏人坏事”的书。

此时，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八、九个月的共同奋斗，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已受到初步遏制，形势开始向好的方面转变。但令人遗憾的是，当时毛泽东对“左”倾错误的严重性还缺乏足够清醒的认识，其纠正错误的努力是基于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完全肯定的基础上，因而不能也不可能彻底纠正“左”倾错误。更为严重的是，毛泽东在离开武汉10余天后，即庐山会议后期，在指导思想上发生了重大反复，造成整个形势逆转，致使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中断，使国家和人民遭受到重大损失。

## 二、与省文教工作者在一起

1960年春，毛泽东又一次南巡，于5月1日在天津同工人、公社社员、学生、解放军官兵和各界人民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后，经山东、河南，来到湖北，他要实地考察各地建设的情况。就在这次视察中，他于5月15日在武汉接见了出席湖北省文教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即湖北省文教群英会）的全体代表。

自1959年7、8月间的庐山会议以后，中共中央领导在经济工作的思想上发生了重大反复，不仅继续在总体上坚持“大跃进”的指导方针，而且在具体工作上也停止了纠“左”，转而反右，把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设想改变为：在1959年“提前完成原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1962年）完成的主要指标”<sup>①</sup>，“在10年左右的时间内（从1958年算起），实现‘在15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英国’的口号”<sup>②</sup>，致使以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和瞎指挥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再度严重泛滥起来，到1959年秋、冬之际，中共中央几经讨论研究，制定出更加脱离实际的1960年“跃进”计划。一时间，举国上下再次掀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湖北省的各条战线也纷纷积极响应，决心以更大的干劲实现持续“大跃进”，随即，各种形式的“大跃进”誓师会、群英会等相继召开。湖北省文教群英会就是在

<sup>①</sup>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公报》，1959年8月16日。

<sup>②</sup> 《红旗》杂志社论：《驳“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谬论》，《红旗》，1959年9月9日。

这种形势下，于1960年5月12日开幕的。当时，舆论界称它是一次“检阅成绩、表彰先进的庆功大会”，“是总结交流经验的学习大会”，“也是文教工作持续跃进的誓师大会”<sup>①</sup>。

当大会进行到第四天（即5月15日）的时候，毛泽东突然来到代表们中间，接见了大会的全体代表。

这天晚上，参加湖北省文教群英会的全体代表聚集在洪山礼堂观看文艺演出。当晚会暂告一段落时，白银灯忽然齐放光明，会场上寂静无声，仿佛预示着一个异乎寻常的时刻即将来临。不知是谁悄悄地说了一声：“毛主席来了！”果然，一个伟岸的身影出现在主席台上。刹那间，整个洪山礼堂沸腾了，“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欢呼声此起彼伏，一股幸福的暖流激荡在每个代表的胸怀。

毛泽东神采奕奕，缓缓地走着，那慈祥的面庞上布满和蔼的笑容，令人顿感亲切；他不断地向台下招手、点头致意，似将殷殷期望、谆谆教诲倾注在这挥手之间，令人倍受鼓舞；尽管他没有说什么，但每位代表都深深感到有一种激越、亢奋的情绪在心头回荡。

由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迅速胜利、以及其他种种因素的制约与影响，长期以来，在全党乃至全国人民中逐渐产生和滋长出一种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情绪，把毛泽东视为正确路线的代表或化身，类似“毛主席啊！听您的话，革命胜利了；听您的话，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又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毛主席啊！您是胜利的旗帜，您是真理的化身，我们一定永远跟着您，走向灿烂辉煌的共产主义”<sup>②</sup>等语句，在当时的新闻媒体上屡见不鲜，导致普通的党员、群众把毛泽东的接见看成是“最高荣

① 《湖北日报》，1960年5月13日。

② 《湖北日报》，1960年5月20日。

誉”、“能带来最大的鼓舞和力量”<sup>①</sup>，所以，参加湖北省群英会的全体代表一直渴望能得到毛泽东的接见。

5月15日，代表们从报纸上得知毛泽东在武汉会见外宾的消息后，心里就迫切地希望能见到毛主席，当晚10时，这个愿望变为现实。代表们怎么也没想到，“这一刻”会来得如此之快，真可谓：领袖与群众心心相印。他们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幸福的泪水溢出眼帘。同时，毛泽东看上去是那么健康，步履沉稳而坚实，高大的身躯犹如泰山一般。在那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这无疑给了代表们以巨大的精神力量，使他们干劲倍增，信心百倍，决心“战胜一切困难，创造更优异的成绩，来回答领袖对我们的亲切关怀”<sup>②</sup>。

毛泽东的关怀，激起代表们极大的勇气和力量，他们经过酝酿讨论，集体向党中央、毛泽东发去了致敬电，“谨向党中央和毛主席致以最衷心的问候和最崇高最诚挚的敬意！”<sup>③</sup>接着，将自己的感受、成绩和决心向党中央、毛泽东作了汇报，表示“一定把群英大会上交流的先进思想和先进经验的种籽，撒遍全省文教战线，将学先进、比先进、赶先进、帮后进的社会主义竞赛运动推向一个新高潮，使共产主义的思想和风格迅速成为全民的风尚，使先进经验和革新创造迅速成为全民的财富，促使文教事业以更高的速度向前发展”<sup>④</sup>。随后，武汉地区文教工作者率先响应省文教群英会的倡议，掀起学比赶帮的高潮，继之而来的是，全省文教工作者以更大干劲为实现文教事业的持续“大跃进”而“奋斗”。

① 《湖北日报》，1960年5月20日。

②③④ 《大会全体代表向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致敬电》，原载《湖北日报》，1960年5月20日。

### 三、“我们一起向上游”

游泳，是毛泽东最喜爱、最擅长的体育项目。他矫健的身影，曾畅游于祖国的江河湖海之上。故乡屋前的池塘是他儿时戏水的好地方。1911年到省城长沙求学后，一师前面的湘江更是他流连忘返之处，无论酷暑还是隆冬，都在湘江中搏击，常年不懈。他还经常邀约一批志同道合者聚于郁郁葱葱的岳麓山和风景秀美的桔子洲头，指点江山，赋诗言志，探讨救国救民之策；或纵身跃入湘江，在波涛中遨游，到江心水深流急处击水，让澎湃的心潮在劈波斩浪中得以宣泄，将宏大的抱负幻化在这同大自然的拼搏之中。1949年进入北京城后，仍念念不忘游泳，他向大海挑战，征服过辽阔长江，还游过邕江、密云水库、韶山水库、庐山人工湖、武汉东湖……，但唯对长江“一见钟情”，第一次在武汉畅游长江后，便再也难以忘怀。此后，只要是夏季来到武汉，总会去尽情享受一番“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的乐趣。哪怕是途经武汉，有时也会忙里偷闲，情不自禁地到长江中流击水。

1959年6月22日，毛泽东安排了召开庐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拟回到湖南，路过武汉时，曾跃入大江之中畅泳（6月25日），然后登上“湖北”轮，在武昌造船厂二码头上岸。在船上他身着泳装接见了武昌造船厂副厂长田青和董菲。与风浪搏斗后的毛泽东，看上去依然是那么神采奕奕，精力充沛。

6月28日，毛泽东从韶山出来，准备赴江西庐山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当专列抵达武汉时，他又一次走下列车，在繁忙中抽出时间，来到他深深眷念的长江岸畔，再一次畅游了长江。游完以后，似余兴未消，乃舍车乘船，于6月30日在汉口乘“江峡”轮，置身于辽阔万里的大江之中，顺流直下，直驶九江。次

日，“跃上葱茏四百旋”，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著名的“庐山会议”。

或许与其落拓不羁的性格有关吧，毛泽东在波涛滚滚的长江中斗风击浪，犹如在闲静的庭院里散步一样轻松自如、悠闲自在。在水中，他从不囿于常规和固定的游泳动作，而是娴熟地运用着一套自创动作——“立正”、“稍息”、“困觉”、“坐凳子”……，与周围陪泳的同志谈笑风生。他时而仰卧水面，凝望万里长空，或两脚一蜷，两手不紧不慢地划着水；时而奋臂侧泳，劈波勇进；时而踩水前进，漫步于粼粼波涛之上，浏览楚天风光；游到高兴时，偶尔也会扎个猛子，然后露出水面……，载沉载浮，从容不迫，尽情地享受和体验着与大自然风浪较量的欢乐。其情景、其气度确如他自己在《水调歌头·游泳》一词中所描述的那样：“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馀。”

晚年的毛泽东，酷爱在长江中乘风破浪，他曾两次在九江下水畅游长江，可不知什么原因，却对长江武汉段水域一往情深，仅1958年9月，就在长江漂游8次，1961年9月和1962年6月又先后4次畅游了长江。据统计，从1956年5月首次畅游长江至1966年7月最后一次横渡长江为止，毛泽东在武汉共畅游长江近20次。甚至重大的外事活动，也选择在惊涛拍岸、一泻千里的长江边上。

1961年9月23日，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第二次来汉，毛泽东于当日在武昌会见了这位赫赫有名的战略家。翌日，在涛声阵阵的长江之畔，他们进行了最后一次交谈。谈话结束后，蒙哥马利应邀登上“韶山”轮，兴致勃勃地观看了毛泽东横渡长江。

这天下午，秋风阵阵。毛泽东身穿白色游泳裤，在武昌江面下水，先埋头水里，让江水浸泡一下全身，而后双手撒向后方，全身躺在水面，两脚一蹬，用仰泳姿势出发，逆水而行，斗风击浪，游得轻松自如，沉着从容。他以侧泳姿势游过长江大桥桥墩，再

改为仰泳前进，缓缓漂流，慢慢划水，悠哉悠哉。他一边游一边与陪游的运动员聊天：“你们游过逆水没有？”待得知他们未游过逆水后，便说道：“游逆水只是有点费力，没有什么可怕的，应当尝试一下。”<sup>①</sup>当游到长江和汉水汇合处时，风浪加大，水温下降，大自然的挑战激起毛泽东豪情满怀：“我们争上游吧！”<sup>②</sup>说着就带领众人斩浪前进。游到小河口，他忽然潜入水中，过了一会儿，才在男运动员的外围露出江面，运动员们十分惊奇，他却意味深长地说：“要适应各种环境，各种情况嘛！”<sup>③</sup>这次，毛泽东游泳40分钟，游程12华里，一直游到汉口滨江公园附近的江面，才登上“韶山”轮，和蒙哥马利元帅继续交谈。

此时，毛泽东已是68岁高龄的老人，横渡长江后，不仅毫无倦容，反而雄心勃发，邀请蒙哥马利元帅下次访华时，一定和他进行横渡长江的比赛。告别时，毛泽东赠送给元帅的礼物，是一幅他自己创作并亲笔书写的诗词《水调歌头·游泳》。那遒劲的狂草，有如行云流水，又似浩瀚长江，奔腾不息。由此，不难想象毛泽东对长江、对楚天武汉的那份浓浓情感了。

“自信人生两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这是风华正茂的毛泽东写下的充满激情而浪漫的诗句。的确，毛泽东的一生，始终是在大风大浪中奋斗，这既有政治上的血雨腥风，也有一般意义上的自然界的暴风骤雨。为了迎接和战胜这些风风雨雨，他一贯重视游泳这项体育活动，认为它是锻炼身体、磨砺意志的有效方法，是向大自然宣战、向大自然进军的重要途径。正因为如此，他把征服长江，视为与天公试比高、与对手较量的一种象征，因此，在多次畅游长江以后，曾说道：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他一下，也没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东西，其实并不可怕。寥寥数语，将他那与天奋

①②③ 《武汉文史资料》，1992年3、4辑合刊，第12页。

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大无畏英雄气概高度概括了出来。

60年代初，是我国国民经济暂时困难的年份，也是前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的时候，当时，中国人民面临着很大的国际压力。在这最初的两年间，毛泽东在长江中漂流，总是逆水而泳，一边游一边鼓励护游的同志力争上游。

1962年6月24日，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那一天，正值长江汛期，江面风大浪急。毛泽东逆水而上，安详地与陪泳的运动员聊着“家常”，问他们是哪里人？在哪里读书？是否常来长江游泳？累不累？等等，还激励他们说：“我们一起向上游！”<sup>①</sup>此时此刻，这位力挽狂澜的历史巨人为什么喜欢逆水而游？其心态如何？我们现在已无从考证，但他那顶逆流、战风浪的伟大气魄，在当时无疑给了全国人民以莫大的精神鼓舞。

长江的壮阔、险峻、秀丽，深深地吸引着毛泽东，这位伟人与长江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大革命洪流中，他曾登上黄鹤楼，凭栏远眺，进入眼帘的是“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的壮丽景观，尽收眼底的是那奔腾的扬子江；透过茫茫江水，似看到汹涌澎湃的大革命风暴，他感慨万千，“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他也曾在长江岸边的武昌都府堤举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骨干。就在大革命处于危急的关头，他又重返扬子江畔的寓所，思考、谋划挽救危局的方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不顾周围同志善意的劝阻，多次在大江之中劈波斩浪，借与激流宣战，来抒发自己不畏一切艰难险阻、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豪情壮志。气势磅礴的扬子江，也以博大的胸怀拥抱了这位历史巨人，并且永远铭记着这位伟人斗风击浪的雄姿。

<sup>①</sup> 《武汉文史资料》，1992年3、4辑合刊，第12页。



## 四、“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新中国成立后，1958—1966年，毛泽东曾在武汉多次会见外国客人。他们当中，既有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同志，也有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朋友，还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友好人士。毛泽东同他们会见，体现了中国在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的外交政策和方向。

50年代和60年代初，中国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在中国外交工作中占居首要地位。1950年2月14日中国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加强了中苏间的互助合作关系。同时，我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各方面的友好合作都有相当大的发展。

通过抗美援朝，中国人民大大加强了同朝鲜人民用鲜血凝成的友谊。朝鲜停战后，中国人民一面为争取朝鲜问题获得政治解决，使朝鲜实现和平统一而努力，另一方面协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恢复战争创伤，发展国民经济。中朝两国的关系是亲密友好的，朝鲜党、政、军和文化艺术等代表团经常访问中国，也多次来到湖北武汉进行访问。

1958年11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率政府代表团访华，25日中午在周恩来总理、贺龙副总理陪同下乘专机到汉。下午，毛泽东在汉会见金日成首相和代表团成员。陪同会见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等。26日，毛泽东同金日成举行会谈。晚上，毛泽东举行盛大宴会，欢迎金日成和代表团全体成员。随同来汉的朝鲜军事代表团成员也应邀出席。27日，代表团乘专机离汉去越南访问。12月6日，金日成访越后再次来汉。晚上，毛泽东与金日成再次举行会谈。7日上午代表团

乘专机飞往北京。

1958年12月4日晚，毛泽东在汉观看朝鲜艺术团表演舞蹈。演出前，毛泽东、周恩来会见艺术团团长赵灵出，副团长朴光羽、张春燮，功勋演员安圣姬等。

1962年6月22日，毛泽东在汉会见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朴金喆及代表团全体成员。陪同会见的有彭真、柯庆施、陶铸、伍修权、王任重等。毛泽东宴请了客人。

新中国同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当时都处于全面发展时期。

在重大国际政治问题上，中国同这些东欧国家步调一致，为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维护世界持久和平而斗争。例如，中国支持保加利亚提出的使巴尔干半岛成为无原子武器区的建议，支持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建立欧洲集体安全和中欧无原子武器区的主张，支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缔结对德和约、巩固民主政权的努力。东欧国家也支持中国抗美援朝、争取国家统一以及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斗争。

中国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缔结了友好合作条约，同匈牙利缔结了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普遍签订了贸易协定、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合作协定。双方贸易额迅速增长，其他形式的经济合作不断发展。中国还同波兰合办了中波轮船公司，对打破美国对新中国的封锁、开展中国对外贸易起了积极作用。

总之，在50年代，中国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基本上是正常的，往来也是密切的。中国领导人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李先念、彭真、彭德怀、贺龙、陈毅等都访问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的不少领导人和各类代表团，也都访问了

中国。毛泽东在武汉曾多次会见过来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朋友。

1958年4月2日，毛泽东在汉会见波兰部长会议副主席雅罗谢维奇和他率领的波兰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陪同会见的有国家计委副主任杨英杰、波兰驻中国大使基里洛克、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武汉市市长刘惠农。

1958年4月5日，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席基伏·斯托伊卡及其率领的政府代表团，由周恩来、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柯柏年、外交部礼宾司司长俞沛文陪同访汉。当晚，毛泽东会见基伏·斯托伊卡主席及部长会议副主席兼交通、邮电部长埃米尔·波纳拉希、外交部长阿夫拉姆·布纳丘和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粤多尔·鲁登科。陪同会见的有周恩来、王任重、张体学、曾涌泉、柯柏年。

1958年12月11日，匈牙利雷维斯上将为团长的匈牙利军事代表团乘飞机抵汉，受到在汉的国防部副部长谭政、武汉驻军首长陈再道、副市长魏廷槐的欢迎。下午，毛泽东会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陪同会见的有周恩来、陈毅和谭政。

1960年5月14日，毛泽东在汉会见了阿尔巴尼亚政府经济代表团，宾主进行了友好交谈。陪同会见的有周恩来等。

1963年5月27日至6月11日，毛泽东来湖北工作，住省委招待处梅岭一号。这次主要是拟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即二十五条），当时来汉的中央领导同志有邓小平、彭真、康生、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等。为了征求亚洲两个执政的共产党的领导人意见，先后邀请了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和以黎笋、长征、范文同为首的越南党政代表团来汉会谈。会谈时中方代表有邓小平、彭真、康生、吴冷西等。会谈后，毛泽东分别会见了两个代表团的全体成员，并进行了友好谈话。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兴起了民族解放运动。从 50 年代中期到 60 年代末，民族解放运动以更迅猛的势头向前发展，进一步改变了世界力量的对比，把争取人类进步的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中国同亚非拉国家有着共同的经历和愿望，一向把加强同亚非拉国家的团结、合作和互助，作为自己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 50 年代中期到 60 年代末这段时期内，中国继续大力支持亚非拉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同周围一些国家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若干问题，同更多的亚非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不少亚非国家签订了友好条约，也更明确地制定并宣布了同亚非拉国家加强政治关系、开展经济合作的对外政策。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世界上许多国家纷纷承认新中国并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50 年代初期曾出现了一次建交高潮，在这次高潮中，新中国同邻近的一些亚洲民族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亚非会议后，从 1956 年到 1965 年的 10 年间，特别是 1960 年前后，中国又同许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在这 10 年内，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除法国外都是亚非拉国家。

新中国建国后第二次建交高潮的出现，同中国坚决支持亚非拉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立场密切相关。当时被压迫国家的反殖、反帝斗争继续风起云涌，特别是西亚和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有重大的新发展。一系列新兴国家不愿意完全听从国际强权势力的摆布，看到中国大力倡导和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万隆会议的成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国际事务中坚定地站在被压迫国家一边，就有了同中国发展关系的愿望。中国方面对发展同新兴国家的关系也持积极态度，主动做工作。结果就出现了中国同不少亚非拉国家建交的局面，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相互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友好关系。对一些未建交的亚非拉国家，中国也大量增加了同它们的民间往来。

在第二次建交高潮中，许多亚非拉国家的领导人来中国进行友好访问，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他们亲切会见。毛泽东也多次会见来自亚非拉的朋友，其中有几次是在武汉进行的。

1958年12月11日晚，毛泽东在汉会见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社会事务部长优素福·本·赫达、军备和供应部长马哈茂德·谢里夫、宣传部办公室主任河阿德·达列伯。陪同会见的有周恩来、陈毅、对外贸易部代理部长雷任民、外交部西亚非洲司司长柯华等。

1959年3月18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艾地在中共中央委员刘宁一陪同下乘专机到汉访问。晚上，毛泽东会见艾地，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1960年5月11日，毛泽东在武汉会见巴西广播电视工作者代表团、阿根廷文化代表团和古巴学生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毛泽东说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民族民主运动在日益高涨。他说，帝国主义最怕的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觉悟，怕世界各国人民觉悟。我们要团结起来把美帝国主义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赶回它的老家去。

针对当时即将召开的美、苏、英、法四国首脑会议，毛泽东说：我们支持首脑会议的召开，不管这种会议有无成就和成就的大小。但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应当依靠各国人民的坚决斗争。最后，毛泽东举杯祝贺世界人民的团结，祝贺拉丁美洲人民的胜利，祝贺世界各国人民的胜利。会见时在座的有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主席廖承志等。

1960年5月15日，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克里姆·贝勒卡塞姆率代表团到汉访问。17日下午，毛泽东会见贝勒卡塞姆，并进行了亲切交谈。陪同会见的有杨尚昆、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外贸部副部长李强、外交部司长何英、俞沛文。

1961年4月1日，古巴起义青年协会主席霍埃耳·伊格莱西阿斯少校为团长的青年代表团一行6人抵汉。毛泽东会见了他们。陪同会见的有中共湖北省委和省政府的负责人。

1964年11月1日，毛泽东会见了松西·德沙康普为团长的老挝爱国战线文工团一行10人。陪同会见的有宋侃夫、曾惇、韩宁夫、宋一平、谢滋群、熊飞等。

1965年4月13日，毛泽东在汉会见阿联总统外交事务顾问萨里布及夫人一行。陪同会见的有副总理陈毅、副司长李超。

1966年7月17日，毛泽东在汉会见亚非作家会议的全体代表以及国际组织的观察员。中共湖北省委、省政府有关负责人在座。

朝鲜和印度支那停战后，中国曾希望美国在台湾海峡的武装力量能够撤走，中美关系能够有所缓和，亚洲和平能够得到巩固。因此，中国主张中美两国坐下来谈判。这促成了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举行。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开始，1958年9月改在华沙，至1970年2月，总共举行了136次会议。中美大使级会谈达成的唯一协议是双方就在各自国家内的对方平民回国问题达成了协议。由于美国坚持其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会谈没有在缓和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这个关键问题上取得任何进展，只是在两国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成为两国保持某种接触，交换一些意见的途径。

尽管直到60年代末，中美两国的关系一直陷入僵局，但中国仍然接待了一些来自美国的友好人士，其中有的还受到了毛泽东的会见。

1959年3月10日，美国著名黑人学者杜波依斯博士和夫人访汉。13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见杜波依斯和夫人。随同会见的还有美国友好人士、著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毛泽东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谈话中，毛泽东认为美国侵占中国台湾，入侵黎巴嫩，在世界许多地方派驻军队，对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来说，实际上是起到了一种“教员”的作用。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可以看作是1958年9月8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绞索”政策讲话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在那次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台湾、黎巴嫩以及所有美国在外国的军事基地，都是套在美帝国主义脖子上的绞索；美国自己制造这种绞索，并把它套在自己的脖子上，把绞索的另一端交给了中国人民、阿拉伯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爱和平反侵略的人民；美国在这些地方停留越久，套在它脖子上的绞索就将越紧。毛泽东在这篇著名讲话中，谴责了美国侵略中国的行为，同时重申了中国同美国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彼此争端的愿望，对中美华沙大使级谈判寄以希望。

毛泽东在向杜波依斯谈到他每年都要下长江游泳时讲到，他希望到美国密西西比河里去游泳，并且看艾森豪威尔总统打高尔夫球。这似乎并非完全是戏谑之语。它也许是毛泽东想透过杜波依斯或安娜·路易斯向美国最高层发出的一种信息：在大使级会谈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进行沟通。当然，这一信息是否到达美国最高决策层并为其所理解，则不得而知了。

从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末，在美苏从两个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的情况下，中国除了更致力于加强同亚非拉国家的友谊外，也期望进一步开展同西欧国家的交往。一些西欧国家也希望能进一步了解新中国，这方面最突出的事例是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1960年5月和1961年9月两次对中国的访问。

蒙哥马利这两次访华都受到毛泽东的接见。第二次会见是在武汉。9月23日和24日，毛泽东同蒙哥马利进行了两次共长达9个小时的谈话，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毛泽东向蒙哥马利保证：即使将来中国强大了，也决不会对外进行侵略扩张，也不会把自己的思想强加给别人。而这正是一些西方国家所耽心的。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两国人民有两千多年的悠久联系和友好往来。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几十年间，日本曾不断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新中国将广大日本人民同少数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加以区别。中国把重建和发展中日睦邻关系放在对外政策的重要地位，一向认为中日关系正常化不仅有利于两国人民，而且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日本某些领导人却采取了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这就使中日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相当曲折的过程。反对日本官方的上述政策，从发展两国民间关系入手，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是中日建交前中国对日外交的主要内容。因此，在50年代和60年代，中日之间主要是“民间外交”，日本许多非官方组织频频来中国访问，其中一些得到毛泽东的会见。

1958年3月18日，日本社会党访华代表团在浅沼稻次郎率领下抵汉访问。下午，毛泽东会见浅沼稻次郎及部分团员。陪同会见的有廖承志、赵安博、萧向前。

1960年5月14日，毛泽东在武汉会见了日本日中友好协会访华代表团、日本工会总评议会访华代表团、日本医学代表团、日本职工运动知名人士高野实和日本新闻工作者。毛泽东同日本朋友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毛泽东表示关心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的斗争。他说，新的日美“安全条约”是为了压迫日本广大人民，是以中苏为敌、以亚洲人民为敌的侵略性的军事同盟条约，它对亚洲和世界和平是严重的威胁，同时也必将把严重的灾难带给日本人民。中日两国人民和亚洲人民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当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

毛主席说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的共同敌人，是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敌



人。帝国主义在许多国家培养它的走狗，这些走狗是本国人民所不喜欢的。日本的岸信介政府就是这样的政府。日本自由民主党的有识爱国人士，也对岸信介的反动政策表示不满。目前日本人民正在展开规模宏大的斗争，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日本人民在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的斗争中，觉悟一天天提高，觉悟的人越来越多。毛主席说，日本人民是很有希望的。中国人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坚决支持日本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

在毛泽东会见日本朋友仅一个月后，6月23日，岸信介内阁便在日本全国性的反政府高潮中垮台。由池田勇人继起组阁。他上台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对中国的政策，我认为没有必要和美国采取完全雷同的态度”；“现在可以和中国大力开展经济、文化的交流”。中日关系出现了转机。但是直到70年代初，中日关系仍是反复曲折，1972年9月，方迎来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 五、“把杜勒斯当作老师”

1959年3月的一天，第二次来到中国进行访问的美国黑人学者杜波依斯<sup>①</sup>夫妇被告知，正在中国南方农村调查访问的毛泽东准备在武昌会见他们。与此同时，另一位著名的美国作家、已经

---

<sup>①</sup> 杜波依斯(1868—1963)，美国黑人运动领袖和作家。早年便致力于争取黑人平等权利的斗争，为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创始人之一，亦为泛非运动的创始人。平生孜孜于和平运动，反对美国的侵略政策，1950年当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1936、1959、1962年三次访问中国。生平著述甚多，主要有：《黑人的灵魂》、《约翰·布朗》、《重建时期的黑人》等。

定居在北京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sup>①</sup>也接到同样的通知。这个消息使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感到由衷的高兴：毛泽东和她是老朋友了，而在一年多前，她曾写过一封信给毛泽东，请求同他进行一次会见，没想到这时才得到回音。

12日，一架飞机载着他们，由北京飞抵武昌。同行的还有安排这次旅行的中华全国保卫和平委员会的唐明照，以及翻译浦寿昌等人。

次日清晨，当杜波依斯夫妇和斯特朗正在饭店用早餐的时候，唐明照走过来，很有礼貌的对他们说：毛泽东将在10点钟会见他们。但没有告诉会见的地点。

一辆汽车载着他们驶向武昌城外的东湖。东湖座落在武昌东郊，是一个秀色可餐的风景区，湖面千顷碧波，沿岸垂柳成荫，春天梨花怒放，夏日荷花飘香，是武汉人民最喜欢游览的地方。在东湖西侧，有一座在绿树翠竹掩映中的石屋别墅。汽车稳稳地在别墅前停下，当杜波依斯等人走出汽车时，看到毛泽东身着一套缝制十分合身的灰色毛呢服装，走下长长的石阶来迎接他们。

毛泽东在同杜波依斯握手的时候，对杜波依斯的肤色表示惊奇，他说：“您的肤色并不比我黑。谁能说出我们俩哪个更黑一些？”杜波依斯虽是黑人，但由于年龄的关系，皮肤显得有些苍白，同毛泽东常晒太阳的手显得差不多。在同斯特朗握手时，毛泽东用英语向她问好，而斯特朗则用中文说：“您好！”他们都大笑起来。

---

<sup>①</sup>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885—1970），美国女记者与作家。早年投身工人运动。1925年第一次访华。1928年发表《中国千百万大众》一书，介绍中国人民的斗争。抗日战争时期又两次来华，1938年发表《人类的五分之一》，宣传中国人民的革命与抗战。1946年第5次来华时访问延安，会见了毛泽东。1947年发表连载通讯《中国出现黎明》，1949年又发表《中国人征服中国》，描述在中国解放区的见闻。1958年第6次访华后定居北京。著有《斯大林时代》等书。

当他们向别墅走去时，毛泽东对斯特朗说，自从他们从延安分手到现在已有很长时间了，说着掰起手指计算年数。斯特朗插话说：“到这个月就满12年了。”她接着说，今天这场合是解放后主席首次准许美国记者来访。毛泽东听了，好像迟疑了一下，然后说：“似乎可以这么说。”安娜·路易斯猜想，毛泽东实际上把这次会见看成是接待他个人的宾客，而不是接受记者来访。

客人们随同主人进入了一个不大而明亮、三面有窗，可以俯瞰碧波荡漾的湖面的房间。毛泽东在一张狭长、盖着紫色桌布的茶几旁坐下，杜波依斯坐在毛泽东的对面，斯特朗和杜波依斯的夫人雪莉·格雷厄姆分坐在茶几的两边。陪同会见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坐在毛泽东的一侧。毛泽东先转向斯特朗说：“你是老朋友了，你在中国已经很长时间，现在已成了中国人。你是女主人，他们是新朋友，是客人。”毛泽东说安娜·路易斯是中国人，是从文化修养上而不是从种族肤色或国籍上说的。斯特朗知道，在中国，客人总是优先于主人的。毛泽东的这番话是一种有礼貌的提示：今天在这里享有谈话和提问优先权利的是杜波依斯。斯特朗对此表示理解。

谈话从轻松地笑谈年龄开始。毛泽东依次询问了客人的年龄，得知斯特朗是73岁，杜波依斯是91岁，而 he 自己是66岁。毛泽东称羨杜波依斯的健壮，说：“按您的年龄，可算是我的父辈了。但即使是我，也感到上年纪了。不过，我还是精神饱满，颇有精力。我每年都能下长江游泳。这是我的游泳伙伴。”他指了一下坐在旁边的省委书记王任重。然后，又提到他游过的其他江河——广州附近的珠江，还有黄河，他说，还想游黑龙江。安娜·路易斯说，要是他真去，就能游过江到达俄国。毛泽东瞧了瞧她，笑了起来：“啊！你说得真不错。”

“如果你们三位不反对，”他接着说，“我愿意去游密西西比河。但是，我想另外三人可能会反对：杜勒斯先生、尼克松先生和艾

森豪威尔总统。”毛泽东向杜波依斯投去了询问的一瞥。

“相反”，杜波依斯回答说，表情有些严肃，“他们可能愿意看见你在密西西比河游泳，特别是靠近它的河口。”

“真的？”毛泽东回避了杜波依斯话中的寓意，反而显出高兴的样子说道：“如果那样，过几天我就作为一名旅游者动身前往。”

安娜·路易斯这时插话说：“像米高扬那样。”她指的是苏联外交部长最近一次访美。

毛泽东微笑着摇了摇头：“哦，不是。米高扬谈的是政治，我不要谈任何政治。我就是到密西西比河游泳。然后，如果艾森豪威尔总统允许的话，我将看他打高尔夫球。也许去医院拜访杜勒斯先生。”

杜波依斯一本正经地回答说，那一定会给杜勒斯一个打击。毛泽东马上纠正道：这不是他的本来愿望，“我很希望杜勒斯先生健康，继续担任国务卿”。他继续阐述他的独特思想，“作为国务卿，他对我们很有用处，对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也同样有好处。”

毛泽东从客人脸上看出了他们的疑惑，便接着说：“确实如此。杜勒斯之所以有用，是因为他坚持自己的原则。他反对共产主义，反对苏联，反对中国。为了这一目的，他压迫人民，在世界各地派驻军队，建立军事基地。所有这些，对整个世界都是有用的。”他盯住杜波依斯问，“您相信这点吗？”

杜波依斯回答说，这取决于多少人觉悟，能够理解杜勒斯的所作所为。他认为，觉悟的人民对杜勒斯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麻烦，“我不希望这种形势继续太长时间。”他说。

“我和您想的有所不同”，毛泽东说，“这一时期不是太长，而是太短了。”他希望杜勒斯还能够担任10年国务卿，他说：“我们十分希望10年以内我们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也不搞贸易。这将对我们很有利。至于侵占台湾，杜勒斯乐意继续多久就继续多久吧！反正美军最终不得不撤离台湾。不过，我们倒乐意让他们

在那里多呆些日子。当我们人民的教员嘛！一旦他们撤离，对我们反而较为不利了。对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来说，还有什么更好的教员呢？中东事件也很有教育意义。我曾希望美军留在黎巴嫩至少达半年。现在看来，留一年两年会更好。”毛泽东用一种嘲弄的语调说，“他们干嘛要那么快撤军呢？”

“也许，他们中的一些人遭到了重创？”雪莉·格雷厄姆说。

“是这样”，毛泽东幽默地说，“即使我们要求他们，他们也不会再呆下去了。”

毛泽东接着往下讲：“杜勒斯制造的国际紧张局势，对我们是有利的。他把局势弄得越紧张，我们就越容易动员世界人民。每一个人都被迫面对战争问题。杜勒斯本人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一点，并且怀疑他所制造的紧张局势，究竟是对他有利，还是对东方有利。”

毛泽东列举了过去14个月中由于杜勒斯的政策而引起的一些事件，如委内瑞拉人民起义，副总统尼克松拉美8国之行都遭到这些国家人民的强烈抗议，去年7月14日伊拉克人民的武装起义，美国入侵黎巴嫩事件，以及中国对金门岛的炮击等等。毛泽东认为，这些事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炮击金门。

“我们与蒋的战争，已经持续30年了”，毛泽东说，“但因为我们的炮击金门，美国派出了其半数的军用飞机。不管怎样，这是我们的地方。”说到这里，毛泽东燃起了一支烟，吸了一口之后，继续阐明他的战略：“他们坚持其‘战争边缘’政策，他们护送蒋的船只，但在我们追击时，他们总是在三英里外的地方观看。他们停止在了边缘。”

“所以，现在我们把杜勒斯当作老师，我们也是停在边缘。我们炮轰蒋的舰船，美国的舰船挂着巨大的国旗，因此我们能够容易地与蒋的舰船区分开来。我们不炸美国的军舰，我们向杜勒斯学习，也把战争避免在边缘。”

为了说明这种战略，毛泽东还像当年在延安那样，在桌上作模拟说明。他用茶杯、烟灰缸和烟盒在桌上摆了一个“沙盘”，标出了金门外面美国军舰和蒋的军舰的位置，并用幽默的语调说，由于在美国国会选举前夕他们沉重地炮击了金门，也许已经对美国民主党人“自愿尽了义务”，因为这样不啻是告诫选民要认清：杜勒斯（杜属共和党——编者注）是无力稳定局势的。

杜波依斯对毛泽东如此轻松自在地理处理战争边缘政策似乎感到不安，于是打断了毛泽东的谈话，提出了战争中人民受害的问题。他认为这种政策继续下去，“台湾人民受苦难，美国的黑人也受苦难。我怕会灭绝美国黑人。”

毛泽东语调坚定地说：“美国有1800万黑人，灭绝他们是不可能的。将被灭绝的是资产阶级，而不是你们。资产阶级在苏联已经消灭，在中国也将很快被消灭。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正走向灭亡，共产主义者与和平战士永远不会灭亡。世界是属于他们的。但是，杜勒斯及其同伙将被灭亡，他正做着他所能够做的灭亡自己的一切。这也是我如此欣赏他的原因。”

“您愿投他一票吗？”杜波依斯神态庄严的问。

毛泽东微笑起来：“就我个人来说，我是不会投他的票的。”

杜波依斯坚持说，他的许多亲人和朋友已被消灭了。

毛泽东在烟灰缸里掐灭烟蒂，沉痛但平静地说，他自己一家也有6口人惨遭杀害——他的两个兄弟、他的前妻、他的妹妹和侄子都被国民党杀害，他的长子死于朝鲜战争。“尽管发生了一切悲惨事件，但是他们绝不可能杀掉所有共产党人。我的家庭成员可能会减少，但是在整个中国共产党人会增多。”毛泽东说到这里，指了一下他的在美国两所学院学习过的翻译浦寿昌，“美帝国主义培养他们来反对我们，但他却来为我们工作。他们越杀，共产主义者将会越多。”

杜波依斯对此表示相信。

话又转到困扰着美国的其他问题，特别是古巴问题上来。毛泽东说：“古巴，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只有600万人民，相当于美国黑人的三分之一。古巴离美国很近，恰好在它的脚边。但古巴并不畏惧原子弹和氢弹。这不仅是国家大小问题，而且是人民的政治觉醒问题。”毛泽东还打了一个比方，来说明大和小并不是绝对的，他说：“许多病是由细菌引起的。细菌很小，以至于看不见它们。而人则很大，约有150磅。但人的块头一点也吓不倒细菌。它们恰恰进入人体并繁殖起来。”

但在另一层意义上，毛泽东又说：“过去，我国人民恐惧美帝国主义，这是一种心病。还有一种心病，就是羡慕美帝。有了这两种病，就会害第三种病：恐惧与羡慕转化为崇拜。在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被这种崇拜所击垮，甚至于中国的工人阶级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在过去的八、九年中，我们已有成效地改变了这种心理。”

毛泽东认为，同样的力量崇拜，也影响着美国人民以及他们中的黑人。杜波依斯对此表示异议，他说，美国劳动人民不受恐惧、羡慕等心理影响，而是受收入多少的影响。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尖锐的争论：究竟是经济因素还是“迷信力量”在起作用。杜波依斯坚持认为是前者。毛泽东则认为，当人们的阶级地位本应使其站在这一方面，而人们却站到另一方面时，那么他们就是受到盲目迷信的影响，“您吃过狗肉吗？”他反问道：“我相信，如果有人给您狗肉吃，即使您还没有吃，就会感到不是滋味。但是，您能给我讲出什么道理吗？您从来也没有尝过它，您没有经验，没有实践。您拒绝它，只是因为社会环境的影响。对我来说，也是这样。游击战争年代曾经只能吃到狗肉，我迫不得已吃下了它。我没有呕吐，但有一阵子感到难受。后来我逐渐地变得习惯了。从这里，您就能看出社会风俗的影响力。”

长时间的谈话，使杜波依斯看上去有些疲乏，毛泽东站了起来。

来，建议大家出去散散步。庭院里，春日融融，暖风和煦，树枝已吐出新芽，泥土地上芳草萋萋，宾主都兴致勃勃，饱览这里的湖光山色，摄影师为大家拍了不少照片。在闲步漫游后，毛泽东引路归来，把客人们请到楼上的餐厅，招待来宾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

午宴当中，安娜·路易斯终于有机会向毛泽东提出一些她自己的问题。她请求陪毛泽东作一次农村旅行，以便向美国人民报道所谓“一小群住在北京的人统治一切”并非事实。毛泽东认为她的请求是可行的。

当他们就要结束午宴时，毛泽东把他的思路转向有关生与死的问题：“我已经66岁了，我可能会病死，也可能乘飞机遇难，或是被蒋的某些特务分子暗杀。然而，怕死是没有用的。怕死不能制止死亡，只能导致死亡。我并不希望死，我希望能亲眼看到帝国主义的末日。但是，如果我不得不死，我也不害怕。”杜波依斯戏谑地谈及他自己身后的归宿问题。这是因为他的朋友和敌人都认为他是一位共产党人，而党组织知道他还不是共产党员。毛泽东说：“您已经91岁了，在另一个91岁时，你将会遇到马克思，我想他会接纳您为同志的，这是始终可能的。”他又说，“也许我先你而去，那么，到时我会很高兴地将您推荐给马克思的。”

两小时的午宴结束后，客人和主人在友好的气氛中互相道别。

## 六、“中国决不越出它的合法边界”

1961年9月23日，一架专机从北京机场腾空而起，直飞武汉。机上的乘客并不多，但一位头发花白、面容清癯、鼻梁高耸的欧洲人却十分引人注目。他虽然上了年纪，却是腰板挺直，一双锐利的眼睛中透露出一种逼人的气势，尽管身着便服，仍然掩



饰不住他那职业军人的风度。

他，就是当年率英军重创隆美尔指挥的德、意联军，使盟军在北非战场反败为胜，从而也使他自己遐迹闻名的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陪同蒙哥马利访问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李达上将。这次来华，是他对中国的第二次访问了。上一次访问，是在去年的5月。

为什么这位元帅在短短的时间内就两次访问中国呢？可以说，蒙哥马利不仅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军事家，同时也是一个具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60年代初，在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妄图在政治上孤立中国、经济上封锁中国、军事上包围中国的时候，他就清醒地看出，从长远来看，世界和平的关键在于中国，中国兴起成为一个大国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指出，这件事可能造福人类，并可能缔造各国人民所渴望的和平世界。为此，他提出了一个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三原则”：第一，大家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大家都承认有两个德国——东德和西德；第三，一切地方的一切武装部队都撤退到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去。他认为，这是当前国际局势的关键。因此，西方世界必须“在现在”就同新中国和好，并且平等相待。他进而认为，西方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很可能在将来同一个拥有10亿人口和核武器的敌对中国打交道，而这“不是一个很愉快的前景”。

基于这样的认识，蒙哥马利决定访问中国，以便结识中国的领袖们，“看看他们是怎样的人以及他们对世界问题的看法。”于是，1960年5月，蒙哥马利第一次来到了中国，在这次为期5天的访问中，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以及陈毅副总理会见了。但他感到这次访问的时间太短，这样，仅隔一年多后，他又踏上了中国这块古老而又年轻的土地。

在这次将近一个月的访问中，他实地考察了包头、太原、延安、西安、三门峡、洛阳、郑州、武汉等8个城市，接触了工人、

农民、士兵、学生等各阶层人民，并同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进行了交谈。在访问行将结束，他已回到北京，才接到毛泽东将在武汉会见他的消息。这是蒙哥马利期待已久的会见。

抵达武汉后，蒙哥马利下榻在汉口胜利饭店。当晚6时半，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宾馆一个摆设简朴的房间里会见了，并共进晚餐。晚餐后，宾主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谈话前，蒙哥马利拿出一盒“三五牌”香烟赠送给毛泽东，因为他知道主人有吸烟的嗜好。接着提出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要担忧的问题是什么，现在主要考虑的又是哪些问题，“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建国后是否还适用，以及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有何区别，等等。

毛泽东对这些问题一一作了回答。

毛泽东说，建国后共产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缺乏经验来正确处理经济。由于多年的战争和长期的怠忽，整个国家的经济陷入混乱和可怕的境地。要处理迫在眉睫的工业和农业的巨大问题，必须要有经验，而他们缺乏经验，因此犯了很多错误。

毛泽东认为首先需要的是一个正确的农业政策，这是同需要把全国水旱灾害的影响减到最低程度相联系的。由于中国是一个疆域辽阔的国家，自然灾害在各地区时有发生，要做到一定程度的控制自然灾害，必须整治如黄河、长江这样的大河，组织大规模的灌溉；必须使农业机械化，耕种更多的土地；还要使全国各地人口分布得平均些。

其次需要的是工业化，以便建立经济实力。

而要解决工农业问题，就要求有一个大大改善的交通运输系统。全中国铁路干线总共只有4万公里，远远落后于工农业发展的需要。

在同毛泽东谈话时，蒙哥马利注意到毛泽东只使用“社会主义”这一概念，而从未提到过共产主义。蒙哥马利感到困惑：中

国难道不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吗？毛泽东肯定地回答“不是”。他说，目前他正在从事建设的国家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它的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当社会主义得到高度发展，能够达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时，那就是共产主义。蒙哥马利说，当他1947年在莫斯科访问斯大林时，得到的也是这样的解释。蒙哥马利又问道，如果中国现在还不是共产主义而只是社会主义，为什么又自称为共产党中国呢？毛泽东回答说，这是因为他们喜欢把政党的名称同他们的最终目的联系起来。

蒙哥马利在同毛泽东谈话中，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一定的年限内，中国将成为拥有超过10亿人口和巨大力量的强大国家，那时将会发生什么情况？新中国的最终目的究竟是什么？”

毛泽东仔细地听着，然后说：“哦！你显然以为那时中国将要向国外进行侵略了。”

蒙哥马利回答说，他并不愿意这样设想。但是历史的教训是，当一个国家强大起来，它就要向国外攫取领土。可以找到许多这种先例，其中包括他自己的国家英国。

毛泽东以他特有的缓慢语调，十分认真地答复了这个问题。他说，显然不可能确切地说出在中国，或者在全世界，在下一代会出现什么情况，他自己将已不在人世，中国今天的领袖也都会一样，新的领袖将会出现。就他本人而言，他将在他活着的年代运用他的影响，坚决使中国不越出它合法的边界。在一切边界纠纷中，采用谈判方式，决不越出边界进行侵略，而且决不企图把它的共产主义思想强加于其他国家。

毛泽东还补充说，中国自己遭受过如此深重的外国侵略和剥削，今天他所了解的中国无意使任何其他国家遭受这种屈辱。中国只要求别人不干预它的事情，让它从过去受别的国家的侵略中恢复过来。但是如果遭到攻击，它将以一切力量保卫自己，中国是有准备的，而且也有能力这样做。

蒙哥马利说，使他感到遗憾的是，对西方人来说中国是一个“闭门的商店”。这种政策意味着不可能纠正对新中国的误解，并且只会遭到更大的曲解。毛泽东认为，主要理由是，西方人会带来道德标准的降低，这将妨碍他在中国竭力追求的高尚的标准；而且，西方人到哪里，哪里就道德败坏。

然而，蒙哥马利认为，不愿冒道德败坏的危险并不是中国拒绝西方记者或游客的唯一理由。但他并没有深入地谈论这一问题。

谈到晚上9时30分，蒙哥马利说：“今天谈话使我学到很多东西”，“我想主席一定很忙，还有别的事情要做。我能否明天晚上再来谈谈？”毛泽东说：“明晚我就到别处去了。”这一天的谈话到此结束，两人互相道别。

没有料到，次日清晨，毛泽东改变了计划，决定当天下午再同蒙哥马利谈一次，并共进午餐，这使蒙哥马利喜出望外。

这次追加的谈话是从下午2时30分开始的。寒暄几句后毛泽东就说：“元帅是特别人物，相信能活到100岁再去见上帝。我不能。我现在只有一个五年计划，到73岁去见上帝。我的上帝是马克思，他也许要找我。”蒙哥马利说：“马克思可以等一等，这里更需要你。”

毛泽东说：“中国有句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蒙哥马利接着这句话说：“我认识世界各国的领导人。我注意到他们很不愿意说明他们的继承人是谁，比如像英国的麦克米伦，法国的戴高乐，等等。主席现在是否已经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

毛泽东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蒙哥马利又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毛泽东说：“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蒙哥马利说：“中国现在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很需要主席。你现在不能离开这艘船，放下不管。”

毛泽东说：“暂时不离，将来学丘吉尔的办法。”并说：“我随

时准备灭亡。”接着讲了五种死法：被敌人开枪打死；坐飞机摔死；坐火车翻车翻死；游泳时淹死；生病被细菌杀死。毛泽东说：“这五条，我都已准备了。”还说，人死后最好火葬，把骨灰“丢到海里去喂鱼”。

在关于继承人的谈话结束后，蒙哥马利又提出了他认为是过去3年中毛泽东和中国政府所面临的“真正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令中国领导人“很大担心的问题”，即中央权力下放与集中控制的问题。蒙哥马利认为，由于中国在1949年10月时的状况，北京中央政府实行非常高度的控制是必不可少的，这样，才能向前进，并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但是现在，经过12年以后，毛泽东是否考虑到要放松一下，把权力下放给各省？这个问题使毛泽东非常感兴趣，他认为蒙哥马利已经接触到整个问题的根源，他愿意说明这个问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的控制必须很紧；原料、必需商品、食物的供应都很缺乏，那时没有别的路可走。但是随着时间的消逝，情况开始好转，下面对中央严紧的控制就有不少牢骚和怨言。由于这个原因，曾决定放松一些控制。以后中央发觉，由于下面缺乏经验，在放松控制时，供应不多的主要商品和原料开始被浪费，因此认为必须重新实行并加强控制。蒙哥马利问道，“放松”控制开始造成下层机构的浪费和组织不善的情况，是在什么时候发觉的？毛泽东认为是在1959年。蒙哥马利说那是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一年，那时中国在粮食方面有困难。毛泽东说“是的”，问题就在这里，中国在跃进时被绊住了，控制的放松不幸和连续几年歉收的开始同时发生。因此不得不重新采取严密的控制，这使中央政府在1960年和1961年中进行了政策调整工作。蒙哥马利又问毛泽东是否认为他们现在已经找到集中控制和权力下放之间的正确分界线，毛泽东说已经找到，并且再也不会跌交了，不过随着繁荣的增长，中央的政策是要给下面的人以最大的

伸缩余地，这一政策对于像中国这样幅员广大的国家的确是必要的。

谈到下午5点，毛泽东邀请蒙哥马利一起到长江里去游泳。蒙哥马利以胃不舒服为由谢绝了邀请，但答应在船上观看毛泽东游泳。

武汉的9月底，溽暑早已过去，天气渐渐转凉。这时太阳已经西斜，天空一片湛蓝，使人感到秋高气爽。毛泽东在汽艇上换上泳装，然后从舷梯下到江中，当江水没到他的腰际时，毛泽东一手握住舷梯栏杆，一手往身上浇了浇水，接着便往前一扑，在江中游了起来。长江水即使在盛夏也是冰凉，入秋后更令人感到有些刺骨。毛泽东却兴致极高，只见他不断变换游泳的姿势，一会儿蛙泳，一会儿侧泳，一会又躺在水面上仰泳，真是“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游了将近一个小时，毛泽东才意犹未尽的上船来。穿上衣服后，毛泽东对蒙哥马利说，在他下次访问中国时要同他作横渡长江的比赛。蒙哥马利接受了这个挑战。并答应1964年再来中国访问。

上岸后，毛泽东又把蒙哥马利送到汉口胜利饭店——这是外国客人极少能得到的殊荣。他们在饭店又谈了近一个小时，临别时毛泽东将事先写好并署名的《水调歌头·游泳》词一首，“赠蒙哥马利元帅”，作为那盒“三五牌”香烟的答礼。

第六章

逝者如斯夫





## 一、“我当了共产党的钟馗”

1966年6月18日，毛泽东来到被称为“白云黄鹤”的武汉。20天后的7月8日，他在武汉给正在上海的江青写了一封非常重要的信。为什么毛泽东要写这封信呢？这得要从同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长篇讲话说起了。

林彪的这个讲话，人们称之为《五·一八讲话》，主要是讲了三个问题：

一是大讲“政变”。林彪在讲话中搜集研究了古今中外大量的政变资料，得出结论说：“政变，现在成了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他说：“政变，大多数是宫廷政变，内部搞起来的。……现在毛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把我们一向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了，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接着，他危言耸听，大造我们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的离奇谎言。他说：“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野心家，大有人在，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想推翻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健在，他们就背叛，他们就阳奉阴违，他们是野心家，他们搞鬼，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并指出“这里最大的问题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复辟”。他的这套“政变经”力图制造恐怖气氛，仿佛神州大地上到处是刀光剑影、腥风血雨的杀人场。他的目的是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击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制造舆论。

二是大讲“反复辟”。他说：“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永远不要忘记了政

权。要念念不忘政权。”并说：“我想用自己的习惯语言，政权就是镇压之权。……我们取得政权已经16年了，我们的无产阶级的政权会不会被颠覆、被篡夺？不注意，就会丧失。”

三是大讲毛泽东个人的“天才”。他说：“毛主席广泛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当代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毛主席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之上的天才。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世界上几百年才出一个。毛主席活到哪一天，90岁，100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还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作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显然，林彪借鼓吹个人崇拜，竭力把自己打扮成毛泽东的最忠实的拥护者和当然的接班人。

林彪的这篇讲话，当时不仅为与会的大多数人所接受，而且得到好评。只是毛泽东对其中的许多内容表示不安，虽然还是同意批转全党，但不安的心情一直未变，并且思考了很多、很远，终于在武汉给江青的信中讨论了林彪的这篇讲话及由此引起的一些重大问题。

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说：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我的朋友的讲话<sup>①</sup>，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象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

---

<sup>①</sup> 指前面提到的林彪的《五·一八讲话》。

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4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5月会议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全世界100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

“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两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

“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

“中国自从1911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

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90%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这封信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对运动和对林彪的看法，反映了毛泽东和林彪之间的矛盾。信写完后，毛泽东先给在武汉的周恩来、王任重看过。信中对林彪有所批评，周恩来经毛泽东本人同意后曾转告林彪，林彪也感到不安并有悔改的表示，毛泽东遂将原件销毁。现存的是毛泽东校阅过的抄件。

1966年7月16日，当73岁高龄的毛泽东在汉横渡长江上艇后，49岁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高兴地对毛泽东说：“主席的身体真好，我真不敢相信，你的游程近30华里，游了1个多小时。”

毛泽东不无所指地说：“我知道有人一直盼望我死，但我在短时间内是不会去见马克思的。因为这场伟大的文化革命还没有取得最后胜利，所以马克思不要我的。”

王任重笑着说：“主席万寿无疆才是全国人民的幸福呢。我看，中国的右派分子成不了气候。我看了主席7月8日的那封信，我觉得主席可能把形势估计过重了，我认为当前形势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是一派大好的。”

“现在不说那样的话。”毛泽东摆了摆手说。

回到毛泽东在东湖宾馆的住处，王任重见毛泽东还无倦意，就坐在他对面想说些什么。但没等他开口，毛泽东就接着对给江青的信的讨论，问王任重：“你不是说我把形势估计过重了吗？能否具体谈一谈啊！”

王任重没有顾虑地说道：“主席7月8日致江青同志的信我看后，产生了这种感觉的。主席说：‘全世界1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主席的这个估价是对的，但我觉得中国不是这样，也不会是这样。”

“为什么呢？”毛泽东不解地问。

“因为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王任重说，“不过，我还是同意主席的断言和预见的：‘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90%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主席的这些话，写得非常精彩。”

听完王任重的评论，毛泽东对他的记忆力真有点吃惊。当时毛泽东写好那封信后，正赶上王任重陪同周恩来向他汇报工作，便把信给他们看了一遍，然后很快收了起来。而这位被称为“秀才书记”的王任重竟过目不忘。

## 二、最后一次畅游长江

1956年至1966年，毛泽东一共在武汉畅游长江近20次，其中意义最深远、最特别的要算1966年7月16日的最后一次。

这一天的武汉，阳光灿烂，晴空万里。沿江两岸的大地上，到

处是鲜艳的彩旗、巨幅的标语和欢呼的人群，呈现一片欢腾的节日景象。

上午9时20分，在大江两岸扩音器播送的《东方红》乐曲声中，在武汉长江大桥桥头处有3颗红色的信号弹一起飞上蓝天，附近所有轮船汽笛齐鸣，锣鼓声震天响起。参加武汉市第11届横渡长江游泳比赛活动的5000名健儿，在武昌桥头堡依次跃入滚滚奔流的万顷波涛之中。一时间，江水欢腾，浪花飞溅，浩浩荡荡的游泳大军，以“截断巫山云雨”之势，“到中流击水”！

就在这时，毛泽东乘坐的武汉警备区的快艇，驱风逐浪，穿过雄伟的武汉长江大桥，顺流而下，一直驶到游泳大军的前方，然后开足马力，直奔武汉关码头，为游泳大军开辟出一条航道。快艇开到武汉关码头后，又转回头来，驶过汉水与长江的汇合处时，毛泽东从快艇会议室走出来，站在左舷前方。他时而极目远眺，观察那烟波浩渺处变幻着的风云；时而手搭凉棚，检阅着勇往直前的游泳大军，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

毛泽东乘坐的快艇离游泳大军越来越近了。突然，不知是谁第一眼看见了毛泽东，立即高呼：“毛主席来了！”紧接着，游泳大军高举百面红旗，兴奋地欢呼起来，像在地面上一样跳跃着，用最快的速度向快艇浩浩荡荡地游过来。

在离快艇不远的一只小划子上，站着一位女同志。她拿着话筒一边高呼“毛主席万岁”，一边使劲地跳跃着。她每跳一次，小划子就猛颠一下。跳啊，颠啊，她摔倒了又爬起来跳跃、欢呼。

与此同时，停港船舶上的汽笛齐声长鸣，两岸人群也沸腾起来。震天动地的欢呼声、汽笛声、乐曲声汇成一片，淹没了滚滚长江的风浪声。

毛泽东不停地在甲板上走动，一会儿从这边走到那边，一会儿从那边走到这边，微笑着向游泳大军挥手致意，并不断地高呼：“同志们好！”“人民万岁！”

由 200 多名少年儿童组成的游泳队伍，受到毛泽东的特别关怀。这批大多是 8 到 14 岁的学生，簇拥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标语牌，在波浪起伏的江面上奋臂向前。看到这些勇敢活泼的少年儿童，毛泽东格外高兴。他让快艇向他们驶去，他们也纷纷向快艇游来。毛泽东频频地向他们挥手，还亲切地高呼：“少年们，你们好！”

毛泽东的关怀，激起了一阵阵欢呼声。少年儿童们忘记自己是在水深急流之中，一个个在水里欢腾雀跃，振臂欢呼。他们沉下去，又冒出来，有的还喝了几口江水，仍坚持向毛泽东致敬。

就是在这种无比欢乐的气氛中，游泳大军分批从毛泽东乘坐的快艇边游过，于 10 时半胜利到达终点汉口三阳路码头，全程 7 000 米。

这时，快艇驶向汉口岸边。毛泽东站在船头上，不断地向岸上的游泳健儿和无数观众招手致意。岸上的人群再次沸腾起来，震天动地的欢呼声经久不息。11 时许，毛泽东乘快艇来到武昌大堤口码头。这位 73 岁的老人，不顾在甲板上站立一个半小时检阅游泳大军的疲劳，没有休息就脱下浴衣，穿着普通的白色短裤，稳步地从船舷扶梯下水。

他先往下一蹲，让江水浸湿了全身，然后两手松开扶梯，双脚一蹬，安然地仰卧在波涛翻滚的江面上。

不一会，毛泽东抬起头来，发现几个年轻的警卫员拖着 3 个大汽胎，在他周围游着。他好奇地问他们：做什么用啊？

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都不好意思地笑了。

毛泽东马上明白了他们的用意，笑着说：不用，拿上去。说完，他轻舒两臂，拨开波浪，踩着激流，在宽阔的江面上畅游开了。当时，正值长江汛期，水急浪大。毛泽东在波涛滚滚的江面上劈波向前，时而仰泳，时而侧泳，时而潜身水里，隐于万顷波涛之中，时而又平躺水面，全身浮在波塔浪尖之上……。

毛泽东一边从容不迫地搏击风浪，一边还与同他一起游泳的一群男女青年谈笑风生。

他一贯十分关心青少年的成长，把他们看作祖国的未来、革命的接班人。他问身边的同志：武汉青少年游泳活动开展得怎样？3个人当中有1个人会游泳吗？当听到肯定的答复时，他满意地说：这很好！

一位女青年告诉毛泽东：“我这是第二次在长江里游泳。”

毛泽东笑着对她说：“长江又宽、又深，是游泳的好地方。”

当毛泽东发现一位女青年只能游一种姿势，便亲切地教她仰泳。他说：“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

浩瀚长江，风云多变。将近12时，江面上突然刮起了5级大风，涛涛翻滚的江面更加汹涌袭来。别说是一位73岁的老人，就是一位年青的小伙子，要顶着这5级的大风和澎湃的大浪，渡过天堑长江，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一直停候在江心的快艇马上向毛泽东靠近，请他老人家上船休息。他问，游了多长时间？周围的同志说：“45分钟了。”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说，还早，还不到1个小时嘛！

接着，毛泽东又继续以伟大的气魄和惊人的胆略，熟练地驾驭着大风大浪，带领大家向东游去。只见他一会将头埋进水里，把迎面袭来的浪头抛到身后，一会露出双肩，让一泻千里的江水在身边激荡……。

过了一会儿，大家又催毛泽东上船休息。他还说早。

最后，毛泽东坚持游到武汉钢铁公司附近的江面，才肯上船。整个游程将近30华里（约1.5万米），历时1小时零5分。

下午1时17分，毛泽东离艇上岸。拥挤在码头上的群众，欢呼着向他迎上来；争先恐后地目睹这位巨人魁伟的身材、高大的形象、亲切的目光、慈祥的面容、朴素的衣着……

这时，接毛泽东的车子开过来了。但是，刚刚顶着大风大浪



横渡长江的他老人家，没有立即上车，而是精神焕发地微笑着向群众中走去。心情激动的人们自动挽起手臂，给他们心目中的领袖让路。毛泽东一边迈着稳健的步子，一边亲切地向群众招手、鼓掌。走出一、二百米后，他才在工作人员的催促下上了车。

车子开动后，他还在车里深情地向群众挥手告别，群众也十分留恋地目送着他乘坐的汽车消失在马路的尽头……

毛泽东这最后一次畅游长江天险，不仅是73岁的高龄，而且又在江中突遇多次畅游长江中最大的一次风力。无论是毛泽东的气魄、胆略，还是他高超的游泳技术，都令世人不得不敬佩和折服。

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教授曾形容道：对人们来说，年老的毛泽东畅游长江，“就仿佛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横渡英吉利海峡一般。他显然是一个有超人体魄的运动健将。”

另一位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洛厄尔·迪特默的一段话更能代表西方学者普遍的看法。他明确写道：毛泽东的举动是在向全国人民表明，毛泽东“仍然是无可动摇的‘舵手’，单凭他的身体就足以证明他仍然有精力掌握全局，更何况他还是‘壮心不已’”。

1966年7月25日，《人民日报》等主要报刊，都在头版头条登载了7月16日毛泽东畅游长江的报道和照片。

同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题为《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的重要社论：由湖北电视台拍摄、北京电视台制作的电视片《毛主席畅游长江》在全国播放。

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1956年第一次畅游长江后在武汉写的词《水调歌头·游泳》的手迹。

当人们看到毛泽东在快艇上挥手检阅长江中游泳大军的照片和搏击风浪渡天堑的报道时，对领袖毛泽东油然而生一种无法形容的敬仰和信赖感，激励着他们更坚定地“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正如7月27日新华社消息所说的那样：全国军民怀着最亲切、最激动的心情，传播毛主席畅游长江的喜讯，衷心祝

愿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决心在大风大浪中学习阶级斗争的游泳术。

以后，每年7月16日，武汉等地均要举行各种形式的横渡长江活动，以纪念毛泽东老人家以73岁高龄畅游长江的壮举，并表达永远紧跟舵手毛泽东劈波斩浪、奋勇向前的坚定信念。

### 三、“文化大革命不能再搞了”

早在1966年底，毛泽东就曾估计1967年底以前可以结束“文化大革命”。

1967年7月13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118号房间召开的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毛泽东先分析了“文化大革命”的形势，然后诙谐地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打下基础，三年收尾，这就叫文化大革命。”

会上，为了“看眉目”，毛泽东决定巡视大江南北。他说，7月了，我要到外面走走。去武汉游水，那里的水好。他还指定要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跟他一起去。

而与会者多数不赞成毛泽东去武汉。理由很简单，是为了他的安全着想。

周恩来也劝毛泽东：大家都说你不去了为好，还是不要去了吧。

林彪说：主席呀，你的身体是没问题的。到武汉去游泳也是很好的，但大家都关心你的安全问题。

毛泽东则不以为然。他要做的事情，都是胸有成竹的，一旦下了决心，别人是很难轻易使他动摇的。他把烟按灭，微笑着对大家说：“没有关系的。我去，让杨成武跟我去。成武，你跟我去，就这样了。”

大家再也不好说什么了。周恩来只得嘱咐杨成武：“你的任务

是当好联络员和保证主席的安全，直接同我联系。”

当晚，毛泽东就坐火车离开北京出发了。于14日到达武汉，住进武昌东湖宾馆。

14日凌晨5时，当人们还在睡梦中的时候，周恩来已早于毛泽东飞抵武汉，亲自来为毛泽东的视察做好准备工作。

同一天，原在四川解决两派争端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谢富治、王力等人，也以“中央代表”的身份由重庆飞来武汉。

当时的武汉局势不断恶化。1967年3月以后，林彪多次表示要批“带枪的修正主义路线”，并说，对武汉军区不放心，“拿他们没办法”。江青也说，“要冲一冲武汉军区”。接着，武汉地区一些造反组织掀起了“揪军内武老谭<sup>①</sup>”、“打倒陈再道（武汉军区司令员）”的风潮。在少数坏人挑动下，支持和反对武汉军区的两派群众组织之间发生了多次大规模武斗。

为了掌握“文化大革命”的进程，解决武汉问题，7月15日、16日，毛泽东在武汉两次召集周恩来、汪东兴、杨成武、余立金、谢富治、王力、李作鹏等开会，听取有关武汉、云南、贵州、四川等地问题的汇报，讨论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

在谈到“文化大革命”的进程时，毛泽东再次提出：“文化大革命要在1968年春结束，或者稍迟一点，接着开‘九大’，不能再搞了。”

在听取了谢富治、王力等人有关武汉地区两大派组织状态及谁是谁非的汇报后，毛泽东强调指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在商讨如何处理武汉问题时，毛泽东作了如下指示：

---

<sup>①</sup> “谭”指谭震林，当时认为他是所谓“二月逆流”的代表人物。“武老谭”，意指武汉的谭震林式的人物。

一、要给工人总部平反，放掉朱鸿霞（当年3月，武汉军区认为造反组织工人总部是为反革命分子所操纵，宣布将其解散，并逮捕了其头目朱鸿霞）。

二、“百万雄师”（与工人总部等造反组织相对立的所谓保守组织，为武汉军区所支持）也是群众组织，谢富治、王力要派专人作他们的工作。

三、武汉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陈再道支持造反派，造反派是会拥护陈再道的。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当时在汉的中央领导人多次做陈再道、钟汉华（武汉军区政治委员）的工作，要他们承认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陈再道表示难以接受。

7月18日，周恩来陪同陈再道、钟汉华会见毛泽东。当毛泽东听说陈再道不肯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时，笑着说：“这怕什么呀？现在他们一提就是路线错误，谁都是路线错误。”他还说，工作要作好，慢慢来，不要着急。首先要把部队的工作做好，把“百万雄师”的工作做好，群众组织的工作做好了，思想工作做通了，再来开会协商，解决问题。同时，要谢富治和王力开设一个接待站，专门接待群众组织来访，做思想工作。

毛泽东还对陈再道、钟汉华说：“我要他们做工作，做工作做到不仅打不倒你们，而且拥护你们为止。”

然而，就在毛泽东在武汉提出“文化大革命不能再搞了”，再次作出1968年春结束“文化大革命”这个重大战略部署，并为此同周恩来等人一道努力解决全国瞩目的武汉问题的时候，在汉的谢富治、王力等人，却秉承林彪、江青的旨意，煽动反军乱军，支一派（支持少数派的造反派）压一派（压制多数派的“百万雄师”），有意加剧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火上加油，最终酿成一场重大的政治事件，即武汉“七·二〇”事件。

本来，为了防止武汉局势的进一步恶化，毛泽东、周恩来在

武汉曾当面指示谢富治、王力等人暂时不要公开露面，更不要对群众组织发表倾向性的意见，而要协助武汉军区做好军队和群众组织的工作。

可是，7月18日晚，谢富治、王力二人送周恩来上飞机返回北京后，就急忙从机场直接赶往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造反派总部，并在大会上表示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坚决支持造反派。王力还在会上把造反派封为革命左派，把拥有100多万群众的“百万雄师”定为保守组织，并公开指责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

第二天，造反组织四处公开播放谢富治、王力二人上述讲话录音，从而加剧了两派群众组织的对立情绪，激起了广大“百万雄师”和支持“百万雄师”的军队的极大愤慨。当天，声讨谢富治、王力二人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武汉街头。

第三天，即7月20日凌晨，“百万雄师”的群众和部分驻军冲进谢富治、王力的住处东湖宾馆（当时毛泽东正住在这里，但不为外界所知），强行将王力拉上汽车，扯掉了他的领章、帽徽，并把他带到武汉军区大院围攻、批斗，质问他为什么把“百万雄师”打成保守组织。

接着，“百万雄师”调集200多辆汽车，出动10多万人，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上街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抗议谢富治、王力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讲话。武汉驻军近千人参加了游行，其中军区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几百名军人全副武装，佩戴“百万雄师”袖章，并在汽车上架起机关枪，公开站在“百万雄师”一边。

一时间，“打倒王力！”“打倒谢富治！”的口号响彻武汉三镇，还出现了“毛主席受了蒙蔽”，“打倒张春桥，江青靠边站”的大幅标语。

示威游行从7月20日一直持续到23日。这就是震惊全国的

武汉“七·二〇”事件。

事件爆发的第一天，即20日上午，林彪亲自给毛泽东写信，并让戚本禹修改。戚本禹认为此事至关重要，便找陈伯达、关锋一起修改，最后又签上了江青的名字。信中写道：外面形势不好，毛主席的安全受到威胁，要及早转移……

那么，是谁危及毛泽东的安全呢？信中没有挑明。但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林彪、江青一伙是妄图嫁祸于早已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却又手握武汉军区兵权的陈再道。

这封由林彪、江青签名的神秘信件，立即由邱会作乘坐专机飞往武汉，面呈毛泽东。

20日下午4时半左右，为了安排毛泽东安全离开已经失控的武汉，解救谢富治、王力突围，18日晚才从武汉返回北京的周恩来，亲自率领3架“伊尔—18”飞机从北京紧急起飞，火速赶往武汉。

3架“伊尔—18”飞机成纵队前后跟进飞行。周恩来的座机为前锋，另两架运送全副武装的8341部队（即中央警卫团）官兵的飞机，一架为中路，一架断后。它们一路轰轰隆隆地直“杀”武汉，准备降落在汉口王家墩机场。

这次紧急飞行，除了中央少数领导人知晓外，周恩来曾在行前秘密通知武汉军区不得走漏消息。然而，当周恩来一行飞离武汉100公里处时，就有25辆满载“百万雄师”成员的大汽车开进王家墩机场。不知道是来欢迎，还是要闹事，周恩来只得在空中决定，改降距离汉口60公里的山坡机场。

当飞机一降落，周恩来就命令机组人员：“你们就在飞机下面休息待命，随时准备起飞！”

然后，周恩来用当年进入“蒋统区”的办法：从山坡机场到武汉的短短旅途中，几易车船，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了武昌东湖宾馆花园1号毛泽东的住处。

随后，3架在山坡机场待命的飞机接到了起飞的命令。十几分钟后，它们顺序降落在汉口王家墩机场。空军政委余立金的秘书向机组人员传达了余立金的指示：“原地休息待命！”然而，他们对当时如箭在弦的武汉局势一无所知。

为了保证毛泽东安全，秘密地离开武汉，周恩来对各方面的情况都要亲自调查，反复考虑。比如，该走哪条路，怎么走法，出动几辆汽车，车辆如何编队，哪个司机开车，车速多少，等等，他都认真、周密地安排。毛泽东坐的车，他要先坐一坐；毛泽东的车子要经过的路，他要先走一走。

1967年7月21日凌晨，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坐一辆车子离开武昌东湖宾馆，赶往汉口王家墩机场。直到毛泽东在余立金的陪同下，秘密起飞，安全抵达新的目的地上海虹桥机场后，周恩来才离开武汉。

这是毛泽东自1956年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坐飞机了。原来，1956年，毛泽东乘坐飞机从广州返回北京途中，曾因被雷雨云拦截而被迫改道绕行。事后，根据空军的建议，中央来了个硬性规定，毛泽东主席坐飞机受到限制。这次由于事情紧急，中央才破例安排毛泽东放弃专列，改坐飞机。尽管后来在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的几个月中，为了应付突发事变，中央派一架专机跟随毛泽东由上海赴杭州，又到南昌、长沙、汉口、郑州、济南，但是，毛泽东都不再坐飞机了。

就这样，毛泽东这一次准备畅游长江的愿望没有实现，武汉的问题不仅没解决，还半路上节外生枝，杀出个“程咬金”，挑起了“七·二〇”事件。

事发后，林彪、江青一伙将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宣布陈再道“搞兵变”、“百万雄师”是反革命组织，并公开提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在各地掀起一股“揪军内一小撮”的歪风。毛泽东很快发现并批判了这一口号，视

为“大毒草”，并气愤地提出要“还我长城”，才使得全国反军乱军的歪风平息下去。

但是，很不幸的是，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不能再搞了”、要在1968年春结束的部署，一方面由于他自己没有从指导思想上放弃“左”的错误，另一方面，更是由于一心保持要天下大乱、乱中夺权的林彪、江青一伙的操纵和破坏，而一次又一次地被打乱了。

还在“七·二〇”事件之前，周恩来在武汉同毛泽东谈到聂、徐、陈等几位老师的处境时，毛泽东对他们一一作了肯定地评价。

谈到聂荣臻，毛泽东说：聂荣臻同志，那可是个厚道人。

周恩来又说：“徐向前同志的家被抄了三次了，搞得不能正常生活和工作了。”

毛泽东指示：徐老总过去的事情不能搞了，河西走廊失败，他要饭回到延安。在过草地时，他反对红军打红军。

谈到陈毅，毛泽东赞赏地说：陈毅是个好同志。

不久，陈毅用这句话，向批斗他的小将们做了一次绝妙的反击。

当时北京外交学院的造反派正在批斗担任外交部长的陈毅，从武汉返京的周恩来、杨成武赶到了批斗现场。

陈毅忙问杨成武：“有啥子消息？”

杨成武回答：“有。毛主席说：陈毅是个好同志。”

听罢，陈毅一下子精神振奋许多。突然他向全场高声宣布：“请打开《毛主席语录》271页。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陈毅是个好同志’。”

台下的造反者们一下子炸了锅，冲着陈毅喊叫：“你造谣！”“根本没有这一条！”

陈毅开心地望着娃娃们吵闹，待会场稍为平静一些，他说：“杨成武同志传达，有周恩来同志证明，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陈



毅是个好同志。请同志们跟我一起念这条最高指示！”

周恩来也当场证明：“主席是这样说的。”

“七·二〇”事件发生后的7月22日下午，林彪、江青等人曾组织数万人到北京西郊机场欢迎从武汉归来的谢富治、王力。23日凌晨，中央文革向全国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搞“三军联合行动（即武装游行）来声讨‘七·二〇事件’”。同日凌晨3时，武汉军区收到了中央召武汉军区主要负责人进京开会的电报。24日凌晨3点多钟，陈再道、钟汉华一行飞抵北京后，就受到林彪、叶群指使的三军造反派的冲击。紧接着，林彪、江青等人于7月25日下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了百万群众大会，声讨武汉的“百万雄师”和“七·二〇”事件，叫喊“打倒陈再道！”

此时，毛泽东仍在南方巡视。

一天，杨成武陪同毛泽东在一条安静的林荫道上散步。突然，毛泽东问杨成武：“你认识陈再道吗？”

杨成武回答道：“原先不认识，建国之后才认识的。”

毛泽东又问：“他会反对我吗？”

面对这样一个极其严重的政治问题，杨成武如实地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他对毛泽东说：“军队的老同志都是跟你干革命的，不会反对你的。”

毛泽东也深有同感地说：“是啊，我想，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他要反对我，我们就从武汉出不来了。”看来，毛泽东对此是想前思后、深思熟虑了的。

他往前继续走了一段后，又问杨成武：“陈再道现在哪里？”

“不清楚。”杨成武答道。

“你去问总理。你告诉陈再道三句话：一是有错误就检讨。二是注意休息。三是注意安全。”显然，毛泽东的态度很明确，是要保陈再道，而不是像林彪、江青、谢富治、王力等人那样要置陈再道于死地。

毛泽东接着交待杨成武：“你报告总理，由总理定吧。”

不一会儿，毛泽东又指示杨成武：“你报告总理，把陈再道、钟汉华、还有那个师长政委<sup>①</sup>都接到京西宾馆去。”

杨成武很快将毛泽东的指示报告了周恩来，陈再道他们才被保护起来。

不久，毛泽东在审阅中央就“七·二〇”事件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时，在陈再道的名字后面加上了“同志”二字，并作了如下批语：

“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

十几年后，陈再道老将军在谈到毛泽东的这段批语时，十分感激地写道：“毛主席称我为同志，使我深受感动，当时如果没有这两个字，林彪要整死我们是很容易的事情。”

#### 四、“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

自从1970年8、9月间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挫败林彪通过“设国家主席”来“和平过渡”抢班夺权的阴谋，并揭出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陈伯达以后，林彪一伙继续在暗地里更加紧策划抢班夺权的罪恶活动。正当他们紧锣密鼓地准备武装政变之际，毛泽东警觉到可能出现的危险。

于是，1971年8月14日，已是78岁高龄的毛泽东，出人意料地离开北京，冒着炎夏酷暑，风尘仆仆地到南方许多省市作了一次相当神秘的巡视。为了使党的高级干部对彻底解决林彪问题

<sup>①</sup> 指武汉军区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

有所准备，毛泽东沿途同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浙江、江苏、上海、北京等省市党政军负责人进行了多次谈话，着重就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向他们“打招呼”。

8月16日，毛泽东乘坐火车抵达武汉。在这里，毛泽东曾经多次“中流击水”，“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这次，他老人家虽然已经是78岁高龄了，但仍以“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大无畏的伟大气魄，准备应付任何可能出现的不利情况。

毛泽东在武汉停留了10天，先后同湖北、河南等地的党政军负责人进行了5次谈话。毛泽东的谈话不慌不忙，但字斟句酌，极有锋芒，他着重谈了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在上年庐山会议上的不良表现，说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5个常委瞒着3个<sup>①</sup>，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斗争的起因在于“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

毛泽东还直接点名批评了自称是“毛主席的最亲密战友”的林彪，说：“林彪同志那个讲话<sup>②</sup>，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针对林彪所说的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出一个天才的观点，毛泽东指出：“这种说法，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外国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中国从陈胜、吴广到洪秀全等一大批群众领袖，怎么能讲几百年、几千年出一个呢？”他又说：“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几个人，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

<sup>①</sup> 指毛泽东、周恩来、康生。另2名常委是林彪、陈伯达。

<sup>②</sup> 指1970年8月23日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以颂扬毛泽东为幌子，大肆鼓吹“天才论”的讲话。

慧。”

毛泽东认为，“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但是，“庐山这一次斗争，同前9次<sup>①</sup>不同。前9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他应当作检讨，我已经向政治局建议”。这时的毛泽东并没有最后摒弃林彪，表示“对林还是要保”，“回北京以后，还是要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不过，毛泽东又认为林彪有两难，一是分裂党难，二是回头难。他说：“犯了路线错误，有的可能改过来，有的可能改不过来，要看实践。”而“犯了大的原则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

庐山斗争以后，他说：“虽然在北京开了工作会议，几个大将作了检讨，但吞吞吐吐”，“林彪不开口，这些人是不会开口的”。因此，他提醒来汉的党政军负责人：“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陈伯达后面还有人”。暗示党内将有新的更大的斗争。

毛泽东明确地说：“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我们唱了50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了10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10次、20次、30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

对于林彪一伙企图武装政变的阴谋活动，毛泽东是有所察觉的，但他并不害怕。他在武汉很自信地说：“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当时不在武汉——作者注）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

同时，毛泽东还没指名地点了林彪的儿子林立果，批评说：

---

<sup>①</sup> 毛泽东认为中共历史上有过10次大的路线斗争，前9次的代表人物分别是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刘少奇，第10次是林彪。

“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有什么好处？”……

对于以上谈话内容，毛泽东作了特别交待：大家都先不要传达，要保密。这使被排斥在接见之外的林彪、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由于探不到毛泽东南巡武汉的谈话内容而心急如焚。他们想方设法了解毛泽东的动向和谈话，研究对策。8月26日，林立果的“联合舰队”召开会议，把当时的形势估计为可能“由明争转入暗斗”，暂时出现“相持、相对和平友好、酝酿新‘战争’”等几种情况，不过，“‘战争’的突然性很强，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也一样”，必须在“思想、组织、行动上加强‘战备’”。

第二天，即8月27日下午2时半，毛泽东要乘坐火车离开武汉。在列车车厢里，毛泽东刚一坐下就让列车服务员唱《国际歌》，他也跟着唱了起来。在武汉期间，他曾多次带头唱起《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当列车服务员唱完一段，毛泽东就讲解一段，还讲解了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的文章。毛泽东说：“《国际歌》和列宁的文章，包括着马克思主义的全部观点和立场。那里面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在庐山会议，我写了一个700字的材料<sup>①</sup>，就提出是奴隶创造世界还是英雄创造世界这个问题。”

接着，毛泽东又和大家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条要记清’，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

的确，当时就有人违反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的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破坏毛泽东关于暂时不要外传这次南巡讲话内容的纪律。9月5日深夜，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通过“联合舰队”成员周宇驰、于新野，将毛泽东的讲话密报林立果、叶

---

<sup>①</sup> 指1970年8月31日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写的《我的一点意见》。

群。

9月6日凌晨，武汉军区政治委员刘丰来到武汉东湖宾馆一间豪华的套间，将毛泽东在武汉谈话的内容密报给陪同外国军事代表团来汉访问的李作鹏。

李作鹏听完后面无人色，敏感地意识到：庐山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还没有完，而且这次上纲比以前更高，矛头又是直接对着林彪的。于是，他乘坐当天的飞机赶回北京，将这机密、紧急的“军情”分别面告黄永胜、邱会作。黄永胜又立即报告在北戴河的叶群。

林彪、叶群、林立果接到上述密报后，惊恐万状，预感到他们的阴谋即将暴露，于是决定“破釜沉舟”，实施谋杀毛泽东主席的罪恶计划。但是，“玩火者自焚”。毛泽东早已洞察其奸，一次又一次神机妙算地粉碎了林彪一伙的暗杀计划，并提前于9月12日黄昏安全抵达北京火车站。

应该指出，一方面，毛泽东在林彪叛逃前的神秘南巡，无疑是前所未有地刺痛了林彪一伙反党集团的神经，迫使他们更加快了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步伐，不得不提前实施谋杀毛泽东的罪恶计划，公开成为亿万人民的敌人；另一方面，毛泽东的这次重要的南巡，对防止党内高级领导干部因不明底细而盲目地跟着林彪走，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为顺利处理“九·一三”事件，成功地粉碎林彪的反革命武装政变，以及最后彻底地解决林彪一伙反党集团的问题，做了必要的思想上、政治上的重要准备。

## 五、最后的风尘

1974年7月18日武昌东湖梅岭一号，一个头发花白、身材伟岸的老人步入静谧、雅致的庭院。对这里的一切，他无不感到那么

熟悉、那么亲切、那么难忘，普通的平房、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幽静的氛围引起他无限遐思。“大跃进”的热潮，国民经济调整任务的胜利完成，“文化大革命”的风风雨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重要时期，他都曾来到过这里。这位老人正是年逾八旬的毛泽东。这是一次秘密的南方之行，也是毛泽东在湖北度过的最后一段时光，还是他建国后在湖北武汉停留时间最长的一段日子。

在环境幽雅、绿树环抱的住所里，毛泽东时时陷入沉思之中。“九·一三”事件对他的震撼及其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他为此感到极大的痛苦和失望，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自1971年冬身患重病以后，他的病情时轻时重，而且是较严重的老年性疾病，如“大叶性肺炎”等，1972年1月他突然休克过一次，1974年春天又开始出现老年性白内障。精神上的痛苦也是巨大的。林彪事件促使更多的人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重新思考，进而采取怀疑、观望、甚至抵制、反对的态度，一场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正在酝酿和形成之中，这种情形令他忧虑不已，他苦苦思索着如何才能对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言行加以限制和防范。与此同时，毛泽东对于一些具体的错误也曾予以了制止和纠正，保护过一些中共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如对邓小平委以重任和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平反等，他还批准了中共中央为受林彪诬陷致死的贺龙恢复名誉的决定。就在他居住武汉期间，中央于9月29日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文件上写明：“毛泽东已经圈阅。”尽管他一方面还在继续信任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但又察觉他们利用批林批孔运动进行篡权活动，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临到武汉的前一天（即7月17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告诫江青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还说：“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

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王、张、江、姚“四人帮”的问题……。旧的问题还在思索、解决之中，新的情况又层出不穷，在与病魔的抗争和对国家的深切关注与思索中，毛泽东在湖北度过了86个看似风平浪静、实乃暗流汹涌的日日夜夜。

在这段日子里，毛泽东基本上是处理全国党、政、军要务，决定党和国家的大事，因而全国和全世界的各种信息源源不断地汇集到东湖之滨来：国务院科教组等决定在学校实行开门办学，我国国产万吨轮“风庆”轮首次远航欧洲胜利归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25周年的活动，筹备四届人大以及国家机构人事安排酝酿的情况，中国与巴西、马来西亚、特立尼达、多巴哥、委内瑞拉、尼日尔、冈比亚等国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日理万机，其中最重要的也是对后来的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有两件事，一是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二是要求全国“安定团结”。

“九·一三”事件以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但由于过度操劳，他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1974年6月1日住进了医院。周恩来病重，可以从他后来写给毛泽东的信中得到证实。同年11月初，他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我的身体比7月17日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12月能开人大，定能吃得消。”即是说直到毛泽东抵达武汉的前一天，周恩来的健康是令毛泽东担忧的。鉴于周恩来的身体状况及其他诸种因素，毛泽东于1974年10月4日在武汉亲自提议由邓小平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实际上主持国务院工作。对于邓小平的“复出”，毛泽东早有所考虑和安排，还在1973年底，毛泽东就提议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翌年3月，毛泽东提议让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派谁去时，江青坚持不同意邓小平去，27日毛泽东致信江青说：“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



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4月4日，他又在邓小平的联合国大会发言稿上亲自批示：“好，赞同。”此后，邓小平参加了一系列重大外事活动，仅毛泽东在武汉期间，他就于9月4日、19日先后陪同多哥共和国总统和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总统等外宾，接受毛泽东的会见。显然，毛泽东在武汉正式提出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建议并非偶然，无怪乎，他会说对周恩来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此语或许正道出他在危难之际对邓小平委以重任之关键所在。

10月，四届人大筹备工作正在加紧进行，江青等人篡权“组阁”也正在紧锣密鼓之中。10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了由姚文元一手策划、修改、定稿的文章——《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影射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是钻进中共党内的赵高、刘濞（文章中将赵高等说成是披着法家外衣钻进秦王朝心脏的奴隶主复辟势力的代表人物），将“四人帮”自命为“法家”，为江青等人“组阁”制造舆论。毛泽东不理江青的那一套，4日提出了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的建议，江青等极为不满，遂借国产万吨轮“风庆”号事件<sup>①</sup>大做文章，于12日在《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头版发表评论员文章，以“风庆”轮远航为题，含沙射影周恩来和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同一天，毛泽东离开湖北去长沙。

对于“四人帮”篡权“组阁”活动，毛泽东始终给予了严厉

① “风庆”轮事件是指：“风庆”轮开船后，某些人要该轮政委李国堂、政治干事顾广文批判所谓造船不如买船问题上的“崇洋媚外”、“卖国主义”，但遭到两人的抵制，他们指出，一些在这个问题上的谬论，矛头是直接指向周恩来和国务院其他领导的。李、顾原来分别担任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组织处副处长、宣传干事，是奉交通部委派到“风庆”轮上协助首次远航欧洲工作的。于是“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亲信诬陷李、顾是“假洋鬼子”、“代表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将其定为“反革命事件”。江青等强迫邓小平对此事表态，邓小平进行了坚决斗争。

的批评，迫使他们“组阁”的妄想化为泡影。1975年，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立即着手对各方面工作进行全面整顿，很快扭转了局势。这一成绩的取得，正是以毛泽东10月4日的提议为前提条件的。

在汉期间，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了安定团结的问题。尽管这一时期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是他批准的，但他也不希望再度出现动乱局势。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这个意见于10月11日由中共中央在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的《通知》中作了转发。“以安定团结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是符合全国人民意愿的，它为1975年邓小平着手进行全面整顿工作提供了一定的有利条件。

然而，毛泽东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加之听信了“四人帮”的诬告，乃于1975年11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从此，全国再度陷入混乱，他终未能将一年前在武汉提出的“安定团结”的设想变为现实。

毛泽东十分喜爱武汉，常将重大的外事活动安排在武汉进行，每次到武汉，几乎都要会见外国客人，此次武汉之行也不例外，仅9月份，就接见了多哥共和国总统纳章贝·埃亚德马将军和夫人及其随同来访的7位政府部长，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联邦军政府首脑、武装部队总司令雅库布·戈翁将军和夫人及其随同访华的军政官员，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总统莫克塔·乌尔德·达达赫和夫人及其随行的政府官员，菲律宾共和国总统马科斯的特别代表、马科斯总统夫人伊梅尔达·罗穆亚尔德斯·马科斯以及马科斯总统的儿子小费迪南德·马科斯等等外国领导人，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从1973年开始，毛泽东逐渐形成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认为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美、苏以外的西方发达国家和东欧（如欧洲、日本、加拿大）是第二世界，是中间

派；亚、非、拉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要坚决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战争威胁”。由此，他把建立和发展同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关系视为我国外交事务的一个重要方面。毛泽东在武汉频繁的外交活动，无不体现出当时中国外交的这一特点。

毛泽东此次南巡，除视察外，还有一目的，那就是到外面走走，呼吸一下大自然的新鲜空气，让疲惫的身心得以调整和休养。工作之余，他时而到庭院散散步，时而徜徉于东湖之滨，更喜欢的恐怕还是和他的书在一起了。每次到湖北他都要带十几箱书。记得1969年5月的那次武汉之行，他从北京带了马列的著作、鲁迅的著作、哲学和经济学著作、唐诗宋词、名人字画、中外地图、武英殿本二十四史等400余册书，来汉后，不顾“火炉”炎热，只要有空闲时间，便手不释卷。他在梅岭一号卧室里的床和中南海住处的一样，特别大，除了留下能躺一个人的位置，其余大部分全放的是书，此外，在会客室、办公桌上、吃饭桌旁到处都摆满了书。毛泽东把大量的休息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书的世界、知识的海洋里，“人的知识面要宽些”是他常说的一句话，哪怕是在病中，也不松懈。此时，他身体有疾，精力已大不如前，尤其是老年性白内障使他视力减退，阅读困难，加之7、8月的武汉，时逢盛夏，酷热难忍，人闲坐着也会出汗，可毛泽东还是那么聚精会神，孜孜不倦。这种刻苦读书的精神，给在他身边工作的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10月12日，毛泽东结束了湖北之行，拟回到湖南继续视察。100多天以后，大约是1975年1月底2月初，他又告别了三湘，乘上北去的列车，最后一次穿行于荆楚大地，依依不舍地永远诀别了这块他曾经战斗过、生活过、工作过、留下过创痛、也有过欢笑、更有过成功的热土——湖北。

两年以后的1976年9月9日，毛泽东，这位在中国乃至世界

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巨人与世长辞了。噩耗传来，举国悲痛，长江呜咽，荆楚悲歌……。十几个春秋过去了，我们可告慰英灵的是：“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早已实现，“高峡”也即将“出平湖”，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业已形成，……，毛泽东生前的宿愿在一个一个变为现实。我们坚信，一个独立、民主、文明、富强的社会主义中国一定会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 毛泽东在湖北活动日志



## 毛泽东在湖北活动日志

### 1918年

9月初 毛泽东与20多名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从湘江经洞庭湖抵岳阳，再从城陵矶顺流东下，在汉口登岸。稍事停留后，在汉口大智门车站换乘火车去北京。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到武汉。

### 1919年

12月上旬毛泽东率驱张代表团赴京途中抵武汉，住在武昌横街头。12月8日，他们在汉口一家旅馆聚会，商讨了驱张斗争的策略。毛泽东在武汉起草了湖南人民《驱张宣言》，历数张敬尧的种种罪行，表达了湖南人民与军阀张敬尧斗争的意志和决心，向汉口、北京、上海各地报馆散发。毛泽东还与代表团成员在明德大学等大中学校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讲演。并与武昌中华大学、长沙旅鄂中学的学生一道，在武昌鲇鱼套车站查获和销毁了张敬尧托军阀张宗昌准备运往湖南的20多包鸦片种子。消息在报上披露后，张敬尧的名声更臭。

毛泽东在汉期间，与武汉进步青年恽代英等见了面，探讨了救国救民的问题，和武汉的进步青年团体建立了初步的联系。

## 1920年

7月初 在上海得悉张敬尧下台后，毛泽东即从上海经武汉回湖南。在汉期间，与恽代英和武汉利群书社成员多次接触。他认为武汉的“利群书社”、利群织布厂办得不错，和武汉的朋友们商讨了在长沙开办“文化书社”及织布厂等问题。

## 1921年

7月初 毛泽东从长沙起程，经水路抵达武汉，然后转赴上海，出席即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 1922年

2月 为黄爱、庞人铨被害事，毛泽东赴上海组织反对湖南省长赵恒惕的运动，途经武汉，住武昌黄土坡26号中共武汉区委机关里。在汉逗留期间，与中共武汉区委领导人包惠僧、陈潭秋等磋商了组织与发动工人运动等问题。

## 1925年

1月 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四大”后，毛泽东因病回湖南，途经武汉。由汉口上岸，再坐轮渡过江，到武昌乘火车回长沙。



## 1926年

11月下旬 在当选为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后，毛泽东由上海来到北伐军攻占后已成为全国革命中心的武汉，着手“在汉口设农委办事处，就便指导湘、鄂、豫、赣、川农运工作”，并“在武昌开办农运讲习所”。

12月中旬 毛泽东参加了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特别会议，“在会上主张土地革命，并支持湖南区委关于实行土地革命的建议”。

17日 应湖南农民协会的邀请，毛泽东离汉赴长沙，参加湖南农民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并调查和指导湖南农民运动。

## 1927年

2月12日 毛泽东结束了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调查和指导，由长沙回到武汉，住在武昌都府堤41号。

16日 毛泽东将在湖南考察情况写成《视察湖南农民运动给中央的报告》，指出：“农民问题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的问题有两个，即资本问题与土地问题”，“现在是群众向左，我们党在许多地方都是表示不与群众的革命情绪相称。”

毛泽东在农讲所考试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主张扩大农讲所招生范围，添招皖、苏、川、豫、直、陕等省学生。

18日 毛泽东出席了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主持的农民问题讨论会，被选为农民问题讨论会常务委员，并答应在下次会上作《中国农民运动状况》的报告。

23日 毛泽东在农民问题讨论会第二次常委会上作了《中国各地农民运动状况》的报告。

下旬 毛泽东在武昌都府堤 41 号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在江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即将召开时，国民党右派把持的江西省党部农民部企图采取圈定省农协委员办法来进行破坏。方志敏为此请示中共中央农委，“农委书记毛泽东指示：须坚决反对，宁可使农协大会开不成功，不可屈服于圈定办法”，方志敏据此指示与国民党右派斗争，终于挫败了他们的阴谋，使大会如期召开。

3月2日 毛泽东在农民问题讨论会第三次常委会上主张加强农民教育，团结、帮助红枪会会员，吸收红枪会内革命分子进入农讲所学习，他被讨论会选为“红枪会调查委员会”主席委员。

4日 湖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武昌阅马场召开，毛泽东应邀参加了大会，并被大会聘为名誉主席之一。

7日 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倡议和筹建的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扩大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即日开始上课，毛泽东亲自讲授《农民问题》、《农村教育》等主要课程。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预备会在汉口南洋大楼召开。毛泽东在会上提名恽代英为全会提案委员，并建议在“大会期间，政治会议停止开会，如有重大事故发生，应付与主席团全权处理”。这个提案得到与会人员多数通过，形成决议，从而限制了作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的权力。全会预备会还指定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负责起草提交全会讨论的《对农民宣言》和《土地问题案》。

10日至17日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南洋大楼召开，毛泽东以国民党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的身份出席了这次会议。

12日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经过对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提交给大会讨论的《对农民宣言》和《土地问题案》的讨论，由全会主席团指定恽代英、邓演达、吴玉章、詹大悲、毛泽东等对

《对农民宣言》进行修正，对由《土地问题案》扩大而成的《农民问题案》进行审查。

15日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发言支持公布董必武代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提请大会批准公布的《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条例》，主张“以革命手段处置”土豪劣绅。

二届三中全会决定由吴玉章、邓演达、毛泽东三人组成国民党中央处理阳新惨案委员会，会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湖北省农协全权调查处理湖北阳新土豪劣绅残杀9名农运干部的事。

16日 二届三中全会通过邓演达、毛泽东审定、修改过的国民党中央《对全国农民宣言》和《关于农民问题决议案》。

17日 毛泽东在二届三中全会上提议取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中的同志会、同学会等组织，得到全会通过。这样，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中以“黄埔同学会”等名义为蒋介石张目的右派组织便被视为非法，被明文禁止了。

18日 河南全省武装农民代表大会在农讲所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湖南农民运动状况》的报告，号召全国人民“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

晚上，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联合举行“欢迎鄂豫两省农民代表”的集会，毛泽东主持会议，并在会上讲了话。

26日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800多学员走上街头游行示威，要求严惩制造阳新惨案和枪杀陈赞贤的凶手。下午，在农讲所大操场上举行了“追悼阳新、赣州死难烈士”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号召大家下定决心，同反动势力作针锋相对的斗争。晚上，毛泽东又出席观看了农讲所学员举办的声援阳新、赣州人民的文艺晚会。

27日 邓演达、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筹建全国农协问题。

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第191期在汉出版，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第一章和第二章的第一、二节在这期刊出。

28日 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和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负责人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和湖南农协执委易礼容、周以栗、湖北农协执委陆沉、江西农协执委方志敏以及河南武装农民大会执委陈子林等，在武昌大朝街59号开会，决定由湘、鄂、赣、豫四省农协发起组织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

30日 湘、鄂、赣、粤四省农协代表及河南武装农民代表在武昌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组织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以邓演达、毛泽东等13人为临时执委会委员，“邓演达、谭延闿、陆沉、毛泽东、谭平山5人为常务委员”，邓演达兼宣传部长、毛泽东兼组织部长、彭湃兼秘书长。农协办公地点在武昌抚院街，毛泽东主持日常工作。

4月1日 毛泽东领导农讲所进行清查活动，拘留了20多名孙文主义学会、西山会议派分子，打击了国民党右派潜伏在农讲所的势力。

2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土地委员会，以徐谦、顾孟余、谭平山、邓演达、毛泽东等5人为委员，定期研究土地问题。土地委员会前后召开了3次委员会会议，6次扩大会议，4次专门审查委员会会议。

4日 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武昌北城角校址隆重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与邓演达、陈克文3人为讲习所的常务委员，毛泽东主持这个“中国农民革命的大本营”的日常工作。

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到汉后，从4月4日起到20日止，连续召开国际代表、中央委员、湖北区委联席会议，讨论中共“五大”的筹备工作。毛泽东参加了其中的几次会议，并与瞿秋白被推为为大会准备有关土地问题委员会的负责人。

9日 以邓演达、毛泽东、彭湃为首的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在武昌向全国发出就职通电。广大农民将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视为“全国农民的总炮台”。

中旬 中共中央创办的“长江书店”出版了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单行本，书名《湖南农民革命》。瞿秋白在为该书写的序言中说：“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革命者个个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12日 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召开第二次委员会，邓演达任会议主席，毛泽东任记录。毛泽东主张农民不纳租，支持农民“自动的夺取政权”。由于邓演达、毛泽东与顾孟余的观点分歧较大，鉴于土地问题的复杂和重要，会议决定召开除中央土地委员会委员外，还吸收各中央委员、各省区党部的负责同志、各省区农民运动的负责同志和军事负责同志参加的土地委员会扩大会议。

19日 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举行第一次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主张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认为只有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革命才有一支生力军，财政问题及兵士问题也才能解决。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谭平山、顾孟余3人负责起草《解决土地问题之意义》决议案。

20日 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举行第二次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强调：“没收土地问题为解决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负责起草这方面的文件。

22日 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举行第三次扩大会议，毛泽东对他和邓演达等起草的《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作了说明，主张先进行“政治没收，如土豪劣绅军阀等等的土地”，“进一步再论凡自己不耕种而出租于他人的田皆行没收，此为经济的。”

毛泽东与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吴玉章、董必武等39人

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中央候补执监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名义，联名发出《讨蒋通电》，痛斥蒋介石为“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蠹贼”。

24日 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举行第四次扩大会议，毛泽东建议：革命军人复员后，应由政府给以土地，同时建议定出保障佃农的办法。

24日至30日 毛泽东领导的全国农协发起并联合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湖北省农协、学生联合会、报界联合会等单位，开展了“中央农民运动宣传周”活动。全国农协并在《讨蒋通电》上指出：“此贼不除，革命民众无幸存之理，国民革命亦无成功之望。”

26日 在国民党中央土地审查委员会上，毛泽东对佃农缴纳租额、包佃制应改名为包田制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举行第五次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建议：第二期北伐期间，应积极发动北方的农运，取得北方农民的同情，早日成立直、鲁、豫农协。

27日至5月9日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高师附小举行，毛泽东参加了大会，并任大会土地委员会秘书。大会期间，毛泽东提出了加强农民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政权，大力发展农民武装的书面意见。毛泽东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29日 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联合组织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毛泽东担任常委。他将农讲所100余名学员组成战区宣传队，鼓励他们到河南战区去宣传和组织农民。

下旬 登武昌蛇山，游黄鹤楼旧址和奥略楼、警钟楼后，毛泽东作《菩萨蛮·黄鹤楼》词一首。

5月5日 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和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欢送战区农运委员及农讲所学员赴河南前线，参加第二期北伐。毛泽东

代表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前往送行，并勉励他们努力工作。

9日 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邓演达、毛泽东等5委员署名，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呈送报告，并附上土地委员会前后通过的《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处分逆产条例》、《保护佃农法》。

中旬 根据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决定，毛泽东调农讲所学员300人赴麻城平息土豪劣绅和会匪的叛乱。学生军于5月17日到达麻城，协助当地的农民武装，镇压了叛乱。

17日 夏斗寅叛军逼近武昌，毛泽东将农讲所400余名武装学员编入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师生为主体的中央独立师，被编为第二团第三营，配合叶挺领导的部队抗击叛军。

31日 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和湖北省农民协会在汉口普海春酒楼欢宴出席在汉口召开的太平洋劳动会议代表。毛泽东代表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主持宴会，并在欢迎词上说：“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中国农民运动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与世界工人阶级携手前进，同国际帝国主义“作殊死战”。

6月1日 因形势变化，毛泽东领导的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发出通知：原定从5月15日延期到7月1日举行的全国农民代表大会，再行延期，到10月10日举行。

3日 毛泽东领导的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电请武汉国民政府武力解决长沙许克祥的叛变，保护革命，保护工农运动。

7日 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致函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求及时颁布乡村自治条例，立即建立农民政权，以巩固农民运动，有力反抗反革命的进攻。

13日 毛泽东、谭平山、邓演达等5人，以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的名义，发出《全国农协最近之训令》第4号，历数湘、鄂、赣三省土豪劣绅、反动势力进行反革命倒算的罪行，严正要求武汉国民政府保护工农组织，惩办一切屠杀工农、扰乱后方的反动派。

毛泽东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会议，与汪精卫、程潜、唐生智、谭延闿讨论处理“马日事变”的办法。会议决定不用武力，而训令唐生智回湖南去按“中央训令及决议案办理”。

18日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提前毕业，毛泽东等向全体学员颁发刻有“农民革命”四字的铜质证章，勉励学员到农村去开展革命，继续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

2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31次会议，决定组织新的湖南省委，由毛泽东、夏明翰等17人任委员，毛泽东兼湖南临时省委书记。在此以前，陈独秀曾确定让毛泽东去四川，罗章龙去北京，二人商议后联袂要求回湖南组织暴动，以击退反动势力的进攻。中央接受了他们的意见，于是才有这个决定。

下旬 毛泽东在汉口日租界一旅社召集湖南来汉请愿或避难的同志开会，动员大家返回原来岗位，恢复工作，拿起武器，“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武装保卫革命”。

随后，毛泽东回到湖南，“组织暴动反对当时在武汉当权的唐生智”的活动，陈独秀认为他的行动妨碍国共合作，不到10天，便令他立即返回武汉。

7月4日 回汉后的毛泽东参加了中共中央常委第34次扩大会议，在会上力主保存农民自卫武装的武力，必要时可以考虑“上山”，因为“上山可以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而若“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

毛泽东连日在家中与蔡和森谈及武汉局势和唐生智问题，认为武汉形势危急，共产党如静候人家来处置，无异于“鱼游釜底”，建议中央和军委即刻“检查自己的势力，作一军事计划，以防万一”。

下旬 根据汪精卫“七·一五”分共以后的形势，毛泽东着手在汉起草准备在湖南开展工农武装斗争的“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



8月1日 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批准了毛泽东起草的大纲，并寄发给湖南省委。

3日 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任命毛泽东为中共湘南特委书记，并让他起草《湘南暴动大纲》。

7日 中共中央在汉口三教街41号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作为中央候补委员参加了这次会议。毛泽东就革命领导权、农民问题、土地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发表了意见，特别强调新成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更应重视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毛泽东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9日 毛泽东出席了瞿秋白主持召开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在会上反对了要湖南组织军队尾随南昌起义军去广东的主张，建议在湘南建立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一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瞿秋白建议毛泽东去上海中央工作，毛泽东回答：“我要跟绿林交朋友，我定上山下湖，在山湖中跟绿林交朋友。”

12日 中共临时中央局任命毛泽东为中央特派员，同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一起去湖南，领导全省的秋收起义。当天，毛泽东由武昌乘货车连夜奔长沙。

## 1953年

2月16日 这一天是大年初三，晚上11时45分，毛泽东乘火车到达汉口大智门车站。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第一次来武汉视察，住在中南局16号招待所（今汉口惠济饭店）。

17日 上午10时，毛泽东乘船沿汉水上驶，到舵落口后才回航，沿途巡看汉江两岸，边看边问。船到汉阳高公街附近靠岸，毛泽东登岸巡视了他过去从未到过的汉阳。

晚上，毛泽东与中南局、湖北省委、武汉市委的领导共进晚

餐，席间和饭后询问了武汉工业、手工业和公私合营情况，并就“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私营工商业、团结民主人士等问题作了指示。

18日 毛泽东从汉口一早就过武昌听取了湖北省委的工作汇报，接着游了东湖和珞珈山。

下午三时，毛泽东徒步登上蛇山，参观了张公祠和奥略楼，被几个小学生认出，成千上万的群众顿时涌了上来。接着，毛泽东又乘轮到汉阳，游览了龟山。

晚上，毛泽东听取武汉市分管工业的负责人和武昌区委书记汇报武汉手工业生产情况。同时询问了武汉码头改革的情况。

19日 毛泽东请来汉口交易街街长陈光中，向他了解城市居民生活、街道组织和工作情况，指示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上午10时左右，毛泽东约见中南局、湖北省委、武汉市委领导，谈了关于社会主义改造、民族形式、反对官僚主义作风等问题。他说：“我爱进步的中国，不爱落后的中国。”

上午11时半，毛泽东在汉口四码头登上海军227舰（即“长江舰”）离汉。他在舰上检阅了海军指战员，并亲笔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

毛泽东在乘轮东下时，听取了随行的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关于长江水利建设包括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问题的汇报，听取了长江航务局局长兼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刘惠农关于长江航运和民生轮船公司公私合营情况的汇报。

毛泽东在听取了随行的黄石市委书记杨殿奎汇报大冶钢厂情况后，决定在黄石停船。夜晚7时左右驱车视察了大冶钢厂的轧钢和炼钢车间，并登上高炉台，全面观察了炼铁厂生产的全过程。毛泽东指示大冶钢厂一定要“办大办好”。

## 1954年

12月中旬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从南方视察归来，途经武汉。在听取了省市领导人汇报工作后，从汉口车站登上一辆专列北上。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应召随车汇报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问题。毛泽东特别询问了三峡工程的地质情况及坝址。车过广水站，已是深夜11点钟，毛泽东又询问了林一山许多问题。

## 1955年

4月8日 毛泽东来汉视察工作，听取武汉市领导人关于工作的汇报，指示要把武汉“建设好，管理好”。

在汉期间，毛泽东与周恩来率领的中国政府赴印尼参加“万隆会议”的代表团商讨了有关事宜。

12月23日 毛泽东乘专列来湖北视察工作，在中南局招待所接见了省市委书记、市长和几个地委书记，听取了关于企业合作化情况的汇报。然后乘轮渡江，在武昌南站乘专列离汉。

## 1956年

5月30日 毛泽东在巡视大江南北后从长沙乘车来汉。

31日 毛泽东乘“武康”号轮船视察正在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在轮船甲板上听取了大桥工程局负责人关于大桥工程建设情况的汇报。然后乘轮船在武昌岸边大桥8号墩附近下水，一直游到汉口湛家矶，历时2小时零4分，游程26华里。这是他第一次畅游并横渡长江。

晚上8时，毛泽东到武汉歌舞剧院小礼堂观看武歌的文艺演出。

6月1日 毛泽东视察了座落在汉水、龟山之间新建的武汉第一棉纺织厂。

2日 毛泽东再次视察了长江大桥建设工程后，提出要游过正在施工的大桥水域和水流迥异、漩涡密集的龙王庙江面。他从汉阳鹦鹉洲尾江面下水，穿过大桥2、3号桥墩和长江、汉水汇合处的龙王庙水域，一直游到武昌八大家附近，游程28华里，历时2小时40分。这是他第二次畅游并横渡长江。

3日 毛泽东听取了武汉重型机床厂负责人关于武重建设和生产情况的汇报，然后驱车在去武昌东湖的路上，下车眺望正在建设的武重工地。

移驻东湖后，毛泽东游兴未尽，不游东湖，而要再游长江。下午，他驱车到武昌造船厂，然后在造船厂附近的平湖面下水，穿过大桥7、8号桥墩，顺江下游，到武昌任家路附近才上船，游程25华里，历时1小时。

当晚，毛泽东在东湖客舍接见了武汉钢铁公司总经理李一清、副总经理韩宁夫，听取了他们关于武钢建设情况的汇报。

4日 毛泽东召集省市负责人座谈农业合作化经验。

5日 毛泽东与湖北省委负责人研究湖北农业生产发展规划。毛泽东写成《水调歌头·游泳》。

## 1957年

9月5日 毛泽东乘轮渡15号轮在大桥5号桥墩处下水，顺流游到汉口四维路附近。游程15华里，历时36分钟。

9月6日 毛泽东到武昌新河洲头视察武汉第四棉纺织厂（原裕华纱厂）。

傍晚，毛泽东视察即将竣工的武汉长江大桥，从汉阳桥头步行走到武昌桥头。

## 1958年

3月30日 毛泽东在主持讨论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报告后，在重庆登上“江峡轮”，亲临考察长江三峡，于4月1日抵达武汉。

4月1日至9日 毛泽东在武汉主持召开了有上海、浙江、安徽、广西、河南、福建、山东、湖南、江西、江苏、湖北等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听取了一些省的汇报并作指示。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等14人。

2日 毛泽东在武昌东湖会见波兰部长会议副主席雅罗谢维奇和他率领的波兰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

3日 毛泽东到汉口老通城酒楼品尝了那里的特色小吃——三鲜豆皮。

5日 毛泽东在汉会见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席基伏·斯托依卡及其率领的政府代表团和也门共和国巴法尔王子率领的政府代表团。

6日 毛泽东到武汉体育馆会见了正在那里举行誓师大会的武汉5000多名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工作者。

上旬 毛泽东在武昌东湖接见了苏联驻我国大使尤金。

上旬 毛泽东再次观看了武汉歌舞剧院的文艺演出。

上旬 毛泽东在武昌东湖风景区听涛酒家品尝武昌鱼。

11日 毛泽东到武昌东湖畔参观武汉市地方工业品展览。次日离汉。

9月10日 毛泽东在参加了北戴河会议后开始巡视大江南

北，11时40分到达武汉，住在武昌东湖宾馆甲所。午饭后即兴勃勃地到长江游泳，在滚滚波涛中游了好几里。

下午，毛泽东在寓所接见武钢党委书记兼总经理李一清和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了解武钢一号高炉等建设情况和长江三峡工程建设问题。

11日 毛泽东到武昌积玉桥南面的武汉第一纱厂（后名武汉第六棉纺织厂）视察，特别参观了该厂兴建的小高炉。

下午，毛泽东又到长江游了37分钟，游程约20华里。

12日 毛泽东接见了参加武汉部队党代表会议的400多名代表。

中午，毛泽东再次到老通城品尝那里的豆皮。

下午，毛泽东站在“航川”轮甲板上向群聚在鲇鱼套口码头、趸船、堤岸、塔吊旁欢呼的武昌造船厂职工致意，高呼“人民万岁”。然后乘船到大桥下的江心下水，在长江里游了30分钟。

晚上7时20分，毛泽东到达武汉大学，先参观校办工厂，接着在武大大操场会见了武汉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武汉测绘学院、中南民族学院的13000多名师生员工。

13日 毛泽东在武昌东湖观看了全国赛艇运动员的表演。

中午，毛泽东从东湖宾馆驱车到长江边，然后乘船到江心下水游泳，历时20多分钟。

下午2时，毛泽东泳后乘轮抵达青山蒋家墩码头，专程视察武汉钢铁公司，到炼铁厂观看了提前建成的一号高炉流出的第一炉铁水，到焦化厂了解了焦炉生产和建设情况。

14日 毛泽东冒雨到长江游泳，历时10余分钟。

晚上，毛泽东在武昌洪山大礼堂会见了武汉妇女代表。

15日 上午7时许，毛泽东视察了武汉重型机床厂。上午10时左右，毛泽东驱车由武昌至黄石途中，在鄂城临江公社黄柏山

大队小停，看了那里的棉田。

上午10时45分，毛泽东到达大冶铁山，视察了大冶铁矿的十里矿区。

下午1点多钟，毛泽东到达黄石，再次视察了大冶钢厂。

下午3时左右，毛泽东在视察了黄石地区厂矿后，冒着狂风大雨在长江里游了10多分钟。然后登上停泊在那里的“江峡”轮。

16日 毛泽东为“二七烈士纪念碑”题字，并为此给湖北省委致信：“敬挥数字，看可用否？谨向烈士们致以敬意。此次在鄂，谈得好，看得好，虽是走马，热情已经看出来了。祝你们一帆风顺！”

16日 凌晨，毛泽东乘“江峡”轮从黄石赴安庆。

11月14日 毛泽东从郑州来武汉途中，在孝感火车站接见了孝感地县领导和朋兴公社农民代表官木生、晏桃香等人，了解了那里农业生产的情况。然后乘车到当地驻军大礼堂观看文艺演出。

21日至27日 毛泽东在武昌召集了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为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作准备。

25日 毛泽东在汉会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和他率领的朝鲜政府代表团，并与金日成举行会谈。

28日至12月10日 毛泽东在武昌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决定》和《关于改进农村财政贸易管理体制的决定》。

12月1日 毛泽东在汉写成《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

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

4日 毛泽东在汉观看了朝鲜艺术团的表演。

5日 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听涛酒家品尝了武昌鱼。

6日 毛泽东在汉接见湖北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全体代表和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武汉空军部队党委扩大会议的全体代表，以及湖北省共青团地、县委书记。

晚上，毛泽东与访越归来的金日成再次举行会谈。

7日 毛泽东在汉接见红安县种试验田的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当晚，与代表们一道在洪山大礼堂观看文艺演出。

11日 下午，毛泽东在汉会见匈牙利军事代表团。

晚上，毛泽东在汉会见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代表团。

晚上，毛泽东在汉接见参加中共湖北省委召开的工业书记会议的地、县委书记，出席全国财政会议的各省、市、自治区厅局长，正在武汉开会的湖北省政协委员，刚从北京归来的出席第二次全国青年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大会的湖北代表，武汉市工农业劳动模范和在武钢工作的外国专家。

28日 毛泽东在武昌102战略物资仓库接见出席中共武汉市第三次党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

## 1959年

3月10日 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后乘京广线专列到达武汉，住在武昌东湖宾馆梅岭一号。

13日 毛泽东在汉接见美国著名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著名黑人学者杜波依斯及其夫人。

14日 毛泽东在汉接受了缅甸联邦新任驻华大使貌貌觉温准将偕大使馆外交官员递交的国书。在貌貌觉温致词后，毛泽东



致答词，他深信，在中缅双方坚决维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情况下，中缅两国人民友好合作关系必将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从而对亚洲和世界和平作出更大贡献。

15日 毛泽东在汉以《党内通信》的形式，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介绍河南、湖南、湖北、广东等省人民公社的核算和分配办法。

17日 毛泽东在汉发出第二次《党内通信》，要求各地召开五级干部大会，贯彻第二次郑州会议的精神。

18日 下午，毛泽东在汉会见日本社会党访华团团团长浅沼稻次郎一行。

晚上，毛泽东在汉会见由总书记艾地率领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

中旬 毛泽东在武汉接见了湖北六级干部会议代表。

6月23日 毛泽东在安排了庐山会议后回湖南，途经武汉，又跃入大江中游泳。后登上“湖北”轮，身着泳装接见了武昌造船厂副厂长田青和董菲，然后在武昌造船厂二码头上岸。

28日 毛泽东从韶山归来，准备赴庐山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途经武汉，再一次畅游了长江。

29日 毛泽东在汉与各协作区主任谈话，力图纠正、解决“大跃进”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30日 毛泽东在汉口乘“江峡”轮顺流直下，去九江参加“庐山会议”。

## 1960年

5月12日 毛泽东来湖北视察工作，住东湖宾馆梅岭一号。

5月14日 毛泽东在汉会见日中友好协会访华代表团、日本工会总评议会访华代表团、日本医学代表团、日本职工运动知名

人士高野实和日本新闻工作者以及古巴学生代表团、巴西广播电视工作者代表团、巴西科学家代表团、巴西农业经济学家代表团、阿根廷文化代表团、秘鲁文化代表团等，发表了“帝国主义最怕的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觉悟，怕世界各国人民的觉悟。我们要团结起来，把美帝国主义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赶回它的老家去。”

15日 毛泽东在武昌洪山大礼堂接见出席湖北省文教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

17日 毛泽东在汉会见了以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克里姆·贝勒卡塞姆为首的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代表团。

9月间 毛泽东再次来武汉视察，其间曾到洪山大礼堂观看他亲自点的、由汉剧名演员陈伯华主演的《柜中缘》。演出结束后，在礼堂接见了一批被打为“右倾分子”的干部。

## 1961年

3月 广州中央工作会议后，毛泽东到湖北调查研究，提出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毛泽东指示东湖宾馆的接待人员要贯彻艰苦朴素精神，降低他本人的生活水平，拒绝对他的一切特殊照顾，还教导警卫人员生活不要特殊化，不要脱离群众。

4月3日 毛泽东在汉会见古巴起义青年协会主席霍埃尔·伊格莱西亚斯少校为团长的古巴青年代表团。

9月23日 毛泽东在东湖宾馆会见英国蒙哥马利元帅，共进晚餐，并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24日 毛泽东与蒙哥马利元帅共进午餐后继续长谈。谈完后，毛泽东邀请蒙哥马利一起到长江里游泳，蒙哥马利因胃不舒服，谢绝了邀请，但答应在船上观看毛泽东游泳。

下午，毛泽东在东湖接见了湖北省的地委书记。

下午5时许，毛泽东乘快艇到武昌造船厂江面下水，穿过大桥，一直游到汉口滨江公园附近，历时40多分钟，游程12华里。这是毛泽东第三次横渡长江。

泳后更衣上岸，毛泽东把蒙哥马利元帅送到他下榻的汉口胜利饭店，俩人又在饭店里谈了将近一个小时。临别时，毛泽东将事先写好并署名的《水调歌头·游泳》词一首赠蒙哥马利元帅。

## 1962年

3月9日 毛泽东由湖南乘专列到汉，住东湖宾馆梅岭一号，主要是修改准备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文件。

3月18日 在回京一趟后，在汉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并接见了湖北各地市负责人。

6月17日 毛泽东再次来汉视察，并参加了中共中南局召开的一次会议。

6月19日、21日 毛泽东在汉期间，并两次到武昌造船厂码头的江面下水，在长江里游泳。

22日 毛泽东在汉会见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团，并与代表团团长朴金喆、副团长康良煜、朴信德等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24日 毛泽东再到武昌造船厂码头的江面下水，顶着长江汛期的大浪，畅游了30多分钟。

## 1963年

5月27日至6月11日 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宾馆与邓小平、彭真、吴冷西等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即二十五条），先后并请朝鲜金日成、越南黎笋、长征、范文同等朝、越党政代表团来汉商讨。邓小平、彭真等与两国代表团会谈，会谈后，毛泽

东分别与两国代表团会面，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 1964 年

4月2日 毛泽东再次来汉，住东湖宾馆梅岭一号，10日乘专列离汉。

9月初 毛泽东来湖北调查“四清”运动开展情况。在汉期间，先后接见老挝爱国战线文工团、坦桑尼亚广播电视代表团、妇女代表团，并数次畅游长江。

## 1965 年

1月5日 毛泽东来湖北视察，在东湖梅岭住了45天。其间接见了中南局扩大会议成员，听取了汇报，并多次同中央有关负责同志研究工作。2月19日乘专列离汉。

3月16日 毛泽东再次来湖北，住东湖梅岭。在汉期间，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董必武、彭真、陈毅、贺龙、林彪、谢富治等先后来汉汇报工作，其中周恩来三次，邓小平、陈毅各两次。毛泽东在汉分别召开了几次会议，还接见了中南局扩大会议代表。

3月19日 毛泽东分别接见了马来西亚和英美等国客人。

4月13日 毛泽东在汉会见阿联总统外交事务顾问萨里布及夫人一行。

4月29日 毛泽东乘专列离汉。

## 1966 年

2月 毛泽东在武昌东湖过春节，中共湖北省委为此准备了

专场宴会和晚会。毛泽东接见了省委常委和各地市第一书记，并向参与警卫的干部赠送了芒果。

6月18日 毛泽东在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后来到了武汉。

7月8日 毛泽东在汉写了一封致江青的信，表达了文化革命初期自己对运动和对林彪的想法和看法。

16日 毛泽东检阅了武汉市第11届横渡长江比赛，然后以73岁高龄从武昌大堤口下水，冒着5级大风和湍急的流水，再一次畅游长江，历时1小时零5分，游程30多华里，直到武汉钢铁公司附近的江面才上船。这是他最后一次畅游长江。

17日 毛泽东在汉会见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代表以及国际组织的观察员。

18日 毛泽东离汉返京。

## 1967年

7月14日 毛泽东在巡视大江南北、考察文化大革命形势时，从北京乘火车抵达武汉，下榻于武昌东湖宾馆。

15、16日 毛泽东在汉两次与周恩来召集汪东兴、杨成武、余立金、谢富治、王力、李作鹏等开会，听取有关武汉、云南、贵州、四川等地文化革命问题的汇报，讨论了解决武汉地区群众组织之间矛盾的方针。

16日 毛泽东在汉听取了谢富治、王力以“中央代表团”名义到各地处理文化大革命问题的情况汇报后，严正地指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18日 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接见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治委员钟汉华，告诫他们耐心地做好武汉地区两派的工作。

20日 被谢富治、王力斥为保守组织的“百万雄师”部分群

众和部分驻军冲击谢、王所住的东湖宾馆（毛泽东当时也住在那里，但外界不知道），强行拉走王力，把他带到武汉军区大院围攻、批斗。

23日 毛泽东凌晨乘车离开东湖宾馆，在汉口王家墩机场乘飞机飞上海。

9月18日至20日 毛泽东再次来汉期间，接见了新任命的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政治委员刘丰等人，并两次乘车视察武汉三镇，同时接见了担任东湖一带警卫的“好八连”。21日离开武汉。

## 1969年

5月31日 毛泽东来汉视察，6月26日离汉。

10月15日 毛泽东再次来汉，12月25日离汉。

## 1970年

9月13日 毛泽东来汉视察，17日离汉。

## 1971年

8月16日 毛泽东在巡视大江南北时到达武汉。在武汉的一段日子里，先后同湖北、河南等地的党政军领导人进行了5次谈话，着重谈了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在1970年庐山会议上的恶劣表现，还直接点名批评了林彪。

27日 毛泽东乘火车离汉，在车厢里与服务员一道高唱《国际歌》。这次在汉期间，他曾多次带头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 1974年

7月18日至10月12日 毛泽东在武昌东湖梅岭住了将近三个月，处理全国党政军要务。这是他解放后在湖北武汉留住最长的一次，也是他最后一次来湖北。

9月4日 毛泽东在邓小平陪同下接见多哥共和国总统及其夫人，以及随同来访的7位部长。

10日 毛泽东在李先念陪同下接见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军政府首脑、武装部队总司令雅库布·戈翁将军和夫人。

19日 毛泽东在邓小平陪同下会见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总统和夫人。

27日 毛泽东会见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特别代表伊梅尔达·马科斯夫人及马科斯总统的儿子小费迪南德·马科斯。

10月4日 毛泽东在汉提议邓小平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10月5日 毛泽东在汉会见加蓬共和国总统奥马尔邦戈及随员。





附

录



## 毛泽东同志第一次视察武汉

王任重

今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同志诞辰90周年。几个月前,《长江日报》就约我写一篇纪念文章。以后,《湖北日报》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做出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给我们留下了集中全党集体智慧的毛泽东思想,这是一个无比宝贵的精神财富。现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正在按照《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学习、运用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毛泽东同志生前曾经多次到武汉视察工作。他很喜欢武汉这个地方,很关心湖北省党组织的工作和人民群众的劳动、工作、学习和生活。从1953年2月,特别是1956年夏季毛主席在武汉第一次畅游长江以后,他几乎每年都到武汉来一两次甚至三次。每年在武汉住的时间少则一个月,多到几个月。他在这里进行调查,思考国内外大事,处理中央文件,主持中央的一些重要会议,作出重大决策。他也在这里会见了不少领导干部和群众,会见了一些外国著名人物。1966年7月16日,毛主席以七十三岁的高龄,最后一次畅游了长江。湖北省的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始终是怀着崇敬的心情,回忆毛主席的。

从1949年6月直至1966年7月，我一直在武汉市、湖北省工作。我有幸多次向毛主席汇报请示工作，陪同他参观工厂、农村以及接见外宾，他的许多亲切谈话，使我受到了宝贵的教育。1966年10月底，我因为受到“四人帮”的排挤和迫害，再也没有见到过他老人家。今天，我找出自己当年记载有关毛主席在武汉那些日子日记，回想起往日的情景，心情仍然非常激动，他的伟大的形象，如在眼前。

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毛主席第一次来到武汉视察，是在1953年2月。时间虽然只有几天，却对湖北、武汉的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也在湖北人民中间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下面，我把记述毛主席这次视察活动的日记，整理发表，藉以表达我对这位伟人的纪念和无限敬意与感激之情。

一九五三年二月十六日

今晚十一时三刻，毛主席到达汉口大智门车站，我和中南局李先念、李雪峰等同志去迎接他。这是我第一次和主席握手谈话，心情的激动，可想而知。这是毛主席在全国解放后第一次来武汉视察工作。

二月十七日

今天晚上八点十分，主席请中南局、湖北省委、武汉市委的少数领导同志和他一起吃饭。吃饭时与饭后，主席向我问了武汉市工业、手工业和公私合营的情况，我只作了简要的回答。主要是想多听听主席的谈话。

主席的谈话要点如下：

一、有人说“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还有人主张“四大自由”，我看都是不对的。新民主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在这个过渡阶段，要对私人工商业、手工业、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过渡要有办法。象从汉口到武昌，要坐船一样。

二、全国解放后，富农不敢雇工剥削了。即使还没有搞完土

地改革的地方，富农实际上也变成富裕中农了。斯大林建议我们在土改中要保留富农，为的是不要影响农业生产。我们发展农业生产并不依靠富农，而是依靠农民的互助合作。

三、我们现在家底子很薄弱。钢很少、汽车不能造，飞机一架也造不出来；面粉、纱布的生产，还是私营为主。

四、要团结民主人士，使他们的生活好一点，争取他们和我们一起搞建设。经济基础不强，政治基础也就不强。

五、私人工商业如何转？资本家转什么？他们如何生活？其中有些人会和我们一起进到社会主义的。只要不当反革命，就要给工作，给饭吃。

二月十八日

上午毛主席去东湖游览，回来时徒步经过蛇山，虽然他戴一个大口罩，还是被一个小学生发现了。这个孩子一声呼喊：“毛主席来了！”成千上万的人马上都拥上来了。短短时间就聚集了几万人，把主席团团围在中间，一片喜悦欢呼之声。李先念、罗瑞卿等同志和警卫人员一起手拉手，组成一个圆圈，一步一步地保护着主席下了山，大家都挤得通身大汗。

晚上主席叫我把当时在武汉市管工业的一个人和武昌区委书记找去，向他汇报手工业的问题。又问了码头工人的情况。他说，大革命的时候，有一次他路过武汉、乘船到上海去，被搬运工敲了竹杠。我说，我们准备在今年秋季对码头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取消把头，成立统一的搬运公司。现在正在作调查研究、制定方案等准备工作。那些欺压工人作恶多端的封建把头，已经在民主改革和“三反”、“五反”运动中被打倒了。

二月十九日

早晨八时，主席的秘书打来电话，让我带一个街长去向主席汇报街道工作。我立即找到大智街的街长陈光中同志，带他去见主席。我告诉陈光中同志不要紧张，主席问什么就如实地讲什么。

主席问了街道居民生活的情况、街道的组织和工作情况。主席听了街长的汇报后，满面笑容地说：我非常羡慕你的工作，每天跟群众打交道最有意思。

主席问我，为什么有些手工业要停工？我说要停工的主要是织毛巾、袜子的工厂，这是失业工人组织起来的合作工厂，他们技术不高，产品质量比较低，商业部门怕积压，既不加工订货，也不收购。让这些失业工人没饭吃是不行的。实际上到秋季是商业旺季，运到农村去是会有销路的。

主席说：要把经济核算的原则与政治任务结合起来。国营商业不能单纯追求利润。要关心工人就业问题。在不赔钱的原则下，应当加工订货、收购。

早饭之后，大约在上午近十点的时候，主席把中南局的几位领导同志找到他的住所谈话。我也参加了。他谈了几个很重要的问题：

### 一、关于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主席说：我爱进步的中国，不爱落后的中国。中国有三个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已经被打倒了，还有民族资产阶级，个体农业、手工业和文盲三个问题。当然对待这些人不能用对待前三个敌人的办法。个体农业，要用合作社和国营农场去代替，手工业要用现代工业去代替。手工业目前还要依靠，还要提倡，没有它不行。文盲要扫除。对民族资产阶级，可以采取赎买的办法。

### 二、关于民族形式的问题

主席说：你们在东湖盖的两座房子（指甲所、乙所）象个乌龟壳，有什么好看？落后的东西都要逐步废除，木船是民族形式，要不要用轮船代替？为什么人们不喜欢旧毛厕，要有抽水马桶？飞机、汽车、坦克哪一样是民族形式？这是说，要提倡进步，反对保守，反对落后。还是大洋房子比小平房好。有些人对保护老古

董的劲头可大了，连北京妨碍交通的牌楼也反对拆除。

### 三、关于反对官僚主义作风

主席说：对人要和气，说话要和气。你们有的人，为什么说话不和气呢？

官僚主义作风主要在上边，你们要敢顶、敢抗。对于上边来的错误的东西，要筑坝、要消毒。对于上级布置的工作任务，要分别轻重缓急来执行。

贸易部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批评，主要是针对武汉市的。你有什么意见？你怎么看法？

我说：我们主要担心工人失业问题，我们一定努力把产品质量抓上去。我们没有把情况向中央贸易部报告清楚，是个缺点。我们还是要求国营商业加工订货或收购。

主席说：实际上你也有责任，但我同情你们的做法。

主席谈话是很随便的。并没有分一、二、三，这些小标题是我加上的。但对主席的谈话，我是尽可能按照他的原话记录的。

这天上午十一时半，主席离开武汉，乘海军的一艘舰艇去南京。李先念、李雪峰、赵毅敏同志和我四个人送他到船上。主席在甲板上检阅了海军指战员。

这几天我的精神很紧张，但又很愉快。主席的谈话和他平易近人的作风，使我受到了宝贵的教育。主席到达武汉的前几天，中南局的领导同志就告诉我要准备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我组织了几个个人写了不少材料，都没用得上。因为主席是根据他想了解的情况，向你提问题，除了特殊情况之外，他是不要你按照本本向他汇报工作的。

（原载《湖北日报》，1983年12月21日）

## 毛主席指明了征服长江的方向

林一山

1953年2月19日到22日，毛主席视察了长江。在这次航行中，我一直在毛主席的身旁，聆听毛主席对长江建设的一系列指示，体会到毛主席对全国人民的无比关怀。这幸福的三天三夜，使我终身难忘！

1953年2月19日，江城武汉，晴空万里。中午时刻，毛主席在武汉关附近的专轮码头上，健步登上“长江”舰。

由“洛阳”舰护航，“长江”舰乘风破浪，向东顺流而下。启碇片刻，毛主席派人把我找去。我挟了一本地图，走进毛主席住的卧舱。他笑容满面地和我紧紧握手，要我汇报有关长江的情况。他一边翻开地图，一边问：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借点水给北方呢？他拿起一支红铅笔，首先指着西北高原问道：从嘉陵江上游白龙江和西汉水，向北引水行不行？

我回答说：都不行。

毛主席又问：为什么？

我做了详细的回答。

毛主席手中的红铅笔指向汉中盆地，又问，引汉水行不行。

我回答：有可能。

毛主席凝视着地图上的三千里汉江，兴奋地问：为什么？

我回答说，汉江和渭河、黄河平行，与秦岭、伏牛山，一山之隔，它自西而东，越到下游，地势越低，水量越大。这就有可



能找到合适地点兴建引水工程，把汉江水通过黄河引向华北。

毛主席抬起头来，凝视着窗外的滚滚长江，高兴地问：这个问题，你考虑过没有？

我说：还没有。

毛主席说：你立即部署勘察，一有资料，就写信给我。

毛主席何等渴望着解决华北大平原严重缺水的问题啊！根据这个指示，我们把南水北调工程，列为长江流域水利资源综合利用规划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立即着手制定把汉水引到华北的规划。

长江建设者没有辜负毛主席的殷切期望。他们冒着严寒、酷暑，踏遍秦岭、伏牛山和汉江上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引水通道，这就是兴建汉江丹江口水利枢纽，壅高汉江水位，然后引水穿越汉淮分水岭，不用搞太大的工程，就可以自流引水到淮河、黄河和海河。

遵照毛主席嘱咐，在南水北调工作过程中，我随时写信向他汇报最新成果。经过实地查勘，我们纠正了过去仅根据地貌的表面现象就认为从嘉陵江上游不能引水的片面看法。

1958年3月，在党中央成都会议上，根据周总理的报告，决定兴建汉江丹江口水利枢纽。周总理亲自作了结论，把一项引汉灌溉工程，正式列为丹江口的同期工程，为宏伟的南水北调，揭开了新的序幕。

就在这个会议上，毛主席高兴地说，打开通天河、白龙江，借长江水济黄，丹江口引汉济黄，引黄济卫，同北京连起来了。在爽朗的笑声中，毛主席结束了他的谈话。

1953年2月21日上午，毛主席在“长江”舰的甲板上漫步。他炯炯的目光，看着碧波滔滔的长江，对我说：要驯服这条大江，一定要认真研究啊！长江的水文资料，你们研究得怎么样？我说，我们已经组织了一支力量整理长江的历年水文资料。

毛主席详细询问了水文资料的整理情况，接着又询问了长江流域的气象特点和暴雨区的分布。

我说：长江流域有两个主要暴雨区。一个是南岭暴雨区，在湘赣南部；一个是四川暴雨区，在四川盆地的周边。在正常情况下，南岭暴雨区首先降雨，在3月到6月间，使赣江水系和湘资沅水系开始涨水，随着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继续向大陆腹地西移，7月到9月份，四川暴雨区开始降雨。两个洪峰，正好错开。如果气象反常，南水后移，川水早到，两峰相遇，往往会造成洪水灾害。

毛主席马上问：长江流域暴雨成灾最严重的地方在哪里？

我说，根据记载，1935年7月1日，暴雨中心在湖北五峰，七天就下了一千多毫米，而“川西天漏”地区，年降雨量曾经达到二千多毫米。

毛主席说，真了不得啊！

就在这“长江”舰上，毛主席还十分关切地问我对于长江的防洪有什么设想。

我展开一幅《长江流域水利资源综合利用规划略图》，汇报说，长江防洪的指导思想，是在干流及其主要支流上，逐步兴建一批梯级水库，拦蓄洪水。

毛主席凝视着万里长江图，从世界屋脊的江源，直到烟波浩渺的海口，纵横万里。他左手叉在腰间，举起右手，在图上画了一个大圆圈说：太好了，太好了！修这许多水库，都加起来，你看能不能抵上三峡一个水库呢？

我说：抵不上。

主席又伸出手来，指着三峡口上说：那为什么不在这个总口子上卡起来，毕其功于一役？就是先修那个三峡水库，怎么样？

我兴奋地回答：我们很希望能修三峡大坝，但现在还不敢这样想。

毛主席笑了。接着，他又详细地问了有关三峡大坝的情况，然后，和蔼地笑起来：——好，我这算了解了长江，了解了长江的许多问题和知识了。

“长江”舰驶抵南京，陈毅同志和粟裕同志登上甲板，迎接毛主席。

三天三夜的航行胜利结束了，但是毛主席的光辉指示，一直在我心中翻腾。我领会到毛主席征服长江、改造自然的宏图大略。毛主席关于征服长江、改造自然的光辉思想，一直鼓舞着我们克服重重困难，绕过层层暗礁，在浩瀚的长江上，迎着滚滚激浪，奋勇前进！

1954年底，在战胜这一年长江上发生的特大洪水之后，在京汉线上，在毛主席乘坐的专车里，我向毛主席、周总理汇报有关三峡工程的技术问题和坝址查勘情况，汇报三峡大坝、南津关坝区和美人沱坝区的地质基础情况。这次汇报用了整整一夜的时间。

毛主席十分关切地问：根据已有资料，风化层有多厚？

我说，大约三十米左右，据国内外资料记载，世界上有风化层达到一百米的。

主席耽心地问：如果这里风化层有一百米，那么一百米以下呢？

我说，请主席不用耽心，我们现在还没有全面勘探，我想，在二十五公里的火成岩河谷中，总会选到好坝址线。接着，我补充说，在它的上游，有一段片麻岩河段。

毛主席面带笑容，连声说：好，好！片麻岩是花岗岩的变质岩，抗风化性能要好得多，这下子好办了！毛主席对于三峡大坝的关心，是何等细致入微呵。

担负长江流域规划的广大勘测设计人员，在毛主席的鼓舞下，展开了全流域的查勘，上自金沙江，下达海口，做了许多艰苦工作，重点规划了三峡大坝和自流引水华北的线路，以及全长江的

流域规划。

1956年，三峡勘测科研工作取得了肯定成果，毛主席在畅游长江之后，经过深思熟虑，决定了三峡工程，并且写下了《水调歌头·游泳》这首气势磅礴、光彩夺目的词章，给我们画出了一幅“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的壮丽蓝图。他给我们指明了征服长江的明确方向，向全世界宣布了我们一定修建三峡水利枢纽的坚强决心。

1958年2月，在党中央南宁会议期间，毛主席对我说，我要考考你，你能不能写个象样的文章，来说说三峡工程呢？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我写出了报告。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仔细审阅了三峡工程的主要图纸，详细询问了有关这一工程的设计和造价。然后，转身向着周总理说：这个问题，你来管吧！周总理说：还是请主席管。毛主席说：我那么忙，哪有这么多时间来管呢？还是你来管。周总理坚定地回答说：好，我来管。

毛主席欣喜地伸出四个手指头说：好吧，你来管；一年抓四次。

我们的好总理，多么细心地体会到毛主席对长江规划和三峡工程的高度重视啊！

南宁会议以后，周总理出访朝鲜。二月底回京，他只停留一夜，就风尘仆仆，赶到武汉。在李富春、李先念副总理的陪同下，溯江而上，视察三峡。他那深深的脚印，印在漫天风雪的荆江大堤上；他那爽朗的笑声，回荡在陡峭笔立的峡峰岚翠中。周总理手持几米长的岩芯地质剖面图，逐段逐节，对照岩芯审视地质情况。他为我们找到了理想的坝址感到高兴。他俯身从岩芯箱中，取出一截岩芯，反复观看，赞不绝口，爱不释手。最后，他带走一截岩芯，献给毛主席。

1958年3月8日，周总理到了重庆，立即转赴成都，出席党

中央成都会议。周总理在查勘三峡过程中，详细听取了我们的汇报。在成都会议上，根据周总理亲自作的报告，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了一个重要文件：《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

在成都会议以后，毛主席对三峡工程的考虑，更加深入，更加细致了。

1958年夏天，在武汉的东湖之滨，毛主席让我汇报长江的泥沙问题，也就是三峡水库的寿命问题。我说，长江的含沙量远比黄河少，相对量少，但绝对量还很大。根据计算，三峡入库泥沙，每年大约五亿吨，合四亿多立方米。三峡水库的总库容，大约两百年才能淤死。

毛主席沉思以后说：这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只两百年太少了！

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进一步开展了对泥沙淤积和水库长期使用的专门研究、专门考察，结合国外资料，综合分析研究，逐步认识到泥沙运动的规律，并且找到了水库长期使用的途径。我立即向周总理汇报，得到总理的赞许。他亲自审阅了我们的报告，并转报毛主席。

毛主席对长江规划，南水北调，三峡大坝，是那么重视，那么热情，抓得那么细，抓得那么紧。他亲自制订了修建三峡工程要做到“积极准备、充分可靠”和“有利无弊”的方针。毛主席这样全面，这样深入，这样细致地指点我们，支持我们，给了我们无穷的力量。

华国锋同志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庄严宣布“兴建把长江水引到黄河以北的南水北调工程”。这是多么豪迈的事业呵！这十九个字，将永远镌刻在人类改造自然的历史丰碑上。以三峡工程为中心的长江水利资源的综合开发，将为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重大的贡献！

---

长江将要大变，祖国的面貌将要大变。今天，纪念毛主席八十五诞辰的时候，回忆毛主席在“长江”舰上开始提出的关于长江建设的一系列指示，我们更加感到毛主席的英明、伟大！

（原载《毛泽东同志八十五诞辰纪念文选》，  
人民出版社 1979 年出版）

## 溫馨的回憶

### ——紀念毛澤東同志 100 周年誕辰

劉惠农

在紀念毛澤東同志 100 周年誕辰之際，回憶毛澤東同志生前多次到武漢，我有幸向他匯報過工作，現將有關情況記錄下來，權作紀念。

1953 年 2 月 16 日（大年初三）晚，毛澤東同志來到武漢。這是建國後，他第一次來漢。當時我是中南交通部黨組書記、第一副部長兼長航局局長，一見面，他就握着我的手說：“劉惠农同志，解放前我到過武昌、漢口，就是沒去過漢陽，我想去看一下。”他的這個要求使我不難。一則事前負責保衛工作的羅瑞卿向我打招呼，考慮到安全，讓我設法勸阻毛澤東的漢陽之行。二則當時去漢陽也確實有困難。我於是說：“主席最好不要去。”他稍感驚訝，問原因。我擺出三條理由：“第一，從漢口到漢陽既沒有橋，也沒有渡江的輪船，坐划子很不安全。第二，漢陽的碼頭還沒有建設好，公路上也沒有汽車。第三，社會秩序還不夠穩定。”毛澤東笑着問：“你去過漢陽嗎？”“當然去過。”他又問：“你是怎樣去的？”“當然是坐划子。”我答。“你既然能坐划子，為什麼我就不能坐划子？”我一時語塞，笑了起來：“主席，那我去準備一下。”

後來長航局派出一條船，我陪毛澤東上船，一直開到舵落口才回航。他興致很濃，巡看長江兩岸，邊看邊問。船到漢陽高公

街，我们一行上岸。他问起汉阳兵工厂旧址，我指着龟山北麓一带说：“就是这里。抗战时期，国民党将工厂迁到四川，厂房被日寇几次轰炸，破坏相当严重。1950年下半年，我们在这里建起了一个棉纺织厂。”返回时，他关心地询问：“老百姓过江都是坐划子吗？”“是的。”我边点头边说：“这里是汉水、长江的汇合口，风大浪急，坐划子很不安全。第一个五年计划已决定在汉水上架设铁路桥和公路桥，将与长江大桥一起，把武汉三镇连成一片。”他十分高兴地点了点头。

2月18日，是正月初五，我和李先念、王任重等省市领导同志陪同毛泽东同志去武昌视察。上岸后，毛泽东拾级登临黄鹤楼，扶轩四顾，俯瞰江城景色。忽然听到一位小学生惊喜叫声：“毛主席！”“毛主席！”毛泽东笑着向学生点头。

“毛主席来了！”霎时，喜讯象长了翅膀一样飞遍了武昌大街小巷，成千上万的工人、学生和市民潮水般涌向黄鹤楼，“毛主席万岁！”欢呼声如春雷般在长江畔、蛇山上滚动。人越聚越多，顿时把黄鹤楼围得水泄不通。

我们一方面为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对领袖的无限热爱的热烈场面所感动，但又十分紧张，因为秩序太乱，恐有不虞。我和毛泽东的随行人员罗瑞卿、杨尚昆等，以及其他省市领导赶紧挤到前面，大声喊道：“同志们请让出一条道，让毛主席过去。”

群众非常自觉，话音刚落，立刻让出一条路，毛泽东频频向群众挥手，从人墙当中，缓缓走向码头。群众一个劲儿地鼓掌，许多张兴奋的脸上挂着激动的泪花。我们随着毛泽东上船。船离开码头后，群众还在岸边欢呼，跳跃……

回到毛泽东的住地，我如释重负：“主席，今天我们大家都出了一身汗。”毛泽东微笑着说：“群众很好嘛，秩序也很好嘛！”临别时，他对我说：“这两天主要是看，没和你多谈，如果你不忙的话，和我一起到南京，我们在路上谈谈。”



第二天上午11时，我和中南水利部副部长林一山同志一道，随毛泽东东行。在船上的三天里，林一山汇报长江水利建设规划，我汇报长江航运工作，毛泽东对民生轮船公私合营的情况十分感兴趣，详细地询问了该公司公私合营的全过程。

毛泽东知识渊博，对长江流域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十分熟悉。但他十分谦虚，听得非常专心，不时还提出问题或插话。

毛泽东听完汇报，指示我们对长江航运事业要定一个五年、十年规划，把长江航运事业搞好。他充分肯定了民生轮船公司的公私合营，鼓励我们要继续把这项工作抓好，使长江上所有私营航运公司都走上公私合营的道路。

船抵达南京时，华东局陈毅、谭震林等负责同志在码头上迎接，我便向毛泽东同志告别，去上海长航分局检查工作。

## 二

1954年春，中南行政委员会和中共中央中南局撤销，1955年初我调到武汉市工作，担任武汉市第一副市长，不久，经武汉市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选我为市长。

上任伊始，毛泽东主席又来到武汉。我和张体学、李尔重同志立即前往拜望。那天，毛泽东很高兴地和我们谈了一会话后，便约我们去院子里散步。叶子龙同志为大家拍了几张照。当时没谈任何具体问题。

翌日下午，我再去毛泽东住处。他十分亲切地握着我的手说：“你好嘛，交通部长不当了，当起市长来，有什么打算？”我说：“以前我虽然在武汉，但搞的是中南和长江的交通运输工作，对武汉的情况不熟悉。武汉市情况很复杂，工作面宽，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都有，我没有经验，需要学习，边工作边摸索城市工作的经验。”毛泽东点点头说：“你过去在交通部门工作时，搞

了一个民生轮船公司的公私合营，搞得很好嘛！现在做城市工作，也要做好啊！”我说：“主席，关于武汉的城市建设规划，省、市委多次研究过，现在我将主要内容向您汇报。”他微笑着说：“好，好。”毛泽东不喜欢长篇大论，而是谈话式。汇报过程中，他听得十分仔细，时有问话，有的问题还同我进行了讨论。

我首先汇报了武汉的一般情况。我说：武汉处在华中的中心，地域位置十分重要，战略地位也很重要，有远大的发展前途。解放前，它是一个百孔千疮的消费城市。解放后，政府采取有力措施，恢复生产，稳定金融流通，搞好供给。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在武汉地区进行了巨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投资，投资额高达1151479万元。这样就为武汉市由一个消费城市改变成工业城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把武汉建设成国家的工业、科技、教育的基地之一，将对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毛泽东听到这里十分高兴，频频点头。

我说：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办好几件大事。第一，大力发展工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在武汉地区重点建设有武汉钢铁公司、武汉重型机床厂、武汉锅炉厂、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青山热电厂、长江大桥等大中型项目。我们要以这些骨干企业为主体，带动其它中小企业。

第二，大力发展交通运输。武汉是我国东西南北交通一个十分重要枢纽，素有九省通衢之称，在国民经济中占较重要的地位。因此国家应加强对铁路、航运、公路的投资。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长江大桥将建成，汉水铁路桥已通车，公路桥正在建设中。不久，武汉三镇将连成一片，京汉、粤汉铁路也连成一线。

第三，积极改造旧城区，有计划有步骤地建设新城区，从根本上改变武汉城市面貌。解放前，武汉没有统一规划，是一个畸形的城市。那时全市建筑面积为1252万平方米，其中住宅面积只有668万平方米，而且茅棚、板棚占相当比重。解放后，政府在

資金十分困難的情況下，仍然抽出一筆資金，用於建設新的住宅區，搶修危房，逐步改善群眾的住房條件。我們還要解決武漢市民飲用自來水困難的狀況。

毛澤東同志對此十分關切，指示：自來水的问题一定要解決好，城市與農村不同，居民、工業都要用自來水。希望經過努力，不久武漢人民都能喝上自來水。

我接着匯報：第四，城市不光要建設，還要美化。我說北京到處都是樹，綠化搞得很好。這給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武漢要向北京學習，把綠化工作做好。這樣既可以美化城市，又可以調節空氣，淨化環境。

第五，城市要把大學、中學、中等專科學校辦好。我國經濟十分薄弱，文化也很落后，要把我國建成現代化的強國，就要培養大批有革命覺悟的知識分子。在這方面，城市應該發揮更大的作用。根據我國的現狀，教育一是辦好普通教育，二是辦好業餘教育。

毛澤東同志說：這條很重要，城市發展教育，比農村有更多的有利條件。如學校集中，知識分子多。武漢高等院校就有十多所嘛，應該發揮更大的作用。武漢市還應該多辦一些大學，培養更多的德才兼備的知識分子。這批人不僅要分到國家事業、企業，還要輸送一部分人到農村去，改變農村的落后面貌。業餘職工學校要大力提倡，我們許多幹部、工人同志政治覺悟都很高，但文化程度低了。科學與經濟日益發展，沒有文化就會阻礙現代化的發展。他們當中一部分年紀較輕的同志可送到大、中專學校深造，但大部分脫產學習也不可能，辦業餘小學、中學、大學就是個好辦法，他們可以到這些學校里學習，摘掉文盲帽子，提高文化水平，更好地為國家建設服務。

匯報結束後，毛澤東同志用深邃的目光望着我說：“劉惠農同志，社會主義建設對我們來講都是新課題，我們都需要學習，必

须要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国家管理、国家建设，要按客观规律办事。只有将国家建设好，人民才能拥护我们，人民政权也才能得到巩固。武汉是一个大城市，一定要建设好，管理好。”

我望着毛泽东同志，心中涌起一股暖流，下定决心，遵照他的指示，力求使自己通过工作实践，成为一个懂得城市管理和城市建设工作的干部。

以后毛泽东同志经常到武汉，有时我陪他参观一些工厂、商店和学校。在视察中，他都要详细询问省、市关于武汉建设计划的落实情况。当解放大道、鹦鹉大道、和平大道和武珞路陆续建成后，他曾亲自乘车走了一趟。他非常满意地说：“好嘛，马路还是修起来了，不错。”当他看到解放大道两旁绿树成荫，路旁还有花坛时，连声称赞：“树也有了，花也有了，环境果然绿化了。”

有一次毛泽东问我：“自来水供应解决没有？”我回答：“武汉全市每天需要 100 万吨水，现在用水普及率达 91.2%，还有少部分居民没喝上自来水。”毛泽东同志语重心长地叮嘱：“要好好搞啊，要让所有居民都喝上自来水。”后来他殷切地希望：“要把武汉建设好。”

## 巍巍丰碑映彩虹

### ——缅怀毛泽东同志对大桥建设的关怀

中共铁道部大桥工程局委员会政治部宣传部

长江，古称天堑，源远流长，横贯我国的東西，为我国第一大河。在这流经九省、全长六千三百多公里的长江上，我国人民多少年来，一直盼望着有一天能架起一座钢铁大桥，沟通大江南北，使天堑变通途。

可是千百年过去了，在反动派统治的旧中国，人民的愿望只能一再成为泡影，只有在新中国才能变为现实。随着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1953年铁道部正式批准成立了大桥工程局。从此，新中国的第一代建桥工人在长江上拉开了建桥的序幕。党中央对建桥工人极为关怀，毛泽东同志曾多次亲临视察武汉长江大桥工地，大桥通车的前夕，毛泽东同志又视察了万里长江第一桥。写下了“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诗篇，这些诗句精炼而生动地描绘了武汉长江大桥的英姿，高度概括地表达了人民的雄心壮志和喜悦心情。

我们清楚地记得毛泽东同志登上临江黄鹤楼的情景。

那是1953年2月中旬的一天，武汉三镇，雪后初晴，碧空万里，阳光普照。下午3时许，毛泽东同志乘坐一辆浅蓝色的小汽车，从东湖方向来到黄鹤楼下。他老人家神采奕奕，迈着矫健的步伐，登上了古老的黄鹤楼，极目远眺，展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

会主义建设的宏伟蓝图。这次他老人家是来视察武汉长江大桥的桥址的啊，不久，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开了：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敬爱的周总理审批了长江大桥的建设方案。全国人民热烈地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以极大的热情支援大桥建设。地质部门以最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帮助大桥获得完整准确的地质资料，重工业部、机械工业部解决了特殊钢材的原料，全国各地四十多个工厂接受了大桥的订货，湖北省、武汉市人民给建设大桥以巨大的支援，数以万计的工人、农民、机关干部、解放军指战员、学生和各界人士都直接参加了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长江两岸摆开了征服长江天堑的战场。1954年12月，大桥的前驱工程——第一座汉水铁桥胜利竣工。1955年12月，汉江上的第一座江汉公路桥也胜利建成。这时，毛泽东同志亲笔题字“江汉桥”。如今，这三个金闪闪的大字镶嵌在江汉桥上，展示了毛泽东同志对大桥建设者的无比关怀，鼓舞着建桥大军征服天堑，跨越江河。

我们清楚地记得毛泽东同志视察桥梁工地的情景。

在建设万里长江第一桥的时候，多少台打桩机日夜隆隆，多少支铆枪日夜高唱。正当武汉长江大桥紧张施工的时刻，1956年5月31日，毛泽东同志又来工地视察。这天清晨，他老人家乘坐“武康”号轮船，从汉口方向冲破巨澜，飞越激流，经汉阳晴川阁，向着正在紧张施工的江心桥墩徐徐驶来，穿过二、三号墩，接近鹦鹉洲时，轮船又返航下行，复穿三、四号墩。毛泽东同志屹立在驾驶台上，红光满面，以极大的兴趣巡视了水上、岸上的施工现场，听取了当时大桥局局长彭敏同志的详细汇报。当毛主席听说大桥的基础施工采用了新的施工方法——管柱钻孔法，废除了落后的气压沉箱法，不仅缩短了工期，降低了造价，而且能够全部在水上施工，保障工人的身体健康和改善劳动条件时，十分高兴。他详细询问了建桥的施工队伍、技术力量、机具设备、创造发明等情况后，指示我们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

方针，并说：“将来长江上修二十座、三十座桥，黄河上修上几十座桥，到处能走。”这美好的远景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蓝图，极大地鼓舞了建桥工人的斗志。

这次视察后，毛泽东同志连续三次畅游长江，从汉阳鹦鹉洲的江面下水，游到大桥的桥墩上游水域时，一面踩水，一边观看正在紧张施工的大桥，又一次地视察了大桥建设。

在第三次畅游长江后，毛泽东同志饱蘸长江水，写下了气势磅礴的伟大诗篇——《水调歌头·游泳》。“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这给桥梁建设事业描绘了一幅多么壮丽的图景！这个“飞”和“变”多么不易啊，它飞越的虽然只是一条天堑，它变换的却是一个崭新的世纪，它鼓舞建桥工人架桥铺路，“牵来彩虹凌空架，喝令钢龙跨江来”。

我们还清楚地记得毛泽东同志信步过大桥的情景。

武汉长江大桥是1955年9月1日正式开工的。只用了短短的两年零一个月的时间，于1957年9月全部竣工。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为什么能迅速的建成，又能取得如此好的经济效益，我们回顾当时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各行各业确保重点工程的实际行动也是很有意义的；也不能忘记毛泽东同志对建桥事业的关注。9月6日，毛泽东同志又第三次视察了大桥。

这是一个天高云淡的季节，夕阳的光辉斜照着大桥，桥上桥下显得格外雄伟、壮观，聚集在汉阳桥头的工人和干部，都在等候毛泽东同志来鉴定、验收大桥。人们在桥头急切地等候着。这时，一辆辆小汽车从江汉桥上飞驰而来，汽车停在汉阳桥头，毛泽东同志健步来到群众中，和等候的人们一一握手后，迈着矫健的步伐从汉阳桥头往武昌方向走去。他老人家一路谈笑风生，走到大桥合龙的中心接头处时，站在这里，手扶栏杆，眺望奔腾的江水和披着晚霞的武汉三镇。这时，夜幕已降临，武汉三镇顿时灯火齐明，毛泽东同志看到这壮丽的景色时，情不自禁地连声赞

美，“好呀，灯火辉煌！灯火辉煌！”片刻，毛泽东同志继续向前走了几步问道：鹦鹉洲不是在江中间的吗？陪同的人回答道：从前是在江中间，现在那汉阳的江边就是鹦鹉洲。毛泽东同志微笑着点头说：“啊，那看不到鹦鹉洲了，黄鹤楼呢？”陪同的回答说：“黄鹤楼因修大桥拆了，计划重修。”这时毛泽东同志笑着说：“应当修，应当修，这是历史古物。”是的，毛泽东同志的遗愿已经实现了。如今，武昌黄鹤楼的雏形主体工程已耸立在雄峙“天堑”的武昌桥头，它给楚天增添了一幅绚丽壮观的画图。

毛泽东同志第三次视察大桥已26年多了，大桥职工都不会忘记毛泽东同志那次从汉阳桥头信步过大桥的情景，当毛泽东同志走到武昌桥头堡时，彭敏同志代表大桥职工，把一本《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建设画册》和建桥职工的一封信献给毛泽东同志，他打开画册，看后显得特别高兴，他微笑着和在场的同志都一一握手告别。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26年多过去了，长江、汉水把武汉三镇联成了一座，武汉长江大桥日日夜夜承受着繁忙的运输任务，大桥每年都要经受大自然的一切恶劣条件的考验，如今，武汉长江大桥巍巍挺立在长江巨澜之中。1983年，国家有关科研和运营部门联合对武汉长江大桥进行了精确的测定，结果表明：大桥仍然坚固如初，质量完好。

今天，我们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回顾毛泽东同志26年前视察武汉长江大桥时，使我们对他更加怀念。

武汉长江大桥通车后，我们建桥职工按照毛泽东同志亲手描绘的建设宏图，踏上了新的征途。二十多年来，我们的足迹踏遍祖国美好河山的名川巨流，从那万古不废的滚滚长江，到源远流长的咆哮黄河，从冰封雪塞的松花江，到雪浪拍天的金沙江畔，从崇山峻岭的秦、巴云崖间，到那碧绿海潮起伏的珠江……都洒下了桥梁建设者的汗水，如今，万里长江上已修建起武汉、重庆、南



京、枝城等长江大桥，九江长江大桥正在修建中。黄河上，已修建起郑州、洛阳、济南等八座黄河大桥，还有一座十余公里长横跨黄河的特大黄河大桥也正在开始兴建。在全国，如今已在大江大河上修建起169座现代化的大型桥梁，总延长约一百公里长，相当于60座武汉长江大桥。特别是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把我国的桥梁科学技术又大大提高了一步。党中央对这座大桥的建成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把它写进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这极大地鼓舞了大桥建设者跨越江河，征服天堑，攀登高峰。三十多年来的桥梁建设实践，还培养了一大批的技术人员、技术工人、专业干部，涌现出许多的桥梁专家。现在，中国的桥梁建设者已有能力在祖国的任何江河上建造钢铁大桥。

今天，回顾以往，展望未来，我们大桥建设者感到没有辜负毛泽东同志的希望，没有辜负毛泽东同志视察时的教导。我们决心在党的十二大精神指引下，团结一致，排除万难，架桥铺路，当好先行，为使祖国桥梁建设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新贡献。

（原载《湖北日报》1983年12月25日）

## 毛主席视察武钢

刘文龙

### 引 子

井冈山革命时期，毛泽东就知道一首广为流传的民谣：“三斤毛铁四两钢，拿给铁匠打红枪，举起枪儿打老蒋，穷人要把家来当。”

星移斗转，敌对势力从海、陆、空封锁钳制，新中国负重羁旅在太平洋西岸，毛泽东要抵御和摆脱“包围圈”箭头构成的强烈磁场，他崇尚胸中制胜的法宝：一手托粮食，一手托钢铁，遇事不慌。

毛泽东殚精竭虑，为新中国告别落后的毛铁生产状况，先后曾4次莅临武钢视察，萦绕心际的回忆永远铭刻在武钢职工的脑海里。

### 一、弃船下水到武钢

毛泽东弃船下水了，要游到武钢去。

他说过，这次在汉期间，要一天游一次长江。毛泽东从来不愿事事循规蹈矩，不愿束缚他的个性，尽管已经65岁高龄，不让他下水他还真不高兴。今天，上武钢去看出铁，顺江东下，戏水逐

波，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独具一格的主意叫人叹服，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助兴而往。十多天前，北戴河会议正式确定了当年全国的钢产量要达到1070万吨，毛泽东约见张治中说：“我想到外地视察去，你可愿意同行？”

张治中喜出望外地回答：“那太好了，能够有这个难得机会！”

1958年9月10日，毛泽东一行抵达武汉，9月13日午饭后，毛泽东在王任重等同志的陪同下，从东湖宾馆驱车来到江边。太阳正当顶，天气炎热。一行人登船后，毛泽东忙着下水前的准备，等船驶到江心后，在护泳人员的陪同下，他顺着船舷的扶手下到江里，一口气游了二十多里地，经工作人员在江轮上大声提醒护泳人员，说船快到蒋家墩了，主席才出水回到甲板上来。

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上前给主席披上浴巾，接着用干毛巾替他擦水漉漉的身子，随后将主席送进船上的更衣室。此间，在船头的遮阳棚下，张治中钦佩地注视着江中游泳的毛泽东，手里摇着一柄纸扇——参观武钢的这一天，张治中不离这柄黑色的折叠纸扇，时而抖开扇面摇拂几下，时而合上扇面将扇骨插入衬衣的口袋里，一副清逸洒脱的神情。

不一会，毛泽东精神焕发地走出更衣室，他足蹬一双青布鞋，下穿一条宽松的灰裤子，上身穿一件白衬衫，并将衬衫的下摆扎进裤子里，显得整洁而又朴素。如果说他与众不同，只是随行人员大多穿短袖，或将长袖筒挽半截，而毛泽东习惯将两只长袖筒拉伸至手腕，并扣上袖扣。

9月的武汉，“火炉”还持续着盛夏的余威，毛泽东站在遮阳棚下，嘴唇吮了吮……李银桥看在眼里，会意地给主席点燃了一支香烟。毛泽东的烟瘾是很大的，因整天有卫士在身边，他很少自带香烟。这时，毛泽东像记起什么来，将一盒“中华”牌香烟放进裤袋内，李银桥明白主席参观工厂、农村，总忘不了自带香烟在身上。

另一名卫士端来一把椅子，请毛泽东坐下歇歇，主席点着头，却没有坐下来。毛泽东舒坦地喷了一口香烟，一手叉着腰，举目眺望着江轮右舷前方迤透的堤岸，青山已遥遥在望了。

青山脚下，厂房栉次鳞比，这是一副他搭架画棚供人绘制的油画！

早在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启程赴莫斯科，促成苏联援华兴建和改造50家企业，其中包括兴建武钢，可以说武钢的创建始端源于莫斯科，由毛泽东在此将武钢诞生的胚胎，移植于共和国建设的器皿中。遵照毛泽东“钢铁要过江”的指示，新中国兴建的第一座现代化钢铁企业的厂址，经有关部门建议“大冶一带有建厂条件”，勘探、设计以及干部的调配在华钢开始筹备。1953年2月19日，天快黑了，长江之滨的黄石港码头，一艘登陆艇徐徐靠岸。毛泽东出现在码头上，他在罗瑞卿的陪同下，坐进小车直奔华钢参观了炼钢、轧钢车间，并询问了第二钢都的筹建情况。1956年6月，武钢正处于紧张的施工阶段，毛泽东视察了广东后途经武汉，在东湖客舍特意用芒果款待了两位客人——武钢总经理李一清和副总经理韩宁夫。毛泽东听取了他们关于武钢工程施工的汇报，在共进午餐时隔着桌面，他伸手把整盘芒果推给客人，回手时把一块西瓜拢到自己身边，以开心的口吻说：“我吃西瓜，吐出瓜子。芒果归你们，吃了芒果，要吐出钢铁！”

毛泽东盼望着武钢一号高炉早日流出铁水。这一天，终于来临了！

## 二、活动房里满座生春

下午2时，江轮抵达蒋家墩码头，毛泽东一行登岸，武钢李一清、韩宁夫等人早在码头等候，随即请主席一行人上车离去。不一会，几辆乌黑闪亮的轿车鱼贯地驶入武钢厂区，在一排低矮的

简易活动房前停下来，李一清请主席下车稍事休息。毛泽东走进活动房，仰起脸来打量一下，伸出手指着房顶的石棉瓦，侧过头问李一清：“你们在这里办公？”

“是，主席。”李一清打开一台老式电扇，随风送过话去，“先生产，后生活，我们没有忘记战争年代。”

毛泽东点点头，感慨地说：“小米加步枪能打败国民党，活动房里也能流出铁水来！”

活动房并不宽敞，石棉隔层又不易散热，能挤进来陪伴主席的人并不多。毛泽东对党外人士是很注意礼节的，他向武钢的同志介绍了张治中先生。这时韩宁夫正拉开墙壁上厂区总平面图的帷幕，毛泽东见到有点面熟，一时记不起姓名来，便问道：“嗯……2年前见过一面，你叫什么？”

“主席，我叫韩宁夫。”

毛泽东听得明白，幽默地说：“你取了一个苏联人的名字喽，又是‘宁’噢，又是‘夫’喽……”引得大家笑开了，一片无拘无束的气氛。

毛泽东坐下来，满怀兴致地看着厂区总平面图，听取韩宁夫的汇报。毛泽东听得很认真，不时插话，首先关心地问：“什么时候可以出铁呀？”当听到三点半钟左右可以出铁的回答后，毛泽东进一步关心地问：“是不是有把握呢？”当听说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把握，但也可能有预计不到的万一，毛泽东笑了笑说：“今天看不到，我明天再来，明天看不到，我以后还来，总而言之，我三顾茅庐也要看到你们出铁。”

毛泽东满面春风，不断亲切地询问。当介绍到矿山的时候，他说：“你们矿里的铜也含得不少嘛，年产多少？”当韩宁夫回答了一个数字后，毛泽东笑着说：“看来，你们这个钢铁公司应该叫钢铁铜公司。”当介绍到炼焦能回收200多种产品时，毛泽东又问：“你们回收多少种？”回答说：“11种，有硫铵、粗苯、萘……”毛

泽东的思想跳跃得很快，立即想到了另一手也要抓紧的农业生产，对韩宁夫的回答很感兴趣，立刻插话说：“你们的硫酸怎样？那可是农作物的主要肥料，应该多产些。”有人回答说：“我们第一个焦炉一天产10吨，将来要提高到20吨。回收的11种，别的化工厂能提炼出180多种产品来。”毛泽东听后，指示说：“你们也可以回收，应该多搞些。你们这样大的企业，应该办点化学工业，办点机械工业，办点建筑材料工业，各种工业都办点，办成综合性联合企业。”当话题转到1号高炉时，毛泽东听说1号高炉有70多公尺高，12公尺直径粗，日产2000吨生铁时，他满意地说：“你们的高炉不同一般，应该叫大大高炉。”

毛泽东知识渊博，谈笑风生，每一句话都鼓舞人心。他感情外露，惯用通俗的语言来阐述复杂的道理，或表明喜欢什么及反对什么——尽管他的湖南话不太好懂，但人们听起来特别亲切、随和。

### 三、这次少，以后会多的

下午2时59分，毛泽东离开简易活动房，乘车驶向1号高炉。转眼工夫，毛泽东在车内还来不及抽完一根香烟，轿车“嘎”地一声在潮水一般的人丛前停下来。1号高炉出铁场上，聚集的武钢职工正翘首以待，当轿车出现在视线里，骤然爆发的欢呼声压倒了高炉风机放散的巨响，气球、彩带在人头上空腾跃飘曳，人人都想看上毛泽东一眼，争先恐后地朝轿车挤拥过来。

李银桥拉开轿车门，毛泽东左手指头夹着半截香烟，探身从轿车上下来，扬起右手朝人群致意，人人都想近距离看到毛主席，在欢呼声中将通道挤得水泄不通，只有几位肩扛摄像机的苏联专家在人圈外忙拍不停，他们也为中国人民与领袖的诚挚感情而倍受感动。人海里，卫士、公安人员奋力开道，而人群似乎凝结成

整体，随着毛泽东的步频而微微移动，欢笑声、鼓掌声、哭叫声响成一片。毛泽东经历过这种狂欢的场面，可以说以往在这种场合下不必留意脚下，而眼前打开的通道一脚踩下去，不是一道道铁轨，就是裸露沙石的场地，但他从下车开始，就一直满面笑容地向人群频频招手，不曾朝脚下投去一瞥。

在开道下，毛泽东挤出人墙，青布鞋踏上了高炉铁梯，来自中南海的女摄影记者侯波举着照相机抢步走在前面。铁梯口，高炉工地主任韩喜见主席上来，他伸手想扶一把，毛泽东微笑地摆了摆手，沿着铁梯一步步登上高炉炉台，那里等候着14位为武钢建设立下功劳的模范人物，他同大家一一握手。李一清把女焊工吴润梅向主席介绍，毛泽东和吴润梅握着手，问她今年多大年纪？吴润梅激动地说：“今年二十一岁。”毛泽东又问：“工作有什么困难吗？”吴润梅回答后，李一清拉着毛泽东的胳膊，又介绍另一位劳模：“这位是共产主义劳动小组组长、青年电焊工厉焕波同志。”毛泽东“噢”了一声，伸出手紧紧地握着厉焕波的手，重重地摇了几下。接着，毛泽东同炼铁厂副厂长周传典、技术员张寿荣等人握手问好。

然后，毛泽东登上炉前工休息室屋顶的小平台，这里是李一清等人经反复比较认为是视觉最宜观看出铁的地方，已摆上了几把藤椅和许多板凳。为了安全，在小平台边沿用几根楠竹交叉扎成护栏，并沿着护栏又摆上了一溜花盆——以阻止人靠前。毛泽东听到欢呼声，走近平台一侧的铁栏杆前，望着地面海潮般涌动的人群，再次伸出宽大有力的右手向人们招手致意。随后，因等看出铁，毛泽东招呼张治中、先进生产者们坐下来。高炉工地主任韩喜想紧挨主席坐下，又怕挤了主席，正犹豫着，毛泽东一眼看出他的心情，伸手按住韩喜的肩头挨自己坐下，并且递给他一支“中华”牌香烟。韩喜在惊喜之中，将这根香烟珍藏在口袋里，他接着从口袋里掏出火柴来，划燃一根火柴替主席点燃香烟，毛

泽东微笑地表示谢意。在激动中，韩喜仔细地端详着主席，见主席脸上渗满汗珠，回头从贾继福手里拿过一条白底蓝条子的毛巾想递给主席，毛泽东看在眼里接过了这条毛巾。

围坐在主席一旁的人，热情地伸手这里指指，那里比比，似乎要把整座高炉一古脑儿端在毛泽东的眼前。毛泽东微笑着，很有礼貌地顺从那迭迭四起的手势，将头转过来，又侧过去，耳里捕捉到一个陌生的字眼，便问：“什么叫斜桥？”

“往高炉上送料的设备，有称量车。”有人抢着回答。

“在哪里？”毛泽东站起来张望。

“在下面，主席您看不到。”

“唔……”毛泽东坐了下来，一边问：“这些设备是不是国内制造的？”

韩宁夫说：“大部分是国内制造的。”

李一清接着回答：“高炉上有些主要设备，像称量车、主卷扬操纵盘是苏联供给的。”

毛泽东点了点头。这时，武钢接待处处长吴杰同志，贴近毛泽东身边，轻轻地问：“主席，您喝点汽水吧。”

“什么汽水呀？”毛泽东应道。

“那是一种加了盐的咸汽水，供炉前工喝的，您也许不习惯这种味道。”

“不、不……”毛泽东摆了摆手，连连说：“我就喝工人们喝的汽水，一样的，一样的。”

吴杰打开汽水瓶将汽水倒进杯子里，递给主席。毛泽东手里端着杯子，不时喝几口汽水，也许这种汽水的味道还过得去，他老人家吮着嘴唇显得美滋滋的。吴杰在一旁，接过了主席喝完汽水的杯子，这时他留意到，毛泽东自上高炉后，总有一个不引人注意的习惯动作：提一提裤子。毛泽东穿的衣服比较肥大，腰带系得宽松，他老人家登炉台铁梯时，不时要提一提滑松的裤子，有



一次提裤子时没留神脚下，脚板滑了一下，吴杰正好在一旁连忙扶住了主席，毛泽东对他说不要紧。这时，吴杰见毛泽东喝完汽水，如同一位普通的老者一样，又习惯地提了提裤子便坐下来，同大伙在一块相融的氛围似一幅素描的“家常百乐图”。这时是下午3时25分。

1号高炉生产岗位上，李凤恩、包秀良、苏恒秀等先进生产者奋战在炉前。为了让1号高炉提前出铁，他们已是三天三夜没合眼，在炉前炉后忙碌不停。包秀良和苏恒秀操纵着最新式的电动开口机，只听厂长谢健发出“出铁”的命令，出铁口打开了，刹时间只见从炉内喷出大团大团焰火般的火花，紧接着风呼火啸地射出一道闪电似的烈火，照耀得满炉台大放光彩。站在二弯沟岗位上的李凤恩，兴奋地仰着头朝平台报告：“毛主席，铁水流出来了！”话未落音，火龙般的铁水猛然突出铁口，顺沙沟蜿蜒奔腾而去，一路噼啪作响闪出金花，从出铁台飞泻而下，垂挂成一束耀眼的火柱倾进铁水罐里。

平台上，毛泽东兴奋地站了起来，望着那汹涌奔流的铁水，满面笑容地同张治中指指点点，炉台上下欢腾的呼喊声震耳欲聋。这一刻，小平台上的人开始鼓掌，毛泽东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也居高临下地朝炉台上忙碌的炉前工们鼓掌致意……这似乎还不够，毛泽东兴致勃勃地朝护栏走过去，想更近距离地贴近工人们。一时嫌正前方的花盆阻止了双脚靠前，举步绕过去在一处没有花盆的护栏前站定，继续朝下笑盈盈地鼓掌致意，脚尖离平台边缘只有方寸之距……。张治中站在一旁，将毛泽东的举动看到眼里，他一时下意识地停止了鼓掌，右手拿着折扇，忙伸出左手抓扶面前的楠竹，那副神情似乎在试探用楠竹扎成的护栏牢固不牢固，担心毛泽东再往前走会有什么闪失……。

然而，第一炉铁水流的时间并不长，很快就断流，火龙消失。

毛泽东看在眼里，倏地收敛笑容，皱了皱眉头，将视线定定

地投在李一清的脸上，几乎不相信地问：“没有了么？”

李一清很镇静，简短地回答：“完了。”

毛泽东离开扶栏，把手一招，急切地说：“到前面看看，铁水流出多少？”

“主席”，李一清跟上毛泽东，忙说：“100吨。”

毛泽东摇了摇头，边走边说：“就出这么一点，再多一点嘛！”

李一清正要回答，谢健赶上主席，解释道：“第一炉铁只要温度好就行，少一点没关系。”

毛泽东听了这话，心里才一块石头落了地，他拍着谢健的肩膀说：“不要紧，会多的，会多的。下次我再来看！”他又兴致勃勃地朝下走去。

张治中跟着主席，这时用纸扇指了指耳朵，意思高炉风机放散的声响很大，问谢健：“风机多大？”

谢健回答：“4 250立方米。”

张治中在参观时，他对高炉的一切都感到新奇，印象里什么都“大一号”，新中国的成就同国民党有天壤之别。

迎着灼热的火浪，毛泽东下到出铁台。他的这种举动，超出了武钢同志预定的参观线路。按高炉安全操作规程应穿耐高温的厚底大头鞋上炉台，毛泽东等不及了，足穿青布鞋沿着铁水沟走到第一罐位上面的栏杆边，向下凝望着巨大的铁水罐里微微鼓动的铁水，这里的温度即使是炉前工也只能呆一会儿。随后，毛泽东便沿着出铁台前边的栏杆，向台下走去。炉前工人赶紧在沟上垫一块铁板，并铺上河沙，准备让毛主席跨过沟来，李凤恩还细心地拿开横在路上的两根钢钎，担心它绊住毛主席的青布鞋。李一清陪同毛泽东走过来，这位武钢总经理，个儿并不矮，但魁梧的毛泽东比他足高半个头，自迎接主席上了高炉，李一清的手、眼就不够用了，遇到通道上突伸的管道、阀门盘、铁什，他总是先行一步，用手掌捂着障碍物尖角部位让主席安全通过。这时，在

出铁台的沙沟边，一架悬臂式的钢铁构件拦腰挡住了主席的去路，李一清用手掌护着钢铁构件的顶端，温和的目光从镜片后透溢出来，示意主席绕一步走过去。

毛泽东没有举步，驻足好奇地打量眼前的这架钢铁构件：一根突兀竖立的钢柱，悬托着长长的铁臂，铁臂前端吊着一块板形物，另一端附着重重的铁砣，铁砣下吊坠着一串铁链……

“这是什么？”毛泽东刨根问底了。

“主席”，李一清从钢铁构件的顶端收回右手来，接着搀扶着毛泽东的胳膊，另一只手比划着回答：“这是沙沟上堵放铁水的闸门，开启很轻巧，用手工就能操作。”

“唔……”毛泽东明白了，不由将宽厚的手掌搭在铁臂顶端的铁砣上，暗暗地用力试了试，另一端的闸门就徐徐地提升起来。他老人家笑了笑，松手喃喃自语地下了结论：“这是利用杠杆原理，好。”

毛泽东走过沙沟，经过已三次见过主席的李凤恩身边时，李一清说：“老李，这次铁出的不多呀。”

毛泽东在一旁，亲切地看着李凤恩，笑道：“这次少，以后会多的！”

炉前工人正为此有点不安，听毛主席说这话心情轻松了许多，就在毛泽东视察后不久，他们为不断提高生铁产量而努力，日产量迅速突破了2千吨。

在高炉上，毛泽东还接见了苏联专家。苏联专家们排起队来，由李一清一一介绍，和毛泽东握手。1号高炉顺利出铁，苏联专家组组长巴杜洛夫向毛泽东道贺：“这么大的高炉，武钢要建4座。目前，苏联也只有3座，美国1座，这是你们的巨大胜利！”

巴杜洛夫怀着对毛泽东的崇敬，诚挚地说：“在武钢，我为工人和干部的良好关系很高兴。我作总工程师20多年了，以往从来没有这种感受。”

毛泽东谦虚地回答：“这是你们教育的结果。”

巴杜洛夫：“毛泽东主席，武钢第一期工程将全部提前竣工。我所率领的专家组，将尽全力帮助中国同志掌握全部生产技术。”

毛泽东坦然一笑，说：“太好了，感谢你们！”

当时，因大办钢铁，有几位女同志从北京下放武钢参加工业建设，她们在李一清的引荐下和毛泽东见面。因为她们过去在中南海工作，和毛泽东相熟。毛泽东和她们握手，一边诙谐地问：“你们的‘贾宝玉’找到没有？”问得这几位姑娘涨红了脸，李一清替她们解围，说：“这些姑娘们来武钢只顾炼铁，顾不着找‘贾宝玉’。”

#### 四、逃不过主席的眼睛

毛泽东走下1号高炉，沿着铁轨走向轿车，他还要去看出焦。周围的人担心主席脚下要被什么东西给绊住，默契地由李一清走在前，韩宁夫走在右，李银桥贴近毛泽东——这位卫士长几次寻找时机，想搀扶着主席的胳膊。毛泽东坦然自若地走着，一会儿想起什么似的抬了抬手，胳膊并没有让给李银桥搀住，而是十分自然地将松开的袖口给扣上了。临上车前，欢迎主席的人群又围了上来，毛泽东的青布鞋也给人踩了一脚……韩喜和谢健率人“殿后”，劝阻人群散开。

毛泽东一行来到1号炼焦炉，他在密密麻麻的铁轨中间停下来，向焦化厂厂长袁家柯详细了解焦炉生产和建设情况，仔细地数了数1号焦炉的孔数。一行人站在灼热的太阳下，李银桥给主席递上草帽，毛泽东摆了摆手，顶着火辣辣的阳光而毫无倦意地观看出焦。这时，第十三号孔的炉门打开了，通红的焦炭穿过火架车，像墙壁塌倒在消火车上，消火车带着红焦开进消火塔，冰冷的地下水立即把火熄灭，在塔顶上卷起巨大的蘑菇状的白烟，形

成了一幅宏伟壮丽的图景，毛泽东看得出神，一边问：“多少时间出一次。”

“平均九分钟一次。”袁家柯回答。

毛泽东看了看手表，说：“好呀，再看第二次。”说着，他脱下衬衣搁在手臂上，一副兴趣十足的神态，谁都感觉面前站着的是一个普通的人。

焦炉工人为了让主席在太阳下少站一会儿，不到三分钟，焦炉第二十三号孔打开了，出焦过程又重复了一遍。毛泽东欲离去，一边穿着衬衣，看到这一炉焦出炉时冒起了一阵黑烟，就问：“这一炉同上一炉怎么不一样？”

这也逃不过主席的眼睛，袁家柯如实回答：“主席，这一炉生些还有煤。”

毛泽东明白这是冲自己参观而缩短了炼焦时间，禁不住有几分心疼，脱口而出一句话：“那煤不是糟蹋了些。”转眼间，他体味到刚才说话的口气，便用缓和而又风趣的口吻说：“不要紧，还在空中，在地球上嘛。”这么一说，周围的人都吃吃地笑起来。

毛泽东视察焦炉时，在炉子上操作的工人，有的登上了炉顶，有的站在炉侧，有的跳到铁道边，有的从车子的操纵室探出了头，眼里含着激动的泪花，久久地凝视着毛主席，从心房里迸发出一阵阵的欢呼声。这时，参观的一行人正看得兴高采烈，忽然见到一个青年工人，从远远的2号焦炉连跑带跳地越过几道铁路线，直朝毛主席方向赶来，武钢党委副书记蒋占义吓了一跳，赶紧叫人上前去阻拦，毛泽东也看在眼里，阻止一旁的人说：“让他来吧。”这个青年叫陈家长，是焦化厂化验室工人，从厂前通过烧结厂赶来上中班，听说毛主席来视察，啥也不顾地跑了过来，陈家长到了毛主席跟前，喊了一声“毛主席万岁”，毛泽东亲切地和他握了握手，问他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又见他手里拿着一本书，主席问道：“你看的是什么书？”

“是一本《青春之歌》。”陈家长把书递给主席。

“唔”，毛泽东接过书，翻了翻书页，又问了陈家长的工作学习情况，陈家长一一向主席回答后，欢天喜地跑回去了。

据知情人介绍，毛泽东到武钢来，主要想多了解钢铁冶炼过程，多接触工人群众，但受保卫工作的限制。行动很不方便，他感到很不满足，对王任重说：“没有看好，人太多，受限制。不是我看群众，是群众看了我。要到晚上看就好了！”他的头颅里，又有了新的念头，要近日再一次踏上武钢的土地。同时，王任重体会到主席饶有余兴，与人商定再安排一次参观武钢，让主席尽兴尽兴。

9月13日，毛泽东离开武钢时，他微笑地望着李一清，又语重心长地叮嘱：“像武钢这样的大型企业，可以逐步地办成综合型的联合企业，除生产多种钢铁产品外，还要办点机械工业、化学工业和建筑工业等。这样的大型企业，除工业外，农、商、学、兵都要有一点。”

在炎热的天气里，毛泽东参观武钢高炉、焦炉高温区后，已是满脸汗渍，尘蒙肌肤，白衬衫也变了颜色，他回到东湖宾馆后，又跃入东湖畅游——这一天，他老人家为武钢顺利投产而高兴，也创造了自己的游泳之最：一天游了一江一湖。

## 五、铁样和烧饼

第二天，9月14日的早上，武钢李一清打电话，炼铁厂副厂长周传典带上铁样到了简易活动房，汇报说1号高炉出铁一炉比一炉多，含铁量也达到规定指标。李一清听后，从桌上拿起眼镜戴上，提起毛笔摊开信纸写上“主席”二字，一气呵成了2张信纸，向毛泽东报告“现在达到了铁水奔流”的喜讯。然后，李一清同周传典赶到东湖客舍去见毛泽东，事不凑巧，毛泽东正在东

湖游泳，张治中对他俩说主席一时还不能上岸，李一清就把报告和铁样一块留下，请张治中转送给毛泽东。

当晚7时整，毛泽东在洪山礼堂接见了武汉市先进工作者。在武钢代表中，筑炉工人刘楚勋赴会前还在工地干活，衣服也来不及换，买了5个烧饼就上了汽车，途中只吃了2个烧饼，散会后怀里揣着3个烧饼回到了工地。刘楚勋见到了毛主席，心情格外兴奋，班组的工人们为分享他的幸福，争着伸手抢这3个烧饼，最后每一个人分了一小块，这可是带去见了毛主席的烧饼啊！武钢工人对毛泽东的质朴感情，窥见一斑。

## 六、不辞辛苦登铁山

仅隔一日，1958年9月15日，毛泽东再次莅临武钢。他要让人民知道，大办钢铁不能搞无米之炊，必须促一促铁矿生产。按毛泽东巡视南方的路线，离开武汉将要去合肥，他没有沿长江直抵安徽，离开武汉驱车近100公里，抵达武钢大冶铁矿。

上午10时40分，一溜轿车进入矿区，直接由盘山公路开上尖山东露天矿场。毛泽东由张治中、王任重、张平化和黄石市委及武钢领导同志陪同，乘车来到尖山180米水平的平台上。大冶铁矿党委书记张品、矿长陈明江迎上前去，将毛泽东一行接到临时搭起的芦席棚里休息一会。一路行来，毛泽东的脸上汗水津津，衬衫上落满灰尘。接待人员给他送上毛巾擦汗，那干净的毛巾立刻染上明显的黄迹，接连换了三条毛巾揩擦，毛泽东才擦净脸上和脖颈上的灰尘。他的裤子上、青布鞋上也蒙上了赤褐色的矿尘，可见行色匆匆，真是一副“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气度。

出门就爬坡，毛泽东与陪同人员顶着烈日步入露天采场。矿区光秃秃，山石赤烫，为避烈日，毛泽东和张治中各人手里拿一把大芭扇，扇扇风、遮遮阳，矿区迎接主席只能这番因陋就简了。

毛泽东不辞辛苦，居高远望，目光被对面 2 座剥去了“绿色外衣”的山头吸引住了，问身边的陈明江：“这两座山头上在搞什么？”

“那是尖山和狮子山。”陈明江用手指着，“正在搞剥离工程。”

“有多少矿石？”毛泽东追问。

陈明江主管矿山生产，不假思索即回答：“1 亿吨。”

“恰恰是这么多，不多也不少？”毛泽东望着陈明江，风趣地笑着问，引得大家情不自禁地笑开了。毛泽东只要心中高兴，往往从平淡的话题里引发一种诙谐而有趣的回答，特别使初次见面的人消除拘束感。这时，王任重捡起一块矿石，上前送到毛泽东手上。毛泽东掂了掂手中的矿石，问：“品位有多少？”

“含铁百分之六十左右。”张平化答。

毛泽东显然懂矿，一听含铁量这么高，非常高兴地将手里的矿石递给张治中，并向他介绍矿石的含铁量，什么是富矿，什么是贫矿，铁矿一般含什么矿物。

这时，毛泽东盯着矿石，转头问陈明江：“大冶的矿石里有什么东西？”

“有铁、铜等 5 种矿物元素。”

“光要铁，其它的不要了？”毛泽东在提示，要注意矿石的综合利用。

“不，其它的也准备选。”陈明江回答。

“这里有没有长铜草花？”毛泽东听说矿石中含铜，便又问了一句。

“有。”采矿车间主任张松堂一边远远地应着，一边跑去摘来铜草花递给王任重，转到毛泽东的手上。毛泽东观赏着这种紫色的铜草花，要武钢提高选矿水平，搞好综合利用。

顶着烈日，毛泽东一行沿着采场掌子面而行，沿途欢呼的人群几次让人走不过去。张治中走在一个地方突然发现一只鞋被挤掉了，急得张平化喊道：“后面的同志们，快给首长找一找鞋子！”



一会儿，有人把张治中的鞋送过来，他穿上鞋不由得笑了，深为主席受人民拥戴而高兴。

毛泽东也兴致勃勃地向欢呼的人群频频招手，电铲司机王金忠正想伸手去握主席的手时，发现自己双手糊满了油，正在犹豫不决时，毛泽东已经把手伸过来了，紧紧地握住了这位矿工的手。在掌子面上，探头可见下方几丈深的作业区，有位电铲司机因离不开岗位，只好站在电铲棚顶上高呼“毛主席万岁！”，毛泽东便走到掌子面边沿，向这位矿工招手致意。

毛泽东刚才的举动，叫周围的人捏了一把汗，张品赶上前，对主席说掌子面边沿有爆破震裂的痕迹，人踩上去危险。

毛泽东听进心里，马上关心其他人说：“不要从外边走，外边走不安全。”

毛泽东在视察采场时，说：“搞基本建设还是采用大包干的办法好，这样可以大大地降低建设成本。”一路上，毛泽东特别关心矿工的安全。当他看到一个用石头砌成的窑洞时，便问：“这是矿工休息的地方吗？”

“不是。还在上面。这是避炮洞。”

毛泽东听说这是开采矿石的避炮洞，是关系到矿工安全的地方，忙笑着说：“我也进去避避炮。”他说着就进了避炮洞，坐在一个曾装过炸药的空木箱子上。毛泽东仰起脸来，环视着洞的四壁和洞顶，关心地问：“这个洞壁很薄，能顶得住石头吗？”

“小的石头可以顶得起。大石头飞不到这里。”陈明江回答说。

矿工们耳闻毛泽东这样关心矿工的安全，许多人都感动得热泪盈眶。矿工们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教导，从1958年以来，探明矿石储量已增至1.5亿吨，矿石品种也逐年增加，以铁为主，兼产金、银、钴、硫等多种矿物。

## 七、再次畅游长江抵武钢

1960年6月，毛泽东再次来到武汉，要畅游长江，决意从武昌下水，终点选择在武钢的码头上岸，并打算参观武钢一间技术革新好的车间——《鞍钢宪法》刚刚颁布，毛泽东在1956年撰写的《论十大关系》讲的是大的战略问题，中国工业企业到底怎么搞，还没有系统的放之皆准的说法，趁着鞍山来的这篇报告，批判苏联的“马钢宪法”，树立中国的“鞍钢宪法”。上武钢，看一看，促一促全国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热潮。

武钢接到湖北省委的通知后，当即做好了安全保卫工作，并选定动力厂供水车间让毛泽东参观。听说毛主席要来，动力厂党委书记刘绍文忙呼开了，决定在厂会议室还布置一个展览，将工人们自制的“无人变电所遥控装置”、“小型精密机床”、“绝缘超细玻璃丝”、“小电机”等20多种革新成果一古脑儿搬出来，让他老人家瞧上一眼。毛主席要来，茶水也要准备，茶杯、茶盘连茶炉也赶忙新购买，抽调一位姓梁的女同志当服务员。没料一阵瞎忙呼，省公安厅提前一天来人看了看，说给主席进口的东西，包括水、水果、茶叶均由省里运来，还用金属探测器在参观路线及展览室检查一番。省里的同志刚走，李一清、韩宁夫也来了，再三强调安全保卫工作，接着上展览室看了看，李一清笑了一下，说：“给主席看的展品，太少了把？”

“少是少了点……”韩宁夫满屋子打量一下，认真地说：“东西虽少，但表现了工人们和技术革新的热情。毛主席的时间很紧，展览不宜搞得太大，占他过多的时间。”

动力厂副厂长芦和煜在一旁，将一位神情腼腆的青年人拉上前来，介绍说：“他叫易志觉，是毛主席的同乡，担任讲解员，可以与他老人家讲湖南家乡话。”

武钢人心细，想得挺周全。

毛泽东游泳的那天，武钢市委常委都到码头去迎接。极目眺望，只见长江风平浪静，几只白鸥在江面上戏耍，气温炎热逼人。大家等了十几分钟，忽然见到江面上露出几片白帆，由上而下慢慢地向东移近，但目巡水面仍见不到人的影子，后不知谁喊了一句：“毛主席来了！”大家翘首向上游望去，果然看到那几只小船在前前后后摇摆晃荡，船的中间围成一个不规则的约有半个篮球场大小的“泳场”，里面有六七个人影在挥臂斩浪，并向码头游了过来，转眼间越游越近，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了，只见他时而侧游，时而仰泳，一招一式叫人眼热，不由联想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诗句。

毛泽东游到岸边，第四次踏上武钢的土地。他和陪泳人员一块上岸，已近67岁高龄，面容看上去比一年前来武钢时显出倦怠，大跃进费心劳神。毛泽东披上了睡衣和武钢的同志一一握手，以一种歉意的口吻道：“我今天累了，原计划参观一间车间免了吧。”是啊，他一口气游了30多华里，会水的青年也莫过如此。武钢的同志听了，全都感到失掉了一次和主席交谈的机会。毛泽东在武钢同志事先准备好的房间里更衣以后，再次和他们一一握手告别，走到早在码头等候的轿车前，探身进了车门……。

“毛主席走遍大江南北，他老人家还会再来武钢……”周围的人，用心声相送，甚至毛泽东自己，也相信还会再来武钢。

主席脚下的那双青布鞋离地，鞋底还沾着零星的武钢泥土……

这一刻，毛泽东不知道，他将脚板收进轿车里，已给自己生平某种行踪打上了一个句号，从此再没来武钢。毛泽东更不知道，那双青布鞋离地前的一瞬间，竟是自己最后一次足踩共和国钢铁企业的土地。确切地说，从这一刻直至他老人家逝世，毛泽东除了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对钢铁生产作过指示外，再也没有莅临

任何一家钢铁厂。据统计，毛泽东一生中（大多集中在50年代），9次亲临钢铁厂视察，武钢占四次，居各冶金企业之首。

七十年代，当一米七轧机似一根“神鞭”在华中腹地昂首摆尾，遗憾的是，毛泽东在晚年由于病体难支，他老人家最终没能再次莅临武钢，从而亲手去握住这根“神鞭”，按撤电纽驱动钢铁与电子的巧妙构思、高速和自动的珠联璧合而具有世界七十年代先进水平的轧钢流水线。1991年3月21日，武钢人曾将“神鞭”的模型送进北京，以供《首届全国工业企业科技进步成就展》展出，在北京展览馆掀起了“武钢热”……护送模型的武钢人，怀着虔诚的心情赶到毛主席纪念堂，在瞻仰他老人家的遗容时，不止一次默默地念叨：“春上，国务院号召学武钢走质量效益型道路，武钢人有今天与您老人家赐予的‘神鞭’分不开……”至今，无论何种身份的国人身临卧榻“神鞭”的厂房，无不使眉眼间充溢由衷的自豪感。

蓝天下，毛泽东默默地注视着世界，以一种永远固定的姿式将手掌伸向前方，日夜迎来送往上下班的钢铁大军。

那山，那水，在武钢厂门前的广场上，仍有一座在国内屈指可数的高大的毛泽东雕像！

## 毛泽东的孝感之行<sup>①</sup>

梁柏青

1958年11月14日下午两点钟，孝感县长风人民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朱朝启和全国劳动模范官木生、勤俭持家模范晏桃香、全国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方清官同时接到县委紧急电话通知，立即到县城集合，说有重要领导同志接见。其实，在10多天前地委主要领导同志叫王振明和他们几个人这段时间不要外出，可能中央有领导同志来视察。当时县委还安排管农业的副书记杨炳昌专门负责做好车站至城区公路两旁市容的整理和安全处理工作，安排县委办公室主任陈发志负责生活接待等准备工作。

3点多钟，他们几个分别风尘仆仆赶到县城，办公室的同志将他们安排在县委小三栋平房休息，并说县委王振明书记已陪地委王家吉书记坐吉普车先行一步了，马上第二车返回再接他们去孝感火车站。

初冬的天气，还有点北风，大家都穿上了棉衣。他们在休息室里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只是一个劲地猜测，心里像井里水桶七上八下，不断看表，总觉得时间过得太慢，心情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心直口快的方清官小声说：“反正是一位大首长，不是毛主席就是周总理！”

---

<sup>①</sup> 本文根据朱朝启、晏桃香、陈发志、张晓、杨炳昌等十多位同志回忆材料综合整理。

吉普车返回了，安排朱朝启、官木生、晏桃香三个人坐第二车。一会儿，吉普车一溜烟地来到了孝感火车站。车站街上，只见一些干部和公安人员在忙忙碌碌地张罗，车站门口是长风人民公社第二书记李盛君和车站一位党总支书记负责保卫工作。下车后，他们急急忙忙进入了站台，站台上站着的地区公安处张晓处长与他们点头示意。车站内一片寂静，似乎京广线火车已暂时停止了通行，只见一列专车（大概六、七节车厢）静静地停立在东段岔道上。他们三人在公安部和省公安厅的几位保卫人员引导下，登上了专列的第二节车厢。这时估计已到了4点多钟的样子。

他们先后登上了靠南边的第一节车厢，有五六个工作人员迎接过来，有一位同志详细询问了几位的姓名、职务和籍贯等。因为车厢里有暖气设备，大伙脸上满是汗珠。那位同志示意朱朝启把大衣脱下来，便顺手挂到了衣钩上。接着，由他引导三人向北边第三节车厢走去。

第三节车厢只有一个警卫人员在走动，三人走近第四节车厢的过道门口，门早已敞开着。在那位同志示意下，朱朝启第一个走进了第四节车厢。一进车门，一眼望见毛泽东主席和省、地、县几位领导同志，在一个铺着白布的大会议桌周围一齐站起来。毛主席高大魁梧的身躯，从靠窗口的东边绕过省委王任重书记的椅子向车门口这边走来。老人家笑容满面，双手和他们一一握手，并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你们好！”

他们三人不约而同地说：“主席好！”

毛主席见晏桃香还穿着棉袄，并说：“晏桃香，有暖气，热，快点把袄子脱下来。”晏桃香穿的是一件挑担磨破了肩的内衫，不好意思脱出来，只是连说：“不要紧，不要紧！”

大家坐下来以后，毛主席给他们三人一人一支香烟一个苹果。此刻，大家紧张的心情才一下子平静下来。记得，毛主席坐在东边中间，左边是王任重，右边是王家吉，桌子北边是王振明和朱

朝启；西边顺车厢过道和毛主席对坐的是官木生、晏桃香和省委副秘书长梅白；南边一方坐的是省委副书记王延春。

毛主席早已认识官木生和晏桃香，对朱朝启很陌生，因此笑着问他：“你叫什么名字？”“本地人吧？”还问了家庭成分和职务，朱朝启一一作了回答，毛主席顺手记在一个大笔记本上。这时一个身穿白罩衣的摄影师随闪光灯一亮就退了出去。

会议室恢复了平静，在他们到来之前，省、地、县领导同志已在和毛主席座谈情况。省委王任重书记汇报湖北人民在大跃进中干劲如何大，有一个司机三天三夜未上床睡觉，把汽车开得抵倒了电线杆才醒。地委王家吉书记汇报大办钢铁的情形，有的人为放“卫星”，几天几夜连着干，倒在平炉上睡着了。主席听了笑着说：“我也想睡下觉呢！”逗得大家直发笑。

省委副秘书长梅白继续汇报全省大跃进的典型，他提到孝感县长风人民公社复员军人官春官创造的“万斤田”，亩产万斤稻谷。毛主席听后，望着身边的王任重说：“我不相信。”王书记笑着回答：“虚中有实，实中有虚……”

提起“万斤田”，那是朱朝启和王振明书记陪地委农业书记冉砚农到现场去验收的。还有北京、上海和武汉的农业专家教授，如白思九、郑建南等闻讯后都及时赶到了现场。“万斤田”在长风大队的殷罗湾一个偏僻不显眼的地方，是一个复员军人和一个小伢两人搞的，他们是青年突击队，在那里改造落后畈，巧妙地用铁锹把几块田快黄的稻谷连根起成方泥块，掇到一块田里去了。验收时，只在禾场看谷堆，天也近黄昏，一过秤，花星也没仔细看，就这样成了一个亩产一万五千斤的“万斤田”的典型。验收后，冉书记当场就指示县委王振明书记写了一篇文章《万斤田飞上天》，并指示农业专家郑建南写了一篇评论《这是奇迹，这是事实》。不几天，即1958年8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见报轰动了全国。座谈会上，当毛主席问起这件事时，王振明、朱朝启两个都暗暗

有些自责。大跃进年代，在那种特定环境，他们哪有勇气向毛主席报告真实情况啊！只盼望主席不再追问，快快结束这个话题，害怕说长了捅了漏子下不了台。

接着毛主席将一支香烟，一面用手指慢慢掐着，一面问晏桃香对“挑灯夜战”的看法。晏桃香当时已是近四十岁的农村妇女：死了丈夫，勤扒苦做，把几个孩子抚养得很好。她的事迹见报后，陈毅元帅曾写诗赞颂她的精神。这时，她向毛主席报告妇女干劲大，妇女和男人一个样，但是夜里干了活，白天就没有劲。毛主席将掐好的那支烟卡成两半，放到烟咀里，擦根火柴点着后，微笑着说：“妇女和男人还是不能一个样咯！要关心她们，要执行‘三期照顾’（月经期、怀孕期、哺乳期），今年三月我在成都会议上就讲了劳逸结合么！”

毛主席深吸一口烟后，询问官木生。官木生说：“社员的干劲都起来了。比如我们长风大队官胡家湾有一个12岁的小社员胡春林，他破除迷信，挖自家祖坟，开荒扩大面积，日夜干。”县委王振明书记接过话茬继续向主席汇报这件事。毛主席说：“群众积极性越大越要关心群众，不要搞夜战，人过分劳累要害病的……”

最后，毛主席又询问到农业“八字宪法”贯彻情况，大家将孝感县的“五改”即旱田改水田、山坡改梯田、单季作物改双季作物、籼稻改水稻、高岗改平地的情况你一言我一语地告诉给主席，主席表示很满意，一时座谈会上空气非常活跃。最后，毛主席又谈到水稻产量有无潜力可挖时，大家都谈了自己的看法。朱朝启说：“要增产必须增肥，但肥施重了，水稻又要倒伏，没有办法。”毛主席打着手势说：“据专家们说，水稻根系很长，如果把土层耕深一点行不行？”当时，大家都好像认为毛主席说得有道理，于是地县领导同志当场表态，今后按主席指示去办，主席认真地记到了本子上。

座谈会已开了1个多小时，大家都怕影响主席休息，一时没



有人发言。这时，梅白提议：“主席，是不是下去看一下？”

主席点头说：“好吧！”

大家起身，毛主席在王任重、王延春等同志陪同下先走出了专列，其余一行跟在后面陆续下了车。

夜色初现，站台上静悄悄的，毛主席坐上了已预备好的轿车，其余的人由保卫人员安排坐上了吉普车。五六辆汽车鱼贯式开出了孝感火车站。街道两旁站满欢迎主席的群众，秩序井然，只听见雷鸣般的掌声，但没有口号声。

车子行到了城区三里棚地段，突然拐进了孝感驻军大院。据说地委原来安排毛主席在地区大礼堂接见地、县两级干部，现临时改在部队礼堂接见干部群众。为了有一段时间安排会场，就请毛主席在驻军礼堂（现空降兵十五军大院内）西面的小厅里休息。临时，由部队领导安排军人家属，公安处预审科副科长赵艳玲、地委办公室速记员肖淑芬二位年轻女同志先后陪同主席跳了两盘舞。

晚上7点左右，毛主席在驻军首长廖冠贤等陪同下，健步走进了大礼堂，径直走到前排安排好的小桌前，群情激动，爆发出暴雨般的掌声。主席体谅大家的心情，有意绕小桌子一圈，会场上所有的同志都幸福的见到了毛主席。

主席刚刚坐下，台上由地区京剧团名演员刘占奎和刘丽娟主演的京剧《打焦赞》拉开了序幕。这曲戏一结束，毛主席和省、地、驻军领导同志退场了，会场上没有一点骚动，继续观看县楚剧团演出的楚戏《赶会》。

第二天，晏桃香在县委大院被同志们团团围住，大家都要品尝毛主席发给她的苹果，晏桃香将苹果切成两半，一半切成好多小块让大家分享，一半准备带回长风人民公社的姐妹们尝尝。

过了五天，11月19日，毛泽东主席在武昌主持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六中全会。

## 忘不了，临江的那个金秋

郝启明

每逢金秋时节，一览棉海连天，银珠闪烁之际，毛泽东主席1958年视察临江黄柏山村的情景就浮现在眼前。在纪念他老人家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我们缅怀他老人家的丰功伟绩，追思他老人家对人民群众的无比深情，更加激发对他老人家的敬仰与怀念。

黄柏山村，现属湖北鄂州市临江乡，北临长江，南靠武黄铁路，武黄公路贯穿其中，是全市棉花等经济农作物主要产区之一，1958年系鄂城县旭光人民公社黄柏山大队。

解放前，临江贫苦农民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当地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临江得胜洲，灾害年年有，水涨一片白，水落尽沙丘，苛捐杂税重，穷人如马牛，芦花裹在身，乞讨四方走。”黄柏山村353户人家，就有300户种佃田、卖长工，46户讨米要饭，卖儿卖女。27位贫苦农民惨遭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军队杀害……，是共产党、毛主席把临江人民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走上了社会主义金光大道。

1958年，我正在旭光人民公社任党委书记。当时，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下，从中央到地方，层层解放思想，大胆试验，致力于发展农村经济。我们在旭光突出抓了两件事，一是社办工业，二是高产试验，引起上级领导的重视，被省里列为对外国人开放的重点单位，吸引了不少中外人士前来参观访问。

我们依靠集体经济的力量，先后办起了农副产品加工厂、农

具制造厂和颗粒肥料厂。农村办工厂，农民当工人，在当时是破天荒的事情，尽管我们的工厂规模小，厂房简陋，群众称之为“小小工厂”。但党中央、毛主席知道后很重视，称赞“小小工厂”是个“创举”，毛主席还亲自部署把介绍“小小工厂”的文章刊登在《红旗》杂志上，向全国推广。1957年以前，旭光的农业生产量偏低，棉花亩产几十斤，水稻亩产也不过五百斤左右。为了夺取农业高产，我们大办高产试验田，改良品种，推广栽培新技术、新方法。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同志也到旭光办了一块棉花试验地，并亲自扶犁耕耘。1958年，水稻、棉花普遍长势良好，丰收在望。8月底的一天，张体学省长匆匆赶来，神秘地对我讲：“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毛主席可能要到旭光视察。”消息传开，大家都兴奋不已，盼望着早日见到毛主席。

9月15日，晴空万里，阳光灿烂，临江大地充满丰收的喜悦。送棉、晒棉的人们熙熙攘攘，采摘新棉的欢声笑语在田野里荡漾。近12时，一队小车在临近武黄公路的一块试验地前停了下来。从一辆黑色轿车中走出一位身材高大、容貌慈祥的老人。啊！是毛主席，毛主席果真来了！只见毛主席身穿白色衬衣，米黄色西裤，脚穿一双圆口青布鞋，大步向棉田走来，跟随他的有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等领导同志，在黄柏山大队党支部棉花试验地边，毛主席停下步子，饶有兴趣地看了看写有高产目标的试验地标牌，用手比划着，朝身边的同志点点头，眼里露出赞许的目光。离地最近的黄柏山大队妇女队长廖继安迎上前去，毛主席握着她的手，问她叫什么名字，今年的收成如何？廖继安激动得泪流满面，并一一回答毛主席的问话。这时，很多群众从四面八方涌来，大家为能亲眼看到日夜思念的领袖而欢呼雀跃。毛主席一边向大家招手致意，一边顺着机耕路朝前走。一条又宽又深的沟挡住了去路，周围的同志劝毛主席不要过去，可毛主席笑了笑，摆摆手，迈大步跨了过去。在沟边，毛主席双手叉腰，抚摸面前的一株棉花，数了数满枝的棉桃，询

问身边的两位老农，“这一斗地能摘几多花呀？”

老农答道：“七十多斤。”

毛主席笑了笑，又问：“一斗田能收几多谷呢？”

老农兴奋地说：“现在能打五百多斤，今后一定不止。”

“对！对！”毛主席连声说道，“应该这样努力。”

时间一晃过去了近半个钟头，毛主席面带满意的神情，驱车离开临江，向黄石方向疾驶而去。望着远去的车队，我们激动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在兴奋之余，大家又为没有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没有留他老人家休息一会而深感遗憾。半个月以后，我们从《人民日报》得知，从9月4日至26日，毛主席的足迹踏遍了大江南北，先后视察了武汉、鄂城、黄石等地的工厂、学校、农村和矿山。毛主席的亲临视察，给我们这些在基层工作的同志以巨大的鼓舞，“应该这样努力”的亲切话语一直激励着临江广大干部群众发奋努力，发展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毛主席视察临江距今已过去34年了，农村已经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当年我们为之奋斗的亩产棉花超百斤，稻谷八百斤已经为双百斤棉，吨粮田所代替；“小小工厂”已成为遍及全国的乡镇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仅鄂州市现在就有乡镇企业13000多家，年产值13亿元。毛主席提倡的事业，正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遵循邓小平同志创导的改革开放中兴旺发达，发展壮大。

毛主席离开我们整16年了，黄柏山村人民在他老人家当年停留过的地头建起了一座纪念馆，簇拥纪念馆的仍是一片茫茫棉海。金秋季节，棉株昂首，花桃怒放，仿佛又在接受伟人检阅，仿佛在向前来参观的工人、农民、学生、干部表述临江人民的思念……。

临江的金秋，那个硕果累累、喜讯频传的金秋，总是那么令人难以忘怀！

## 后 记

在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之际,我们特此编写了《毛泽东在湖北》一书,以表达对这位伟大领袖的深切怀念之情。

本书由刘继增、毛磊、袁继成主编。各章执笔者为:第一章,王列平、刘继增(第四、五目);第二章,宋州;第三章,石波;第四章,马德茂、毛磊(第九目)、王列平(第十目);第五章,蔡放波(第四、五、六目)、宋州(第一、二、三目);第六章,谈方、宋州(第五目);大事记,袁继成。附录部分收录了王任重、刘惠农、林一山、刘文龙、梁柏青、郝启明、中共铁道部大桥工程局委员会宣传部等同志、单位的回忆和文章。宋州参加了全书的总纂工作。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办公室,武汉市博物馆,“八七”纪念馆,中共黄石市委党史资料征编办公室,政协鄂州市委员会,中共孝感市委党史资料征编办公室,湖北日报档案室,武昌造船厂厂志编纂办公室,中南财经大学党委、宣传部、科研处和

图书馆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与协助,也吸取和借鉴了有关专家、学者、当事人的研究成果、资料及回忆录,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毛泽东的足迹踏遍荆楚大地,其在湖北的实践活动丰富多姿,理论研究亦硕果甚丰,但由于水平有限和某些客观条件的制约,书中难免有疏漏和错误之处,尚祈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1993年3月底